

出版说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一。

布哈林一生著述很多，为了便于研究人员了解和研究布哈林的理论观点，现编译了这部《布哈林文选》。文选按照专题分三册出版，上册和中册收录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著作，上册包括1919—1925年的著作，中册包括1926—1929年的著作；下册收录布哈林有关政治经济学以及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著作。

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全文，只有少数几篇是摘录。所有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

每篇文章的脚注除注明“编者注”的以外，其它都是文章原有的注释。

1981年1月

目 录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
一 国家的一般理论.....	3
二 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必要性.....	8
三 民主制的破产和无产阶级专政.....	14
四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21
经济政策的新方针.....	26
一 经济政策转变的原因.....	26
二 “新方针”的基本任务.....	28
三 经济的战略和“新方针”的危险.....	31
四 大工业中的劳动问题.....	33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34
六 对新方针的一些基本的反对意见.....	35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37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 报告(摘录).....	63
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	69
论今日的取消派	107
一 无产阶级革命幻想的破灭.....	107
二 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109
三 论今日的取消派.....	112

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文化及其他

（答伊·巴甫洛夫教授）·····	116
一 科学自由的哲学和巴甫洛夫院士的理论·····	118
二 “科学的公正”或巴甫洛夫教授反对巴甫洛夫教授·····	123
三 关于世界革命的希望或巴甫洛夫的第一号死胡同·····	130
四 革命的客观意义和巴甫洛夫教授的思想的 第二号死胡同·····	141
五 内战的惨祸或巴甫洛夫教授的第三号死胡同·····	147
六 我国的文化建设。巴甫洛夫教授的第四号和 最后一号死胡同·····	151
结 论·····	161
马克思主义者列宁 ·····	162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163
二 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	165
三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	171
四 列宁的理论与实践·····	178
五 帝国主义。民族问题。殖民地·····	183
六 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	186
七 工人阶级和农民·····	189
八 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	192
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 ·····	202
一 经济高涨和阶级配置·····	202
二 掌握经济领导权是当前的任务·····	204
三 目前局势下的经济和政治·····	210
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	214
一 共产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王国”？·····	217
二 “吞没”小资产阶级经济还是对它进行改造？·····	222

三 阶级奴役还是阶级联盟和阶级领导?	226
四 工农联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经济“政策”.....	229
五 垄断的寄生性还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	235
六 从政治观点看工农联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同志的立场.....	240
七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规律”概观.....	242
不断革命的理论	248
托洛茨基主义的形式逻辑和列宁的辩证法.....	249
对我国革命的一般估计.....	257
对我国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的一般估计.....	265
我国革命的阶段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	272
我国革命的特点.....	282
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1923年10月的教训).....	292
一 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阶级(无产阶级的基本战略路线).....	293
二 经济结合问题和反对派对问题的总的提法。所谓 “工业专政”.....	299
三 关于“计划”问题.....	306
四 价格政策.....	312
五 币制改革.....	321
六 社会主义积累和同私人资本的斗争.....	328
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	338
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	353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合作制 问题的发言	380
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	390
一 我们正在摆脱贫困。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没有 地主和大资本家的经济.....	390

二	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取得了胜利?(工农联盟)	393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	399
四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斗争	404
五	旧制度能怎样偷偷地回来	410
六	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413
七	工业和农业应当互相帮助	421
八	合作社的发展和农村的阶级斗争	426
九	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形式	429
十	我们应当把宝押在谁的身上?	437
十一	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对不同阶级的不同意义	443
十二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449
十三	经济上的不平等及其克服	455
十四	政治上的不平等, 它的克服以及一般政治的消灭	462
十五	领导的正确政策的保证和共产党	466
十六	国际革命和苏联	471

革命面具下的凯撒主义(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书)	477
一	世界危机与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478
二	路标转换方针。苏联的经济“蜕化”	489
三	经济学的辩证法。“热月”。“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化” 和阶级	499
四	革命和进化。对列宁的诬蔑。“时代的哲学”。 法西斯的凯撒主义	517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①

“归根到底”任何理论都有实践的根源。如果这句话对任何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来说就“倍加正确”了。社会科学是推动一切的看得见的动力，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原理表现得特别鲜明。

然而，理论要推动群众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理论本身必须是正确的理论。而理论要成为正确的理论，它就应该满足某些共同的“方法论上”的要求。

历史性的要求就是对社会-理论学说所提出的这种要求。这就是说，对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必须按照它，并且只有它所特有的那些特点来理解；昏头昏脑地重弹“永恒的真理”，絮聒那些自由主义的有学问的笨牛们才说得出的令人作呕的谰言是同真正社会科学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学者，还是已经土崩瓦解的第二国际“活尸”中那些夸夸其谈的饶舌者，都不能理解这种实质上是深刻的、革命的辩证观点。考茨基就是他们的样板。

帝国主义时代一开始，历史就向工人阶级提出任务：第一，理解发展的新周期；第二，对它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这时，考茨基终于惊慌失措了，而他那可怜的嘟囔，他那撒向德国无产阶级的纯真的（同时也是有毒的）美妙的圣水，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卖，而在实践上则导致彻底的背叛。考茨基完全不理解帝国

^① 载于《十月变革和无产阶级专政》论文集，莫斯科 1919 年版。

主义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质。他只把帝国主义看成历史的偶然现象，看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罪孽”和病态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可以由仲裁法庭和裁军的符咒和公式，即从贫乏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那里租来的公式治好的。结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不是别人，正是考茨基用“敌人的入侵”来恐吓工人，并赞扬谢德曼之流的政策——“保卫”资产阶级强盗祖国的卑鄙政策。

现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来到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直上升的曲线，开始急剧下降了。资本主义瓦解时代来临了，紧接着这个时代而来的，将是在内战的苦难中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一个使胆怯的卑鄙的灵魂感到更加“不舒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在这个时期，布利丹的驴子^①的理论也好，实践也好，都无立足之地。在这里，需要的是选择和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战争期间一直舔（虽然是文质彬彬地舔）将军们的皮靴的、鼓吹“小心谨慎”的考茨基，现在竟然操起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向苏维埃共和国泼污水的崇高事业，为此，大受上司的赞扬。如果从逻辑方面来研究他的“观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又会发现他完全没有能力对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完全没有能力不从泛泛空谈的观点、而是从革命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最辉煌的战果，应当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看作国家政权的特殊形式，不管唐恩、克伦斯基、考茨基和谢德曼这班老爷们愿意不愿意，它是必然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的。

但是，要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就必须象德国人所

^① 法国十四世纪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写的一篇寓言，讲到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外形和质量完全相同的干草，因不知选择哪捆是好，结果活活饿死。——编者注

说那样，首先来“讨论讨论”一般国家问题。

一 国家的一般理论

即使看看纯理论评价方面，也可以发现，大战期间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正是在这一领域后退了多大的一步。从前理应视为无耻的空谈的东西，现在却被奉为当代战斗的“科学”交易所中的宝贝。成年人说的话也象两岁小孩那样含糊不清。现在各国谢德曼分子和唐恩分子发出的嘟嘟囔囔的声音，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因此，如果我们首先提起某些“已被遗忘的言论”，请读者们不要对我们抱怨。

关于国家的各种各样“定义”真是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姑且不谈把国家视为某种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本质、“超理性的本源”、“道德观念的现实”等等的形形色色理论。我们对法学家的大量理论也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从形式的法律的说教这种狭隘观点来看问题，老是在通过法律给国家下定义或通过国家给法律下定义这个循环论方法上兜圈子。这样的理论不能提供任何有益的知识，因为他们缺少社会学的基础，是空中楼阁。只能把国家理解为社会现象。所以，需要有社会学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最一般的组织，它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和扩大对被奴役阶级进行剥削的条件。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既然我们谈的是阶级）也是统治、政权、奴役的关系。诚然，公元前 2500 年，在著名的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中就载明：“执政者的目的就是在国内保障法律，消灭邪恶，使强者不致损害弱者。”^①现在还有人郑重其事地把这些田园诗般的

^① 瓦普洛维奇：《国家理论的历史》，因斯布鲁克 1905 年版第 8 页。

蠢话的主要精神大加吹捧。^①这个“真理”和企业主同盟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工资的说法如出一辙。事实上，既然存在国家政权的自觉调节组织，因而，可以一般地谈到目的的安排（以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为前提），那么，这些目的就应该由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只能由这些利益来决定。所谓“公益的职能”，只不过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正象任何一个辛迪加组织的目的（我们强调的正是问题这一方面：组织的目的）决不在于为自身生产，而在于谋取利润和超额利润，虽然人类社会没有生产就不能存在。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公益”职能，就是对被压迫阶级，首先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最长期、最有效的剥削的条件。这些职能的演变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第一，指挥阶级的直接利益（没有铁路，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因此，就修建铁路；民族的过分退化使国家失去它所需要的兵源，因此，就采取保健措施，等等）；第二，出于反对被压迫阶级的战略考虑（在下层压力下所作的所谓“让步”），在这里对上层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是那个为剥削过程创造最有利条件的“节约力量的原则”在起作用。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调节国家政权行为的原则，只不过是这些利益打着“民族”、“整体”、“人民”等等的虚假利益作幌子罢了。无论在哪里，国家都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组织，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②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最一

^① 参看《国家科学袖珍辞典》中劳宁的《国家》条，维戈索斯基，《国家与经济》，政治手册等，或新书之一，耶路撒冷：《从社会学观点看战争》第61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同上，第168—169页。〕“政治正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法，一种保存和扩大财产的工具。”（阿基莱·罗勒阿：《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巴黎1903年第2版第362页）

般的组织，它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社会分化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衍生物，而决不象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奥本海默）所断定的那样，是外国征服者集团赤裸裸的暴力的简单产物，其实，这些人在这一点上只是拾取臭名昭著的杜林的牙慧。请看弗兰茨·奥本海默是怎样给“历史国家”下定义的：

“从形式上看来，它（国家）是胜利的集团强加于战败集团的一部法典。它的内容是有计划地剥削（“Bewirtschaftung”）被统治的集团。”^①——这位作者写道。

“阶级是依靠政治手段建立的，并且只有依靠政治手段才能建立。”^②

因此，在奥本海默看来，阶级只是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变了形的集团，而根本不是经济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儿。阶级的出现纯粹是同“非经济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关于“阶级起源”和国家的理论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这就是：具体的历史就是暴力和掠夺的历史。但是，问题决不到此为止，因为实际上，如果在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中缺少存在和产生的足够基础，那么无论是“法律设施”，还是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都不能够产生和存在下去。对于作为基本的社会范畴的阶级的出现和巩固来说，这个基础就是因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而产生的经济分化。^③

① F·奥本海默，《国家与社会》，政治手册第117页。另见他的《国家》。他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的论述见他的《纯经济与政治经济的理论》，柏林1911年第2版。

② 《国家与社会》第115页，《国家》第9页。

③ 见G·席摩勒（年鉴，1890年，第72页）：《分工之本质与社会阶级之形成》。席摩勒在这里批判了龚普洛维奇，但是，对历史真实情景过于“轻描淡写”了；还可参看他的《分工的事实》，1889年版。一般理论观点见杜尔克海姆：《社会分工》巴黎1893年版。

阶级的形成在逻辑上决不是以征服为前提的，历史也向我们提供了不经过任何“征服”而形成阶级的实例。在北美洲，国家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诚然，人们对于北美洲封建主义和土地贵族统治的萌芽往往估计不足^①。但是，按照“纯征服论”的观点，美洲资本主义关系的进化就全然不可理解了。

这一类理论结构似乎很激进，但推其根源却在于进行辩护，因为这里攻击的不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即私有制，而仅仅是私有制的垄断形式，仿佛这种垄断的变形不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形式的合乎逻辑的历史的继续。其实，正象阶级一样，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②

如果认为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普遍组织，那么，就必须承认国家是历史的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正如资本在马克思看来并非物，并非生产资料本身，而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一样，国家的“本质”并不是它的技术行政作用，而是由行政技术的外衣掩盖起来的统治关系。^③但是，由于这种统治关系是社会阶级结构的表现，因而，国家也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由此可见，国家不但有它的历

① 这一点可参看迈尔的《美国几家巨富发迹史》。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3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无论是奥本海默的实践要求“体系”也好，还是他的“自由社会主义”也好，都证明了奥本海默的理論的产生有着我们上面所说过的那种社会背景。奥本海默的“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退回到“按劳动”“公平”买卖的简单商品经济上去。

③ 顺便提一提，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著名代表人物伦纳先生，在他载于《斗争》杂志上的一些华而不实的文章中，也许打破了伪造马克思学说的一切纪录，他论证“自卫”口号的理由是：照马克思说来，资本是社会同样需要的两极，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一种关系。伦纳只忘掉了一件小事，即马克思从来想都没有想过要使这些关系永世长存，而且更没有想要在彼该国家的范围所限定的关于这些关系的定义中使这种关系永世长存。

史的起点，而且也有它的历史终点。马克思写道：“连激进的和革命的政治活动家在揭露自己同时代人的狭隘观点时，也不是在国家的实质中寻找祸害的根源，而是在现存的某种国家形式中去寻找，他们要用别种国家形式来代替这种国家形式。”^①恩格斯说得更坚决，他肯定地写道：“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力（Autorität）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国家应当“消亡”（absterben）。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把国家放到未来社会古物陈列馆，“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③以上引文（当然，还可以增加）决非出于偶然，而是恰恰相反。这里显示了马克思方法的特点，它并不把社会现象看作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范畴，而看作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产生和消失的暂时现象。由此可见，这不象某些批评家所想描绘的那样是术语上的争论，正如关于野蛮人的棍子是资本或不过是棍子的辩论完全不是术语上的争论一样。^④在马克思看来，区分的标准即逻辑分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类型，而不是被偶像化地歪曲了的“表面现象”。把社会发展理解为这些类型（“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实也是马克思的任务。他正是以这种方法来考察国家问题的，即把国家问

① 马克思：《批判性的边注》，遗著第2卷第5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8页）。

② 恩格斯：《论权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编者注

④ 阿道尔夫·瓦格纳在《从国民经济观点看国家》中写道，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国家的所有“最高级”的特征，因为现代国家的阶级色彩是“破坏社会秩序”和“非法行为”。所有这一切胡言乱语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结构中都是一模一样的（柏姆-巴维克、克拉克及其一伙）；在他们看来，资本不是统治关系，而仅仅是生产资料；“非法行为”（例如，放高利贷）根本不重要；在未来的社会中也会有资本和利润，等等。

题看成广泛的社会经济范畴——阶级社会——的一种政治表现。正如抱着静止不动的、非历史的观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理解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特殊观点一样，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观点。例如，龚普洛维奇说过：“马克思的理论对国家有新的相当正确的理解。”但是……“社会主义严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相信：仿佛国家将使自身成为多余的东西。”^①“激进的”龚普洛维奇就是这样说的。他的其他的同行们由于自身地位已经不能够理解马克思了^②。

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没有国家的社会，因为这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可是，如果共产主义否定国家，那么，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不厌其烦地谈论的工人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下面回答这一问题。

二 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必要性

先说一点小意见。从考茨基为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写的一本专门小册子（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前社会主义者的叛徒行径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我们在这个被抛弃的思想的“作品”中，顺便发现了这样一个绝妙之处：“在这里（即为了替自己的专政辩护。——尼·布·），人们（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③在考茨基看来，被马克思本人看作是

① 龚普洛维奇，前引书第1卷第373页。

② 例如参看耶利内克：《国家通论》，柏林1914年第3版第89、194、195等页。他有趣地承认，“暴力理论”“Machttheorie”引起“疯狂和灾祸”，因为“它开辟了不断革命的道路”，第196页，以及“暴力理论的实际结果不是建立、而是破坏国家”（第195页）。

③ 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60页。“在这里，人们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

革命理论的基础的整个专政的学说，竟然变成了偶然在“一封信中”无意说出的空空洞洞的一个“词儿”！无怪乎考茨基把专政的理论看作“新”理论。

但是，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新”理论。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需要有工人阶级的临时国家组织，需要有工人阶级的专政，因为他看到了这是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历史阶段的必然性，这个历史阶段将有其专门特点，使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又不同于没有国家的合理的社会的共产主义时期。

这个时代的特点就在于，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无产阶级，不得不考虑到资产阶级将会通过各种形式继续反抗。正是为了制服这种反抗，工人阶级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牢固的、无所不包的也就是国家的组织。

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具体现实提出来的这一问题要抽象得多。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所选用的是“纯粹”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不掺杂任何旧的生产关系残余、任何“民族”特点等等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马克思在提出工人阶级专政的问题时，也是把它作为一般的工人阶级专政问题，作为消灭资本主义的纯粹形态的专政问题提出来的。

如果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上提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提出最广泛的专政的代数公式的话，那就根本无法提出问题。

现在，社会斗争的经验使得我们能够从各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具体化。首先，这一经验指出了工人群众必须建立最坚决的、真正铁一般的专政。

社会主义革命，即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到的暴力变革，并不是指挥棒一挥就会立即在所有国家中实现的。生活本身要比“灰色的理论”复杂得多。资本主义的外壳不是在各地同时破裂的，而是首先在资产阶级国家组织最脆弱的地方绽开的。在那里，摆在

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退外来敌人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整个发展进程必然要驱使它去破坏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列宁同志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首先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问题。^①

同时，这也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显然，宏伟的世界变革，将包含着已经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防御战争和进攻战争，防御战争是为了打退进攻的帝国主义者；进攻战争是为了彻底击溃退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动仍在受压迫的民族起义，为了解放殖民地，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成果。

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但是，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有组织的整体，而是一个用一切手段互相角逐的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无政府主义体系^②。然而，它是一个世界性体系，它的各个部分都是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如此，欧洲战争变成了世界大战。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经济的相对分散性加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状况，使得世界大战不是一下子发生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逐渐被卷入战争的过程。意大利、罗马尼亚和美国的参战时间要晚得多。但是，正是美国的参战使得这场战争变成了遍及两半球的战争，即世界大战。

世界革命的发展也有相似之处。资本主义衰落和无产阶级起义是一国接一国发生的过程。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因素，帝国主义战争，民族独立起义，国内战争，最后还有组织成为国家的资产阶

^① 参看大战期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共产党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的文章。这些文章也转载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合著的《反潮流》一书。

^② 对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分析，见我们的著作《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版。

级(帝国主义国家)和组织成为国家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阶级战争,都离奇地交织在一起。

但是,事件越发展,阶级战争的因素就越尖锐地突出到首要地位上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谈论不休的著名的“人民同盟”,所有这些“国际联盟”和社会叛徒集团口里吐出来的其他废话,事实上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共同扼杀社会主义起义而建立神圣同盟的尝试^①。马克思曾正确地指出,革命的政党使反革命的政党联合起来。这一论点用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上也是正确的:世界革命的进程,或者象现在完全有权名之为“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使国际资本的力量联合起来了。

但是,此种“国外”局势不能不具有巨大的“国内”意义。如果不存在外部帝国主义力量,那么在公开的阶级冲突中被推翻、被击败的本国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指望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的阶级瓦解过程就会快一些,与此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的专门镇压机关,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随之消失。

然而,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某一个国家中或者在某两三个国家中已被推翻和被击败的资产阶级,还有着外国资本作为强大的后备军。因此资产阶级的反抗将旷日持久。俄国革命的经验就光辉地证实了这一点。进行怠工,搞阴谋诡计,煽动叛乱,组织富农暴动,成立以旧日的将军为首的匪帮,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冒险,建立靠外国人的刺刀和钱袋支持的无数边区“政府”,最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向苏俄发动的讨伐和进攻——这一切都属于同一类的现象。

从历史事件这种完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进程中可以而且应该

^① 美国的第一流帝国主义分子,同时又是和平主义联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塔夫脱先生,就曾经公开地谈到这一点。他所指的“和平”首先就是国内和平,因此,他准备把和平的破坏者即工人淹没在血泊之中。

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我们面临的是整整一个你死我活的极端残酷的斗争时期；第二，为了尽快地渡过这一时期，就必须有一个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制度。在这里，策略法则是从有一切根据的科学预测中得出来的。

当然，世上的一切都是可以争论的。有一些可怜的诡辩家，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说一些烦琐的没完没了的无聊废话。考茨基恰好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含义。现在，他不能理解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含义。这位“工人”领袖写道：“我期待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采取和资产阶级革命全然不同的特殊形式；同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民主制已经扎根的一切地方用经济的、立法的和合乎道德的‘和平’手段进行斗争。”^①

当然，很难同叛徒们进行争辩，他们学识渊博，以致把塔夫脱的骑兵长统靴都看成民主制。

但是，在我们眼前就有一个民主制确实在那里“扎了根”的真正民主制国家的例子，这就是芬兰。而这个独一无二的国家的例子证明，在比较“文明的”国家中内战必然会更加残酷、更加无情、更加排除使用“和平的”和“立法的”(11)方法的任何基础。

考茨基企图确定，马克思所指的专政其实不是专政，而完全是别的什么东西，他说，因为“专政”一词只能用于个人，而不能用于阶级。但是，恩格斯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只要引一下恩格斯的意见，便可以知道考茨基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多么远了。恩格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时写道：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

^①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18页。

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大少了吗？”^①

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未来的情况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现在，当这种观点已在我们面前得到经验的证实时，还谈“和平”和“立法”的道路，简直太可笑了。

已经开始的革命时代要求采取相应的方针。如果这个时代是正在发展成阶级战争的前所未闻的阶级搏斗的时代，那么，工人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便应当具有特殊的军事性质，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在这里，正如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社员所说的那样，具有“冲天”精神的阶级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权形式，即专政政权的形式。

考茨基认为，马克思写到专政的时候，他写的并不是“政体”（Regierungsform），而是“实际状态”（einem Zustande）。事实上，马克思所写的大大超出了“政体”范围。他写的是新的非常特殊的国家类型。在考茨基“批驳”本书作者所写的关于专政的提纲^②的那一页上，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而完全不是偶然的“状态”。

总之，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隔着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还保留着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国家政权。在这里，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它在使自身消亡之前，应当镇压自己

^① 恩格斯：《论权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4页〕。俄文的译文引自列宁同志的名著《国家与革命》。由于这本书里非常详细地选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我们认为在这里再摘录引文是多余的，请读者们去读伊里奇的著作。

^②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苏黎世自由青年出版社版，本书也译成波兰、芬兰等国文字。

的一切敌人，改造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三 民主制的破产和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制”和工人专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具有最重大实践意义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按照纯理性的方式臆造出“管理形式”的。他们抓住了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使自己的目标符合这种趋势。对于专政问题应当也只能抱这样的态度。

同时，必须记住：政治形式是一定的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它反映了各个阶级之间的一定关系；政治外壳如果在阶级关系的结构中找不到自己的基础的话，它就必然会化为灰烬。

我们在上面对这个开始到来的时代作出了总的评价。这是越来越激烈的正在转化为有组织的阶级战争的内战时代。因此，我们应当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内战同民主制形式符合不符合的问题。

但是，先说一点小意见。我们的对手，其中包括考茨基，他们把民主制说成是某种现存的东西。但这是一个明显的谎言。现在并不存在民主制国家。现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存在的是金融资本专政。这正是发展的起点。

因此，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在国内战争时代能不能按照到处已被金融资本吞噬了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形式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民主制这个词既然指的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一种最精巧的形式。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许许多多被巧妙地用来长期愚弄群众的虚构的东西。全民意志、“民族”、“整体”观念，就是这种虚构的东西中

的主要一种。整个民主设施的体系是建筑在“全民性”的基础上的。“全民性”准则的阶级含义是不难理解的。谁都知道，的确存在一些有着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谁都知道，实际上根本谈不上什么能把工人和资本家联合在一起的“全民意志”。但是，资产阶级需要，而且必须有虚构出来的“全民族的”东西。资产阶级是当权的少数派。但是，正因为它是少数派，为了使群众俯首听命，必须以“全民族”的名义说话，因为它不能公开地代表一小撮人说话。所以，就编造出了全民意志这类谎话，资产阶级出来代表民族和“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则出来代表全体人民的“祖国”。

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对国内和平的破坏，它是一场国内战争。正是国内战争暴露了分裂成阶级的社会的真面目。那种所谓全民族的虚构的东西，恰恰就在国内战争的烈火中被烧得一干二净，而不同的阶级都手执武器分别站在革命街垒的两边。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一切贴着“全民族”标签的形式、机关和设施，都必然土崩瓦解，这是毫不奇怪的。不管个别人、个别集团、甚至某些中间阶级愿意不愿意，这仍然是一个完全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绝对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国内战争有它自己的逻辑，一旦发生内战，那么也就会出现资产阶级以代表全社会作幌子进行统治的旧形式土崩瓦解的过程。

某些同志还在十月革命前就提出来的这些观点，现在又一次得到经验的证实。不管拿哪一个领域来说，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全民族的、“普遍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设想的，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下是不可能的。

我们拿任何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军队来说吧。任何一个非空想主义者都明白，全民族的军队在现在是不可设想的。无产阶级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自己的军队；而苏维埃共和国正在建立工农红军。让强迫征募来的工农参加军队，这对资产阶级来说

越来越危险了，所以它不得不建立白卫军。在试图建立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为首的“全民族”军事机构（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力量的“国民军”）的那些地方，这个机构必然要四分五裂，陷于灭亡，因为它的结构在目前情况下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在一切地方，直到经济领域都同样如此：在一个工厂中，不可能有资产者和无产者“两个阶级之间”的共处；共同的“住宅委员会”正在瓦解，由贫民的住宅委员会取而代之；共同的村民会议日趋解体，由贫农委员会取而代之；在市政局内，那些手执武器在街头交战的人，不可能坐在一起，它要由工人阶级的苏维埃各部门来取而代之；由于同一种原因，立宪会议不可能存在；旧议会连同形形色色的全民宪法都被炸得粉碎。

当然，可以说在所有这些议论中存在着一个逻辑错误，这一切不过是窃取前提罢了，在这里，不是对布尔什维克行为的合理性加以论证，而只是记述这些行为。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我们的敌人，即“杜马”和“立宪会议”的狂热拥护者们，仅仅是在口头上拥护普遍民主的公式。要知道，代替立宪会议的只是一个右的，也就是阶级的部门，而在各级杜马以及西伯利亚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中，都曾庄严宣布，他们那里有普选权，但反国家政党的代表即布尔什维克，从而也是工人阶级没有存在之余地。

如果以为这一切不过是偶然的、“病态”的现象，那就未免可笑了。事实上，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能联结在一起的那些东西正在这里土崩瓦解——使这些东西联结在一起的唯一条件是：无产阶级还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麻醉之下；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把自己看作是不能改变的整体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胜利，完全和最终胜利，它的世界胜利，终将在新的基础上，在整个社会失去阶级性的基础上重建

社会的统一。那时，完全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才会实现。然而，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必须经历一场除专政之外不能容忍任何别的形式的激烈斗争；如果工人阶级获胜，就将建立工人专政；如果资产阶级获胜，就将建立资产阶级及其将军们的专政。

可以从略微不同的观点上来观察问题，虽然实际上在这里谈的是同一回事。可以挑出基本的阶级力量，看一看谁能执掌政权。考茨基在1905—1906年写道，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种“特殊的”革命，现在却在俄国金融资本形成12年之后，把百倍成熟的十月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如果历史的发展也象考茨基本人的发展一样是向后倒退的话，那当然应由资产阶级来执掌政权了。但是，资产阶级想要建立的却是无产阶级决不想要的将军们的军事专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是不能掌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码常识。农民现在在分化——我们农村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可是，农民的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起独立的作用。剩下的只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政权不但把大资产阶级，而且也把“中间等级”送上拷问架。不过，无产阶级强大得足以领导贫民来粉碎自己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有别的出路。

社会主义的叛徒们最怕的是“不安宁”。考茨基就是这样。当资本主义在战场上杀害了几千万人的时候，他却在鼓吹“和平的”资本主义。现在，为了阻止无产阶级起义反对资本，他鼓吹“和平革命”。他一本正经地写道，“安全和安宁”是革命建设的需要，所以就拚命反对“最可怕的”国内战争。这个按其贩卖性来说达到骇人听闻程度的批评，其前提就是小市民渴望安宁的心理。民主制这种最有效地防止无产阶级暴动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就是他的终极理想。

这一点，哪怕从一点见解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争

夺……政治权利的斗争中，现代民主制出现了，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了；随之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因素：保护国家中的少数派，反对派。民主制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它同样也意味着对少数人的保护。”^①因此，考茨基认为，现在需要民主制。

只要看一看这一妙不可言的议论，就会看出考茨基对于当前的事态真是一无所知。难道可以劝告俄国无产阶级去保护被善良的考茨基轻松地叫做“反对派”的反革命的权利吗？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沙皇暗探、将军、投机倒把分子、神父以及手执炸弹和手枪反对无产阶级的那一切人的权利吗？——这样做不是傻瓜，就是政治骗子。但是，在这个迟钝的庸人看来却必须这样做，他力图使各阶级和解，并且不明白他所支持的大资产阶级在镇压了无产阶级之后，就会把他这个自己的帮手也一起干掉^②。

任何国家都是暴力的工具。在尖锐的阶级搏斗中这个工具应当发挥特别强大的作用。因此，在国内战争时代，国家政权的类型必然是专政的类型。但是，这个定义是一个形式上的定义。重要的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既然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之手，那么，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国家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应当具有专政的性质^③。无产阶级不但不给资产阶级以任何“自由”，还要对它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手段：查封它的报刊和它

^①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15页。

^② 考茨基如此强烈地渴望社会和平，以致把布尔什维克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内战“解释成”不是由于阶级和集团的差别，而是由于“策略方法”的差异所引起的。按照他的看法，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都愿意实现同一件事情”。这使人想起老牌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他们硬要别人相信，他们也是在追求“人类的幸福的”，只是道路不同……

^③ 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镇压剥削者的这种必要性。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我们将废除普选制，如果革命要求这样做的话。也是这个普列汉诺夫赞成在一定条件下采取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反对给予被推翻的阶级以任何自由。参看他的小册子《大革命一百周年》。每一个同志都不妨去读一读这本书。

的各种团体，用武力粉碎它的暗中破坏活动，等等，等等，正象资产阶级当时对地主—沙皇政权的代理人所做过的那样。然而，无产阶级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给予劳动人民群众以最广泛的自由。

这一点需要予以特别强调。一切“民主自由”都带有形式上的、纯宣言的性质。例如，民主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如此。这种“平等”很好地体现于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和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之间的形式上的平等。这是一种掩盖着真正奴役的虚伪的平等。在这里，宣告了平等，但就事情的本质而论，实际上的不平等把形式上的平等变成一纸空文。资产阶级民主给予工人的出版、新闻等自由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这方面也宣告了“自由”，但工人却不能实现这种自由；资本家阶级对纸张、印刷厂和机器等等的实际垄断几乎使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化为乌有。这就象美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做法一样：它常常不是简单地查禁工人的报纸，而“总共只不过”是禁止邮局发行这些报纸，由此可见，形式上的“出版自由”，结果就是完全扼杀这种自由。

工人集会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给予工人以集会的“权利”，但是不给工人提供集会的场所，而街头集会则在维护“交通自由”的借口下予以取缔。

工人阶级专政消灭了各阶级的形式上的平等，但是却使工人阶级在物质上不受奴役。“契约自由”随“贸易自由”一起消失。但对资本家阶级“自由”的这种侵犯，乃是对劳动群众真正自由的保障。

重心正是转移到这些保障上来了。苏维埃政权不是简单地宣布工人有集会自由，而是为工人集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等等提供了各城市里的一切最好的大厅、所有的宫殿和剧院。苏维埃政权不是简单地宣布工人有出版自由，而是把从原先的资本家手里征

用和没收来的所有纸张、所有印刷机和所有印刷厂都交给工人组织使用。工人和农民组织——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工会组织、工厂组织、俱乐部组织、文化教育组织、文艺组织等等——占用的房舍数量之多真是史无前例，对这一点简单地进行一次统计便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为劳动人民群众的真正自由和真正解放办了多少事。

批评我们的论点的考茨基，恰恰在能够说明对工人阶级的自由提供这些保障的地方狡猾地中断了引文，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考茨基之所以抛弃这最本质的东西，为的是想再一次欺骗无产阶级。

在这里，我们还要研究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从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而现在却反对这种民主。

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这点是不难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否定一切和任何绝对的东西的。它持历史的观点。因此，运动的具体口号和目的，完全取决于战斗的无产阶级必须在那里活动的时代的性质，这本来就是非常清楚的。

过去的时代是积聚力量和准备革命的时代。现在的时代则是革命的时代。从这种根本的差别中也就产生了运动的具体口号和目的上的重大差别。

从前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民主，是因为它还不能够实际考虑专政的问题。那时它需要的是工人的新闻自由、工人集会自由和工人结社自由，等等。那时候，资本主义报刊、黑色的资本家同盟和同盟歇业的业主会议对它都是有害的。但是无产阶级没有力量提出解散这些资产阶级组织的要求，要这样做它就需要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制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它帮助了无产阶级把自己的觉悟提高一步。但是，无产阶级那时不得不使自己的阶级要求带有“普遍民主”的形式，——它只好不要求工人集会的自由，而要求一般集会自由（因此，也是反革命集会的自由），一般的新闻自由

(因此,也是黑帮新闻的自由),等等。但是,无钱难行善。现在,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堡垒和镇压剥削者的时代已经来临,只有有生理缺陷的庸人才会满足于“保护少数”的议论①。

四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旷日持久的内战的长期性,不仅仅要求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一些个别的措施,而且也要求有相应的国家组织。我们只能把这种组织看作专政。即最尖锐地反映出这一政权的阶级镇压性质的一种政权形式。

现在,我们需要阐明作为崭新的国家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

无论是马克思,无论是恩格斯,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有新型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是持夺取资产阶级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制,公民考茨基!)的观点,而是持炸毁(Sprengung)和打碎(Zerbrechen)国家机器的观点。他们极端鄙视受到机会主义分子如此关心的“国家的废物”,“人民国家”②。

新型国家的特点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它们取决于两个原因:

第一,无产阶级国家是国内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任何别的专政则是一小撮人的专政③;第二,以前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目的都在于维护和巩固剥削的过程。相反地,很清楚,大多数人不能靠一小撮人生活,无产阶级不能剥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

① 参看上文。

② 列宁同志的《国家与革命》对问题的这个极端重要的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

③ 被孟什维克造谣者大力改造过的考茨基,说出了大量的各种各样地地道道的谬论,当然,这些谬论都是不值一驳的。

的目的，就是在社会经济的领域内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关系，是对私有权的“专政的侵犯”（马克思语）。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是经济变革的杠杆。

如果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经济革命的杠杆，那么很清楚，“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应该融合为一个整体。在具有典型的完备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金融资本专政下就存在着这种融合。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旧世界的一切关系都颠倒过来了，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政治专政也必然应当是它的经济专政。

上述一切首先产生了苏维埃政权的那种特征：这是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群众性组织的政权。在考茨基如此心爱的“民主制”中，工人和贫农参加国家生活无非是每四年一次到投票箱前投进一张选票，然后回家睡大觉。在这里，我们又清清楚楚地看到资产阶级通过长期往群众的头脑里灌输各种各样幻想的办法来欺骗群众。表面上工人参加管理国家，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可能参加管理。资产阶级是不允许工人参加管理国家的，但是它在一定条件下必需造成工人参加的假象。任何少数人的管理形式，不论它是封建地主国家、商业资本主义国家或金融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是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原因就在这里。这种管理形式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脱离群众的，而群众也是脱离它的。

我们在苏维埃共和国看到的就迥然不同了。苏维埃是直接的阶级组织。它不是个铁定的机构，因为有撤回每一个代表的权利；它就是以选出来的人为代表的，以工人、士兵和农民为代表的群众本身。

但是，问题不单在于组成所谓整个国家机构的上层的苏维埃。不，所有工人组织都成为政权机构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众组织同时不是政权机关的。工会是经济专政的最重要机关，它管理生产和分配，规定劳动条件，在经济专政的中央机关——最高国

民经济委员会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领导着劳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工厂委员会是实行国家调节的基层组织；贫农委员会是地方政权、同时也是国家分配机构的最重要机关之一；工人合作社同样也是国家分配机构的基层组织。所有这一切组织都参加制定各种各样的草案、决议和决定，然后，这些草案、决议和决定通过中央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付诸实行。

列宁同志在他最光辉的小册子之一^①中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使得甚至每一个厨妇都学会管理国家。而这并非奇谈怪论。群众过去对自己的政权连想也不敢想，现在通过城市无产者和贫农的组织，也就是通过这些越来越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的组织，开始作为这一政权的机关来工作。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接近群众。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就是群众本身的巨大组织。

我们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问题的另外一面，这不仅仅是一个以工人为主的组织，而且也是一个进行工作的组织。在“民主共和国”最高机关是“议会”，译成俄文就是“清谈馆”。政权分为立法和行政两部分。通过把工人选出的议员派往议会去（每四年一次）的办法，又造成了工人参加国家工作的假象。事实上，连议员们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光说不做。一切事务都交给一个专门的官僚阶层去处理。

苏维埃共和国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它的一切机关，从最高机关直到基层机关，都是进行工作的委员会，它们同群众组织保持联系，依靠群众组织，并且通过这些组织吸引全体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因此，一切工人组织都成为进行管理的组织。它们的职能在

^①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人阶级成为局势的主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工人组织，在这一个时期内，情况不能不是这样。

只有那些愚蠢到不可救药程度的我国的孟什维克或考茨基才会反对把苏维埃变成政权机关。他们的“理论”无非是一套没完没了的陈词滥调，让苏维埃成为反对执政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机关。在苏维埃获得胜利后怎么办？那就让它们解散，不再成为政权机关，然后为了不敢去夺取胜利而重新开始“斗争”。

但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会成为“官方”机关等等的议论，也有其另一种用意。无论是考茨基，无论是孟什维克，都不愿群众组织管理国家，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因此，不管他们说些什么，他们所主张的是“清谈馆”加脱离群众的官僚制度的组合体。他们的眼光没有越出这堆旧废物的框框。

由此可见，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是群众的自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个劳动人民的组织都是整个机构的组成部分。组织的线路从政权的中央各委员会朝四面八方通到地方组织，又从地方组织直接通到群众中去。这种联系，这种组织线路是永远不会中断的。它们是苏维埃生活的“正常现象”。这是使苏维埃共和国根本区别于一切国家生活形式的主要之处。

政治和经济之间、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之间的联系，不仅表现在群众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最紧密的合作上，而且甚至表现在苏维埃的选举上，这种选举不是按照人为地划分的选区，而是按各生产单位如工厂、矿山、村庄等，在工作和斗争的场所进行的。因此，全体代表，“工人议员”同选派他们的那些人即群众（他们被共同的劳动团结在一起，被大生产的技术本身集中在一起）取得了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群众的主动精神，是苏维埃政权的整个建设的基本原则。看一看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在组织红军的工作中起多

大的作用——他们以极端的热情向前方输送了成千上万改造了军队并使它恢复元气的同志、组织者、鼓动员和战士，或者看一看工人们，他们已经大大成长，并在苏维埃的各种经济机关的实际工作中受到了教育。只要看看这一切，就足以了解俄国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已向前跨出了多么巨大的一步。^①

未来属于苏维埃——这一点连它们的敌人也不能否认。但是，如果这些敌人认为，国外的苏维埃只配干些仆役的差使，只能站在资本家老爷的马车的脚凳上，那他们便大错而特错了。苏维埃，这是俄国革命开创的一种完备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既然这样——并且毫无疑问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正处在资产阶级旧的强盗国家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组织的前夜。人们谈得很多和写得很多的第三国际一定要来到。这将是国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写于1919年。译自《进攻》文集，莫斯科
1924年俄文版第89—114页。

^① 一窍不通的考茨基，竟然说什么“群众的”可怕的“冷淡”是苏维埃专政的必然结果。但是，人们早就知道：无知不是论据。

经济政策的新方针

本文的目的是要说明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总的精神，它的原因和目的，它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总的前景中的意义。

因为我们的许多党内同志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前景；似乎前景已经丧失了，似乎明确的路线已经消失在某种模糊不清和极其渺茫的东西之中了。

一 经济政策转变的原因

“新方针”的原因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经济之中，而且在 1921 年春的非常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我们在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实质上不可能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的政策。当时的“突击式的”而又是无所不包的任务，就是要对国家进行红色的保卫。一切都要用于这个目的：不管是物质资源还是组织力量即一切善于进行经营管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在国民经济方面，基本的口号不是要关心它的稳步恢复（一切“自然条件的改良”都不是“目前”能做得到的），而是要立刻获得产品，哪怕是以破坏生产力为代价。不是要“进行生产”，而是要“拿到手”；要拿来立即供应红军，供应国防工厂的工人等等。这，而且当时只有这才是注意的中心。对于反革命势力的胜利，历史地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种条件下，“计划的

不适当”(确有计划不适当之处),必然由在正确地进行分配的条件下发展生产的计划,变为在生产只具有次要意义的条件下经济地进行消费的计划。

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我们的农业政策几乎全部归结为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政策,即征收余粮的制度。但是,在这种制度下,个体生产者即农民失去了对扩大生产的兴趣和刺激,因为不管你扩大多少播种面积,除了口粮部分之外,反正全被人家拿走了。因而,这里便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的需要同我们的政策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俄国的农业是农民的农业(总的说来,苏维埃农场的国营经济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的农业政策同整个农业的发展发生了——而在战时也不可能不发生——客观的矛盾:农业危机是必然要尖锐起来的,而且它果然尖锐起来了。由于我国工业的基础是农业,所以,总的说来,这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危机的尖锐化。

由此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平衡,不是以“正常的”经济过程,而是以工农相互之间在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当然,这种军事政治联盟的建立,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无产阶级由于保卫农民的土地,使之不被地主夺回去,从而得到粮食。但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战争结束,纯粹经济方面的矛盾就必然会尖锐到极点。摆在面前的是经济问题,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在农业方面要发展生产力,只有通过发展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才可以设想。建立起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在经济方面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即建立一种使生产力有发展余地的相互关系,十分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整个革命的这一基本矛盾——在国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条件下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在尖锐的社会危机中表现出来了。

在经济破坏的总的过程中，城市瓦解得比农村更快；掌握着粮食的人对于掌握着城市工业品的人在经济上拥有优势。农村在经济上摆脱受城市控制的程度，依生产力受到破坏的程度而定。在战争时期，一切国家中到处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俄国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在俄国，农民在经济上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工人在经济上所占的比重。而且在俄国，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正因为它掌握了政权，它就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去管理 16 000 万居民，去参加红军等等）。工业的破坏使工人阶级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变成了农村手工业者，同时使一部分留在城市的工人变成了另一种小生产者（制造打火机，为自己而独立工作，如此等等）。

在生产力得到发展的条件下，小工业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在经济破坏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变为小资产阶级。制造打火机的人同作坊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或者农民一样，直接对自由贸易感兴趣。

在 500 万工人当中大约只有 100 万工人和 70 万共产党员反对自由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对基于无产阶级的压力——况且在这种压力的后面存在着战时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现实矛盾——，有把无产阶级专政挤垮的危险。因此，经济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考虑已经发生了变化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在这种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情势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给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提高生产力的任务。军队复员的过程，封锁的解除等等，已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实际的可能。一个新的时期来到了。“新方针”已成为必要的了。

二 “新方针”的基本任务

在任何条件下，不管执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的方针，对于共产

主义建设来说，根本的利益就是大工业的利益。大工业是全部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大工业是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大工业是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即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柱。因此，按照发展生产力的路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加强大工业。

但是，我们一提出加强大工业的问题，我们马上就碰到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为了加强大工业需要“储备”（粮食、原料、补充设备的储备等等）。而在这里我们有陷入循环论的危险：为了搞工业需要产品，为了获得产品需要工业。“陆地是鲸鱼背上，鲸鱼在水上，水在陆地上；陆地是鲸鱼背上，等等”。

由此可见：为了把大工业搞上去，便必须千方百计，采取一切办法增加产品的数量。

要千方百计啊！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具备使大工业得到高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以往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原料，没有粮食等等，光靠号召提高劳动热情，我们是走不远的。

要采取一切办法啊！因为要投入到我们的大工业中去的补充的产品，应当取之于外，即不是从工人国家所掌握的大工业本身当中取得，而是从旁边、从其他的、外面的来源取得，对这些来源我们要不惜花费任何代价。

增加产品的数量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最高规律。上述情况说明了新方针的“全部英明性”，说明了它的基础。对这个问题，必须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在这里不能作第三种回答。

要得到补充的产品，我们可能有哪些来源呢？这些来源是：农民经济、小工业、租借制、租让制、对外贸易。

大家都知道，农民经济是个体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如果不大力发展、提高这种经济，我们就寸步难行。相反地，这种经济的高涨是发展我国大工业的必要条件。

把农民经济同其余的世界割裂开来来看待农民经济，是完全错误的，现在这样做就更加错误。从农民经济中获得补充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应当让它得到发展，而发展农民经济——暂时，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发展资产阶级关系。但是，这种发展为得到补充的产品提供可能。

小工业的情况同农民经济的情况完全相同。

租借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资本主义的租借形式（把企业租给资本家），或者把企业租给工人集体的形式。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不会遇到资本主义的危险，不过工人集体通常不会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在实行资本主义的租借的情况下，那就要有如下的先决条件，即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投机的租借者，而是一个拥有这种或那种形式资本的生产组织者。他应当不是从国家仓库中，而是从农民经济和小工业中弄到原料、粮食等等。因为出租的主要是那些不开工的、办得不好的这一类企业，又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将以租金的形式获得实际价值的补充数量，所以这些价值将构成社会主义化的大工业的必要储备。

租让实际上也就是租借。不过在这里我们的对象是比较高级的资本主义的租借者，他们还必须投入一部分固定资本（机器设备、建筑物等等）。

共和国从承租者那里所扣除的份额，同样地也是补充到社会化的工业储备中去的产品的来源之一。

对外贸易部分地也与租让制有联系，因为承租者将通过输入外国产品来向我们缴纳租金。

从我们的基本任务——增加产品的数量——出发，无产阶级正在发展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经营形式，其目的是要保存、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形式以及社会化的大机器工业。

三 经济的战略和“新方针”的危险

在非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形式的这种发展当中蕴藏着很大的危险。而我国“目前形势”的客观矛盾也恰恰就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对增加产品的补充数量感兴趣，而这一点又只有通过加强资产阶级的发展趋势才能做到；另一方面，加强这种趋势恰恰是对于共产主义的一种危险——从各种经营形式的竞争的观点来看，一种所谓来自另一个极端的危险。

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加强无非意味着在商品流转的基础上产生收购商人、商业资本家、企业主。资本主义的各种承租人等等，在经济上日益增长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当中也有自己的牢固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将来全部发展的图画是怎样的呢？

如果我们把经济政策的新方针理解为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宏伟的、预计到要执行多年的战略措施，那么，这幅图画将是非常鲜明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这条战线上所面临的形势，与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战线上的形势极为相似。

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同极其强大的敌人的斗争中的战略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以下几点：

(1)基本的危险是德帝国主义，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存受到威胁；

(2)我们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红军；

(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基本口号是要千方百计、用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赢得和平；

(4)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利用喘息时机来建立红军；

(5)附带的危险是德帝国主义的内在影响；

(6)战略动作的完成：当红军建立起来了的时候，就可以把舵拨向另一个方向。

把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形势与此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同样的几点。

(1)基本的危险是经济破坏，它也使整个共产主义建设受到威胁；

(2)我们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我们的红色的工业军队，即我们的社会化的大工业；

(3)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的基本口号是要用一切办法，甚至不惜暂时发展小资产阶级的和大资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形式来增加产品的补充数量；

(4)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利用补充的产品来建立社会化的大工业，来使它进入“充分的战斗准备状态”；

(5)附带的危险是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内在影响；

(6)战略动作的完成：当社会化的大工业在利用补充产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的时候，就可以把舵拨向另一个方向。

为什么说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政策是成功的呢？因为我们得以建立了红军，因为德帝国主义被革命从内部搞垮了。在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战线上我们将获得胜利的保证何在呢？在于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化的大工业搞上去。

做到这一步之后，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就要“把舵拨转”；不过，再把舵拨向相反的方向，这决不意味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即回到余粮收集制去等等。因为那些方法是由于生产力下降、由于对农村而言城市的经济实力下降，而被用来调节消费的，

那些方法完全不适合于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以增加大工业的实力为基础的情况。所谓“把舵拨转”就是要逐步地在经济上消灭私人的大经济以及使小生产者在经济上服从大工业的领导；小生产者将被吸收到社会化的经济中来，但不是通过经济以外的强迫手段，而主要是通过拖拉机、电灯、农业机器等等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实惠；他们将被电线所征服（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电线送来促使经济繁荣的富有生命力的能。

四 大工业中的劳动问题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组织国有化的大工业。但是这个任务有自己的内部的方面——关于劳动和劳动强度的问题。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起了组织力量的源泉的作用，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抓去”送往前线了。留下来的工人，不管实际上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所得的报酬大体上是平均的。结果，在热情和劳动能力普遍低落的情况下（由于饥饿和身体衰弱等等），在小资产阶级情绪和个人经营动机上升的条件下，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劳动强度下降的现象。

如果作某些相应的变动，则工业中的这种情况部分地与农业中的情况一样：对生产缺乏个人的和团体的直接物质利害关系，导致生产下降；由于国家勉强强养活的工人人手过多，生产效率下降。

由此就自然得出了医治这种疾病的药方：加进工人对生产的个人的和团体的利害关系的成分。换句话说，必须按照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来决定对工人的供应。而这样或那样地运用所谓的“集体供应”原则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这里，集体供应原则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提供直接利害关系的刺激，推动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并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它是在质的方面改善无产阶级成分的杠杆。实行这种原则就能经常挑选构成大工业的核心的真正的基干工人。反之，那些小市民分子，非无产阶级分子将脱离出去和分散掉，将跑到小资产阶级中去。经过改组的和不断发展的大工业将得到相应的基干无产阶级。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为了充分明确起见，我还要稍微谈一谈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个人认为这个名称是不正确的。但是，因为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事物的实质”，不在于词句，而在于概念（而在这方而党内没有任何意见分歧），所以必须把这个“事物的实质”着重讲一下。

国家资本主义就其西欧的和美国的意义而言，是达到了极限的资产阶级的万能权力，在国家资本主义下，生产集中于资产阶级国家手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最高管理者。

当无产阶级国家把企业出租给承租人的时候（就是说，在资本家去向工人租借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下），企业的所有者始终是工人阶级。

发展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在本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下，全部剩余价值归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即归资产阶级所有。而在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租让、租借等等）下，剩余价值却直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利润进入资本家的口袋；另一部分采取提成或租金的形式，交给我们的国家，即

落入无产阶级之手。

将来我们自己愈发展，则我们签订的契约就愈有利，无产阶级的份额就愈大，这个份额不断扩大，最后就会把资本家的份额吞噬掉。这就会是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那时的结果就是：外国资本，不论其意志和愿望如何，在我国的总的经济中只是扮演了协助我们把苏维埃经济的沉重马车从泥潭中拉了出来的“专家”的角色。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摧毁欧美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只要我们正确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加以消灭。

六 对新方针的一些基本的反对意见

针对经济政策的新方针而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反对意见都是以不了解整个“战略行动计划”为基础的，那些意见同当年某些同志（“本人就是他们当中的头一个”）在反对完全正确的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时提出的意见，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开敌人在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时提出的意见如出一辙。

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就是关于“让步的界限”问题。让步的界限到哪里为止呢？如果我们放弃明斯克，那么放弃不放弃斯摩稜斯克呢？或者，放弃不放弃莫斯科呢？显然，这个问题是荒谬的。让步的界限是不能预先决定的：它取决于具体的条件。只要有建立自己的力量可能性就行——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决不可确定租让的“界限”，直到租让工厂为止。因为这里只能一般地讲：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基础必须仍然直接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并不排除把某一企业或用地转交给承租人。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我们一定会蜕化变质。而敌人则说：你们

既然作种种让步，你们就正在变成德帝国主义的党。显然，这是胡说八道。

可是，现在有些人往往还议论说：如果你们向小资产阶级让步，那么这样一来你们就在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党。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比如说，英国政府既然向采煤工人让步，它就是工人的政府，或是，至少是“全民族的”政府了。这种说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当然，我们现在处于危险的境地。当然，如果我们不建立大工业，那么，到时候我们要么就会蜕化变质，要么就会被推翻。但是，我们必将建立起我们的大工业而把敌人吓得目瞪口呆，让资产阶级的“正人君子们”去讥笑和预言我们快要完蛋吧。我们倒希望在他们的坟墓上唱“呜乎哀哉”哩！

写于1921年。译自《真理报》1921年8月6日。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①

1. 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2. 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3. 反对封建贵族文化的资产阶级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4.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和领袖。5.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的行政干部问题。6. 文化的提高和蜕化的危险。

要透彻地了解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就必须从它的所有特殊性方面去了解它，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当人们“从一般的观点”来讨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时候，通常都满足于皮相的类比方法，满足于运用极其庸俗的（似乎“理论的”）陈词滥调、刻板公式和成规旧套，而这些东西的特点，除去令人厌烦的千篇一律以外，还有一个本原的属性：它们全都毫无用处。考茨基、列维、马尔托夫这般老爷以及所有这一帮胆小的倒霉的“老婆娘”愈多地运用类比和历史对照的方法，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姑且不谈实践上）的完全无能，就显得愈加清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从伟大的无产阶级学说上砍下来的一种内容贫乏、被歪曲、被糟蹋，同时又加以粉饰的断简残篇。我们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驳倒陈词滥调，并且指出——哪怕是

^① 本文是作者准备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一书的第一章。原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 1922 年第 7—8 期。

极其概括地——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特殊性，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所依据的首先是陈词滥调，是极为无知的陈词滥调。但是，陈词滥调的危害并不因此变得小一些——成为阶级斗争史中最大背叛行为的社会民主党的实践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

看来，革命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是关于成熟性的问题，说得确切些，就是关于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或者是——内容完全相同的——在旧的社会生产和政治外壳内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成熟问题。对社会主义来说资本主义已“成熟”或者还没有“成熟”乃是哪怕只在口头上参加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政党、集团和组织所必须断然答复的一个问题。在政治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充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正是这些战争表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经济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党的、库诺夫的、考茨基—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却以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来了个逻辑大翻个，使得美国最高明的魔术师都会感到羡慕。实际上，只提一下“老太婆”考茨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对革命的态度连续不断地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1. 战前。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我们进入了危机时期。我们正在走向战争。应该利用战争来进行革命变革。暂时别着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取得政权的道路》，巴塞尔宣言。）

2. 战争时期。国际是和平的工具。它在战时不能活动。不必着急。应该等待和平的到来。那时我们再让国际发挥作用。胜利自然会属于我们。（考茨基的战时论文。）

3. 战后和平时期。哪里还能考虑革命呢？难道可以吗？在遭到如此破坏的情况下难道能在这种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吗？不要着急。需要等待。上帝看得见，胜利将属于我们。

这种不起作用的、毫无价值的絮聒，将会作为一种独特的“三段式”没完没了地重复下去，它充分说明了社会民主党谎言大师们的逻辑和伟大精神的特点。

从前有个婆娘，
住在山顶榭树旁，
带着自己的好朋友
一起走向洗澡房。
瞧这个婆娘多么聪明有主张，
顺手还拿上一束丝瓜瓤。
这首歌，真无聊，
请你从头唱。
从前有个婆娘……

由于这的确是一首极其“无聊的歌”，同时它的意思又很明显，所以就不必再多去谈它了。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还很少注意。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为了证明尚未成熟这一论点就同资产阶级革命作类比。他们说，在那里，事情确实已经成功。在那里，资本主义确实在封建主义内部发展成熟了。在那里，革命确实已成为客观上进步的因素，挣脱了桎梏，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只要“撤掉首脑”，进行某种清洗，运走某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垃圾，便足以开辟整个社会迅速向前发展的时代。

如此说来，革命轻而易举，而且代价比较小，可是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代价却大得多，这种情况就被机会主义者用作以下二事的证据：第一，证明资本主义根本就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第二，证明俄国革命绝对不能妄想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称号。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同我们的对手展开全面争论。但是，我们

要注意他们的庸俗的陈词滥调。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他们风闻新的关系是在旧的外壳中成长起来的。但是要懂得这些关系是怎样成长的，就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了。他们无休止地、令人厌烦地、糊里糊涂地重复着必须具备成熟性等等的说法——他们沉湎于这样干，甚至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了。可是要看到，什么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内部成长的特殊性，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长的特殊性，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无论在那里或者在这里，都需要“成熟性”。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越不出这种公式化的提法。

然而，新的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成熟过程是如此不同，如此各具特点，以致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差别。

资本主义是怎样在封建社会的怀抱中发展成熟的呢？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在对抗封建领地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都市而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从城市向农村伸出千百万只触角，瓦解自然经济，冲刷旧关系，并且开始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这里有什么特点呢？在这种新关系成长类型中，有什么是应该指出来的呢？这里的特点是：新的关系是整个地作为一个整体成长起来的。在“封建主义怀抱”中成长的，不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骨架、它的物质机构和它的技术，不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关系的最本质部分，而且还有这一切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一切等级制度，活生生的人们的整个阶梯，从壮工到工业中的低级领班，直到高级指挥人员和私有者寡头，所有这一切，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已经以现成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在地主制度范围内发展成熟的，不仅有新的技术，而且还有资本主义的现存的人的社会机构。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下。社会民主党的学究们会篡改我们的这些论点，把事情描绘成这样：照我们的看法，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已经完全发展成熟，已经达到自己的最高形式，达到它的

最大的社会规模，以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可发展的了。但是，把这种“思想”强加于我们是不成的。我们只断定一点：资本主义的组织，现存的机构是在封建主义范围内整个地，即同它的行政上层一起发展成熟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如果把这个时代同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或者同我们这个时代相比，资本主义关系的比重当然不很大。但是，我们在城市里已经一下子有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两极：有了资产阶级，也有了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怀抱中成熟的类型是不是这样呢？

成熟的类型实际上能不能这样呢？

这是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而且在这里——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立即清楚，成熟的类型本身应是不同的，不可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代中的类型一个样。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怀抱中“整个地”，即同生产机构的行政上层一起发展成熟。即使在资本高度积聚和集中、有庞大的无产阶级等等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可以说社会主义并没有另外一个使它能在那里“独立”发展的经济领域。资产阶级处于上层而无产阶级居于其下的城市，是在对抗封建领地、大地产和地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不是居于土地贵族之下，而是同他们平起平坐，并且是反对他们的。

社会主义在它同资产阶级工业的关系中所占的地位，却完全不同于城市在它同封建领地的关系中所占的地位。社会主义就是在城市这可恶的监狱里，在资产阶级之下并在没有自己的生产行政上层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这种行政上层是不可能有的，因为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行政上层应该是无产阶级的。而这样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显然不可能发生。在封建社会下，资产者已能在城市中执掌指挥生产的岗位。他们能够成为工业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成了这样的垄断者。相反地，无产者，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执掌指挥生产的岗位，不可能占有工业生产资料。因为否则也就不存在资本主义了，这一点甚至任何一头两条腿的驴子也都能明白。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整个地，即同自己的行政上层一起成长起来；社会主义在旧社会中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特殊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中的成长情况不一样的。

一些特别“细心的”批评家可能在这里对我们提出大致如下的反对意见。

你们对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其所以不正确，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必须先有两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阶级的剥削关系；在这里谈得上机构的“上层”，因为“上层”是一个阶级的用语。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关于上层的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剥削的关系。因此，不应提出等级的问题，因而也不应提出“上层”的问题。

这种论据当然是不正确的。这有许多理由。

第一，并不是任何“上层”都属于阶级的范畴。

工人阶级，就其成份、就其成员和组成部分的文化程度、政治成熟性、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说，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工人阶级不可能用“诺夫哥罗德的市民会议”，用数以百万计的人手去管理（无论是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经济生活方面），它必然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通过自己的行政干部，通过自己的领导者去进行管理。但是，这种行政干部并不属

于阶级的范畴。

第二，并不是任何阶级关系都是剥削关系。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社会主义的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关于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说它是靠剥削，譬如说，靠剥削隶属于它的工程技术人员而生存的。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所有制关系。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处于社会的上层的。

于是，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按照事情的本质，按照工人革命的特性，社会主义不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整个地”成长起来；它不能这样地成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不能有无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进行阶级的集体垄断的余地；它不能这样地成长，还因为在这个范围内无产阶级在整个生产上的指挥权，特别是它这个阶级的经济行政管理干部的指挥权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又是什么呢？

第一，新经济的物质骨架，已经积聚和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技术上可能的劳动调节过程。第二，无产阶级，它犹如一种最充分地体现劳动的社会性质的共同劳动的生产关系体系。第三，熟练的组织工作、行政工作、“指挥”工作人员（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第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能成为未来行政机构的骨干的工人组织。

技术知识分子是所谓中间的上层指挥人员。但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技术知识分子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反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成长起来的。可以教育技术知识分子养成新的精神，——而且正

在这样教育他们，但是这样做，已经是资本主义联系瓦解时期的事了。在过渡时期，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劳动联系）在破裂，这是革命过程付出巨大耗费的最大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我们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

因此，把资本主义的“成熟”和社会主义的“成熟”进行“简单的”类比，却不去看这种成熟的类型之间的巨大区别，是荒谬的。这是一点。

由于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人们惯于“轻率地”把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关系中的矛盾同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类比。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推翻地主，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于是，大功告成。

然而，按照事情的本质来说，在这里使用类比是极其冒险的。因为这两种关系在这里完全不同，这两种“矛盾”毫无相似之处。并且，它们是根本不同的。

实际上，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种关系是不是经济剥削关系呢？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是不是被剥削阶级呢？这种事说起来可笑。正因为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是同自己的上层一起成长起来，正因为城市的发展是和地主在土地上的专权同时并存的，正因为资产阶级关系的两极已形成，所以根本谈不上被剥削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进行着剩余劳动的瓜分。封建主掌握着国家政权，能够用不同的形式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创造剩余产品的不是资产阶级，处于被剥削阶级地位的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享受不到全部权利。它由于封建主的经济政策而遭受损失。它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分给封建主。但是，它是作坊和工厂

的指挥者，它是工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它是从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的关系，不是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

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之间，也就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关系。这首先是经济剥削关系。

有人说，这是老生常谈，是尽人皆知的，为什么还要多费唇舌呢？

让我们假定，这是尽人皆知的。但这样就更加突出地表明，进行无批判的类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个“尽人皆知”的区别当中，除去产生所有的人或每一个人都确实知道的那些特点以外，还产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这些特点总起来就造成了不同的事变进程、不同的革命耗费和不同的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区别：不受剥削的资产阶级放在封建主义的环境中已经能够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所推翻的阶级；反之，经济上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不可能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必须推翻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

资本的积累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就已经开始了。早在“旧制度”遭到革命摧毁以前，“财富”就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积累起来。并且，这些财富是以货币的形式、在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大家知道，用叮当作响的金属是什么都弄得到手的。

黄金说：“一切我都买。”

宝剑说：“一切我都拿。”

黄金说：“滚开！”

宝剑说：“我就走！”

因此，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制度内部就已经是工业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生产过程的指挥者，资本主义积累的主体和积累的财富的所有者。在这个基础上，资产阶级文化在和它敌对的制度的范围内也几乎能够毫无阻碍地成长起来。封建主义绝对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为教育的垄断者。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发展自己的文化，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转入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手里。经济关系的新（同农奴制相比）制度的阶级体现者——资产阶级，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从而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同时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教育的垄断者。贵族的、“骑士的”学校，迅速让位于工商业学校。正是后一种学校得到了发展的保证，因为金钱已经成为可以左右一切的社会力量。而金钱则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在对比不同的阶级文化和讨论关于一般文化的问题时，可以把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某种文化所特有的、独特的标志和“原则”，关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风格”，关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基本趋向和方法等；第二，关于该趋向、方法和原则的研究深度问题，即关于该文化的集约问题；第三，关于这些意识形态和素养所掌握的人的范围问题，即关于掌握的广度、关于该文化的粗放领域问题。

现在让我们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转折点和分界线来看一看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贵族文化的关系。

方法和原则。十分明显，在封建主义范围内，资产阶级文化在它的结构方面就已经高于农奴制的文化。静的观点为动的（进化的）观点所代替，经院式的思辨哲学为自然科学经验的原则所代替，封建束缚社会的教条主义为“有思维能力的个人”的批判主义所代替。如果从文化的实际作用方面，即从文化帮助控制自然力达到何等程度（正应该这样提问题）方面寻找评判文化“高度”的标

准,那么,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性是不容置疑的。如果目前在资产阶级的合唱队中意识形态的领唱人竭力吹捧中世纪的思想家、特别是神秘论者,那么,这只是资产阶级没落的征兆,而决不是象头脑有病的现代没落分子所竭力描绘的那样,找到了失去的“最高原则”。

文化的集约性。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拿托马斯·阿奎那来说吧——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完整的”体系。但是,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法国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等人的大《百科全书》是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写成的,那大概就不会怀疑:对于新的意识形态原则的研究的深度并不比相对说来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中实际上受到限制的文化所进行的研究为差。(为了回答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不妨顺便提一下:如果说,把“中世纪”看成一种历史上的失败这一旧观念是不正确的,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推动“中世纪”前进的正是新的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关系。)

文化的粗放。由于我们把封建文化理解为高水平的意识形态和素养,所以封建文化就具有表现得很露骨的等级性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国王的愚昧无知以及学者的寺院气和教会气。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不能不更加广泛一些。所谓的“知识民主化”实际上还是在封建主义制度崩溃以前就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开始了。因此,早在土地贵族这一国家的栋梁被推翻以前,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就已经高于土地贵族了。

现在让我们把这种在文化上的对立情况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对立情况比较一下。

首先应该叙述一下必然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存在从而也决定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总的背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经济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剥削的主要源泉,是在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中被榨取的能量的供应者。无产阶级的生活费用，是使无产阶级作为人的体力能够再生产出来并发挥作用所必需的资料。

无产阶级的技能，是执行体力劳动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技能。整个说来，社会结构的这一部分在其资本主义的外壳之下也只是照这样再生产出来。应该正视事情的真相。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本身对于劳动力的技能，对于组织的、指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新的等级，所以就划分出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新的“中间”阶级，所谓技术知识分子，“新的中间等级”；而且只有人数较少的工人贵族阶层才略为接近这一类型。这与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也随着技术的提高而整个获得提高的情况毫不矛盾。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及其技术知识分子为另一方的相对的文化水平。

“人人都应该安分守己”这句农奴主的口头禅也完全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再生产物质价值，而且再生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这种再生产过程的纯经济方面可归结为对收入的资本主义分配，那么，这一过程的文化方面就归结为教育的差异。对教育的垄断完全符合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对教育的垄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没有给以足够的估计。

教育的过程是生产熟练的“活机器”的过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从事情的特殊方面来说，则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的正在成长的一代进入不同的学校实验室受教育；上帝的归上帝，帝王的归帝王。税吏得到税吏应得之份。指挥的阶级把自己的子女送入高等和中等学校，这种学校，无产阶级是无法进入的，正如他们无法垄断生产资料或占有剩余价值一样。

有人认为,技术员和工人之间的差别,作为一定的社会范畴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就已经渐渐地消失,这种观点(相当流行)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如果在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本身,至少是自己的各大阶层,就已经转变为技术知识分子,同技术知识分子溶合为一体,从而在文化上成熟到可以胜任管理生产的职能,这会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下,新的制度就会整个地成熟起来。这时,只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者的寄生的、渺小的、可鄙的、无能的、徒具统治之名的上层,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嘴里就能长出蘑菇来……

但是,可惜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不错,正如经济上不太内行的魏劳赫教授所说的:“到处都由机器代替了人的位置,而机器的管理却掌握在人的手里。机器在工作,而人在管理它。”^①

但是,工人对于机器或机器零件的管理活动,绝对没有推翻工人对于人和整个生产过程并无管理活动的情况。这种组织和指挥的职能,是留给另外一些集团和阶级的:留给非寄生的资产阶级(如德国的史汀纳斯、巴林、西门子、克虏伯这样的大托拉斯组织者,经济上的头号首领)和技术知识分子的。我们在不越出物质生产的范围内,毕竟应该承认,一个技术知识分子甚至只从数字方面来看也代表着相当大的力量。例如,1906年,在德国一些最大的企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比例如下:

冶金业和矿业……………	职员 1 人	工人 30—26 人
针织厂……………	职员 1 人	工人 18—25 人

^① 罗伯特·魏劳赫:《技术,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与其发生作用的领域的关系》,德意志出版社,斯图加特和柏林 1922 年德文版第 34 页。

纺织厂.....	职员1人	工人12—10人
造船厂.....	职员1人	工人16—8人
机器制造厂.....	职员1人	工人12—4人
煤气工厂.....	职员1人	工人9—4人
化工厂.....	职员1人	工人7—6人 ^①

无论如何,这些“枯燥的”数字是有相当说服力的。指挥、组织和运用高级技术知识的经验在这里积累起来并且是工人阶级所无法得到的。^② 即使有个别工种的工人,在熟练程度上接近于技术员,那也是人数很少的阶层(例如,电机工业的装配工)。但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另一种趋向却表现得很突出,而且丝毫也没有被现代的资本主义技术所打消。“如果以前受过多方面训练的手艺人能完成生产工厂制成品所必需的全部工作,那么机器,特别是‘专用机器’,就要求进一步分工。因此,机器创造了现代的熟练工人,并且容许越来越多地使用甚至没有受过训练的劳动力。”^③ 最近发生的情况是这样:“在这里(在更加经济地使用劳动力方面。——尼·布·)战争首先显示出了新的可能性。由于战争的动员和延续不断,需要日益增长地用少年和妇女的未曾受过训练的劳动来代替越来越少的熟练劳动力。为了使这样做成为可能,必须把生产进程划分得尽可能细一些,并且通过这个办法简化各个生产过程。这样一来,由于进一步分工,在成批生产的时候就有可能由未曾受过训练的工人的手制造出许多东西……第五等级(这四个字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形成了。”^④

① 前引书,第43页。

② “企业”采用“科学的组织”,只是加强了这种趋向。“这里揭开了工程师职业中的崭新一页:他不仅是物的设计者,而且还是人的塑造者……”(威利·赫尔帕赫:《经济的精神力量》,《技术与经济》,第14年度,第1期,第10页。

③ 罗·魏劳赫:前引书,第36页。

④ 罗·魏劳赫:前引书,第38页。

“健全的国民经济的主要条件，是要使每个人都满意自己的地位。”^①“职业学校中所进行的训练，应该尽量简单，只包括属于职业知识的东西。”^②“一个受过多方面训练的工人永远不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地位，因此永远不会感到满意。”^③毫无疑问，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的资本主义训练标准，就是这样的。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阶级这个文化低而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

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情况就是如此。而在商品流通的过程（比如说银行）中和意识形态的劳动部门内，无产阶级在熟练程度上所占的比重就更小了。如果说，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毕竟跟劳动过程中的工程师还有共同之点，那么，在教授老爷给学生老爷们写公式的时候把粉笔递给教授老爷的堂役，就已经是完全置身于劳动的专门逻辑之外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学校、科学和艺术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专家”，他们的劳动在这些部门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其巨大的。

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成为在文化上深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机构压迫的阶级；这种受压迫的现象，对于夺得国家政权以前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

但是，主要由于工人组织有了发展以及投靠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人数增多这两种情况，工人阶级终于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萌芽以及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萌芽。我们现在应该按照我们在比较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时所根据的三个基本方面，把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同资产阶级文化作一对比。

① 古斯塔夫·弗仑茨：《对泰罗制的批判》，柏林尤利乌斯·施普林格书店 1920 年版第 104 页。

② 同上，第 112 页。

③ 同上，第 109 页。

方法和原则。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文化就其结构以及方法和原则来说，是高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由于共同劳动和共同斗争的关系在生产中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推动人类的全部知识在共同观点下的联合。无产阶级提出这个原则是要反对这样的分工，这种分工把文化完全分割成各个不同的部门，在资产阶级的意识中抹杀它们的联系，妨碍这些不同部门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则是资产阶级白白努力寻找而始终不能找到的。其次，无产阶级指出一切“文化珍品”的实际意义，从而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信奉的盲目崇拜。无产阶级用社会技术的合乎目的原则代替了各式各样的“绝对命令”和“绝对理想”。无产阶级把进化的观点扩大为革命的观点，消除了资产阶级对动力学原则的限制，并且充实了它的内容。不言而喻，无产阶级继续了革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的和依靠经验的倾向，而在现代资产阶级那里，这种倾向已为神秘主义、神智学、通灵术和宗教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代用品所代替。

文化的集约。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就其原则来说是较高一筹的，那么，它的集约性——这里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却远远不如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没有担任指挥生产的职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组织者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首先是在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因此，无产阶级首先发展的这个方面的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这里无产阶级建立起自身文化的基础，而马克思的最有天才的学说就是这方面的最优秀典范。然而，无产阶级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艺术家、建筑师、地质学家、生产组织者、熟练的专业发明家、数学家、诗人、法学家、银行家、演员以及诸如此类的干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不能象它在社会理论和实际政治方面那样提出同样多的自己的东西。无产阶级在它的存在中没有解决这

些任务的条件；它只能极端概括地指出日后解决这些任务的办法——仅此而已。同资产阶级拥有的东西比较起来，这实在少得可怜。仅仅在社会科学方面，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相匹敌（这里说的是文化的集约性），另外，在实际政治方面，无产阶级还可以创造出在熟练程度上相等的，有时甚至较为优越的干部力量（例如，凯塞林伯爵说，苏俄拥有一批世界上最优秀的领袖，这是不无原因的）。但是，总的说来，无产阶级落后很多。

文化的粗放。从阶级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社会阶级的尺度来看，无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存条件，在这里也是注定非常落后的。要为这种思想举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只须提一下这样的事实就够了，即“资产阶级偏见”犹如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头上，然而资产阶级却很少有人由于“无产阶级的偏见”而遭受痛苦。有人会说，不过，在这方面过错在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学校和教会等等。一点不错！资产阶级制度的这些机构俘虏了整个无产阶级大军。如果我们认为谢德曼、诺斯克、托姆·肖和龚帕斯等人是叛徒的话（在实际政治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文化，被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联系和意识形态联系的全部总和从工人中间培育出来的可怜的产物。但是，除去（在上层）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受资产阶级控制以外，我们还看到无产阶级最广大的群众在技术、教育、政治等方面极其“缺乏训练”的情况。总结：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可以为未来的文化作出一些极其天才的暗示，为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卓越的条件，但是，无产阶级这个文化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这种范围内不能把这些条件发展到能够培养自己去组织整个社会的程度。无产阶级来得及训练自己去“破坏旧世界”。它只有在自己专政的时期，才能“改造自己的本性”，并且成熟为社会的组织者。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额外耗费，此类耗费，一

般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

但是，这里不由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文化上虽然不可避免地落后，可是无产阶级用怎样的方式创造出比资产阶级进步的文化基础呢？无产阶级又用怎样的方式终于产生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家干部和领导者干部呢？

我们在这里要转入关于阶级、政党和阶级的其他组织以及关于所谓领袖的问题。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仍然使用比较的方法，也就是要这样看待上述几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观察它们在资产阶级那里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观察它们是无产阶级那里是怎样形成的。因为，正如我们以后所要看到的，在这里也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对无产阶级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所不知道的问题，并且使无产阶级遇到资产阶级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危险。

但是，我们需要先谈一下总的意见。

任何一个阶级的组织都是出于加强该阶级实力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切组织的实质都在于，从组织这里得到的力量就其大小来说要比单纯用算术把各个组成部分的力量加在一起的总和大。同时，阶级的组织并不包括阶级的一切成员在内，组织和阶级并不是完全相等的。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具体分析起来，阶级就其整体的成分而言并非单一的。

阶级在同一个组织的成员的社会技术熟练程度（例如，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他们的文化水平，阶级类型的纯洁性，政治成熟性等方面都不是单一的。由于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最高的”、最根本的斗争形式，所以，十分自然，一个阶级的政党或者政党的变形（例如，雅各宾俱乐部），是最成熟的阶级分子的联合，阶级可以通过这些分子最正确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因此，把政党和阶级对立起来是极端荒谬的。

由于组织（其中包括政党）的成员不是单一的，就产生了建立领导者（领袖）集团的客观必要性，政党（或是该组织全体）通过这种集团表达自己的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暂且谈到这里为止，下文我们还要从另一方面来谈关于领袖这一非常复杂的问题。

现在还要预先指出一点。各个组织一方面给阶级增加补充的力量，一方面为阶级发展自己的文化和选出自己的领导者创造补充的条件，这是十分清楚的。工人阶级，虽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却以它的生存的另一面（在它的文化修养仍然不可避免地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在不大的地区上的集中和积聚，工作的集体性等）显示出了它在团结自己的队伍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这个阶级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和它的群众性，以及这个阶级的劳动的集体性，是使组织成为可能的两个基本因素，这使得受压迫受摧残的情况能局部地得到补偿。

这种受压迫的情况，除我们在上文曾经提到的以外，还具体反映在两个特殊的现象中。

第一，资产阶级不需要敌对阶级出身的领袖，可是，无产阶级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作为自己的领袖。

这是从上述全部分析必然得出的结论。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能获得文化上的出色发展的资产阶级，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最“高级的”思想家干部（哲学家和学者等）以及自己的政治领导者。当然，这里面也有从其他阶级投靠来的人，但是，“本阶级的”、“出身纯正的”人，相对说来占很高的百分比。而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把其他阶级、首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作自己的最高领导者（领袖、思想家）。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无产阶级的最有概括性的和最正确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所制定的。

直到现在，我们在理论和高级意识形态环节领域看到的只是

知识分子。不错，经过一段时期，后来在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组织中也培养出所谓“工人官僚”，即工人出身的领袖这一整个阶层。但是，知识分子仍然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就拿英国和英国的工会来说吧。在复杂的“工人”干部系统之上的是一批费边社社员，他们也正是思想的供应者。由行政管理人员出身的工会中的机会主义领袖对于政治或其他“高级物质”等基本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不考虑这一点，有维伯或某某教授替我们考虑。”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造就了大量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工会和党的官僚干部。但是，居于最高一级的，是修正主义集团，这个集团是由一个彻头彻尾知识分子集团，《社会主义月刊》编辑部发展出来的。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再举一个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时，它的基本领导干部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可以认为确定无疑的是，知识分子流入机会主义工人组织队伍中的人数特别众多。但是，也决不能否认真正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所起的领导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资产阶级领袖和资本主义的普通资产者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别比较起来并不特别大，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和普通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却要大得多。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资本主义的资产者在他们的社会生产制度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受到高等教育，至少是中等教育的训练。他们的收入保证他们有享受“文化生活”的基础。他们在生产、流通和意识形态的劳动部门所担任的角色，使他们获得应有的训练、素养、知识和经验等，也就是说提高了他们的熟练程度。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精神气质”、职务的类型都同执行领袖职能的人相似，并且相当接近。无产阶级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领袖，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院士”），往往受过很多的智力训练、具有高

度的文化水平，然而，阶级的普通成员却和这个水平有着极大的距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甚至“工人官僚”，往往都没有无产阶级因守在“机床旁边”而特有的那种本能的和自发的集体主义情绪。所以在这里心理上的差别就比在资产阶级那里的相应情况下所具有的差别大。

总之，我们可以确定，早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也就是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处于其他环境出身的领袖干部的领导之下。

现在，我们越过残酷的公开斗争阶段，转入新阶级掌握政权的时期，也就是转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某种社会平衡状态的时期。

夺得政权的阶级肩负着极其重大的任务。它成了社会的组织者阶级，成了当前历史基础上的社会领导者。它的斗争的范围扩大了，它的职能极端丰富起来。现在所必需做的，已经不仅是领导一个阶级，而且要以社会的规模从事分为无数部门和专业的有组织的“积极性工作”。为此，需要一些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者和设计者干部。

于是在这里，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之间又出现了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我们上文分析过的那些现象的继续和后果：资产阶级大体上具有它自己的管理国家的行政领导干部，或者具有就一般文化训练而言几乎已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物，而无产阶级却必须长期地在经验中学习，因此他不得不大量地利用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与它敌对的力量。

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其全部范围内对文化力量的需求是很大的：让我们想一下，工人革命为自己提出了多么巨大的组织任务！因此毫不奇怪，吸收“老牌的”文化力量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且从历史上来说也是必要的。认为没有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也能对付过去的观念，是非常可笑和绝对幼稚的。这是一种有害

的幻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队伍中绝对不容许这种幻想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不能否认这种情况隐藏着无产阶级革命所不可避免的一个极大的危险，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的”危险。我们说的是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蜕化的危险。

不能根据资产阶级比地主文化高这一个简单的原原来谈论资产阶级国家以及资产阶级的执政的领导党（或各党的联合，或俱乐部等等）的蜕化。相反地，无产阶级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蜕化的危险，却正是因为工人阶级虽然具有原则上最高的文化形式，但是工人阶级就其文化水平来说毕竟比资产阶级要低得多。

人们常常重复人所共知的历史上的一个例子，说得确切些，历史上的许多例子，例子的内容是当一个胜利的野蛮民族定居在文化较高的部落中的时候，过了一段时期实际上便成了战败者，因为他已经接受了“战败”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甚至语言。较高的文化、灵巧机警、熟练的技能、技术上的优势、实际的训练、确定方向的能力等，这一切，通过无数的途径，通过微小的分子运动，使胜利的民族所习惯了的生活内容和社会联系瓦解、蜕化、变形、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民族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投降。

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同这种野蛮民族很相似。它的文化“在原则上”比较高，这是不够的！在这里解决问题的不是这种原则上的高度，而是这种或那种文化的活生生的、起作用的代表和体现者的数量和质量。这才是重要的。这在任何历史争端包括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重大争端中，都是极其重要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初期，文化力量的显著优势不是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更不是在专门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一边。不应忘记，被迫同无产阶级一起工作的知识分子力量，甚至其中那些自愿参加工作

的力量，虽然带来极其必需的好处，毕竟只有（我们强调指出的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旧文化的经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力量在心里不相信计划经济、劳动的社会调节、社会主义在技术经济上的优越性及其在经济上的合理性。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些人看来是一种不健康的、奇怪的不正常现象，是必然要消除而且是将会被消除的。在他们心目中不存在作为调节工作的原则的社会主义。而且在他们的经验中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类的东西。任何不可避免的对于资本主义的让步，他们都表示欢迎。并且，他们将以同样高兴的心情欢迎每一个轻率的、完全多余的，然而却是“健全的资本主义的”步骤。可以概括地把这个问题这样解释一下。我们假定，任何技术上的或是经济上的任务〔задача〕（我们现在所喜欢说的是“задание”），用旧的方法和新的方法都能解决。关于新的方法，从理论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它是可以解决任务的。但是，没有实际经验，没有实际工作者，没有执行任务的人，没有“粗胳膊的人”。然而，“粗胳膊的人”却不习惯于这样干，而习惯于自己的一套办法。于是，问题经常用旧的办法解决，因为不这样，就什么也干不成。当然，另外有一套旧的方法并没有害处，而且在缺乏社会主义实际工作者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这样。但是，大家知道，“量”有转变为“质”的狡猾性质。在直接生产的领域内，情况是这样。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文化上的差别，“新”与“旧”的斗争，应该说是更加激烈的；大家知道，意识形态决不是没有力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它们的社会功能对意识形态的各个阶梯，一直到诗歌、到抽象哲学，并不是毫不关心的。在本阶级的具有经得住考验的和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对世界的感受（因为感情的领域也起着巨大的社会作用）的干部不够的情况下，在这里甚至不管“不完全是我们的”专家干部的自觉愿望如何，也

可能搞垮新社会所需要的上层建筑。自然，这里说的不是灾变和一次解决的变革等，而是极其微小的、往往是无限小的运动，这些运动在联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就形成一条非常明确的发展路线，即使不是真正的倒退，无论如何也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趋向一种新形式的旧的阶级社会。

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工人群众本身的文化落后性，尤其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即当分给行政管理和领导干部的消费资料（不管愿意不愿意）一般必须大大超过分给普通中等工人的数量的时候，甚至那部分由工人群众从自己队伍中推举出来的干部人员，也会发生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

诉诸工人出身和无产阶级美德本身并不能成为消除产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的论据。因为我们应该知道并且懂得，在象我们时代这样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阶级一般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而且在原则上绝对没有排除旧阶级的某些部分完全变形并从其中形成新阶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脱离”群众的干部人员能够（但不是必然这样，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被他们的文化较高的担任指挥职务的同事所同化，并和他们一起变成新统治阶级的萌芽。不言而喻，如果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和不利的外部环境，对资本主义作出重大让步，并且不阻挠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心和与之相应的人们的集团的增长（例如，正象俄国在其完全不可避免的“新经济政策”制度下所曾发生的情况一样），产生这种悲惨结局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在这里，不论新阶级是在其处女般纯洁的状态中组织成社会的基本阶级的，还是这个阶级本身将会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寡头，也可以说是从侧面成长起来的新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这在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将与我们的后代有关，而在目前我们将会让他们去解决一些适当的任务。至于我们的任务则在于，根本不容许这样“进化地”恢复

剥削关系。

上述危险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实在在地显露出来，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象俄国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得这么远。这一点就足够让那些名叫马尔托夫、考茨基、列维或其他什么的社会民主党坏蛋们写一些证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必定要变成资产阶级政权的书、小册子和文章的了。当然，这些老爷们在遇到任何危险和斗争的情况下立刻会想起各式各样的念头。他们预言无产阶级一取得政权就会彻底垮台。他们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同协约国的斗争中灭亡，他们在发生危险时卑鄙地随风转舵。当饥荒的黑翼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忘却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此说来，现在，当无产阶级即将承担新的任务，虽然不是直接战斗的、军事含义下的“突击”任务、却也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时，这些勇士们又在预言另一种灭亡，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是斗争。但是，如果说，在某种新的社会平衡确立以前，这是多多少少公开斗争的一种形式，那么，在以后的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个斗争就在文化战线上、在较量技术的灵巧和能力、组织经验和素养的战线上以及在社会上层建筑各个部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线上具有小冲突、但就其整体来说是大冲突的形式。由于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在人们的一定的技能中固定下来的，而且进一步发展的进程取决于人的数量和质量，因此，这种文化上的斗争首先是争取行政管理方面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干部的斗争。只有那个能够从本阶级推举出足够数量的管理人员、组织者和思想家来引导社会按照确定的阶级路线前进的阶级，才能享有（用“隆重的文体”来说）统治社会并领导社会的历史权利。因此，在革命的一定阶段，争取干部的斗争不但从“一般”建设事业来看，而且

从今后社会阶级的前途来看，都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下文我们将指出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解决这个任务，以及他们应当怎样克服上述的危险。

第一次发表于1922年。译自《进攻》文集，
莫斯科1924年俄文版第216—241页。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摘录)

(1922年11月18日)

下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即使在我国的书藉中也没有做过详细的分析；这就是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修正主义的提法中，人们对长入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谈得很多。修正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将长入社会主义。我们可以说：我们仅仅通过法令、通过纯粹的暴力措施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有机的过程，严格地说，是真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但是，我们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这种长入从何时开始。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要任何革命，他们认为，这种长入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应当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杠杆来改变经济关系。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形式获得愈来愈大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残余将逐渐被排挤出去，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被完全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为止。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这就是关于——自然是作为生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类型”的问题。革命前我们大家对事情都是这样设想的，以致我们在谈论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时候，根本没有具体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特别是在有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之后，我们看到，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时

期，在这个时期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类型。让我们来看一看资本主义，并且把法国的资本主义同美国的资本主义比较一下。法国的资本主义有自己的特点，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让我们看一看法国人的那种高利贷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那种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性质，或者看一看德国和英国的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历史。这是一些各不相同的道路，各不相同的进程。当然，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切差别，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归于消灭。但是，社会主义无论如何只能在已经存在着的东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将是以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另一种形式中的继续；这就是说，各个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在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中表现出来。以后，这种差别将随着无产阶级世界统治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世界生产的增长而归于消灭。无产阶级在一切国家中夺取了政权以后的最初发展阶段，也将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我们可以完全公开地说，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相比，将具有亚细亚的形式。我们能够实现国有化的东西和不能实现国有化的东西之间的比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等等，——我国经济发展的所有这一切落后的特点，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落后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切，如果我们预先考虑到这一切，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谈谈另一些事情，例如，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了。

这是我准备要说的第八点。我想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我们可以从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即从策略的观点或革命的策略和战略的观点，以及从经济上的合理性的观点来阐述这种新经济政策。这是互不相同的两个观点。几个同志，包括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已经从战略和策略的观点讲了自己的意见。在这里，我打算不从这个观点，而从经济上的合理性的观点来阐述一

下这个问题。

我认为，任何一国的执政的无产阶级都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组织问题，即如何安排两种生产形式之间的比例：一种生产形式无产阶级能够使之实现合理化、加以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管理；另一种生产形式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发展初期不能使之实现合理化和有计划地进行管理。这是无产阶级将要遇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正确地规定这个比例，就是说它拿到自己手中的东西太多，超过了客观情况所容许的限度，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下列的形势：生产力不会得到发展而会受到束缚；无产阶级不可能组织一切，无产阶级不可能强制地用自己的计划去代替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小农。结果，无产阶级不能起到给社会提供真正实际的东西的阶层的作用，反而一无所成。周转可以说会被堵塞。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一般经济生活的进一步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还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竭力把过多的东西拿到自己手中，那么它就需要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它需要过多的职员和工作人员代替小生产者、小农等等来履行其经济职能。用国家的职员——或者如你们所说的，这就是国家官吏——来代替所有这些小生产者的职能的这种企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官僚机构，以致它的开支比由于小生产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而产生的耗费还要大得多，而那时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情景：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不是发展生产力的形式，而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个机构恰恰是它应当成为的那个东西的对立物，因此它以铁的必然性要被摧毁。要么由某种反革命势力或小资产阶级来摧毁它，要么由党自己来对这种机构实行精简和改组（在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做的），反正情形都一样。如果无产阶级自己不做这件事情，那么机构就要被其他的力量所

摧毁。所有的同志都必须认清这一点。

因此，我认为，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确是一种独特的、俄国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会场上喊声：完全正确！）它不仅是实行一种战略上的退却，而且是解决一个组织社会的大问题，即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我们应当使之实现合理化的生产部门和我们现在还不能使之实现合理化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的问题。同志们，老实说，我们曾企图在我国把一切都组织起来，甚至把农民和数百万小生产者都组织起来。因此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非常之大。因此我们也遭到了政治危机。因此，我们为了拯救自己，正如列宁同志非常坦率地讲的那样，为了拯救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我们必须实行这种新经济政策。这决不是——如某些同志认为的那样——象某种隐密的病症似的东西，人们必须加以隐瞒。这不仅是对那些全力反对我们的人所做的让步，而且是对组织社会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解决。老实说，在旧的经济方针下，我们这里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莫斯科的红色民警曾把那些出售面包等等的老妇人撵走，从经济合理性的观点来看，这简直是发疯了。人们既然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就必须把这种发疯的行为改变成某种更好的东西。某些同志认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罪过。这不是我们的罪过，这是我们党对于我们在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由于没有经验和无知而做的一些事情所进行的必要的纠正。这就是我们的看法。所以我说：新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也是国际性的问题。自然，在我们使之实现合理化的东西和我们不能使之实现合理化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比例系数上，我们有独特的东西。俄国的独特的东西就在这里。

我们有许多农民、小市民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拿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如德国，甚至美国来看，那么，也许你们认为在那里就不会

马上出现这些问题吧？然而马上就会出现！例如，难道我们一开始就可以把美国的农场主组织起来吗？决不能！必须给这些阶层保留经济活动的自由。例如在德国，情况也是如此。你们是否认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够立即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尤其是在拜恩——把一切农民经济组织起来呢？决不能！当你们要农民提供粮食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要求什么吗？他们要求有活动的自由，要求可以出售东西。因此，你们在德国也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将来你们一定要非常慎重地考虑：你们要让受约束的社会主义经济占多大的比例和你们必须保留多少自由的经济。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就是这样。但是，这个问题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有联系。在革命中，经济合理性的原则恰恰同另一个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则，即纯粹政治斗争的适当性原则相矛盾。我曾多次举过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假使你们建筑街垒并且为此而砍了电线杆子，那么，不言而喻，这决不意味着提高生产力。（场内笑声）在革命中也是这样。例如，假使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拼命地反对你们，而他们在小资产阶级中有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人直接按照大资产阶级的委托行事，那么，无产阶级应当怎么办呢？无产阶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垮大资产阶级的这些小资产阶级代理人。在这种斗争的尖锐时刻，也许无产阶级不得不剥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那时就出现一种不合理的现象，从经济上考虑是不适当的东西，从政治斗争以及从非取得胜利不可的国内战争的观点来看却可能是适当的。一方面，经济上的合理性，以及另一方面，政治斗争的适当性，——这两种观点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二者往往是矛盾的。但是，政治斗争的适当性应该是基本的东西，因为如果事先没有无产阶级国家，我们便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不要做任何超过了限度的事情，不要做任何从政治斗争的观点来看是不适当的，而从经济的

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事情。我当然不可能去对这个思想线索做进一步的发挥，不过它本身是不言自明的。我们还可以从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的观点来阐述这个问题。这里要考虑我们同中间等级的关系、同所谓知识分子即新的中间等级的关系，还要考虑我们同农民以及农民中的各个阶层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应在纲领中作出规定。在这里，我们当然要利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如果我们不在理论上掌握和利用迄今为止我们已取得的这一最伟大的革命的经验，那就简直是愚蠢之极了。

译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汉堡 1923 年德文版第 415—419 页。

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①

同志们，我选择《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这个题目来向你们演讲，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目前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由一大批同志和组织完全自发地提上了日程。第二，因为这个问题对于象你们这样的听讲者正好是最有关系的。

请你们允许我在讲到本题和提出问题之前先讲几句开场的话。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目前都在经历着一个非常独特的阶段。可以大致把这说成是革命向前发展过程中放慢速度的阶段。在俄国的情况下这一阶段是同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就国际范围来说，这一阶段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是：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已在垂死挣扎，但是除了在俄国以外，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是唯一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我们的情况目前在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中引起形形色色的想法、意向、感情、思想倾向等等。拿我们的敌人来说吧，我们看到，他们根据俄国的国际生活和国内生活中的一系列事实得出了所谓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这一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们的敌人、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是这样考虑的：绝望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杀人犯的影响下曾经尝试在俄国进行一场十分巨大的历史试验。不出所料，这一巨大的历史试验以失败和破产告终了，这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预言过的。大张旗鼓地宣布的那些口号在苏俄已经

^① 1923年2月5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报告的速记记录。

没有地位了。租借政策、同资本主义大国的贸易关系、出租和五花八门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日益转变成凌驾在工人阶级之上的外来的空壳，从根本上说来已不再同无产阶级有任何关系了。我们的敌人说，我们在俄国所有的无非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是一个脱离了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布尔什维克集团在统治着国家。共产主义的破产是明摆着的。而这一破产——我们的敌人这样说——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据说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很不发达，而且是半亚细亚式、半野蛮的无产阶级，这样的国家当然不能象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那样实现历史的飞跃，跳过它的历史发展预先决定的那些阶段。俄国曾经尝试进行这一飞跃，不过当然是掉进了泥坑，摔下了深渊。人们不能废除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不能依靠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来进行一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无产阶级的全部生活条件和全部根源都同半亚细亚式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决没有为完成正确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所提出的问题这一任务作好准备。

我们的敌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是怎样判断的呢？他们看不到仅仅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这一事实就已经产生的那一巨大革命影响，而是作出了和上面类似的结论。他们甚至把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缓慢的发展速度也要算在俄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帐上，他们声称，正是共产主义在俄国破产的情况，例如俄国的饥荒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阻碍了国际革命向前发展，在这一方面恰好又应当由布尔什维克负责，正因如此，人们现在不得不进行一次决算，决算表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作为世界观和作为实际政策领域的共产主义不折不扣地等于零。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断定的，他们对我们党从一开始进行的政策普遍是这样评价的。

现在请你们允许我讲讲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我们的加引号的朋友，另一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首先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们。我们的加引号的朋友（在俄国方面）是旧的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首先是路标转换派。他们没有作出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作出的那种结论。他们没有说人们必须反对现在的苏维埃制度，他们也没有说社会民主党人说过的许多其他的话；但他们同时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朋友，因为他们同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一种经过特别深思熟虑的、自觉的打算之上的——这种打算是错误的，但是它的根源在于深信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敌人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们把我们在俄国的情况大致设想成这样：俄国革命，也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工人阶级及其领导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有能力从反对旧制度的人中造就出坚决的、勇敢的、毫不容情的、钢铁般的干部，他们有勇气承担清扫旧制度的肮脏马厩的任务。

他们把沙皇的机构、半腐朽的资产阶级打得粉身碎骨，他们摧毁了已经彻底腐朽的俄国知识阶层，这些知识分子只会高谈阔论，就上帝、魔鬼和类似的毫无用处的东西争论。他们改造了全部国家机器，唤醒了最低下的人民阶层，并这样为发展一种新的类型的资本主义，为创造一种新的、一种掠夺性的、厚颜无耻的、没有贵族纹章、没有旧的资产阶级偏见的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是不依靠政府施舍为生的，这种资产阶级象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背口袋的人”一样，备尝艰苦，饱经风霜，还常常蹲在契卡的牢房里；他们经受了这些考验，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性格，现在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胜利的、精力充沛的、自信的、精通生活、不依靠任何施舍的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是一个新生的、年轻的、精力充沛的“美国式”资产阶级。

这一类型的“朋友”，这些“重新学习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现在是这样考虑的：现在反对苏维埃政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现在在俄国引起混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相反地，必须支持苏维埃政权，必须逐渐钻进苏维埃机体的毛孔里去，参加苏维埃建设的机构，在那些机构里到处安插自己的人，缓慢地但是坚忍不拔和牢固地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构成，正象路标转换派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所说的那样，依靠微小的内部变化，通过一再用新的人代替来改变苏维埃机构的构成，使共产主义政权的全部政策“遭到妨碍而陷于失败。”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种状态：表面上仍旧维持我们的一切装饰、红旗、国际歌、苏维埃政体等等，但这一切的内容已经不一样了，它将不是反军国主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了，而是将反映那一新的资产阶级阶层的期待、愿望、希望和利益，这一阶层将持续增长，不断加强，并且将通过缓慢的组织变化来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整个构成，逐步把它引向纯粹资本主义政策的轨道。路标转换派认为，那时，俄国发生的革命的全部历史意义就看清楚了。它的意义恰恰在于消灭依靠沙皇政府的施舍生活的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由于俄国革命的结果，旧的资产阶级被一个新的强大的美国类型的资产阶级代替了；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什么也不会害怕，它将打着用国际词句掩盖着的民族旗帜前进，走向一个强有力的、伟大的、新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俄国。

这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打算，他们的秘密想法，他们的内在意图就在于此。他们同情我们，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把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而追随我们才这样做的，而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狡猾的打算，他们把牌押在我们的内部蜕化上。

现在请你们允许我谈谈我们自己人中间存在的那些想法。一部分我们自己的同志和一部分工人阶级有些动摇，并且怀疑我们对内和对外的方针是否正确。从表面现象看来，我们在这里看到象这一新的资产阶级的实际成长这类的情况。我们看到，我们在

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攻击之后不得不开始退却。与这一点相联系，目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的确，是否也许会发生我们的敌人所预言的那种情况，他们是否确实还是有道理的，我们面前是否也许确实出现了很难克服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呢？脑子里出现很多这类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在我们生活的进程里，在我们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的进程里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因此同志们，我们作为我们整个党的代表，无论如何必须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你们也许会问我，这一切同文化问题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的报告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同志们，你们根据下面的全部说明就会看到，所有这些问题都同我的题目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的命运，我们实际上注定要经过的那一历史道路，归根到底历史上既定的任务的解决——这一解决将首先取决于在我们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文化问题。这一命题，这一主题，也将是我今天的报告的主题。请你们允许我现在转过来对我们的敌人进行一些反驳。

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敌人用来证明我们不可避免要崩溃的第一个论点是依据两个事实：首先依据革命的巨大耗费这一事实，其次是依据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他们根据这两件事实推论出共产主义的破产。我们在这里必须首先从相反的方面给我们的敌人算一笔帐，就是说要问他们：你们这些可爱的人，资本主义的境况如何，它的健康如何？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温度计放在它的左腋下，那么它的资本主义自我感觉将怎样呢？如果我们提出这一问题，那么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完全明白，按照资本主义原则来解决当前的任务和问题，是一件明显行不通的事。所有的（不折不扣是所有的）最近这几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已经有了几年所谓的和平状态以后目前在欧洲发生的事件以最显著的、几乎是大吹大擂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缔结了一系列条约——凡尔赛条约，塞

弗尔条约等等——之后，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关系有所调整，而是相反，目前所有的人，甚至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都胆战心惊地等待着整个欧洲被卷入一个空前灾难的漩涡。我根本不提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已经预言过了。但是让我们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首先是德国的、然后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你们将看到，在他们的全部著作中目前都流露出一种不安的担心，这种担心越来越明显了——为全欧洲规模的整个制度的命运担心。你们很了解，甚至一部分优秀的资产阶级教授，比如说英国的凯恩斯，曾任意大利部长的尼蒂，曾任法国部长的卡尤，今天一致提醒他们本国的政府，提醒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要注意欧洲即将发生的事件，在他们看来这些事件是加倍阴暗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观察各大国在经济领域和纯粹政治领域所执行的政策，并且客观地加以评价，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它们在怎样努力从泥潭里脱身出来，哪怕只是爬出来也好，西欧就是这样一个泥潭；它们怎样努力缔结一系列协定，它们怎样召开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朝不同的方向探索和勘查地面，却丝毫无能为力。欧洲的整个社会机构散了架，全世界一片财政混乱，物价飞涨，证券市场猛涨猛跌，这些情况都是空前的。你们自己看看每天的报纸。德国在发生什么事？资产阶级不能按正常方式进行统治了。他们想找一个代用品。这种代用品是使关系更加激化的手段，例如，占领鲁尔区。他们想找一种新的蛊惑人心的政体，这在目前表现为所谓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资产阶级尝试并且力图按照完全不正常的方式进行统治，他们甚至尝试用蛊惑人心的方式利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中等阶层，有时还利用一部分农民，鼓动他们出来参加政治生活，给他们提供蛊惑人心的口号，但是这一来——我们对此完全清楚——却会达到他们自己毁灭自己的结局。

不管你们从哪些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你们到处都会看到同样

的情况：冲突增加，经济混乱增加，国际关系乱成一团，地平线上已出现一场新的、惊人的、大规模战争的魔影。要知道在这一战后时期，在资产阶级统治领域里只有一条线是“向上”发展的：空前的新的战争发明：无人操纵的战舰，能从一个房间里操纵并且根据需要投掷炸弹的无人驾驶飞机，美国的巨大战斗舰队，法国的能够用火药保护整个法国海岸的巨型大炮，还有人类天才在这一领域的与此类似的其他表现。“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冲突是不可避免要积累起来的——自由主义的教授们也承认这一点——那么也很清楚，人们面临的前景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可怕的前景，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能够用这一战后和平时期发明出来的最完善的毁灭武器把它本身的文明的残余彻底消灭——如果工人阶级不加阻挡的话，它是会这样做的。

这样的前景（如果人们还能把这说成什么前景的话）过去已在人类历史上现实地存在过，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我们知道，在古代，象亚述和巴比伦这样的具有伟大文化的强大国家是怎样崩溃，怎样被彻底消灭，从地球的表面被抹掉的，因为它们在当时的社会经受不了的流血战争中弄得筋疲力竭了。有什么担保，有什么保证能说现代社会不会完成这一全面消灭人类的高尚任务呢？对此是没有任何保证的。目前在资产阶级的最优秀部分中，在现在坚持反军国主义路线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着忧虑，这种忧虑是向未来领域的突进，是资产阶级优秀代表人物对国家政策的大胆的理解，他们揭开了这一未来的帷幕，看到了它的全部赤裸裸的惊人的、悲惨的景象。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一角度出发、走到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敌人和来自纯粹资产阶级阵营的敌人面前，向他们提出如何按照资产阶级世界的标准和方向解决当前任务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在这里充满信心地说：不，先生们，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你们的事情，因为在你们的道路上只有一种前景——欧洲灭

亡的前景，然后还要把这同一情况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漆黑一团，完全绝望。你们不妨看一看不久前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曾经是共产党员而现在是叛徒的保尔·列维刚刚不久前警告德国工人阶级不要夺取政权，他提到俄国作为自己的论据。他说，俄国的工人夺取了政权，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只要看一看那里的破坏和饥荒等等多么严重就知道了。德国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况。工人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将立刻遇到象财务状况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机器的精致的和敏感的工具。我们将看到马克价值猛跌，一美元将值一百马克。自从列维发表这一声明以来，才过了整整四个月，根据昨天的报纸——我还没有看今天的报纸——一美元已略微超过四万马克，也就是说，马克的下跌已是列维预见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会出现的情况的四十多倍。因此如果人们认为列维的计算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可以说，我们可以进行四十次以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还比我们没有进行革命而遇到的情况代价更小，没有自己的政权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处境，就象一个人一面被施蒂纳打耳光，另一面被法国帝国主义打耳光，而所有的阶级包括施蒂纳本人在内又都被法国帝国主义打了耳光，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来擦掉从鼻子里流出来的血。

因此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由此看得很清楚，由于继续实行资本主义而产生的耗费，在这一时代和在这条彻底绝望的道路上产生的混乱，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伴随现象，即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受到惊人的破坏，还有如此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致只有一个简直不能在最基本的数量范围内进行计算的人才会心安理得地主张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解决一切问题。在人类面前十分清楚、明确和明显地出现了这一任务：或者转向新的社会发展的途径，哪怕付出最沉重的耗费作为代价，因为这里是有前途的，这里真正展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避免把人类引向毁灭的那

些巨大危险——或者仍旧留在旧的途径上，但那时就会清楚地看出，人类没有出路，人类将象一系列古老的人类文化曾经灭亡的那样灭亡。由此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西欧、首先是德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中间（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身内在消耗并自趋灭亡的倾向在德国表现得最尖锐），为什么我们恰恰在资产阶级最伟大的思想家中间看到转向种种思想体系的情况，而这些思想体系是离开地球并把眼光完全朝着天上或者只看自己的肚脐眼的。我们在资产阶级人士中间看到这一巨大的思想潮流，即脱离地球，深深陷入心理观察，追求来自东方、来自托钵僧、来自宗教等等的秘密启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人类历史上已多次出现，它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灭亡的预感。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敌人的反驳是十分可悲、甚至简直是卑劣和无聊的原因。他们看不到最重要的事物，看不到整个人类目前遇到的非常大的两难处境，如此巨大的悲剧性矛盾，他们不能把握在人类面前出现的那些问题的全部巨大规模；他们象是咬我们后腿的小狗一样，不能理解以如此可悲的方式用翅膀掠过全世界的妖怪。甚至当他们试图走近我们并且就某些微不足道的事来刺激我们时，比如说就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等等，那时他们与其说是提出一个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正确分析，不如说是表露他们内心的秘密的愿望。一句德国谚语说得很对：“愿望是思想之父。”你想要什么，你就把它当作一种分析、一种客观的逻辑的分析放到发生的事情里去。这里发生的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我们的敌人说共产主义已在俄国破产时，他们用什么来论证呢？是说我们俄国存在资本主义。很对，是存在。但它是存在于我们经济的社会主义因素的中间，存在于我们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路线办事的积极意志的中间，而且还有不断的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谁将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呢？他们这样说和这样想：我们希望资本主义胜利。他们就这样表述：资本

主义已经胜利。

但是在哪里曾经这样说过呢？有谁说过这场斗争、它的历史进程的最后结局是完全有利于耐普曼的呢？有谁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永远处于后退状态，决不会向这些分子发动进攻呢？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是在哪儿说出来的呢？根据欧洲的虚弱状态（那里的工资现在已开始下降，而我们这里却开始提高），根据德国、奥国等地发生的知识分子的崩溃，得出的结论是另一种的，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前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就是说，苏维埃俄国在恢复元气的时候将成为新的美国，但不是在这个词的资产阶级意义上说的，而是在这个词的无产阶级意义上说的。任何斗争都要冒一定的风险，不管是军事斗争，革命斗争，还是经济斗争。但是谁如果在斗争的进行中自己就已经宣布自己要失败，那么他就是不想取得胜利。谁现在说我们已经一切都完了，耐普曼将把我们吞掉，那么他就是希望这些耐普曼取得胜利。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在这里举出的反对意见也只是显得幼稚可笑的原因，如果从总的前途和当前的伟大任务的角度来说，这些反对意见就显得可悲了。但是有一些反对意见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尽管它们是由于对整个工人革命的性质极端不理解而产生的，是由于对革命进程中的特殊性质极端不理解而产生的，这类反对意见的表现形式是一系列反对我们的补充论据，我将尝试证明这些论据统统都是建立在彻底错误的基础之上的。

我现在要分析一个反对我们的论断，这就使我们同今天报告的题目离得很近了——我到现在为此讲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开场白的性质——另一方面，这一分析又将揭示出我们的政治敌人的主要错误，他们指出工人革命的巨大规模的耗费，企图根据这一耗费来证明，在一个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不打算停留在我们的著作中已非常频繁地讲过

和写过的内容上，我在这里不打算阐述全部的重要论据，这些论据归结为：不应当把俄国从它同整个世界经济、从而同西欧经济的普遍关联中，从整个欧洲经济以及从而从西欧经济的整个循环中割裂开来，我们的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部分；问题的这一方面已有过足够的说明，我不打算涉及了，我在这里想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来解释这一问题。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论题：敌人在反对我们的论据中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进行类比，他们认为这种类比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全部本质来说，这种类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当作证据。我将证明，无产阶级革命不仅由于它的阶级内容而同资产阶级革命有区别，而且由于它的全部进程具有如此特殊的特征并在随便哪一个国家都将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任何类比都不能成立。

敌人中间是这样考虑的：拿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典类型、比如说法国大革命为例，可以看到，新的资产阶级如何推翻封建地主统治。在这场内战中当然有耗费，但是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伤口是比较小的，国家很快就开始恢复元气，重新站了起来。但是俄国革命表明，出生时的阵痛、内战的耗费、新统治者缺乏经验和技巧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致使人认为，新的统治者在俄国自己暴露出来的无能的证据就证明了国家还不成熟。我在这里提出一个论点，即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在随便哪一个国家里，即使在一个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里，它的耗费也将同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有区别，其相差的程度是无法估量的。

这首先是因为，任何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时的方式，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产生时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敌人特别喜欢引用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点，即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当这个社会的因素还未在旧的关系内部、在旧社会内部成熟以前，都不能取代旧的社会

形态。因此，他们可以说，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实行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时，这无非是试图使一个怀孕的妇女生下一个完全没有成熟的婴儿，既然婴儿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二个月出世的，这当然是一次毫无用处的早产。这一论据是我们社会民主党敌人的主要论据。我请你们注意这第一点，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资本主义是怎样从旧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又是怎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和明确地看到二者在成熟的类型上已经有很深刻的区别。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成熟起来的，正象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农奴制度内部发展成熟起来一样，但是问题在于它们是怎样发展成熟的。这一差别是原则性的差别，是特别深刻的差别。我们的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敌人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根本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立刻看到这一区别，当然只是在我们愿意看到它的情况下才会看到。

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整体，从根基到顶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还在封建主义制度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工厂里就已是发号施令的阶级，而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工厂里还要服从资产阶级。人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一把梯子，梯子顶端站着发号施令的资产阶级，中间站着工程师，工匠和熟练工人，下头是工人阶级的非熟练部分——这一整个社会等级制阶梯连同它的发号施令的顶层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已发展成熟了。资产阶级已经在封建地主制度的政治统治的外壳下在工厂中，在手工工场中指挥着工人阶级。现在你们问一下自己：是否甚至在一个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极点、看来再也不能向前一步的国家，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呢？你们问一问，是否能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个极高度发达、已经达到其发展终点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关系将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长时的那样作为一个整体成长起来。你们立刻就会明白，这样的一个假设是双重地无意义的，是彻底没有价值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阶级必须自己作为指挥者站在上头，或者以本阶级的代表的身分，或者以本阶级优秀分子的身分，或者以本阶级的领导者即党的身分，或者以随便哪一种其他的方式，在这一情况下这是无关紧要的；同样十分清楚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和过渡时期结构的主要标志是这样一个标志，即工人阶级在旧社会的外壳下支配生产关系。

这样的情况是否能出现呢？这种情况当然甚至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发生，因为怎么能设想有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会让工人阶级在工厂里发号施令呢？怎么能设想即使是最成熟的资本主义机体里，工人阶级能作为生产的领导者站在另一个阶级之上呢？这样的假设是荒谬的。哪怕只假定这种可能性会出现一秒钟，也会是纯粹的痴人说梦。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成熟、诞生和形成同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发展成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资本主义完全是在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而社会主义连同其指挥的上层人物无论如何不能在哪怕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完全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和原则的区别，我们的敌人没有一个人曾经哪怕是把这一区别拿出来讨论过。但是由此却产生整整一系列后果，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由此首先产生如下的区别。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地主阶级，但它不是受剥削的阶级；它推翻封建制度，但它是作为受到地主的政治权力压迫的阶级而进行攻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不是受剥削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受剥削的阶级，——这一点完全用不着进一步证明，因为这已是人所皆知的

了。由此还产生一个情况，这一情况同问题的本质的关系已很密切。就是说，由于这一十分深刻的区别产生了如下的情况：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在文化方面不是受压迫的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在封建主和地主的政权的外壳下，是一个在文化上比被它打倒的那个阶级还要高得多的阶级。在城市里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同以农村生活为基础的地主进行斗争时，已经用精密知识和科学充分武装起来，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力量和具有专门技能的力量可供利用。他们住在城市，拥有正在发展中的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大手段即货币。他们在封建地主的统治下已经积累资本，并且在积累这笔资本的同时搜罗了现存社会的全部文化精华。难道在封建制度之下封建地主是学校的真正主人或者教育的独占者吗？没有这样的事。在封建统治的外壳下，技术人员、学者、实验室研究者等等已经处于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已经被它掌握了。这个新的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但是已经成熟到拥有第一流的文化力量了，它就文化水平来说比它被迫去推翻的那个阶级高。这一情况是按照铁的必然性由社会成熟过程的两种类型——资本主义社会在封建社会范围内和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的成熟过程——的差别产生的。

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成熟起来时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呢？

没有，也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假定在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甚至在最漂亮、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工人阶级在文化水平上能超过被它打倒的资产阶级，这简直是纯粹的谬论。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它使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并从而在文化上都处于奴隶依附地位。断定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能提高到某一个比资产阶级文化水平更高的阶段，那是十分可笑和荒谬的。工人阶级之所以是被压迫的阶

级，之所以是最彻底革命的阶级，正是因为它在一切方面都受到压迫。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或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例如波格丹诺夫，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性本身能使工人阶级愈来愈有教养等等，并且把这当作证据来反驳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这样做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他们在这里把完全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无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在文化上提高了吗？完全正确，它是这样的。在机器生产中是否比手工工场要求更有教养的工人呢？完全正确。但是在工人从手工劳动转到机器劳动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获得更大的熟练程度、更多的技巧和知识等等的过程中，在这一时期中，站在工人之上的那些阶层，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一定不会满足于算术的基本知识，而是要掌握高等数学的知识。大家都趋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工人在文化上提高了，指挥的阶层提高的程度还要大，并以这种方式保持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和他们的为社会所必需的职务。因此，如果把工人阶级在文化上的提高当作论据，来证明工人阶级能够并且也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长为一支比它所推翻的那一阶级在文化上更高的力量，那么这不是什么论据，谁想把这看成论据，就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对比着观察不同社会的不同的发展类型和不同阶级的状况，还会发现某些值得注意的情况。我举出以下一点：如果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发动攻击，那么它所需要的为它效劳并帮助它同地主进行斗争的来自旧阶级的叛逆者的人数要少得多，因为它本身在封建社会内部从自己队伍里培养出了这些文化力量。而工人阶级呢？工人阶级不折不扣地在一切国家里——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观察证明这一点——到处都选择来自其他阶级、首先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人作领袖，而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没有一个工人党、没有一个工会组织的占有发号施令地位的

阶层是完全不由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组成的。当然，在这一方面，改良主义的党和革命的党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是即使在最革命的党里，比方说在我们的共产党里——我们无须隐瞒——有一个确定的领导上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人组成的。怎么来解释这一点呢？根据我已经对你们讲过的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解释——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受压迫的地位使它不能象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从自己内部产生足够数目的领袖。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如果它必须管理社会，那么它一定会从自己内部为管理和行政等等培养出一大批应有尽有的力量。由此就完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样的情况，好也罢歹也罢，它必须利用不属于本阶级的力量，其程度和数目比资产阶级利用来自封建社会的人要大得多。你们看到，在这里，一件事是怎样同另一件事在逻辑上因果相连的，一件事是怎样同另一件事在逻辑上互相联系的。我们在这里必须首先详细地论述这一文化上的对比。让我们撇开经济成熟程度的差别，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你们会看到，不用几分钟这一问题就将显示出它是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请你们设想一下：必须详细地考察这一文化对比的问题。我用如下的方式来论述这一问题。我把这一文化领域分成三个小问题，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整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我提出以下这些问题：首先是文化原则的问题，——这种文化将产生什么新事物；其次，这一新文化传播得多远，它包括哪些人——用一个外国词来说，这就是文化领域的粗放性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这一阶级文化加工得有多深，或者这一加工的集约性、这些新原则的集约性问题。我要从这三个小问题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在这方面，封建社会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内的无产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关于文化原则的问题或分题。我不可能

在这里对它进行详细的考察，只能提出几个简短的要点，以便使人理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如果我们观察老的封建的地主文化，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基础，它的原则基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的轴心，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第一是不折不扣地到处都暴露出来的整个文化的极端停滞，这是从封建社会本身的停滞、从它深刻的保守主义产生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文化生活受传统支配的情况。所谓的批判的思考受到了压制，也很少抬头，在随便哪一次思想意识争论中主要论据是援引圣经，援引这一种或那一种教义，援引祖先的某些传统。这一停滞状态到处盛行，无所不在。这一封建文化的第二条原则是等级原则，权威原则。这是容易证明的。它是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的反映。等级原则、诉诸最高权威的原则是极端敌视任何批判的考虑的，这一原则在科学领域和随便哪一种构思的领域，都导致到诉诸传统并把这一传统承认为最高权威。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封建地主文化各原则的整个轴心。

那么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带进了什么新事物呢？他们破坏和扫除了旧的封建相互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个人解放。资产阶级在他们起来冲击封建主义社会时所宣布的自由首先是贸易和剥削的自由，它同时也是对宗教教义、圣经和教会势力的权威进行批评的自由。粉碎天主教会的是破卵而出的资产阶级个人，教会曾经通过征税阻挠他进行自由贸易和自由建立它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产阶级个人朝气蓬勃，精力充沛，钱包里许多金币叮咣作响，它用胳膊左挤右撞，打开一条路来，摧毁了封建社会，直到把它彻底消灭并且把政权拿到手里。这一新的阶级在文化方面的主要事业是什么呢？就它的原则来说，它站在更高一层。如果我们现在未考察它的文化，那么我们就要问：它们带来的新事物是比旧的事物高明还是不比它高明？就原则来说它无疑是更高明的。因为社会的

向前运动不能依靠基督教会或另一种教会的教义；为了破坏旧的宗教信仰及其概念，必须在经济领域对自然界进行精确的分析，必须有批判的思想，必须有批判以及研究我们的现实的经验，首先是研究自然界的经验。这就是社会作为整体在向前发展时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从新文化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站在更高层。但是从传播这一文化的角度，从它所支配的人的范围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也比封建社会站得高。我已经对你们说过，资产阶级拥有最熟练的社会工作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城市中发展起来的一切，城市关系的整个范围，浮现到表面的、向前推进并且带动其他的东西，都处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从资产阶级能够支配的人的范围来说，它同样也比封建制度优越。最后，从制定新文化的原则的角度来说，资产阶级也是优越的。只要想一想，还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就已经有了一部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的百科全书，其中由新阶级的代表者从不同的方面概括了，制定了和精确表述了全部新文化。这是这个新阶级的一部完整的文化法典，巨大的文化法典。因此这一资产阶级就制定新文化的原则来说也比它所冲击的那一阶级站得高。

现在请你们十分冷静地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地位。工人阶级目前把某种新事物带进了这一领域吗？我坚决说，是，而且从原则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比资产阶级的阶级文化高。在这一问题上，就新文化的原则来说，我认为以下的论点是反驳不了的，工人阶级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带来了比旧的资产阶级文化更高的东西。为什么？在这一方面的新事物是什么？在这一方面首先以下两个互相联系的论点是新的。第一，正如工人阶级有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倾向一样，它也有克服文化和知识的生产方面的无政府状态的倾向，这就是说，它很了解，为了使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和各种

科学分枝发挥最大的效果，必须把它们综合起来，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观的体系；各个文化分枝的结合和计划性以代替无政府状态——这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个原则。资产阶级由于专业化（专业化又是以无政府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因此不能认识这一点。由此就产生第二个情况，即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学者等等不懂得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实际意义，而工人阶级却出色地懂得一切——从应用力学开始直到抽象的认识理论——的实际价值。它懂得，在这里，一切都有实际的价值，它们或者是作为同外部自然界斗争的工具为某一个阶级或整个社会服务，或者是一个阶级掌握的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武器。工人阶级是认识这一实际价值的。为什么这是更高的原则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一认识提出了一个对科学、文化等等的新的看法。我要举出下面这个重大的例子：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么我们当然必须知道，我们应当比如说为生物学，为纺织工业，或者为香肠生产支出多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们必须权衡这一或那一领域、从香肠生产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的实际价值。因此十分自然，我们在这方面即在这一文化的、思想的领域，也象在纯粹经济 and 管理的领域一样，将同样有一个计划经济。

因此我们的文化原则是更高的。我们将不会受偶像支配。难道是上帝、命令、义务或某种荒谬的东西强迫我们去做我们的工作吗？无产阶级政党的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成员都知道他必须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因此他从来不象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代表者在某一领域，比方说在伦理领域（这是知识的领域之一）所想的那样去想。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的阿谀奉承者总是问自己，正象罗普申问自己一样，是否可以杀死一个人，是否可以开枪打死一个警察局的盯梢。但是我们说，一切都取决于某种实际的考虑，即对于革命的进程、对于实现这些或那些任务是否合适。我们把我们的

道德关系和科学看成我们为了把人类引导到新的、更高的发展形态而同自然界、同有害于人类的分子进行斗争的工具。我们的斗争就在于此。我们的思想体系和我们的新文化（我们是它的体现者）的崇高之处不是在于我们力图从更高层的力量方面取得对我们的行动的批准。它是在于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坚持文化的价值，象一个好的司机在走一条坏路时那样掌握它，我们的力量就会增长。在于我们意识到，不是上帝抓着我们的领子，或者康德的绝对命令掐住我们的尾巴，而是我们自己站立着，引导着并向前进，我们给文化价值指出方向，支配着它，因此不是它带着我们走，而是我们带着它走，我们的力量的“崇高之处”就在于这一对力量的意识，在于对集体力量和集体意志的强有力增长的这一感觉。人们在同人类曾经知道过的原则相比时称之为更高的那些原则就在于此。

让我们举出同文化相联系的其他问题。如果我们涉及其他问题，我们立刻就会意识到我们的弱点。原则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就其原则来说站得比资产阶级文化高。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摸索到这些原则的萌芽。

但是这些原则的传播和它们的加工完成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在这一方面我必须说，我们同资产阶级相比真是个孩子。必须承认这一点并且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拿文化的粗放性问题来说吧，这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用我们的文化影响工人阶级。我只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一个证据，你们立刻可以看出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可怜。——在这一方面我们将发现整个整个的工人阶级大军处于资产阶级偏见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之下。这是事实。追随社会民主党的人也就是那些仍旧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的人。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工人妇女中相当大一部分仍旧拉着工人们去找神父吗？可以举出例子来说明好些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处于他们

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束缚之下。从另一方面来说，找出处于无产阶级精神影响下的资产阶级集团来吧！没有一个统治的资产阶级是处于工人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的。这说明了这一相互关系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差别。工人阶级的最先进阶层提出新的原则，但是说到传播这些原则，那么在这方面工人阶级还只是一个光着屁股到处乱跑的小娃娃。工人阶级有一支小小的先头部队，它就这些原则进行思考和提出新的东西，但是这些新的文化原则的传播还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让我们从新文化的这些原则的定形和巩固的角度来看看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这种定形方面工人阶级在哪里能显示出自己的能力呢？只有在一个地方，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工人阶级才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为代表，赋予无产阶级所带来的那种新的原则以外形。在其他领域里呢？在其他领域什么也没有。无产阶级制订了自己的文化原则，是从无产阶级的地位出发的，也就是从它和资本的斗争出发的；也就是说，这里首先出现的是社会科学。无产阶级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多多少少有一点本领，而在其他方面呢？在其他方面是没有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奴隶地位把它的力气耗尽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里，工人阶级不可能指挥生产，同样，他在这个社会的范围里，也不可能给自己造就技术员、工程师、发明家等等。有过个别的情况，但不多！但是有几只燕子还不算春天。这完全是由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里极低下的地位造成的。

假如我们把上面所说的一切概括起来，我们就算出这样一笔帐来：工人阶级的原则比资产阶级文化原则更高些，但是，就这些原则的传播来说，它不行！就它的形成来说，也是一样，不过，事情取决于活生生的人的斗争，而不取决于没有人的躯体、只有骨骼的

原则。如果我们问一下：这两者相比，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相比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总结说：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时，它的文化力量比起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的文化力量高得很多；工人阶级在文化方面比那个要被它推翻的阶级弱小许多、许多、许多倍。

由此可以得出两件对于我们革命的前途来说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第一，很清楚，当这个阶级掌握了政权，深刻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统治时，由于它的文化程度低，将要不可避免地做出很多错事，显得十分笨拙，而且在一切领域里都会这样。所以，有本领的人就要对它进行怠工。由此就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耗费，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未曾有过的，换句话说，那些被纯粹归咎于俄国的经营不善的，或者归咎于也在我们历史中起了伟大作用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人革命的耗费，那些巨大的耗费对于任何工人革命都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由工人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地位造成的。

这是第一。第二，由此也产生另一个情况。在随便哪一个国家的任何工人革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的巨大危险，即那个革命、那个无产阶级国家和那个政党的内部会发生蜕化。因为，假如工人阶级在文化上落后，却又掌握了政权，那它不可避免要利用在社会上与它敌对、但在文化上却高于它的其他社会力量。由此就出现复辟的可能性。这是路标转换派指出的前景，我已经有幸谈到这一点了。任何工人革命都将面临这个危险的前景，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和德国的工人革命。问题在于观察和研究这个危险，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摆脱危险。解决的方法很清楚。你们看到，关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文化问题，在一定的革命阶段会成为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我是以完全清醒的头脑，用

习惯的说法就是凭自己的责任感说这些话的。我们革命的结局，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这一点。

我觉得，以上所说的情况，为评价所谓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了新的线索。旧的论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作为整体已经成熟了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成长到立即就能管理整个社会的程度。而且，既然实际的发展不是这样，就得出结论说事情恰恰没有按应有情况发展。我曾说到社会民主党反对我们的论据，这一论据正是依靠以下论点的：如果工人阶级干了错事，碰到了各种类似知识分子怠工、革命的额外耗费等等现象，那就应当说，旧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诞生新社会的程度。

按照我的分析，我觉得，这样说是没有错误的：无产阶级的这类错误和额外耗费，并不只是俄国革命所特有的。它们在俄国不可避免要达到巨大的规模。在俄国存在着俄国经济的落后性和俄国无产阶级本身在技术、文化方面的落后性，尽管无产阶级具有高度熟练的革命能力。从我的报告里可以看出，工人革命的这些额外的巨大耗费，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工人革命的特性。但是由此我要说，这个分析为评价整个过渡时期提供了某些新的线索。可以从上面的论述得出这样一个理论方面的结论。可以说——我在这里完全是抽象地说，是指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并且要再一次强调，这不仅是对于俄国工人革命而言——我说，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熟起来，这个阶级有能力砸碎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剥夺资产阶级，镇压内部敌人的反抗，也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残余的反抗，镇压它的正在进行反抗的、有时是疯狂反抗的部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不可能作为一个善于全部完成新社会的组织职能的阶级成熟起来，不可能全部完成，也不可能单独完成。由此可见，从这个观

点去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我们可以说，过渡时期的任务、职能（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作用正是在于：工人阶级在这个过渡时期成长为一个产生所有这些文化力量的阶级，成熟到一个能够管理社会的阶级；在这以后，在全面共产主义的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取消不可的时候，在老的阶级划分的残余消失的时候，阶级也将消亡。

让我们从毫无诗意的观点再来看看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有关无产阶级文化能力的问题时得出结论说，仅仅有一个新的文化原则是不够的，需要这些文化原则的活的体现者。问题就在这里：需要这些文化原则的活的体现者。换句话说，需要有一定的由活人组成的干部队伍。这些新的文化原则会在他们身上扎根、积累，集合，深入到他们血液中。要知道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活的机器。我们可以把资产阶级教授看作某种活的机器，这种机器的用处在于从自己身上把资产阶级文化的能量向一切方向辐射，把这种文化传授给别的阶层，通过这些辐射充实那些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应当加以改造的人。或者按经济学的说法，象资产阶级教授这样有高度技能的人，是生产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生产资料。无论在创造这些文化财富的意义上说，还是在用这些资产阶级概念、思想等等灌输进别人脑子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对我们来说，也必然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在这方面，在我们面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假如我们愿意工人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我想，这一点是我们所有人都愿意的——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面前还有一个人的改造问题，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敌对的思想意识影响之下，需要把他们变成这样一些活的机器，它们将在自己所有活动中——不管他们是管理工厂还是在什么学校里教书，指挥军队，还是在其他成千种可能的场合，都能按照新的原则，按照新的无产阶级思想指导自己。如果我们有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人，解决问

题是一个样子，如果这样的人数不够，解决问题就又是一个样子。这是十分清楚的。

假如你们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那么你们就会用另一个表述方式重复我已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说过的话。这件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和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和基础，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垄断；另一方面是把武器集中在统治阶级手里的垄断；第三方面，垄断教育。如果工人阶级不打破教育垄断，那么，它成熟为用自己的力量统治全国的阶级的可能性就被堵塞了。由此可见，根本不能设想，也不能幻想，无须破坏和击溃资产阶级对高等学校的垄断，就能生产工人阶级出身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这样高水平的文化干部。这一点，我再重复一下，是很清楚的，无需任何争论的。由此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成熟为这样一个文化力量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里，工人阶级没有力量打破教育垄断。如果设想资产阶级只是靠赤裸裸的暴力维持，或者说只是依靠垄断生产资料，这是肤浅的，完全缺乏批判的，不正确的。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垄断同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高等学校中、在教育方面的垄断地位是一致的，因为在它手里掌握着这个施加文化思想影响的强大机器。不言而喻，如果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成长为这样一个阶级的任务，即它应当自己组成这样的阶层，那么它就应当打破这种垄断，但是只要它还没有把国家机器和国家政权夺取到手，它就不能打破这种垄断。我觉得，整个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就在于此：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造就出身于劳动人民本身的有高度技能的干部，或者更确切些说，首先造成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干部。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就会把其他任务全搞糟了。那时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完成我们交给它的历史任务，那时一切都将表明只不过是我们的幻想

罢了。

因此，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用来吓唬我们的那些捏造出来的说法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就是绝对反革命的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最近发表的一本书里，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他说得简单、清楚，并且毫无顾忌地、完全恬不知耻地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宣布，在社会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相反，考茨基说出这么个理论：在社会民主党统治和资本主义之间必然有一个联合政府时期。而这个联合政府应当代替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请你们从我在这个报告中捍卫的观点来看看，请看看考茨基的这种修改，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篡改。很清楚，就算联合政府是某种过渡阶段（就我们所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么这个过渡时期（考茨基式的）一丁点儿任务也不可能完成。它之所以不能完成任务，是由于很简单的原因：在资产阶级的政府里放进那么两三只社会民主党笨驴，这一丁点儿也不能推动新的阶级前进，也不能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使这个阶级有改造自己本性的可能。你们知道，马克思有一处说到，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等等，工人阶级必须忍受国内战争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的时代达15年、20年、50年之久，以便改造自己的本性。这个过渡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我们工人阶级要以各种方式改造自己的本性，首先是用这种方式改造，即从自己的总的人力储备中分出若干受过一定文化、思想、技术和其他训练的人们的队伍，并且——这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从高等学校培养出来，进入其他的生活领域。这样就可以帮助解决必然落到工人阶级肩上的伟大任务。

这样，你们看到：从这种观点来看，过渡时期的意义恰恰在于，为了使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同时忍受着贫困的工人阶级，通过使自

己的成员接受文化教育，训练出一批干部，从而使工人阶级可以用自己的强劲手腕管理整个国家，可以把自己信赖的人作为有高度技能的人派到各个岗位上。那些它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做不到的事，在过渡时期它都能做到。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它完全关上了门的事，它在自己专政时代第一次获得了做这些事的可能。尽管正因如此，才有国内战争无尽无休的耗费，有最初阶段国民经济的巨大失误，有经济上的巨额开销，但是我们必须克服这一切干扰，因为我们归根结底要依靠新人打下某些基础，这些新人将按新的规律引导历史发展的进程。按照这个观点，现在就应当走向所谓过渡时期，也就是工人专政时期。工人专政会打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单凭这一情况就应当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因为创造新社会基本的、人的社会资本就是在这里形成的。

现在我再来分析一下我在这一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刚刚提到的问题，它是我今天报告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这就是关于任何工人革命必然遇到的那些危险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地位，使它必须利用敌对的或中立的（如果能够使其中立的话）社会力量。但是这样仍然不能解决任务。因为任何时候，任何对敌对的或中立的社会因素的利用，都伴随着危险。我们可以举这么一个粗略的例子。假定你们有从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出身的某一阶层或某个人，有一支技术力量，他们甚至愿意与工人阶级政权合作，他们接受工人阶级专政，自愿遵照作为领导的工人政党的吩咐和命令行事。这里说的完全不是自觉的欺骗或怠工，那是容易解决的，说的是某种更广泛的东西。假定你们要完成某种经济任务，它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完成。从有组织的经济观点看，共产主义的、正确的路线是完全清楚的，技术组织的原则是完全清楚的，但是缺少能够贯彻这些原则的足够数量的人手。相反，却有足够数量的人，他们诚心诚意地愿意利用现有的一

切，而在灵魂深处却不相信新制度的未来；他们的全部过去的经验和素养都倾向于按相反的途径解决这些任务。在类似的条件下，这样一个人会怎样行动？这样一些人，甚至是我们的人，会怎样行动？他们按阻力最小的办法行事（“不管怎么着，开头总过得去”），他们作出的决定，将是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作出的决定只有毫厘之差，但是如果这种不正确的决定，这种略微不正确的决定积少成多，你们得到的将是它们的总和，它们的累计、它们的普遍化，这就是相当巨大的误差了。

这就是内部蜕化的危险性。这个内部蜕化的危险性必然和所有的工人革命紧紧相联。这里的问题在于怎样和它斗争。我要在这里十分坦率地提出关于这个危险的两个亚种——一个是原有的，另一个是具有较为普遍性质的。可能发生什么呢？可能发生的是，我们利用的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阶层的一部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战胜我们。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一次演说中，曾经举过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这个例子我也在自己的演讲中几次引用过，这个例子很浅显，它很好地说明了事情的实质。这个例子是取自历史上的。常有这样的事：象教科书里说的那样，某些很野蛮的部落攻击和征服了某个具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他们简单地击溃了文化高的民族，简单地破坏了他们。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些占据高位、压迫着文化较高的民族的胜利者，被人家从下面削弱了。几十年过去了，几百年过去了，可以发现，过去的胜利者掌握了被他们战胜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信仰。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每次都是这样发生的：社会的必然性要求比征服者所能提供的技能更高的文化力量来执行职能。那时，文化较高的阶层（被征服的）有意无意地，在一丁点儿一丁点儿的很难觉察的过程中，一小步、一小步地实行渗透，掌握了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并且在有组织的过程中，无须经过任何灾变，不知

不觉地、缓慢地站到自己的胜利者的位置上去，并使他们在一切方面实际上服从自己的影响，从而把他们同化了。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身上。工人阶级可以简单地镇压敌人，工人阶级可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集团，在物质上可以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有可能被自己敌人的文化更高的力量从下面吃掉。不是在战斗里，不是在厮杀中，不是在彼列科普，而是在一种缓慢的、逐渐发生的、社会演变的过程中。你们现在完全清楚地看到：这种事怎么会发生，为什么能够发生，又为什么这种危险必然摆在每个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面前！假如这事发生了，那时就会从技术知识分子、从一部分新资产阶级，具体说，从工程承包人、商品供应人、承租人和其他人，甚至加上我们自己工人政党中的一小部分人中产生某种新的阶级，而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总的基础，转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时我们就会处于列宁所举的历史例子的那种状况。

重复一下，对于工人革命，这是最大的危险。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指出这种危险是完全必要的。当列宁同志在自己出色的演讲（如果我没记错，那是去年在冶金工人大会上）中说到共产党人的妄自尊大时，许多共产党人听了很激动，几乎感到受了侮辱——怎么能这样说党员呢！这样说流过血的党员呢！列宁同志在这里是击中了要害。假如我们俄国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它同资产阶级相比是不学无术的，它就会把自己的事业彻底输光。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谈特谈无产阶级的美德是不正确的；现在，在当前的情况下，正确的策略是，要大声疾呼：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这样才能大大鼓舞我们在这方面的劲头。

我答应过谈谈这同一个危险中的第二个危险问题。实际上，我们面前的这个危险有两个不同的分枝。第一，从和我们敌对的或半敌对的社会阶层中，可能产生新的、高高在上的阶级，对于这

个阶级来说，工人阶级变成了被剥削阶级，从部分耐普曼（按俄文说）中，从部分我们利用的知识分子中，可以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还有另一个可能是更加本质性的危险。我认为也应当坦率地、毫不掩饰地谈到它，这是我的职责。我要在这里提出以下论点：甚至无产阶级出身和异常粗糙的手以及其他优秀的无产阶级属性，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变成新的阶级，因为我们如果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中间有一部分脱离了工人群众，他们凭借这种出身而长期占据垄断地位，那么他们也可能变成特殊等级，也可能变成新的阶级。因为大革命的时代、大变动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这时候不能依靠革命前的旧阶级。相反，在革命之后，旧的事物摧毁了，旧的阶级粉碎了，变形了，等等，从其中可以形成新的阶级，从原先的阶级中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阶级。这是革命的标志之一。特别是这么深刻彻底的革命更是如此。这个革命，可以说，把自己的触须一直伸到人类社会的最深处。所以，在工人政党面前，在我们俄国党面前，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使这些有害的抵抗陷于瘫痪。你们看得很清楚：直接的危险是从异己的阶层那里来的危险。怎样和它斗争呢？根据上述所有那些论点，这是十分清楚的。这个问题要用文化力量在数量上的优势去解决。

如果我们培养得出，如果俄国工人阶级培养得出（我一点也不怀疑它培养得出）足够数量的干部，可以逐步地、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取代来自旧知识分子和旧职员干部，那它就消除了第一个危险。也就是说，正是在这个进行种种组织的、思想意识的、行政的等等分子的斗争的战场上，我们将拥有同样多的或更多的文化机器。而且，如果他们在质量上不比旧的低，数量上又比旧的大，那么在这盘棋上我们就赢定了。这是我们应当解决的第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因此，高等学校以及文化问题的解决，现在对于我们是最紧迫的、最为大众瞩目的任务之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

它们看成可有可无的玩意或是奢侈的东西。不能！这可是关系到革命的前途的。而第二个危险，同志们！是更为深刻的，或者是更具有普遍性的危险。我已经讲过，这个危险在于，你们，你们这些听讲的人，以及我们较老的一代中的一部分，有可能变质。那么，在这方面究竟有什么保障，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的基础又是怎样的呢？只有一个办法，它在我们的政策得到正确运用并且这个政策具有正确原则的情况下，恰恰也能最终保证我们胜利。如果能保证从工人群众本身中经常输送人员到新的工人知识分子中去，并且使这种输送源源不绝，与日俱增，形成来自工人阶级的补充阶层，我们就会胜利，我们就会在这方面排除这个深刻的危险。也就是说，可以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工人阶级送进高等学校的第一批队伍形成了小圈子。后来受高等教育的，也只有他们的儿子，孙子，重孙，玄孙，那时就将形成一个排他的集团，尽管出身于工人阶级内部，却又作为教育的垄断者进行统治。那时就将出现一个巨大的危险，他们在这里就会变成一个蜕化了的新阶级。但是如果有一批又一批规模愈来愈大的新的工人阶级分子经过这种巨大的学校实验室的改造，得到越来越多的技术训练，那时，我们就能消灭这种危险，就能预防它。

这样，如果从长远看我们的工作，那么第一个任务就是造就新干部，这是为干部构成而进行的斗争。谁将是干部成员？我们的人，还是敌人？如果最后干部成员中占压倒多数的是我们的人，第一个任务就解决了，而我们将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里解决它。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保证这批干部同经常增加的新力量保持联系，不使这批干部把自己封锁起来，成为垄断的特权阶层。如果这个任务解决了，那时就意味着，我们是踏踏实实地走向共产主义。那时，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的矛盾也消灭了。而这是整个事情中最重要的一点，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点。那时，有知识

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本身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将失去原来的意义。

你们看到：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极其小心，特别应当防止有时在我们这儿多少得到传播的那些思想，或者那些情绪。例如，有的人没有充分思考过这整个问题，他看到耐普曼时就是这种态度。他说：“让我们再一次把他的牙敲掉。”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两万次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随便在哪个城市制造大镇压，根本不费劲。但是现在应当明白，完成任务和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不是用机械的办法，不是用再次敲掉牙齿的办法，而是用训练我们的人材成为我们的干部的办法。我们党内曾经就工人反对派等等进行过争论，这现在已经过时了，那时有些工人反对派的同志采取了阻力最小的路线。我说，我们可以两万次再做这种敲掉牙齿的事，简单地进行镇压，这不是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得从我们自己人中间分出这么一些人，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而且干得不是比那些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有危险的人坏，而是比他们好。这是今天我们在文化工作领域的政策的中心点。我们应当明白，为了培养我们需要的干部，必须雷厉风行地办事。我们应当明白，解决这个任务，不能用简单的镇压和强制方法。必须明白，这里需要的是内部的、深刻的改造。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那我们无疑将会完成自己的任务。

现在请允许我说说比较具体的东西。上面说的全都正确，可是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属于什么样的心理类型的人？为了保持胜利，我们需要多少人，什么样的人，他们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头脑？我们需要一支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干部队伍。他们应当有怎样的心理特征？我已经在莫斯科的一次与此大致相同的报告中阐述过这一论点。现在我们需要属于这样心理类型的人：在马克思主义修养方面，应当具有俄国旧知识分

子的好素质，眼界广阔，对事件具有理论分析能力，又有美国人的务实本领。我们需要属于新的心理类型的人。我国的旧知识分子，哪怕是出身于工人的，都具有理论分析和善于概括的优良品质，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手脚笨拙，不会动手干活，丢了裤子拉了背带，在实际生活中什么也不懂。现在应当把它们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在所有我提到的好的素质方面，要加上这种务实本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心理类型。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加上美国精神。

当我们刚刚掌握政权，开始管理俄罗斯国家这架巨大的机器时，我们处于自己的胚胎状态是不得已的。我们只能成为万事通，什么都得做：“只要下命令——我就会当助产士。”今天在前线，明天就到了另一个地方，等等。总算好歹把事情处理了，因为革命这个学校给了我们巨大的精力。当然，也做了些错事，有时捅个漏子，不过总算勉强对付过来了。我们整个干部队伍就象俄国古罗斯封邑时代的流浪民族似的。我们现在应当过渡到定居方式。应当明白，现在应当一下子并且永远地停止说大家什么都能干了。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专家，他们可能对别的部门一窍不通，但对他们研究的事物却很熟悉，而且一点不假，就象在这部门工作的旧资产阶级专家那样熟悉，或者比他们还强。这是极其需要的。需要我们的每个专家同时也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明白一切，明白而且听见了革命的精灵的翅膀在空中颤动，因而能够遵循我们党引导俄国社会前进的那条轨道，同时也需要他能够负责，并且通晓自己的本行。因此，现在必须进行专业化，并停止一切有关从妇女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万事通的废话。这种类型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是一种有害的类型，应当同它斗争。此外，同志们！从另一方面看，也很清楚，在我们当前的文化经济计划里，某些环节具有巨大的意义，另一些环节的意义小些。在当前，高等技术学校的意义最重大。这是第一位的，它将决定事业的成败。顺

便说一句，我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我在莫斯科做了报告之后，一大批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决定离开共产主义大学去进技术学校。这太过火了。但是，就整体来说，应当明白，工程师和技师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最令人满意的类型是那种完全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优点和必要性、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类型，他进入高等技术学术机构时，就知道正是在这条战线上首先将要发生我已经有幸提请你们注意的那些战斗。

最后，我还提出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说我个人的观点，并且只由我个人负责。我说过的所有那些话，在党员方面等等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我要说的这最后一小部分，大多数领导同志是不会赞同的。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派而产生的那次争论。这是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看来是两种观点在斗争。一种观点断定，现在，在我们俄国条件下，必须学会读书，学会识字，这是现在最基本的。饭后要洗手，要学习文化，这是主要的，决定战斗的，而其余的一切，都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之类臆想出来的废话和空话。第二种观点，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它对识字等等问题没有涉及，没有阐述，却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定和实现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原则上。

我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既然我们管理着我们所有的群众，俄国所有的劳动人民群众，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从我们和这些群众（这是工人阶级加几百万农民的总和）的关系方面提出问题，提出我们进一步的任务问题，那么最重要的任务是清楚明白的：必须教会他们读书、写字等等。如果我们问到我们能给教育战线提出的预算，这个预算又该怎么分配，给这一项多少，那一项多少，第三项多少？那么很自然，在这个巨大的教育事业上，我们应当把我们能拨给所谓文化战线的全部经费的很大百分比用来进

行这种初等的扫盲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问题的提法不会引起任何反对。如果，比方说，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他们就会犯很大的政治错误。因为很自然，我们要解除我说过的那一危险，就必须有基础。我们必须提高广大的工农各阶层，使他们达到新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同新的干部结合起来，因为大家不能一下子都进入天堂。而如果出现下面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可避免要垮台；如果我们一批人只是游游荡荡，不会读书，不会写字，而另一些人却具有真才实学，那时蜕化就不可避免。因为即使我们在恢复经济方面的那些技术和经济任务，我们也无法在生着虱子和没有文化的状态下完成。既然我们提出了关系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文化政策问题，那么，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个基本的政治任务。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我在农民大会上讲话，那是一回事，如果，比方说，到红色教授学院去讲话，那又是另一回事。在那里我不能整整四个钟头去说什么饭前要洗手；会后我也不能简单地戴上帽子就走，我得在实质上回答他们应当怎样解决他们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怎样设想本阶级的科学的前景，等等。在那儿可不能躲躲闪闪。所以我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应当花一些钱。在整个预算中，这应当占我们的人力、物力的多大部分呢？让我来作一个对比。你们知道：当我们开始管理我们的经济事务时，我们的政策是摇来摆去的，一会儿我们强调这个，一会儿强调另一个。拿我们的经济计划来说吧，它是一个由许多环节组成的链条。如果我们拼命把所有力量都放在一个环节上，就会把别的环节弄断。所以，高明的经济管理——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分配人力和物力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对某个战线，也就是某个环节特别着重，打算在那里比在其他环节投入更多的力量，那么这时我们也不忘记那些细小的环节，因为常常有许多大的环节依靠这些小环节。缺少一个螺丝帽就能弄坏整个机器，虽然从数量上看起来，一

个螺丝帽在整个机器的构造上是个无关紧要的东西。这里的情况也一样。现在我们应当生产新的人。很可惜，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安排的，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教授和工程师。只能通过这样可能的途径：先培养一批干部，由他们再培养其他的人，以下类推。首先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使他们精明练达起来，然后是其余的人，然后是另外一些人，这样就逐步把全体人民都训练出来了。没法不这样做，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变成红色教授，一下子把每个伊凡诺夫都变成红色工程师。这是做不到的。这是空想的任务。在全体人民还没有受训练以前，必须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实践的将军们下面，建立一支军官队伍，然后，建立一支军士队伍，一支过渡性队伍，等等。如果我们现在只教所有人学文化，而不培养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姑且不说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授），那么教课的就不是我们的教授，而是其他的、异己的教授。而他们要教谁呢？教那些中间环节，那些最不成熟的群众。那我们就在这儿把事情搞坏了。我们就从另一头把链条弄断了。应当在广泛的战线上开展文化工作。主要的注意力要放在消灭文盲上，但不应当忘记熟练干部，必须注意培养他们，使他们成为更加熟练的干部。使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经过这个链条传授给下一阶层，使整个机器运转起来。应当这样提出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既然我们讲的是在千百万人中间的政策，我们就应当强调消灭文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另一些比较狭窄的、培养我们的干部和技术力量的领域，也不应当提出另外的问题。那些问题我们也应当解决，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领域。

我的报告快结束了。我想说几句结束语，作几点总结。这几句话是这样的。同志们！我们是在对许多事情无知的情况下，开始了我们的革命。我们开始我们的革命时，还没有想到革命会带来的那些巨大的困难。必须十分清楚地、准确地、坚决地说明这一

点。可是现在，一大批我们的敌人走过来说：你们错了！事情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耗费很大，流血很多，失败不少，等等，所以你们破产了。我们要说：谁都能叫唤，就是你们没有资格叫唤。你们的情况糟糕得多。我们有前途，我们看得见出路，我们有意志、愿望，我们面前有大道，而你们什么都没有，你们哭去吧！叹气去吧！抠自己的肚脐眼吧！求上帝去吧！你们会变成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怜的、老朽的、淌鼻涕的老头。我们应当说：我们受尽磨难，我们知道做这一切有多困难，我们比你们更清楚，在我们道路上有怎样的危险。见鬼去吧！旧的神像已经砸碎了！知识之门已经打开了！我们造就新人，而且不用从前的办法，是用另外的办法。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人家对我们说，俄国革命什么也没有带来，我们非常贫困。这完全是事实。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到，大地的汁液已经进入我们体内，流入我们的血管，升到我们的头脑里。我们的头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工作了。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水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俄国人民，这个臀部宽大的妇女，她从前对村子以外的事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唤醒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而现在，她可不仅知道罗莎·卢森堡和马克林是谁，她还知道任何一个法国市侩不知道的事。就拿俄国农民来说，他们过去对自己宅院外的任何事都不知道，现在他们被改造了，他们想到的不仅是自己的宅院，自己的村子或是村庄，甚至也不仅想到莫斯科，还想到伦敦，想到巴黎。我们再拿占领鲁尔区来说吧。这一时期，我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了农村群众许多来信，这说明群众对于鬼知道在哪儿发生的各种事件都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头脑的改变是很巨大的，只有纯粹的糊涂虫、思想上的饭桶才对它估计不足。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现在是凑凑合合地培养一些干部，他们可能犯错误，但是反正是

会进步的。可不是吗，不久以前，德国大使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他说，是啊！你们这里的听众，比我们的共和国参议院里要象样些。我们自己也在这些代表大会上看见了，我们有一支新的工人干部队伍正成长起来。他们处理问题是很深入的。在我最熟悉的经济理论领域里，就有许多同志比我懂得多，而他们是出身于工人的。同样的现象，在理论的、实践的各个领域里，到处都有。

我们看见，我们的群众已经再生了。他们尽管贫困，还是前进了，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国家政权使他们有可能进入高等学校，他们开始学习了。如果这些干部将明白自己的责任（而我相信他们会明白），那我们就要说，和这个新的、革命培养出来的人民在一起，和这个新的、革命培养出来的、将取代老一辈的青年在一起，我们会胜利，我们会克服一切障碍，并且要向所有那些哭鼻子的人宣布：你们这些可怜的小人物！你们那时使我们烦死了！你们妨碍我们工作！而我们却把旗帜拿到手里，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了！

译自《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
彼得格勒 1923 年俄文版。

论今日的取消派

一 无产阶级革命幻想的破灭

马克思曾经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经常对自身进行批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在其最初阶段，即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阶段，还是在其发展的以后阶段，即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巩固自己的专政、并为改变生产方式而斗争的阶段（这时，不论有些集团、阶层、甚至某些阶级是否愿意，无产阶级实际上已是整个社会的领导），都必然要面临一些独特的问题和原则性的新的任务；而资产阶级革命则没有一次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没有一次会而面临这样的任务。

胜利的无产阶级，由于面临的~~任务~~复杂、新颖、独特、困难，使它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错误、幻想、不正确的估计和目标错误的尝试。然而由此也产生了冷静的自我批评，从这种自我批评中得出正确的行动路线。幼年时期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并且消失得毫无踪迹，现实关系以其全部冷静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而无产阶级的政策有时从外表看来是不太激动人心的，但却是比较正确的、牢固的、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因而它改变这种现实也是有把握得多的。

从这个观点看来，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我们幻想的破灭。共产主义的敌人、喋喋不休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空谈家们，同公认的我们的无耻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们一样，过去和现在

都把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评价为共产主义的破灭。要注意，在这种评价方面，同他们意见一致的，还有“路标转换派”俄罗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无产阶级专政进化地蜕化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式的俄国大国主义。他们“接受”苏维埃政权，不是把它当作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把它当作“新的俄国”的政权。他们不赞同饶舌者的愚蠢格言：“世上没有新的东西。”但同时他们又相信，我们正从另一端走向彼得·司徒卢威先生的“伟大的俄国”，而这位司徒卢威先生曾经在“真正的俄国”男爵弗兰格尔的欺诈可疑的旗帜下那样不成功地为自己杰出的女皇陛下服务。

这样，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轻率盲动都在同一个立场上动人地联合起来了：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的破灭。为了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还会联想起国际上的社会民主党的腐朽的理论家也是这样评价局势的。这些腐烂的废物也抓住机会来证实臭名昭彰的“破灭”。

只有一种力量，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采取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立场，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它的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的党。

实质上是什么“破灭”了呢？是“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制度破灭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破灭了，也就是我们党内曾经有过的幻想破灭了。这绝不是说，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在最初的时候就根本是错误的。在国内外封锁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象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做。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想象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整个相对性质。

当时我们曾这样想，我国的和平组织工作、我国的经济政策和我国的经济建设，将是这个时代的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进一步延长。然而由于当时已经集中得相当厉害了，所以自然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完全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为时不远了。换句话

说，战时共产主义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在生产力下降的情况下，天真的最严格节约的合理化形式被看作是和平经济政策的合理形式。而这就是那个时期的幻想的基础。只要战时时期的准则和思想一消失，这些幻想也将必然破产。那时候，立即会涌现出有关当前经济政策的许多新的问题，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经济形式；关于这些经济形式，它们的阶级体现者曾经不停地谈论过，而在某些地方还是被他们大肆吹嘘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幻想，在无产阶级的军队占领皮列柯普的那个时刻就破产了。

二 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从“了解”战时共产主义的时代的观点看来，新经济政策是无可怀疑的和极大的让步。从现实的革命路线的观点看来，它是无产阶级实际的经济政策，也就是旨在发展国内生产力的政策的前提、第一步和总的必要条件。

如果从高等代数的观点来看，即最抽象地来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那我们就会得出一幅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社会的发展图景。但是，在现实中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意见也不那样一致，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有许多过渡形式。计划不能一下子从上面先天地、唯理地规定出来。实际上它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集中、在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调整了的原则的经常压力下才能形成。这并不是说，它只是自发地产生的。无产阶级手里握有足够分量的大工业和运输业，它能支配它们，也能管理它们。但是它必然要注意到分散的小经济的巨大压力，这些小经济的整个分散性

和小资产阶级局限性，表现为盲目的、但却是巨大的市场自发势力，这种势力分化出商人，并投入新资产阶级的怀抱。

过渡时期里的过渡时期表现在一系列的事实上；表现在形形色色的经济形式上，从社会主义的国有工业、国有土地上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经济直到私人资本家的经济、耐普曼的经济；它表现在市场关系上、货币力量上，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上；它表现在我国国营企业的经济政策的资本主义形式和方法上，尽管这些形式和方法具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抗的内容；它表现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刺激因素和这些刺激因素的惊人结合上；最后，它表现在各种对抗的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形式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分子斗争过程中。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采取了看不出的、极端奇特的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大工业争夺对私人资本统治权的斗争。由此可以更加具体地来看：无产阶级争取对农民起影响的阶级斗争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争取通过合作化和国营贸易达到同农民经济的经济结合以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因此，无产阶级反对小资产阶级、甚至农村资产阶级的私有者领导的阶级斗争，又是争取农民合作化和争取电气化的斗争。

在国内战争时期，问题是在于鲜明的政策界限：打击资产阶级、在农民中寻找同盟军、给万第人—富农以打击。阶级斗争的这些基本问题现在穿上了经济的外衣。但这丝毫也不否定它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因为国营工业反对资本家、同农民结合反对商人，合作化和电气化——都是为逐步克服小所有制而斗争的武器。换句话说，过去的阶级斗争对我们来说首先带有军事政治打击的性质，而现在它却开始具有有机的和平经济的而貌。在这种类型的阶级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在这里撇开了外部的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问题，大体如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是，发展的总趋势是，大生产战胜其较小的敌人，排挤它，克服它，而最终成为国内的经济寡头。结果我们在这里会遇到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我们俄国字义上的而是西欧字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从形式上看，在我们这里现在也是这样。但是却有原则上的、本质的差别，即大生产在我们这里是掌握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的。这种大生产对私人的、较小的资本进行斗争。它同自己的敌人竞争。它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甚至采用资本主义形式的一切簿记（“计算成本”）。但是这些形式和方法客观上为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服务。这种竞争的过程应当保证大生产，即我们的、无产阶级的生产取得胜利。而随着这些胜利、随着经济的集中、随着农民的合作化（所有这些过程都由工人阶级的独裁政权来调整和指导），将日益成为现实那种将越来越快地变成整个社会生产的实际计划的经济计划，也将日益成为现实的。结果我们遇到的将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为纯粹形式的无产阶级公有制也排挤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由我们调节的租让制、租赁、私人资本等等）。因此，我们现在的竞争，在外表上非常象大资本与小资本进行的竞争，而在本质上，也就是从阶级的观点来看，则鲜明地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当工人的专政剥夺了剥夺者、俄国的主要工商业大王时，我们的敌人喜欢说什么“用指令建不成社会主义”。当然，光用指令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仅仅用单纯的剥夺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剥夺、即把经济生活的命脉掌握过来，为阶级斗争形式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为经济类型的竞争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从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中和这样的经济类型的竞争中成长起来。

大生产的优越性在我国的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优越性，在生产力下降、经济崩溃、原料和燃料来源枯竭、管理干部和有经验

的干部完全缺乏的条件下,这种优越性是不会有。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有了燃料、原料,以及有了最重要的因素——经历过足够的严酷的经济斗争、经验丰富而又内行的同志的时候,这些优越性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农民市场的发展而日益鲜明地显露出来。

三 论今日的取消派

因此,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绝不象我们过去所设想的那样简单。我们摆脱了幻想,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重大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也应当改造自己的本性。但是,这一条困难得多和曲折得多的道路,虽然它保证我们胜利,却要求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具备非常充沛的精力。此外,伴随它而来的,不仅是从这种特殊斗争的逻辑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困难(例如在实现“学会做生意”这一口号中的困难),而且还有在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内部的社会制度中的全新的困难。这里也关系到所谓蜕化的全部问题,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面前,产生了在工人阵线内部增加斗争的任务。

这样,按照新的路线任务复杂起来了。而且,现在看得十分清楚的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相反,这个问题将在任何的工人革命中起相当重大的作用。因此,对更加平坦笔直的道路所抱的幻想在这里也破产了。

幻想的破灭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失败。从一定的观点(非常有限和非常相对的观点)看来,它本身就可能被看作失败,尽管它实际上是胜利,因为从已经破灭了幻想本身的角度看来,也就是从这些幻想的实际体现者看来,它是失败。

在任何的失败之后,都会出现逃兵。但是,如果深入地分析这些逃兵的队伍,就总是会发现,他们是从那些最不坚强最不坚定的

战斗中来的。

在无产阶级大军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很容易被吸引去参加炽烈的冲锋，但是他们也同样容易泄气、绝望、歇斯底里地“怀疑”、“失掉信仰”、成为怀疑分子、“抱怨叫苦”、“改变立场”或迷恋于某种“高尚的”领域，而让“信仰者”去吃苦受罪。

到时候，他们会立即叛变，把自己装扮成精神贵族，高傲地看待那“反正什么结果也得不出来”的东西。

我们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看到过这种逃跑的景象，真正意义上的逃跑的景象。当时成千的人离开了工人阶级，而且是永远地离开了。

现在，当幻想破灭后，我们又看到某些类似的现象。在这里同样有意思的是，仔细研究叛变思想的细链是怎样形成的。

在1905年民主主义革命中，自由资产阶级还在十二月起义以前就公开地转到反革命的阵营去了。它成为工人阶级的同路人（即在十二月后开始大批离开工人阶级队伍的那些人）的思想引力中心。孟什维克开始唾弃莫斯科工人的起义，同立宪民主党人勾结在一起；公开的逃兵浸透了“路标派”的情绪；过去的“最高纲领主义者”中的某些人开始骂俄国人民是没有头脑的丑女人，为了她，英雄老爷们实际上不值得去努力争取什么，如此等等。

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阵营里脱离出来类似1905年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幻想破灭以后，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成为逃兵的思想引力中心，从这个角度看来，分析象“工人集团”（米雅斯尼柯夫派）和“工人真理”这样的集团会是极为有益的。它们把幻想的破灭当作共产主义的破灭，并开始从“左”面来批评我们的党，转了整整180度（特别是“工人真理”集团），彻底转向孟什

维克主义的观念了。

“工人真理”集团从批评俄国共产党是出卖十月革命的党开始，而以批评十月革命完成它自己的事业，也就是回到了1917年10月李伯尔、唐恩分子的道路。米雅斯尼柯夫派则从批评党内的所谓“专政”开始，进而至于批评无产阶级的专政，并提出口号要联合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从米留可夫直到唐恩。而所有这些可尊敬的人——无论是唐恩分子和“曙光派”，还是社会革命党人和逃兵，全都以同一管笛子故意大吹伤感的新经济政策的调子，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新经济政策的“民主”。

所有这些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但是，最坏的是，我们这里有一些隐蔽的怀疑分子（为什么要掩饰这一点呢？），其中包括有能力的青年学生。在他们中间，把谈论我国继续向前进看作坏品格的标志，相反，他们非常喜欢带着自己的优越感（要知道，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批判地思维的个人”同所有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放肆地议论我们的弱点、失败和错误。

在他们中间，对革命的命运没有崇高的担忧的感情，有的只是对我国前途的深刻的隐蔽的怀疑。他们生活不是在寻求肯定的解答，而是要从事那种使“今日的仇恨”在它面前显得暗淡无光的更加“高尚的”活动。

这种在思想上接近于逃跑主义、然而却罩上一层“高贵而漂亮”的朦胧面纱的未老先衰的年轻人，趁目前还不算迟的时候，应当请医生治病。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中，新鲜的工人力量成千上万地走向我们，这支新的队伍同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构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呵！这些新的队伍满怀坚定的信念、充满了社会乐观主义！同时它们也看到无数的困难，看到我们机体上的巨大缺点。但是他们全都具有积极的创造的信心，相信我们将战胜一切困难，只要我们钢铁般的队伍是团结的、友好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我们党正在经历的那种巨大的革新，其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的巨大标志。取消派将按无产阶级的意志而得到可耻的结局。

第一次发表于1924年。译自《布尔什维克》
杂志1924年第2期第1—9页。

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 文化及其他^①

(答伊·巴甫洛夫教授)

伊·巴甫洛夫院士是俄国的大科学家之一。他的名字享有世界的声誉。他在生理学领域中创立了整整一个学派。他为人类作出的丰功伟绩是不容置疑的。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其不容置疑。因为客观情况就是这样：巴甫洛夫教授在政治上看来离工人阶级遥远得很，但他首先是在为工人阶级而工作。他的条件反射学说是完全为唯物主义效劳的^②。巴甫洛夫教授从事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成果是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强有力工具之一。而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唯物主义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里无须解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我们只是确认这个事实。正当资产阶级满怀疑虑地越来越望洋兴叹，而哲学的唯心主义象油斑一样漂浮在资产阶级意识的表

① 载《红色处女地》杂志 1924 年第 1、2 期。

② 笔者曾经从平衡论观点阐述过唯物主义辩证法，因此特别高兴地指出伊·巴甫洛夫教授的以下论点：“什么是适应这个事实呢？不是别的……无非是复杂体系的诸因素自身之间以及整个体系与周围环境的精确联系。不过，这也就是在任何一个无机体中都可以看到的完全相同的东西。就拿复杂的化学机体来说，化学机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个别原子和原子群自身之间以及它的整体与周围条件的平衡。高级机体和低级机体能够完全同样复杂地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只是因为它的组成部分自身之间以及与周围条件都是精巧地和准确地联系着的、平衡的。分析体系的平衡也是生理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目的。”见伊·巴甫洛夫院士《二十年经验》及其他，第 14—15 页。亦见我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面时，整个资产阶级科学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神秘主义就在这里筑下了牢固的窝巢。新活力论、对达尔文学说的批判、目的论、绝对的相对论、纯粹逻辑论以及形形色色庸俗不堪的“主义”也迅速地在自然科学界泛滥起来。如果说在我国，“科学之父”弗洛连斯基企图借助于数学公式和天文学计算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这类现象在西欧科学界则具有真正流行病的性质。西欧的科学目前过于接近某个梅列日柯夫斯基的立场了，后者在亚述学中仔细搜索，企图推算出默示录日历的“大周期”，预测世界的末日，并同别尔嘉也夫先生一起分享正如尼茨施所说的“白天和黑夜的小小乐趣”，确认布尔什维克革命是“野兽”降世，而苏维埃制度则是“恶魔临头”。神秘主义，或者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一种旧式的怀疑主义，即一再重复世间百事的沉沦——这就是现时西欧科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因此，大胆起来反对这种神秘主义浊流的每一个科学家现在和将来都会受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尊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再说一遍：这样的科学家，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都是在为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那个事业而工作。巴甫洛夫教授正是属于这类科学家的。

但是，太阳也有黑点。而象巴甫洛夫教授这样的自然科学专家们一旦着手从事他们所根本不了解的事业（请条件反射论的作者原谅我这样说）时，这些黑点则具有相当巨大的规模。巴甫洛夫院士在其绪论性的演说中批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批评我们党，批评笔者时，情形正是如此。

巴甫洛夫教授抗议愚昧无知的共产党人对文化珍品和科学珍品的摧残。我们这位批评家的基本“道德”就是：“不要去做你所不了解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而来谈。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应当指出，社会科学也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也是应当了解的。而巴甫洛夫教授正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他在涉及到社会问题

时竟然陷入如此幼稚可笑的地步，就象在自然科学中去维护林耐的观点或者某种燃素说一样。

一 科学自由的哲学和巴甫洛夫院士的理论

巴甫洛夫教授提出来反对我们的最一般的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是纯粹的教条主义，因为他们（共产党人。——尼·布·）认定，这就是真理；他们不愿知道更多的东西，（他们。——尼·布·）总是致力于一点。”^①

然而，“科学和教条主义是互不相容的东西。科学和自由批评是同义语，教条主义则不然……牢不可破的真理有过多少呢？就拿原子的不可分性来说吧！曾几何时，这种理论已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全部科学都充满着这类例子。”

巴甫洛夫教授因此向听众们发出相应的指示：

他说：“如果你们认真地对待科学，如果你们扎扎实实地了解科学，那么尽管你们是共产党人、‘工农速成者’等等，你们就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决不是绝对真理，它只是一种或许包含着部分真理或许并不包含真理的理论。因此你们一辈子都应从自由的观点去看问题，而不是从这种受奴役的观点去看问题。”

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社会”演说的结尾时就是这样号召自由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不愿成为“科学上冷漠无情的人”。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巴甫洛夫院士的这个非常抽象的几乎是

^① 我们手头有巴甫洛夫教授演说的速记记录稿，显然是没有经过校对的。因此，我把一些修辞上必要的词句放在括号内，不言而喻，这丝毫不会损害原意。

“哲学性的”论点吧！

首先，什么是从“自由的”观点而不是从“受奴役的”观点看问题呢？我们不应故作天真。我们知道，人们在政治领域中，对“自由”这个词玩弄了多少把戏。而在科学领域甚至哲学领域中，也存在着这类把戏。别尔嘉也夫们、梅列日柯夫斯基们等先生不是反对“理性的桎梏”吗！？不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实吗：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学派把自然规律看作是奴役，而把合乎理性的认识同直觉对立起来看作是汗流浹背的劳役者的工作，其中有些人（如布尔加柯夫在《经营哲学》中）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经验地产生的整个世界无非是“世界的罪恶外壳”，按这个罪恶世界的内在逻辑来说，那里是不可能自由的。巴甫洛夫教授是不是同意这种“自由”的观点呢？

当然不是。这是同他的自然科学观点相矛盾的。然而由于他对自己的“自由观点”的说法没有深思熟虑，因此直接得出了“非理性的”结论。

因为：巴甫洛夫的“自由观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没有观点。任何一种观点都具有“约束的”因素。一旦你持有某种观点，那么人们就可以责备你，你是它的“奴隶”，你是它的“俘虏”，你是“受奴役的”等等，等等。

不过，在这堆无谓的废话中最有趣的一点是：不可能完全没有观点。比方说，在力学中什么是“自由观点”呢？力学中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是你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加以使用的。从什么意义上说你使用这些概念呢？例如，埃·马赫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分析得对不对呢？任何一门科学都要讲“规律”。那么这些规律是现象的客观联系呢，还是我们可以随意调整的理性的产物呢？按照康德的意见，它是可以仿照主人的样式从混沌中确定宇宙的“法制国家”的。任何一门科学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是

可以被批判地置于放大镜之下的。按照巴甫洛夫的意见，一个“正直的”科学家应该怎么办呢？什么也不加考虑吗？不过，这也是一种“观点”，只不过是最好的一种观点：这是科学上的庸人的观点。这是最好的一种教条主义，因为它对一切现成的概念都信以为真，并装出蒙昧人的无辜的模样来运用它。

总之，观点，甚至是一定的观点，是任何一个不愿穿着思想的长衫和破鞋的科学家都必须具备的东西。

现在要问，持有一定的观点、敢于“有自己的见解”并认为这个“见解”是最正确的、在现有的一切答案中最好的见解的科学家应该怎么办呢？为了发展科学，一个不是“无舵无帆”地在知识的浩瀚海洋中航行而是遵循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经过检验的、经受过同其他的理论批判性地较量的观点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他将起来捍卫这个观点，为它而进行斗争。科学也有自己的战士。这样的人曾经把科学事业推向前进；他们曾经是保证科学思想向前发展的有益的社会酵母，而绝不是害怕持有一定观点的庸人。只有因循守旧的编纂者、尤其是折衷主义者才害怕持有一定的观点。

我们非常清楚，巴甫洛夫教授在议论“奴役”和“自由”时完全是在无谓地进行自我诋毁。的确，就拿他的文集《客观研究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二十年经验》来说吧。单是根据这本书就可以看出，作者正是“以极其顽强的精神”“致力于一点”的。而巴甫洛夫教授的著作的优点正在于此，正在于他“致力于”这个“一点”。我们尊敬的论敌，难道不是这样吗？

巴甫洛夫院士甚至在实验室的研究中也是多么热心地捍卫这个观点的，这一点我们从条件反射论的作者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例如，他写道：“我们完全禁止自己（在实验室中甚至宣布要罚款）使用这样一些心理学上的表述，如‘狗猜着了’、‘它想要’、‘它

愿意’等等”^①。

诚然，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工农速成者”还没有对比方说使用了拟人观、目的论或者唯心主义的表述而采取罚款的，但是他们无疑也会对巴甫洛夫主义者为了科学在自己的实验中所采取的实验室“卢布专政”进行辩护。

然而，所有这一切怎么能同教授本人所反对的“受奴役的”观点相一致呢？要知道，连小孩子也明白，巴甫洛夫本人的科学实践是同他的关于“自由”和“奴役”的论点是截然地、明显地矛盾的。

假如他的批评者摆出一副自由美女的卫士和骑士的高贵姿态，对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也说出类似的以下一番话，那么巴甫洛夫院士将会说些什么呢：

“条件反射论或者巴甫洛夫教授的信徒们的教条主义……是纯粹的教条主义，因为他们认定，他们拥有真理；他们不愿知道更多的东西（例如完全不愿倾听活力论者的意见），他们总是致力于一点，死抓住自己的唾液腺不放。然而，科学和教条主义是完全互不相容的东西……牢不可破的真理有过多少呢？就拿原子的不可分性来说吧！”如此等等。

假如他的批评者对他和他的学生们以直截了当的训诫口吻说出以下一番话，那么巴甫洛夫教授将会说些什么呢：

“如果你们认真地对待科学，如果你们扎扎实实地了解科学，那么尽管你们是条件反射论的拥护者、‘巴甫洛夫主义者’等等，然而你们一定会承认，巴甫洛夫的理论，即条件反射论决不是绝对真理，这只是一种或许包含着部分真理或许并不包含真理的理论。这样你们一辈子都会从自由的观点去看问题，而不是从这种受奴役的观点去看问题，自然，你们也就永远不会对自己的信徒们因为

^① 巴甫洛夫院士《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研究中的生理学和心理学》，见上述文集第195页。

随便说了一些话而进行罚款，因为正如一位诗人说的：

‘对于自由的思想，
就是上帝也不应该
采取暴力和压迫。’”

我们相信，巴甫洛夫教授一定会愤怒地把这位饶舌者赶走，即便这位饶舌者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一定会对他说：“别妨碍我们工作。收起你的那套胡言乱语吧！”

而他是完全正确的。庸人般的、不加批判地使用字眼有时是很危险的。已故的科兹马·普鲁特柯夫写道：“许多人就象香肠一样，装进去什么，那里面就是什么。”但是，象“香肠”一样的不仅有许多人，而且有许多话。我们竭尽全力地为社会底层的自由，为摆脱资本的自由，为发展合理的因素、克服自发的因素的自由等等而斗争。但是，我们决不主张资本摆脱无产阶级桎梏的自由；我们决不主张摆脱理性桎梏的自由；我们决不主张摆脱一定观点的自由，等等。

这是巴甫洛夫教授应当懂得的。他必须在自己的见解上自圆其说。他必须从自己的唯物主义前提中得出社会—哲学的结论。他必须摆脱一旦在他涉足社会学领域时威胁着他的那种语言拜物教的残余。

他必须懂得甚至自由主义的屠格涅夫多年以前就已懂得的东西。

在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中有一首很著名的《处世之道》：

“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对我说，——你若想狠狠地责难对方，甚至加害于对方，那你就斥责他有某种缺点或毛病，而这正是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你要义愤填膺……并痛加斥责！

第一，这会使别人以为你没有这种毛病。

第二，你的义愤可能甚至是真诚的……你会受到自己良心的

谴责。

譬如说，如果你是叛徒，那你就斥责对方，说他没有信念！

如果你生性奴才，那就责备他说，他是奴才……文明的奴才，欧洲的奴才，社会主义的奴才！

——甚至可以说失去了奴性的奴才！——我说。

——这也是可以的。——老奸巨猾的家伙附和说。”

二 “科学的公正”或巴甫洛夫 教授反对巴甫洛夫教授

巴甫洛夫教授在批判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时说，他是持客观态度的。

他说：“先生们，应当说，我对事情的态度是极其诚挚的……每当我对（某件。——尼·布·）事情感兴趣时，我就不是一次地读书，而是……几次……我把这本小书读了整整三遍（啊！——尼·布·）。读时非常专心致志，并且我觉得……我是持力所能及的公正态度的。你们知道，我一生，即已经半个世纪了，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每天都检验我的公正态度、我的一些想法。这首先是……其次是（我指的是。——尼·布·）我的公正态度，因为现实始终必须回答——我是对的还是错的。现实是怎么也不能欺骗的。”

从这种态度中可以看出，巴甫洛夫教授的问题的提法，是多么天真。门捷列夫是著名的化学家，但未必有谁敢断言，他对专制制度的态度是公正的，他在经济政策领域中的保护主义的态度没有缺点。牛顿是杰出的科学家，但他对默示录的态度未必是公正的。威廉·克鲁克斯是公认的天文物理学家和杰出的实验家，但谁都知道他对招魂术的态度是有缺点的。难道这样的现实是可以欺骗

的吗？

况且巴甫洛夫教授在谈到巴甫洛夫教授自己时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这样认识社会现实的：

他说，“我的一生过得极其平凡：我只知道自己的住所，自己的实验室，看不到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因此，我看不到整个生活。根据现时的报纸，未必可以（得出。——尼·布·）生活的概念：报纸太偏颇了，我根本不看它。”

于是，巴甫洛夫教授就去看我的小册子，然后“公正地”对它进行批评。

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原委”吧。巴甫洛夫教授不看“现时的”报纸，因为它偏颇。不过，巴甫洛夫教授从前当然是看报纸（不是“现时的报纸”）的。这样说，他过去看报纸，是因为报纸总的说来是公正的或者——说得更好和更慎重些——是比“现时的报纸”较为不偏颇的。这是从巴甫洛夫教授关于他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法的言论中以无可反驳的逻辑得出来的结论。

现在我们要问一声巴甫洛夫教授：难道从前的报纸在战争时期写到战争的目的时是公正的吗？难道充斥着关于自由、文明、弱小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圣索菲亚的十字架等等的弥天大谎的“从前的报纸”，在巴甫洛夫现在看来，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今天看来，竟是神圣的和公正的真理吗？或者说，这样的现实是可以欺骗的吗？

或许二月革命后的报纸是公正的吧？那时候，报纸不是把列宁宣布为德国的间谍吗？那时候，报纸不是颂扬科尔尼洛夫吗？

巴甫洛夫必须把话说到底，以便作为诚实的人并意识到现实。他“公正地”闭眼不看资产阶级报纸对待资产阶级的“偏颇”，而却极其厌恶“现时的”报纸对工人阶级的“偏颇”。问题实际上正是这样摆着的。

如果巴甫洛夫教授对我们的报纸采取这样的“公正”态度，那么他也应当对我们的书籍或小册子采取大致相同的态度。巴甫洛夫不看报纸，但看领导这些报纸的人所写的报告，这只能说明他在努力解决社会问题时的“方法论”是思想不一贯的。很明显，这里事先就表现出了一种“虚幻的统觉”。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巴甫洛夫教授有时候毕竟对问题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过这只有当问题是以完全另一种逻辑程序提出来的时候才是这样。例如，他以欧洲内战的威胁来恐吓“共产党人和工农速成者”，并提出社会力量的配置这个理由，当然这个理由本身是非常正确的。

他写道：

“一旦发生内战，这（指双方的军事动员。——尼·布·）是通过全民进行的。假如革命方面有更多的物质，那么另一方面则有多少智慧、知识以及其他等等东西呢？”

是有很多智慧和很多知识。这一点我们同意巴甫洛夫院士的意见。但是，难道他没有看到，他正是以这种说法彻底粉碎了他自己的所谓科学工作者公正态度的说法吗？我们要问一声巴甫洛夫院士，为什么您的那些习惯于实验室工作、习惯于检验现实等等的科学家们会发现成为反对物质的这种惊人的“公正”呢？这里能不能找到具有“智慧、知识以及其他等等东西”的人们的“外部行为”的某种客观规律性呢？为什么这种“知识和财产”会成为一方的街垒呢？或许是上帝这样安排的：具有智慧、知识以及其他等等东西的人们必然是如此地“公正”，以致一定要起来反对“物质”呢？如果这样，那么何以解释象季米里亚捷夫和爱因斯坦这样一些人对这种“物质”的“偏颇”态度呢？或者说何以解释在我国，部分地在德国，知识分子头脑中产生的这种转变呢？而那时从科学工作者的“公正”行为中还留下什么东西呢？

假如巴甫洛夫教授站在形式的立场上，即持形式上公正的观点，而实际上是持维护需要形式上加以思想掩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即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公正的观点，那么他是不可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

这样一来，巴甫洛夫教授在解决当代伟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时，是宽宏地在给人类浇灌玫瑰色的镇静剂。我们的这位科学家在完全正确地指出一旦内战爆发具有“智慧和知识”的力量将站在哪边之后，摆出一副天真的（或者说故作天真的）姿态得出以下的“结论”：

教授说：“我本人，按一个科学家的职责来说，则持不同的想法（与共产党人不同。——尼·布·）……出路只有一条，出路就在于科学，而我是相信科学的，我认为，人类借助于科学不仅能弄清自己与自然界的状况，而且也能弄清自己与自身本性的状况……所以对于我来说，出路就在于发展科学资料并将它贯彻到人类中去。它将会制止人类进行这种互相残杀的可怕事情，不管是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都一样。”

至于说到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等等之间是否能划等号，这一点将在下面再谈。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以以下一点。当然，长篇大论地来谈论“科学和艺术的益处”是非常幼稚的。不过，我们要问巴甫洛夫教授，什么样的科学资料，哪个科学领域的资料将能“改造”“人类”呢？是否需要这样的资料才能理解脑袋上被铅弹打个窟窿是无助于人体的健康的呢？在这种意义上，即在摆脱帝国主义战争，摆脱剥削，摆脱殖民地掠夺等等的意义上，科学将提供什么呢？就拿化学来说吧。巴甫洛夫承认，科学工作者是反对“物质”的。这就是说，他们也相应地反对化学。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将会帮助（也正在帮助）化学家：他们发现机体中最敏感的地方，并在选择毒气时发出指示。还是巴甫洛夫教授认为数学可以拯

救人类呢？或许还是认为社会科学呢？不过在这里——这是巴甫洛夫教授也知道的一——存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一个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实用地看，它也无非就是革命的工具；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整个说来它也无非就是从思想上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不能详细地来证明这一原理，这是每个“共产党人和工农速成者”都相当清楚的，不过遗憾的是许多科学家教授还不甚清楚。我们只想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我们手头有一本新出版的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的“大”作：《公共经济》。这部著作在结尾第 503 页上有这样一个结语：“一个社会究竟是善是恶，关于这一点可以作不同的判断。但是，宁愿生而不愿死，宁愿享福而不愿受苦，宁愿富裕而不愿贫穷的人，应当接受和承认 (bejahen) 社会。而承认社会并希望它发展的人，也就应当拥护没有任何限制和没有任何保留条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①

我们手头还有一本“深奥的”资产阶级社会哲学书，这是别尔嘉也夫先生提供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不平等的哲学》^②。

书中有这样的话：

“所有制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的因素，而不是物质的因素……所有制因素是同人的不朽联系在一起。”（第 215 页）

“贵族是具有本体基质的、拥有自己独立特点的种族。贵族是上帝创造的，并从上帝那里获得其品格。”（第 105 页）

“国家（自然不是那里的某种苏维埃政权，而是‘真正的’即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尼·布·）在世间存在是有其积极的宗教意义和辩解理由的，国家的权力具有神的本体的渊源。”（第 64 页）

“创造精神是具有贵族性的。”（第 25 页）

^① 路·米塞斯：《公共经济》，耶拿古斯塔夫·费舍 1922 年德文版第 503 页。

^② 尼古拉·别尔嘉也夫：《不平等的哲学》，柏林“奥别里斯克”书局出版。

“社会革命不可能不同抢劫和掠夺相类似。”(第 25 页)

“你们当中那些幻想达到社会的极乐天堂……而肉体上依然是物质世界王国及其规律的臣民的人，是丧失理智的人。”(第 203 页)

“社会主义的消费—分配的经济理想实质上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反宗教的。这是奴隶的理想。从宗教观点看，完备的饮食就是圣餐。在圣餐中，人在基督身上并通过基督与天堂融为一体。那时，消费和创造是一致的，人把天堂生活溶于自身，并从自身中分离出通向天堂生活的创造性能力。”(第 212 页)

尼·别尔嘉也夫先生不是随便的一个什么江湖骗子，而是“公认的”俄国社会活动家和哲学家。请问，怎么能把这种“科学”认为是世界的救星呢？怎么能把尼古拉·别尔嘉也夫先生身上“分离”出来“通向天堂生活”的这种胡言乱语认为是世界的救星呢？

再拿俄国经济学家之一的勃鲁茨库斯先生^①来说吧！他是比尼·别尔嘉也夫先生较为清醒的人。他未必喜欢享用最完备的“圣餐”。“圣三位一体”和“索菲亚圣女”公共食堂对于具有“积极思维能力”的人们并不特别富有吸引力。勃鲁茨库斯先生并没有“分离”出来通向天堂生活，而是通向白俄侨民的行列。他是根据现代生物学的一切规则被苏维埃政权“移植”到那里去并在那里完满地“长合”的。于是这位科学家教导说：

“……时代要求更加坚定不移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受过社会变革理想的教育的工人群众可能会立即去着手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或者是赞扬群众的这种激情，并站到第三国际的旗帜下，或者是坚定不移地否弃马克思主义的崩溃的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未来的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必须

^① 见B·H·勃鲁茨库斯，《社会主义经济。关于俄国经验的几点理论思想》，柏林特里坦密斯书局出版，序言。

公开地对群众说，私人占有和个人创造的制度……是不能加以摧毁的，因为欧洲的文明建筑在这个制度上面……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种幻景，追逐这种幻景可能会不是进入天国乐土，而是掉进死亡深渊。”

勃鲁茨库斯先生明智地避而不谈“私人占有制”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点，后者也象卖淫、梅毒、宗教和酗酒一样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个社会学家、俄国历史学界的代表P·Ю·维佩尔教授的所作所为要更放肆得多。维佩尔教授在其近作《历史的演变》中对一切都作了多余的解释。

他写道：“战争不是文化的赘瘤，而是它的有机的本质，它的强有力的因素。”

“战争是需要的，因为它给人的英勇精神提供出路，使人的精力得到运用，创造精神得到发挥……”

不言而喻，我们这位精力充沛的、富于创造的、英勇的教授，为了完善创造精神一边请人们“几乎是互相残杀”，一边又说，只有根据“资产阶级的原则”（借用巴甫洛夫教授的话）才能杀人，因为“在内战中，诚实和正直都消失了”。

所有这些是维佩尔先生在革命后才“臆想”出来的。他的以往的一些杰出的历史著作说的却完全是另一番话：

我们也曾是一批大走马^①！

而现在是“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切”。

结论：这种科学能拯救我们吗？

别尔嘉也夫的圣餐？

勃鲁茨库斯（自然是公正的勃鲁茨库斯）的私人占有制？

维佩尔战争？

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种很不体面地热心于“旧调重

^① 大走马是俄罗斯最有名的一种马。——编者注

弹和谎言百出”的科学所充斥的成百上千种诸如此类的“分离物”？

难道在当代振奋人心的重大事件面前可以如此故作天真吗？难道可以闭眼不看：从这个拿撒勒^①中散发出来的正是死亡、腐烂、发霉的臭气吗？

巴甫洛夫院士所谓的那种科学的公正完全是虚构的神话！这种神话创作是同巴甫洛夫学说的唯物主义原理根本矛盾的。这里巴甫洛夫院士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陷入矛盾的罗网，或者是摆脱对私人占有制的那种事实上的偏颇态度，因为私人占有制是那些“饱食终日、爱好饶舌空谈、双手沾满鲜血的人们”的基本东西。

我们的时代不需要神话创作，而需要无畏地和勇敢地理解现实。为了胜利地（哪怕身上留下成百上千个伤疤）度过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个痛苦而又伟大的历史时期，需要的不是甜蜜的自我安慰，也不是鸵鸟式的行为，而是“思维的力量”和钢铁般的意志。

三 关于世界革命的希望或巴甫洛夫 的第一号死胡同

为要在当代的许多事实中辨明方向，首先需要理解人类正在经历的历史转折的全部巨大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找出用来评价目前时代这些或那些历史事件的应有的尺度。“旧世界”的大人物们（首先是科学家们）的通常的错误就在于（如果我们说的是事物的逻辑方面，而逻辑是建立在作为社会存在的职能的心理学上的），在评价整个旧制度的灾难时，往往徒劳地竭力运用从和平的、宁静的、所谓“正常的”资本主义生活的业已习惯的、与这些人的脑子同生同长的实践中取来的尺子、尺度、标准。这就好象是格列佛

^① 巴勒斯坦古城。——编者注

穿上小人的裤子或者用俄尺来测量地球到猎户星座的距离一样。格列佛需要穿格列佛的裤子，而众所周知，测量星际空间则需要象光年那样的尺度。同样，我们也应当变通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找出不完全是通常的或者说完全不是通常的标准。

在说完这段作为开场白的意见之后，我们要转而来分析一下巴甫洛夫院士“驳斥”我们的革命学说的那些“驳词”了。

巴甫洛夫院士在谈到笔者的一本小册子时说：“在这本小书中，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去年就在另一本书，即《共产主义 ABC》中使我感到惊讶的那一点。这就是用断然的语气说出来的一个假设：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即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

“这就是我的思想首先注意的一点。但是，有什么证据来说明，这样的革命会推广开来，它确实会成为世界革命呢？……而我无论在生活的观感中怎样翻寻，……我也看不出表明世界革命可能性的任何东西来。”

“我们执政党的领袖们相信世界革命将会发生，但我想问一句：他们将相信到什么时候？要知道，需要确定个期限。可以相信一辈子，并怀着这种信念而死去。”

“应当有一些令人感觉得到的迹象，说明这是有希望的，但这些迹象在哪里呢？”

巴甫洛夫教授接着就从自己的“公正的”观点来分析客观形势。我们尽量用原话首先来引用一下这个分析的结论：

我们的论敌说：“就拿一些操纵着各民族命运的列强如法国、英国、美国来说吧！那里没有任何迹象，一切平安无事！……同时，它们还把世界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切都有赖于它们，它们依然精力充沛。”

有点混乱，有点爆发革命的样子，那是在战败国，首先在德国，在波兰（这里巴甫洛夫教授弄错了，因为波兰根本不是战败国。不过这种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尼·布·）。为什么呢？正是因为它们是战败国。德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为它发动了战争，同全世界作战，现在就得向全世界清偿债务。哪里去取得这些经费呢？根据外国报纸你不会理解（而根据俄国报纸或许可以理解，但您又不看。——尼·布·）到底是它不愿意偿付，还是它无力偿付作为战败国所理应偿付的赔款。不过这同革命毫无共同之处……促使革命爆发的因素在哪里呢？资产阶级是不赞成革命的（那还用说！——尼·布·）。最有组织的部分（工人。——尼·布·），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这个革命。那么谁来进行革命呢？这就是说，由力量微不足道的共产党来进行吗？……他们有什么经费呢？……

现在保加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这也是个战败国，落后的国家。这里有什么世界革命的希望呢？无论持怎样公正的态度，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的。”

于是巴甫洛夫教授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我国的革命“使我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费用，遭受了极其可怕的破坏；而如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如果世界革命不发生，那将怎样呢？……我感到很难过，我的思想飞向四方，企图寻求出路，但没有找到。这就碰到了死胡同。”（这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巴甫洛夫教授是在几个月以前做这篇讲演的。但是在这期间发生的那些变化最好不过地表明，巴甫洛夫教授对形势的估计是多么不正确。首先，我们来谈谈我们的论敌所运用的方法。

在德国——有点爆发革命的样子，不过它是战败国。

在保加利亚，有点爆发革命的样子，不过保加利亚是落后的国家。

在波兰，有点爆发革命的样子，不过它是弱小的国家（或者说是另一种国家：巴甫洛夫教授错误地把它列入战败国）等等，等等。

好极了！就算保加利亚是落后的战败国，就算甚至波兰也是战败国。但是，为什么这就可以用来作为反对“推广”俄国革命的论据呢？资本主义开始在其最薄弱的环节（从而开始在受1914—1918年的战争破坏最甚的国家里）被冲破。这是无可争辩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止一次地写到过，在理论上也是十分明白易懂的。难道这竟会损害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或者损害巨大的革命风潮这一事实吗？要是这样来议论问题，那就可以宣布：俄国革命也不是革命（因为俄国也是战败国，也是相当落后的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革命，一切都是布尔什维克臆造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本身又是谁臆造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人去研究）。巴甫洛夫院士谈到德国的那番话，就更加天真了。请听，这个德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为它发动了战争，同全世界作战，现在就得向全世界清偿债务”。这真是对任何一种“客观方法”的公然背离了。我们且把谁“发动”战争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巴甫洛夫院士这里依然处在“交易所”及其同行们所施行的催眠状态）。就算是德国发动了战争。不过，难道它是因此而现在处于“困难的境地”的吗？而不是因为它是被战败的吗？不是因为它是被掠夺的吗？在研究因果关系时何以用这样的道德呢？这等于是用这样一种说法来“反驳”巴甫洛夫的学说：进入罪恶的巴甫洛夫实验室的哈巴狗的主人是缺德的，因此巴甫洛夫的实验取得了成功。这位穿长袍的“明智的”神父的论据就是：“上帝因为德国的罪孽而惩罚了它，这样就有点革命的样子了。”

让我们回顾一些事实，即我们的论敌喜欢说的那个现实吧！我们清楚地知道以下的事实。战后曾经发生了革命。

俄国有两次，两次都取得了胜利。

德国有一次，取得了胜利，还有一系列起义。

奥地利有一次。

匈牙利有两次。

芬兰有两次。

保加利亚有两次。

波兰有一次，等等。

我们且不说中国的革命和在殖民地如印度经常发生的骚动。

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还是布尔什维克的胡闹呢？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能够说，俄国革命不会推广开来，甚至没有这种“推广”的令人感觉得到的迹象吗？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巴甫洛夫院士不看报纸；或许因此他“相信”，威廉、卡尔等的皇冠还继续戴在这些君主们的头上呢！……

让我们说正经的吧！世界革命是事实，这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它还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无产阶级还只夺取了六分之一的土地，而不是六分之六的土地，这也是事实。现在可以自问，世界革命将向何处进一步发展呢？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正面临着革命低潮和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加强、壮大的过程呢？

请听一听某些“具有智慧和知识的人们”的意见吧！

“我们面临着一个软弱无力、无所作为、组织涣散的欧洲，被内部纠纷和民族仇恨搞得四分五裂，在日益加强的斗争和饥饿的痛苦中发抖，充满着抢劫、暴力和欺骗。何以证明，这幅图画的色调描绘得过分阴暗了呢？”

凯恩斯先生就是这样说的。^①

“我们在欧洲看到的现象，从伟大的资本家阶级的角度看是异

^① 凯恩斯，《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国家出版社 1922 年版第 140 页。

常虚弱的现象，这个阶级产生于十九世纪工业的辉煌成就并在几年前被认为是我们万能的统治者。这个阶级中的成员的恐惧和个人的畏怯现在表现得这样厉害，他们对自己社会使命的信心，对自己对社会制度的不可或缺的信心变得如此不足，以致他们很容易成为恐吓的牺牲品。”^①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教授、被公认为官方专家的话。

下面是意大利前任部长、教授和金融专家尼蒂先生的话。

他写道：“革命正处在开始的阶段……整个欧洲浸透着革命精神。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生存条件不仅不满，而且激愤和发怒。全欧洲的居民开始怀疑现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否合理。”^②

德国的副教授舒尔采先生说：

“这类(欧洲的。——尼·布·)失常现象的基础完全是由普遍的半饥饿状态和绝望情绪造成的。萨满教的巫师几天前开始吃斋，准备采取神魂颠倒的行动。如果许多民族都将不得不长期吃斋，它们就会陷入同样狂乱的状态。”等等^③。

法国前部长凯约先生激烈地批评欧洲的现状。面巴甫洛夫教授，您知道他是怎样评价俄国革命的，是不是象您以为的那样是“徒劳无益的”呢？请看：

“应当承认，苏联人是开始在解决一个问题。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试图减少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工业及其发展服从于社会利益……另一方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Status quo* (现状)！平静和舒适的 *Laissez faire!* (悉听尊便)。”^④

① 凯恩斯：《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国家出版社 1922 年版第 133 页。

② 尼蒂：《没有和平的欧洲》，国家出版社 1923 年版第 83 页。

③ 舒尔采：《世界经济的崩溃》，国家出版社 1923 年版第 348 页。

④ 凯约：《法国向何处去？欧洲向何处去？》，国家出版社 1923 年版第 176 页。

且看英国资产阶级的一家最有威望和最稳重的机关报《经济学家》对欧洲现状的描写吧：

“我们的一位驻德国的记者（不能责备他站在德国的立场上）报道说：

‘目前的事件毫无疑问地证明，法国并不抱恢复的目的，而是不断在扼杀德国的生活’^①，‘整个现状，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现状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法国掐住了德国的咽喉并不断地将它的生活扼杀。’”^②

我们有意援引了那些不会被任何人怀疑为倾向于“俄国执政党”、“共产党人”、“工农速成者”和其他反对资产阶级意识的人的意见。

上述引用的大多数“证词”还不包括最近这段时期的。这段时期内的事件说明什么呢？它们是完全反对巴甫洛夫院士的。欧洲中部正在急剧地沉落。德国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是无庸置疑的。“小小的”共产党已经成为决定性力量。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整个说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是连瞎子也看得见的事实。

英国“工党政府”怎么样呢？或许它不会长久，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事实证明，甚至在最强大的、最少受战争之苦的欧洲大国，由于它的精巧的保守主义，其他的传统，手工业工人阶级，社会各阶层对教会、国王、高礼帽和牛里脊十分尊敬，甚至在这样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不能用其“正常的”方法进行的管理。从这个观点来看，麦克唐纳先生的工党政府无非是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全欧危机（它的革命危机）的表现，如同德国工人的汉堡起义所表明的一样。

① 《经济学家》10月第6期第511页。

② 同上，第522页。

假如巴甫洛夫教授在研究人类社会方面坚持采取他如此成功地运用于狗的那种客观方法，那么他或许会理解现时的形势。

以前的沙皇俄国已经挣脱了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其余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离开“相互平衡”还非常遥远。关系的变动现在十分清楚地表现在：这是欧洲的衰落和我们苏维埃国家的真正“复兴”，而复兴只是由于这些国家社会结构的重新组织才成为可能的。在我们联盟内部，我们已经初步地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达到了社会阶级因素的平衡。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之所以成为我们国家的民族英雄不是偶然的。而“苏维埃体系”的外部平衡正始终以正号向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在英国和意大利都承认我们的今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在西欧的“发展”中却是相反的数学符号。换句话说，我国专政的坚硬的结晶体已在欧洲的一片混乱中沉积形成，正是它现在成为欧洲注意的中心和使腐朽的旧形式腐烂的因素。而巴甫洛夫教授看不到我国胜利的“令人感觉得到的迹象”！看不到甚至凯约之辈已经看到的東西！

即使甚至中欧无产阶级无力取得巩固的胜利，甚至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在中欧的革命也还是一种特殊的半胜利。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关系的复兴将会是不可能的。欧洲会长期地腐化下去。它的过剩人口会被推出生产性劳动领域之外。工人阶级、技术知识分子以及甚至科学界阶层中的最优秀的、最大胆的、坚毅顽强的人也会侨居到我国来，到一个几年前曾被认为是“野蛮的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来——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未来的情景。我们苏联将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的美国而长足发展。因此，我再重复一遍，即使在这种从革命的胜利节奏观点来看是最坏的情况下，世界革命即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革是有保证的。

我们且不谈别的。巴甫洛夫教授甚至不愿考虑问题，他自己

问自己，革命过程的一切耗费难道不是“徒劳无益”的吗？我们可敬的论敌，从客观分析的角度看，它们是不会“徒劳无益”的，即使甚至我国的革命没有保持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种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才保证了俄国摆脱封建主义的残余，用铁扫帚清除了整个沙皇地主的粪堆，为我国进一步的发展解除了封建的桎梏。假如不是从帷幕的丝穗或瓷夜壶花纹的完整性的角度来看问题，假如懂得旧的关系客观上已经成为不可能，那是不会抱着枕头痛哭的，也不会自问：革命究竟是不是“徒劳无益”的。连露骨的反动思想家们，从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到别尔嘉也夫都懂得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非常不乐于想到我们会变成培育新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肥料堆，因为那时我们在客观上就会成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胆的和最坚决的创造者。但是，不难设想，那时革命也将不会象巴甫洛夫教授所担心的那样成为徒劳的和流血的儿戏。

诉诸现实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巴甫洛夫教授是对的，然而，现实正在把上述问题变成为学院式的（从这个词的不好的意义上来说）问题。因为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表明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在腐化，而我们在巩固。这是任何诡辩也无法加以驳倒的根本事实。

巴甫洛夫教授提出共产主义胜利的期限问题，并认为他的这种问题的提法是很机智的。实际上它是十分幼稚的。

到底这是指什么期限呢？是指全世界无产阶级胜利的期限吗？还是指欧洲革命胜利的期限呢？还是指德国革命胜利的期限呢？巴甫洛夫教授向我们提出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说的是全世界的胜利，那么我们无可奉告。不过提这样的问题也是可笑的。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开始的。欧洲的最近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在1917年2月，这次革命

推翻了地主的专制政治制度。日程上还会发生资产阶级的殖民地革命，然而，这些革命由于完全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将具有另一种意义。亚洲、非洲等地资本主义关系的改革一定会占据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必须看到变革的历史规模，必须懂得变革的全部巨大意义。目前，由于世界经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更大，情况的发展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更快，这是十七世纪时没有的现象。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期限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要是有个英国人拍拍克伦威尔的肩膀并懊丧地追问他，到底什么时候最后一顶皇冠会从它的最后一个拥有者头上落地，那可真是不错啊！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普希金曾经幻想过这种“场面”：

我们要使俄国人民欢心，
即使在那耻辱柱近旁，
用最后一个神甫的肠子，
赶走最后一个沙皇。

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世纪以后发生了，不过并不完全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从客观的“历史的理性”角度来看，我们能对这位假想的英国怀疑论者说些什么呢？历史的理性未必会发给他一份令人满意的证书。

或许可以弄清全欧革命的期限吧？根据同样的理由，这也是不很明智的。

那么可以问什么呢？首先可以问发展的趋势。假如巴甫洛夫教授能驳倒我们的论点，即认为在中欧事情一团糟，而在我们这里则有条不紊，那他就有权对我们的“信仰”表示怀疑或加以嘲笑。在我们这里可不是“信仰”决定一切啊，教授！我们的信仰是建筑在冷静的科学（客观）分析基础上的。而您的信仰，却是没有道理的、保守的、自发的，是对资产阶级秩序稳固性的陈见。“信仰是给

希望者的通知书，是对未见物的披露。”您继续寄希望于旧秩序。您把资本主义关系的这种看不见的和不存在的稳固性当作了现实。在这里，您是同您在谈到自己专业时认为正确的那些科学要求分了手。这又说明资本主义是怎样地搞乱了甚至卓越人物的头脑，怎样限制了甚至最杰出的人物的视野。

但是，巴甫洛夫教授试图反驳。他谈到我对“形形色色资产者”的反击并承认上述腐败的事实有些是真的。他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的回答是很简短的。他说：

“这（指欧洲的混乱。——尼·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确实是可怕的，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变迁也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如此动荡的平衡是不可能很快恢复的。”

这个回答确实是出色的。不过这里又缺乏巴甫洛夫院士的那种“公正”，实际上这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下意识的偏颇。

事实正是这样。现在该让我们来问一声巴甫洛夫教授关于期限的问题了。什么时候能够期望“如此动荡的平衡”得以“恢复”呢？或许，我们借用巴甫洛夫教授的话说，“可以相信一辈子并怀着这种信仰而死去。”真是这样吗？不过请再向您提一个有趣的问题：“应该有一些令人感觉得到的迹象说明这是有希望的，不过这些迹象在哪里呢？”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巴甫洛夫教授是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回答的。因为事实反驳了他。因为在我国平衡建立起来了，而在“他们”那里更加“动荡”起来了。巴甫洛夫教授或许会怀着对资本主义稳固性的信仰而死去，但是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不怀这种信仰，这也是对这位大智者的一点抚慰吧！

旧世界没有前途。因此它也没有任何能够团结人们、密切他们关系的巨大的思想。随着经济-政治衰落的曲线，也出现了思想堕落的曲线。施本格勒们、凯泽林们、神志学者、东方式的卜卦

算命者、黑人舞蹈者、吸鸦片者、先知者、精巧的色情狂者、令人作呕的怀疑论者、施泰涅尔们、安德烈式的白俄、歇斯底里的狂吠者、形形色色的未来派作家——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英雄谱。

我手头有一本德国教授弗罗贝尼昂的非常有趣的调查报告《陌生的非洲》。在这部作品中，尊敬的教授象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抓住了黑人及其古老的文化。“对遥远的东西的向往”，对“天真的和纯洁的事物”的激情，“逃避流汗和机器的环境”^①——这就是激励他去建立科学功勋的东西。在非洲，使他感到惊讶的首先是：“迟钝的保守关系”^②。“宏伟的安宁”——这就是理想。瞧，非洲简直可以拯救世界啊！过去在战前，他们发出狂热的叫嚣：

向非洲进军！向喀麦隆进军！

现在这些不幸者和可怜人却抓住这古老的遗物，以便涉足这生活的发源地。但是，奇迹是不会产生的。死尸是不会复活的。而工人阶级则继续从事文化和文明的事业。它既不害怕汗臭，也不害怕机器的轰鸣。它将以自己坚强的双手来从事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

四 革命的客观意义和巴甫洛夫 教授的思想的第二号死胡同

巴甫洛夫院士是宽宏大量的，他准备向我们“让步”并承认，至少我国的革命是个事实（愿别尔嘉也夫先生的上帝保佑他吧！）。不过，我们的教授认为，对于这个事实，或许不是应当叫“阿门！”，而是应当叫“救命！”

① 弗罗贝尼昂，《陌生的非洲》，第3页。

② 同上，第13页。

他写道：“其次，假如在我国革命的因素中有某种能够起促进作用的东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瞧，你们很不幸，我们则很幸福，我们将会来帮助你们摆脱这种困境。但是，没有这种东西。”

现在，巴甫洛夫教授对我们的这种“恶毒的”（打引号的）挖苦，已经变成巴甫洛夫教授对巴甫洛夫教授的恶毒的（不打引号的）挖苦了。因为比方说，当我们论敌的同行们在科学家代表大会上决定帮助德国科学家的时候，当我们的工会也同样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些并非重大的事实后面隐藏着实际上正是足以彻底驳倒巴甫洛夫那种说法的原则性转变。我们远非“很幸福”，但是我们把油脂运给德国科学家，把面包运给鲁尔的工人，一般说尽量安排对德国的出口，并以自己的军事威力（以军事威力存在这一事实本身）来制止某些人彻底瓜分德国的企图。难道这一切不是巴甫洛夫教授所如此热爱的（象热爱“物种”那样的）事实和现实吗？而假如巴甫洛夫教授不是以柏拉图式的爱（因为柏拉图式的爱对于一个生物实验家的作风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去热爱现实（真理的标准），那么是否该得出某些实际的结论呢？

首先必须领会上述事实。

应当作出的主要结论是：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把国家从毁灭和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巴甫洛夫教授是否明白，除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外，俄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使国家免遭真正的毁灭和解体？巴甫洛夫教授是否曾经打算哪怕大致地计算一下，俄国所负的国债仅仅利息一项就要多少？巴甫洛夫教授是否读到过，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在当时被白卫分子占领的地区是怎样作威作福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

难道现在，直到现在还不明白，决定国家这个独立实体的生活的只有摆脱战争和不付债款这两件事吗？难道这还需要加以证

明吗？

但是，要拯救国家和保卫国家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才行。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需要激起群众的极大积极性，而只有当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夺取工厂和政权时，这种积极性才能被激发出来。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是保存被称为俄罗斯的这个结合体的客观前提。正是因为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了出来，正是因为他们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发扬了忘我的、英勇的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正因为是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因为旧的基础已经过时）成为伟大的强国。难道这个道理如此难懂吗？

“具有狭隘阶级性的”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这种全民意义也是一种基本的标志，说明旧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过时了，旧的经济结合已经不行了，各阶级间的旧的结合已经不行了，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以前的相互关系已经不行了（客观上不行了），各国之间的旧的类型（帝国主义类型）的平衡已经破坏了。在目前的条件下，“需要”激进的社会改组。只有它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看不见这种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光明完全在无比神圣的私有制及其“宗教-本体论基础”的神圣原则上。不过，现在这种可能性已开始实现，而德国和俄国的平衡的同步的发展将是最好的实例，来反驳巴甫洛夫教授的“驳词”。因为我们暂时还不是“幸福的”，但是正在变得“越来越幸福”。而德国已经“不幸”了，并将越来越不幸。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然而，巴甫洛夫教授反驳我们说，“就拿德国来说吧，它正在受苦，因为战败了，因为它必须支付过多的赔款。无产阶级革命将如何——我要知道如何就好了——帮助它呢？现在，他们除了一小撮以外反正都互相团结一致，那样他们就会形成一个互相敌视的

营垒。而为什么这就会使他们摆脱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这一点我又不能想象，我又陷入了死胡同。当然，结局可能是，法国会越来越迅速地改造德国，占领更多的领土，掠夺更多的财富，如果他们（德国人。——尼·布·）制造（！——尼·布·）内战的话。我完全不明白，这（指摆脱困境。——尼·布·）将如何达到，而我又陷入了死胡同。得不出答案。”

巴甫洛夫教授的论证是惊人地天真的，这种神圣的天真实在令人感动，感动得使人不由得想起约翰·古斯老太婆的话：啊，天真如圣！

确实如此。巴甫洛夫教授实际上提出了唯一的一个论据：如果“他们”团结一致，那么“他们”就更强大。如果“他们”互相敌对，那么“他们”就更软弱。不过，巴甫洛夫教授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也就把最主要的问题从讨论中勾销了。因为当代的主要问题是，谁来团结整个社会，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前提就是现时力量对比的危机，即实际的危机。因为巴甫洛夫教授究竟在哪儿见到过，“所有德国人”“除了一小撮以外”都“互相团结一致”呢？要知道，这种说法等于是开玩笑。在德国，起义一个接着一个，德国正在解体，阶级斗争空前激烈，而巴甫洛夫教授只说“一小撮”。

诚然，巴甫洛夫教授作演讲时，许多事实尚未发生。但是，巴甫洛夫的糟糕之处就在这里，就在于他看不到发展和衰落的客观趋势。看不到，或者说不愿看到。阶级之间在分裂。是否可以恢复旧的平衡，或者需要找出一种新的社会配置——问题就在于此。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能否捆住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必须捆住资产阶级，并重新组织社会，为争取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只能这样提出问题。巴甫洛夫对问题的提法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它看不到最主要的东西，看不到世界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其次，再来看一看巴甫洛夫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过程。

要知道，他的全部议论，一字一句，都同样可以“运用于”俄国革命。让我们想一想世界大战时期吧，那时候沙皇军队节节败退。巴甫洛夫教授可以逐字逐句地重复自己的论据。他说得对不对呢？一点儿也不对。因为他看不到巨大的、完全客观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相应地配置各个阶级并决定这些阶级的意志（或者也可以说，它们的“外部行动”——在目前这是完全一样的）。在战争时期，开始时确实只有“一小撮”坚决反对者。但是，应当明白，这“一小撮”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只是因为客观的生活条件使得群众处于必然要发动起义的境地。必然要——您这位客观方法的拥护者是否懂得这一点呢？

目前中欧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和平的说教将成为神甫式的布道，将会遭到群众的拒绝，就象豆子掷到墙上一样。它顶多只能是那些毫不中用的、无能为力的、不依附于任何一种社会力量、故作先知姿态的知识分子，就象人们曾经称赫尔岑那样的“无骨气、随风倒”的人希望通向“天堂生活”而说出来的唾沫四溅的“仁慈的”话语。这种使人变得软弱无力的说教客观上除了带来危害以外，从来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现在再来看一看使巴甫洛夫教授陷入死胡同的一个最“可怕的”问题：革命何以有所助益；或者用康德式的话说：“革命的客观的有益作用怎么可能”。的确，对这个问题怎能没有答案呢？

先生，您搞错了！首先，生活本身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我国的革命已经回答了，“这”是怎样发生的。上面我们已经用几段话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只须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到这几段话对德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现时的德国政府是“一小撮”的政府。在总危机的条件下，它不可能保卫德国，因此，将在客观上促使它腐化，尽管它千方百计地努力也枉然。群众将被动员起来，但不是拥护政府，而是反对

政府。然而，只有依靠群众的政府，动员群众并领导群众的政府，才能挽救德国。

“法国反正会掠夺它，会使它破产。”那为什么在我国，法国+德国+英国+“其他国家”却不能掠夺我们的成果呢？正是因为群众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而不是钱袋的国家）。诚然，德国没有象我国那样辽阔的领土，没有那些使我们有可能有回旋余地并赢得时间的领土（列宁同志在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在党内曾经说过：“我们让出领土，为的是赢得时间”）。不过我们那时是孤立无援的，而现在已经有了象我们整个苏联那样的革命基地。请凭良心说说，假如革命群众的队伍集结在从莱茵河到海参崴一带，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战胜它们呢？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从苏维埃德国汲取生存的液汁呢？难道真的不明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什么东西、怎样和为什么支援德国吗？

这种革命结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历史地必然的。

巴甫洛夫教授真是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困境啊！

他想到在我国找到并不存在的死胡同，他写道：

“当作者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景时，他提请注意的是这个资本主义欧洲的精力和思想贯注在哪里。正是贯注在制造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武器上，贯注在大炮和飞机上，这些东西只要一动用，城市等等就会被摧毁。诚然，这是一幅可怕的图景，假如所有这些杀伤武器动用起来，将会对人类的灭亡构成威胁。当然，前景是可怕的，除非人类(!)想出(!!!)某种东西(?!)来加以缓和(!!?)。”

是的。巴甫洛夫教授，您对人类进行了一番安慰！……

不过这很有点儿象谢德林的寓言。

“鲫鱼是一种信奉理想主义的安静的鱼，难怪僧侣们喜欢他。”

“鱼类应当彼此相亲相爱，——他用演讲的神气说，——他们应有‘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精神，那才是真正和谐实现的时候。”

“我倒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带着你的那份亲热走到梭鱼跟前去的。——棘鲈鱼冷冷地回答说。”

“我是要走到他的跟前去的！——鲫鱼坚持说，——我知道那种语言，只要梭鱼一听到，他就会变成鲫鱼的。”

“我倒要领教领教！”

“我只要这样问：梭鱼，你知道什么是德行吗？在你和你的邻居的关系上，德行使你承担什么责任呢？”

可惜的是，巴甫洛夫教授甚至不知道这样的语言……而大家知道，梭鱼后来还是把鲫鱼一口吞吃了。

五 内战的惨祸或巴甫洛夫 教授的第三号死胡同

巴甫洛夫教授向“人类”提出自己的“缓和”办法（公民们，你们希望这种只值半个卢布的“缓和”吗？）的建议（不过这里让人不明白，为受苦受难的人类脱去一层厚外衣，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时，竭尽全力地攻击内战的非“缓和”的办法。这样（显然这是他命中注定的），他就又陷入了自己的死胡同，不过读者对此大概不会再感到惊讶，因为：“习惯乃是第二天性”。

伊·巴甫洛夫感叹说：“不过请问，在这未来的可怕处境中，无产阶级革命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这位论敌援引了马克思关于各国人民的内战和搏斗的漫长时期（“15年、20年、50年”）的话，并悲哀地问道：

“这算是什么出路呢？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4年，使人类痛苦

到了极点，而马克思竟还预言要进行50年各国人民的可怕的搏斗、内战。这算是什么出路呢？……我不明白，在运用这些毁灭性手段的条件下进行50年的全民战争，这是什么出路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这不会涉及到马克思，而会涉及到布哈林（非常感谢！——尼·布·）——他们（指布尔什维克。——尼·布·）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革命的轻易获胜所诱惑了，不过我认为，是没有充分理由为它所诱惑的。不用说异乎寻常的耗费，俄国的破坏要几十年才能恢复……假如我们党的愿望实现的话，那么在各国发生的屠杀，将无可比拟地要超过我国发生的屠杀。”

在巴甫洛夫教授的这段话里包含着一连串的错误。

首先，伊·巴甫洛夫天真地把客观的预测同行为的准则混为一谈。马克思是作为某种现实可能来预示世界战争的时代的；马克思预言内战是延续整整一个时期的总的灾变的结果。而马克思说，在这个“铁的”时代里，工人阶级将不得不进行积极的斗争，这个斗争将使它受到锻炼并“改变它的本性”。这些预言对不对呢？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回答：它已经开始在实现了。而巴甫洛夫教授面对这些事实，却摆出一副高贵的姿态说：“哎，这是多么糟糕啊！老是打仗又打仗，没有一点儿安宁。”

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您为什么把所有这些“仗”（其中包括世界大战）都归罪于无产阶级，看作是它的“出路”呢？这是十分荒谬的，毫无道理的。马克思是“预言过”。这是对的。但是，“预言”并不等于“希望”。我们至今还“预言”：神圣的私有制王国将一再地导致流血的屠杀。资产阶级及其科学家和技术将不是为了好玩而去制造各种杀人武器的。它不可能不这样做。而我们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是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危机，来推翻这个万恶的制度，对于这个制度来说，战争、掠夺和抢劫也象货币权力、对群众的压迫、对科学的收买等等一样都是具有表征意义的。但是，难道能够因此

得出结论，可以把资产阶级的流血的肮脏的政策归罪于无产阶级吗？要知道，这是一种麦耶尔霍德式的逻辑，“本末倒置的逻辑”。否则是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第二，巴甫洛夫教授从何得出结论，我们被俄国革命的轻易获胜所诱惑了？巴甫洛夫教授“出于公正”是不看现时的报纸的，却为把我们当作死人那样来诽谤的可能性所“诱惑”了。假如他知道得更多一些，那么他或许会“觉得”情况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因为以列宁同志为首的所有共产主义思想家一直在说，在西方取得胜利比较困难，但从事建设将比较容易。取得胜利比较困难是因为资产阶级要强大得多、聪明得多、有力得多，它经受的锻炼更多，更富有经验；因为那里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不象我国的农民；因为人民没有武装等等。所有这些话，我们大家都说过几千遍了。可是巴甫洛夫教授却“认为”，我们想的“完全相反”。一个“严格科学”方法的拥护者，怎么能这样猜想呢？！当然，如果对自己的讲演象对嗑瓜子一样地看待（把瓜子皮往角落里一吐就算了事），那是另一回事。不过，巴甫洛夫教授是个严肃的、受大家尊敬的、杰出的科学工作者。这就是说：“报纸我是不看的，而审理得由我来。”

第三，巴甫洛夫教授提出革命的耗费作为论据。不过从上述一切已经清楚，他作的这些耗费平衡表是完全错误的。他得到的图表是这样：

1. 资产阶级	2. 无产阶级
四年世界大战。	五十年国际大内战。
它使人类痛苦到了极点。	它将人类完全埋葬。
它的罪魁是发动战争的 德国资产阶级。	它是马克思以及所有共产党人 代表无产阶级建议的。

于是，伊·巴甫洛夫得出大致如下的结论：由于 50 大于 4，因此“无产阶级”的出路是纯粹不合理的。假如巴甫洛夫教授的“估

价”哪怕稍微符合点实际，那么一切就会是这样。但是，它的（这种“估价”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不反映也不代表任何现实。正确的估价表应是这样：

1. 资产阶级	2. 无产阶级
四年世界大战。	俄国革命胜利和其他国家发生
凡尔赛和约后的混乱。	一系列革命。
新的不可避免的战争。	不可避免的起义。
欧洲的文化毁灭，或许还有更加广泛的文化领域的毁灭，	欧洲从毁灭中得救（或许整个文明世界得救）。
所有这一切将延续“15年、20年、50年”。	所有这一切将延续“15年、20年、50年”。

“革命的耗费”将是巨大的吗？是的！十分巨大。但是如果把它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所带给人类的打击相比较，那么毕竟具有“很大差别”。世界大战（第一次！）使人类有1000万人死亡和2000至3000万人受伤^①。光是俄国死亡的人数就有250万^②。请设想一下在最新发明（毒瓦斯、遥控炸弹、自动控制的飞机以及其他人类天才的产品）基础上进行的世界大战将会带来什么。“革命的耗费”与此相比将会是什么样呢？不要当鸵鸟，尽管鸵鸟是很好的鸟，而且有美丽的尾巴。不消灭资本权力，我们就会走向灭亡——这就是每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大脑应当得出的结论。而为了拯救人类，我们应当作出革命所要求的种种牺牲。

巴甫洛夫教授在清晰地描述了资产阶级和科学家一起怎样为反对“物质”而斗争，内战怎样“渗透到整个民族”，统治集团怎样发现在镇压无产阶级的事业上“行动一贯”等等之后，又唱出了通常的副歌：

^① 《国际工人运动政治年鉴》1922—23年，第223页。

^② 杜林的统计。见《1913年至1921年期间的世界经济》，法尔克涅尔教授编的统计年鉴。

“结果会怎样呢？对我来说又是死胡同，我又不能理解，人类今后的命运这个可怕的问题将怎样借助于（！）这50年的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而得到解决。”

就象我国“借助于”俄国革命而得到拯救一样呗！不多不少，正是这样！

还有一点小小的意见。巴甫洛夫教授一口咬定，说什么“俄国遭受的破坏要几十年才能恢复”。怎么能作出这样的预言呢？这种悲观主义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数字、有什么客观材料可以证明呢？据我们看来，苏联再过5—6年将成为一个最强大的欧洲国家。由于巴甫洛夫教授不看我们的报纸，自然他只好跟一些“模糊不清的和不可理解的”材料打交道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妨看一看某些图表。美国的参议员们、法国的高利贷者们、英国的商人们倒没有患象巴甫洛夫教授那样的色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根据比住所和生物实验室更为合适的来源来了解我国的生活的。对我们的封锁已经解除了，教授！而您也早就应该解除您对我们的报纸、对“现时的”我国舆论的封锁了！那种旧的“公正的”舆论，那种始终反对人类“物质”的舆论已经死亡了。任何怀疑、任何哀号都不能将它复活。

六 我国的文化建设。巴甫洛夫教授的第四号和最后一号死胡同

我在我的小册子中曾经谈到，工人阶级不仅能拯救世界，不仅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且能创造新的文化工作形式，实现和贯彻新的文化原则。这一方面是指理解任何一门科学和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部门同生活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指克服文化智力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巴甫洛夫教授说，这个问题使他“很感兴趣”。巴甫洛夫教授对我表示敬意，承认我那里有“许多好的东西”。使巴甫洛夫教授特别喜欢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比较起来是不学无术的”。巴甫洛夫教授在引用了这句话以后，就立即开炮，并说他又陷入了死胡同。

“这就是他（即布哈林。——尼·布·）说的话。但同时使我十分不明白的是：这个根本什么也不知道的工人阶级何以能肩负起消灭文化个体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重任。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要消除这种无政府状态，只有在这方面懂行的人才行，如果一个人什么也不懂，那么他怎么来消除这种无政府状态呢？我又陷入了死胡同，我又什么也不明白了……”

很遗憾，上述论点是完全正确的，符合现实的，而且——请允许我礼尚往来地回答——它也完全是“好的东西”。让我尽力来解释一下并纠正这个对巴甫洛夫教授来说不很有利的现实。

最通常的解释首先就是用实例来解释。我们也就从实例说起吧！

工人阶级过去懂不懂管理国家的事情呢？不懂。“厨师的儿子”甚至离学校大门也很远。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相比是不是曾经不学无术呢？是的。他是否“肩负”了管理国家的重任呢？“肩负”了。这些都是巴甫洛夫教授本人所承认的。

对不起！您所说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在那里呢？不学无术的人竟打败了敌人并象茁壮的橡树挺立在收复的土地上，这样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谜底非常简单，巴甫洛夫教授：过去不懂，现在懂了；过去没学过，现在就去学而且把它学会；过去不会，后来就会了。事情就是这样。某些非常令人尊敬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甚至认定，我国的政府是最明智的政府（见凯瑟琳伯爵有关这方面的议论）。不过我们且撇开这个问题不谈。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取得胜

利并得到巩固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我国无产阶级领导有方，难道不是这样吗？

另一个例子。工人阶级过去知道怎样建设军队吗？不知道。军官团不是从工人中招收的，这也是伊·巴甫洛夫清楚知道的（因为他是看“那时的报纸”的啊！），而主要是从高贵的贵族阶层中招收的。工人出身的将军微乎其微，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不学无术的革命家，那他们是不曾指挥过军队的。不过且慢！工人阶级是不是“肩负”了这个重担呢？“肩负”了。请想一想，它建立了军队，指挥了军队，领导军队胜利地投入战斗，并且取得了敌人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承认（建议巴甫洛夫教授看一看白卫将军们对红军的反映，这是很有教益的）。这又是怎样的奇迹呢？这难道是“无法克服的矛盾”吗？当然，只有从守旧的、静止的、可以说纯粹形式逻辑的（用黑格尔的话说不懂得“形成”范畴的）观点看，才是矛盾的。而这里谜底又非常简单：是学会的，巴甫洛夫教授！而学得比高尔察克们、弗兰格尔们、尤登尼奇们等等这些在军事方面“富有经验”的人更加适应新的战争条件。

第三个例子。工人阶级过去是否管理过工商企业、银行、合作社等等呢？

没有。它一无所知。当它着手做这件事时，它做过许多蠢事。而现在学会了一些，站立起来了。现在还在继续学习，不过已经满怀信心地站在对它来说崭新的基地上了。

现在让我们问问自己：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工人阶级是不是作出了一点新贡献呢？显然，作出了新贡献；红军已经远不象白军了；苏维埃制度完全不象所谓的议会制国家了；我国的经济也远不是资产阶级的私有经济了，如此等等。

现在倒很想知道，文化为什么有这种“禁忌”，这里“不学无术者”为什么就不能做点什么，为什么就不能学会呢？何曾作过尝试

(哪怕是尝试!)证明这一点呢?可惜,丝毫没有证明,有的只是一些气话和牢骚。

巴甫洛夫教授气得简直有些发狂。

他冲着我们写道:“人们幻想,尽管他们说自己愚昧无知,但是他们能把现时的整个教育改造过来。”

好大的火气啊!这才真是可怕的呢!不过我们需要改造的,我们一定能把它改造过来!就象过去改造我们自身、改造国家、改造军队,现在改造经济一样,就象我们曾把“拉舍伊斯卡娅”、“费多鲁什卡-瓦尔瓦鲁什卡”改造成为积极的、有志向的、迅速成长的、热爱生活的、只有现在才得到真正发展机会的人民群众一样。

其实,巴甫洛夫教授是否反对我在报告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原则呢?不,不反对。他本人是否承认各个意识形态领域之间联系的必要性(“消除智力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明确意识到科学结构各部分的实践价值等等呢?

似乎是承认的。资产阶级能否解决这些任务呢?在我们看来不能。如果需要证明的话,我们可以举出不少来。现时的资产阶级科学,从最抽象的科学到最“实用的”科学(如技术)正在徒劳地寻求结合——但没有找到。艺术领域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四面八方都在诉怨,都在议论“精神文化”的危机、“死胡同”等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梅尔在其一部近作中谈到普遍精神危机问题,按齐梅尔的意见,普遍精神危机是“生活”和现时生活方式之间冲突的结果。把这句哲学上抽象的话译成具体的话,就是:资产阶级制度以及由于这一制度各种形式的解体过程而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分散性,已经不可能解决结合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它的文化正在走向下坡。正因为这样,文化发展的历史前提应当是工人阶级的统治。

但是,巴甫洛夫教授没有时间来这样高谈阔论。他把我们的

实践作为自己攻击的出发点，他对我们大致这样说：“你在哪里坐下，你就在那里唱得好！”原来，我们“坐得”很不好，虽然我们或许唱得很好。

“现在对有些事情提供大量经费，例如对日本，以期争取世界革命，与此同时，我们科学院的实验室每月只得到3个金卢布……应当合理地提供，应当懂得生物学的意义、其他问题等等的意义以便去实行。然而没有这样做。”

接着就说得带火气了：

“如果自己承认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的人们蔑视这门学科本身，那还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这对科学来说不是非常严重的危险吗？”

这里需要开诚布公地说明一下。

首先，巴甫洛夫教授从何知道“对日本”提供“大量经费”的？他不是不看报纸吗？是“熟人跟他说的”？一个客观主义的科学家不应该采取这种办法呢？这样好吗？

其次，我们确实对各国劳动人民给予不止一次的援助。但是难道他们没有给我们援助吗？难道他们没有帮助我们同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进行斗争吗？难道在饥荒严重的年代里他们没有支援我们吗？难道他们没有帮助我们、迫使一系列国家承认我们是大国吗？不能那样鼠目寸光地看待问题。不能对有时起决定作用的重大问题视而不见。

巴甫洛夫教授和其他不少教授一样，看不到这种巨大的、历史地必然的工人阶级的战略，因为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

当斗争在进行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直接斗争的目的常常不得不牺牲一切，尽管从日常的观点看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斗争的良好结局是其余一切的必要前提的话，那么没有别的抉择，只有牺牲一切。

从静止的观点和从“一般”见解的观点来看，我们用于防务的开支要比用于教育的开支大，这是毫无意义的。但从我们的整个事业即推翻旧的现状来看，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为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具有比“住所和实验室”更大的视野，需要超越狭隘专业的范围，需要不囿于四面围墙，需要竭力从事情的相互制约中、从它的运动中、从它的世界范围（尽管多么困难）来理解它……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一切不能作为替个别一些错误、无谓地“打碎坛坛罐罐”、不善理事和缺乏经验的具体的和一般的事例辩解的理由。这是“学费”，虽然是非常昂贵的，但是是暂时的。它不是决定事情的因素。巴甫洛夫教授反对整个制度，反对“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的”共产党人的领导。

说到我们的领导人，那么我有把握使巴甫洛夫教授相信，他们在生理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知识要比巴甫洛夫教授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多得多，而巴甫洛夫教授以如此断然的口气讲话是完全徒劳的。当然，我们承认，我们整个阶级还十分缺乏文化。然而，对于我们整个阶级来说，还不能加以责备，似乎它是“蔑视”科学的。为此只需看一看比方说我们的党纲、工会、苏维埃政权各级组织、各种工人代表大会和会议等等的一系列决议就够了。我们过去犯过、现在还在犯许多错误，但是我们政策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任何危险可言，只是对那些使得“具有智慧和知识的人”转而来反对“物质”的假科学的偏见才是危险的。对于这些东西来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危险，而如果这种东西的危险变成这种东西的灭亡，那是极大的好事。

不妨用事实来检验自己的论点——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巴甫洛夫教授的意见。不但用从一般场合中抽出来的个别事实，而且用根据“大数定律”的全部规则得出的结论来加以说明。或许巴甫

洛夫教授会说，我国近两年来文化科学的曲线不是在下降吗？只要看一看出版的书籍、杂志、专门读物等的数目，就可以看到我国在多么迅速地发展。

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危险在哪儿呢？这不是正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学会了一些东西，我们已经在摆脱巴甫洛夫教授使自己担惊受怕并用来吓唬我们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吗？要知道，他曾公然声言，说我们的政策“正在导致俄罗斯文化的毁灭”——不多不少，正是如此。巴甫洛夫教授认为，共产党人只会按以下原则行事：“蹭蹭肩，挥挥手！”难道现在还不是该丢掉这种说得客气点“不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了吗？

高等学校接受学生的阶级方法这一事实使巴甫洛夫教授极其苦恼。“由于……在获得知识方面不循序渐进，教育水准正在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大量受过教育的人……离开学校，给他们设置了各种困难。”

如果我们撇开一些“过火行为”不谈，来讨论一下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阶级方法等等），那么决不能把这个问题脱离我们的总的任务。无论是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也无论是发展智力文化，从理论上讲只可能有两种形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假如干部结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思想“指导”人员等）的发展转到反无产阶级的路线（这远非常常以有意识地反无产阶级思想为前提），那么我们必然会坐上“路标转换派”的制动装置滑到自由资产阶级的“理想”目标上去，在经济上是“健全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是所谓的“法制国家”。不过，我们有完全充足的理由，来反对这些蜕化倾向。不言而喻，不回答这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那就无法理解生产性质的问题。没有“一般的”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一定形式的、具有具体历史外壳的生产力的发展。智力文化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决不想为资本主义发

展的新的周期充当肥料，因为这种周期必然会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关于“白松鼠”的歌是纯粹的悲歌。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消灭和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正因为如此，任何逻辑，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都在我们这一边。

巴甫洛夫院士的错误就在于他回避主要的问题，即这个或那个社会制度的社会本质问题。而回避这个问题是不行的，不许可的。

显然，从“中立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从一般说来较不文明和较少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进行选择的阶级方法是荒谬的，而如果只局限于这种观点的范围，那么共产党人真的可以算是狂暴的疯子了。

但是，问题正在于，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十分明确的前提上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干部和这样的干部队伍的经常再生产，他们能够在以后所分配的劳动棋盘的每一个点上执行无产阶级政策。这种政策的保证就是一定的社会-阶级的接种，即社会出身。“阶级方法”就是由此而来的。当然，从“脱离”社会评价的业务观点来看，我们暂时“失利”了，但是我们也因此得到了保证，使列车沿着安全的轨道前进而不致在什么地方颠覆。这里有什么可奇怪的和不明白的呢？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接着就在整个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各个领域内开始进行这种革命，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自然，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懂得整个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相反地，如果不预先了解整个过程，即我们的整个政策所遵循的基本轨道，那就完全不能理解象我们高等学校接受学生的阶级方法这种局部措施（这是同完全特殊的和专门的“耗费”相联系的）。

属于这类“耗费”的还有巴甫洛夫院士提到的高等学校培养的业务人员水平的降低。一般说来，革命在其最初阶段必然会在这一

个领域中，即在生产品业务熟练的智力人员领域中出现一些破坏现象。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看到的是迅速的进步。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革命毕竟为迅速繁荣文化生活创造了某些前所未见的前提。文化的集约性下降了。但是它的粗放性则大大地提高了，尽管曾经遭到物质上的破坏。群众的心理变得更加活泼得多，变得更不守旧得多；眼界非凡地开阔了；意志受到了锻炼；经验无比地丰富了。面向广大群众的政治著作以及经济著作、俱乐部网、文艺小组等；群众性的宣传和鼓动方式；为几十万和几百万人敞开大门的红军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使文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其结果甚至影响到我们社会中人数最多和文化水平最低的我国农民的语言。文化的这种巨大的粗放化是极大的文化成果，它的结果必然要经过若干时候才反映出来，这一点难道不容易理解吗？这是未来空前的文化繁荣的基础，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白吗？

在这里，提出一个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般问题，是完全适宜的。一般说来，这种制度和这种秩序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在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下有可能达到文化上的发展和文明地选拔最大数量的人材。这个育种场越广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就越好。

我国革命正是在这方面实现了真正巨大的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还没有保证战前的生活水准。但是，它已经大大扩充了育种场，破天荒第一次吸收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参加文化活动，使有可能不是从“几万上等人”中，而是从几百万“下等人”中进行挑选。通过象政党、工会、工厂委员会、俱乐部等这样的组织，有一大批人进入高等学校，而这些组织无非就是从最广泛的生活中挑选人材的一所巨大的、空前未有的学校。

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就；它是巩固的、无可争辩的。如果说我们在开始时没有完全“够格”的大学生，那么这些不完全“够格”

的大学生同过去的大学生比较起来有一个无容置疑的优点：他们同生活、同实践、同积极参加社会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奥林普山诸神们”——科学家们对这个特点是不满意的，他们听不到生活的颤音（奥林普山诸神们的左耳往往是迟钝的）。不过，这种不满也恰恰证明他们是落后了。未来不属于（这一点就是在资产阶级人士中也开始明白）那些思辩哲学的英雄们，因为他们的思辩比庸俗的和唯利是图的市场投机好不了多少；未来属于同实践联系的人们，在他们看来，科学是这种实践的工具，而不是学究式的稀汤或者“消夏的甜柠檬水”。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实践是天性。工人阶级在社会科学方面（即在社会学理论和工人阶级的科学政策方面）所提供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无疑将逐步地占领一个又一个的领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难道我们不能通过我们的国家政权把舵转向唯物主义的统治和坚决反对宗教的荒诞鬼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以及诸如此类的别尔嘉也夫式的“分离物”的方向吗？

这种实验科学、唯物世界观、唯物主义教学的统治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这种转变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当然，那些所谓“民主思想”的游手好闲的空谈家们至今还没有忘记来谈论什么专制独裁和对各种自由的强奸。不过，这也无非是那种极端庸俗的、拜物教的思想，恕我直说，从历史的观点看也是一种野蛮的思想，如同别尔嘉也夫先生关于“圣餐”的思想一样。人们以为，这是非常明智的。而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尽管由于作者们的经心提炼，它也无非是石器时代才配有的、资产阶级的“公正”的科学家们才会去诉诸的思想。然而，巴甫洛夫教授的科学观点怎能与之相一致呢？问题就在于此。

结 论

虽然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基督教的美德，但是我们还是尽力来帮助我们的论敌摆脱他的无数的死胡同和陷坑。因为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不是康德的无上命令和基督教的道德说教，而是革命的合理行为。同巴甫洛夫教授的想法相反，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都决不蔑视底层的科学。但是，它也要坚定不移地指出伪科学的江湖骗术，这种骗术现在在欧洲血流成河的大地上正猖獗一时，而某些泣血顿首的俄国知识分子正把它看作是最新的神的启示。工人阶级热切地关心能使科学的优良传统（而科学的优良传统是同富有经验的研究、唯物主义、反对各种形而上学联系着的）同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青年学生的努力汇成一股洪流。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来答复巴甫洛夫教授这位诚实科学的杰出代表。不仅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而且从最客观的方法的角度来看，他是有过错的。当问题涉及到唾液腺时，他是那样卓越地捍卫这个客观方法，而当需要分析社会生活中的事件时，他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一直只是向巴甫洛夫抛出一条客观方法的救命绳，以便把他从陷坑里救出来。“救命绳只是一条普通的绳子”，不过这条“绳子”可以不仅仅在实验生理学领域中帮助摆脱陷坑……

但愿有时能走出住所和实验室来透透新鲜的空气，——这毕竟是非常需要的。诚然，查拉图什特拉^①是不会这样说的，不过医学则会“以极其顽强的精神”使你确信，我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一次发表于1924年。译自《进攻》文集，
莫斯科1924年俄文版第171—215页。

^① 神话中传说的古代波斯等地的宗教——祆教的创始人。——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者列宁^①

在我党的相当多的党员中间，甚至在党外，通常都认为无可争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极有天才的工人运动的实践家；然而，对于他的理论工作的评价通常却低得多。依我看，现在时候已到，应对这种观点作一个不大的，甚至也许很大的修正了。我认为，对于列宁同志作为一个理论家的不确切的评价，应归咎于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心理偏差。列宁同志所完成的理论工作并没有集中、压缩和编选在少数几本首尾完整的书里。列宁同志的理论性原则、表述及概括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十之八九是在不同时机临时作出的。它们分散在他众多著作的各处，不难理解，正因为它们是分散的而不是以一种紧凑的，自成一体的，篇幅不大的形式提供给我们的广大读者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便认为作为理论家的列宁远远不如作为实践家的列宁。但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看法就会垮台，而在稍远一些的将来，列宁同志就会以他的真实形象，不仅作为一个最有天才的工人运动实践家，也作为一个最有天才的理论家，呈现在我们面前。要是允许的话，我只想从我本人的工作中，从我本人的“理论实践”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一次，我曾有机会在一篇论文中相当详尽地论述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体系中社会主义结构的成熟程度和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结构的成熟程度之间具有多么

^① 本文是作者于1924年2月1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纪念会上的一篇报告。

大的原则差别。我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表的这些相应论点，后来在好几篇有关法律、一般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章中获得了或多或少理论上的加工提高。但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文，并真诚地相信我已经在这个小小的理论领域中，在一定的小分支里总算说了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新看法之后，我才看到，我所说的一切，实际上都已经包含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讨论“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期间我党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一次讲话中的短短四行话里。我相信，我们中间那些从事理论工作或将要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以及现在愿意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研读列宁的著作的人，无疑将会从这些著作中发现大量的新东西，那些东西是我们至今为止一直都忽视了的，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这些东西的理论深度是我们以前一直没有理解的。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列宁始终在等待着人们给他的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将来，当这个工作完成时，当列宁所给予我们的所有新东西——这些东西不计其数地散布在他的著作各处——有了一个系统的形式时，在那个时候，列宁也是一个工人共产主义运动的天才理论家的巨人形象就会以其全部高大气魄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我的报告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些路标，在我们今后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研究的工作中，这些路标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推动力。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正如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一样，在纯粹理论领域和理论应用领域内，都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活动的量值。它可能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而且，象其他学说一样，它可能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发生蜕变，但它却决不是一成

不变的。我认为，在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已可完全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是与工人运动史的三大分期相适应的，这三个分期又大体上与首先是表现在欧洲社会中的人类社会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由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定型并加以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绝不是欧洲社会发展的有机的或和平的时代。那是一个欧洲正在经历几次大动荡的时代，是它在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最鲜明表现形式的时代。

理论概括的主要材料，以及从社会方面给革命的表述提供了动力的东西，都来源于欧洲社会发展的天变动性质的种种条件。马克思主义起源的那个时代赋予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学说以完全独特的特点，这个时代也在这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构上打下了印记。我们可以很容易追寻我刚才所说的给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革命动力的那些基本线索。首先是理论概括的极大程度的抽象力同革命实践的结合。我们都知道，在理论性抽象最高级阶段，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命题：迄今为止的科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不言而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这种实践的和现实的倾向，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而且，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具有锋芒毕露的造反性质。从思想结构的高级阶段开始，直到其应用于实践政治上的结论，它在实质上是彻底革命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在纯粹理论方面和应用理论方面，都是彻底革命的。你们都知道马克思是怎样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灵魂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一反许多人的意见（当

我说到许多人时，我甚至想到一些现在还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马克思的学说并不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因为在他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为人所知了，他的学说是，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一般用来称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公式，即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代数学，这个公式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个神奇的机器，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在它所有各个理论环节(我要再重复一遍)及实践和政治结论环节中的统治，它是最伟大的武器。

二 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

上面所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是它的第一个历史面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我们充分了解，后来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也就有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妨把这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称为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或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言而喻，从马克思主义的那条路线，即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过渡到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天翻地覆性质的。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工人运动思想体系中的这种演变，是以欧洲资本主义首先经历而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也经历了的演变为基础的。我要再说一遍，首先是欧洲资本主义所经历的。1848年革命以后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状态，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一个阶段开始了。这个时期把它最突出的矛盾推移到它的殖民地边缘地带。在日益发达的大工业的一些基本枢纽地带，存在着一个生产力有机地增长的过程，伴随着工人阶级的相对富裕。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土壤上，还存在着一个相应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统一的民族国家——“祖国”。资产阶级充分牢固地掌握着权力。帝国主义的政策开始了，不妨说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

始，它特别明显地开始出现了。在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工人贵族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从内部、从思想意识上蜕化的工人组织慢慢地长入资本主义总机构体系的推进过程；而资本主义机构的主要表现形态，亦即它的最合理的表现形态，是资本的政治领导，也就是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就这样，这个过程成了工人运动中统治思想的蜕化的背景和土壤。正如大家所知，思想总是落在实践后面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发展上和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实践的发展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基本形式也都开始蜕化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倾向把这种蜕化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就明确的理论表述而论，我们在其他国家中再也找不到更典型的例子了，即使还有更明显的蜕化。由于一系列我现在在这里不能详加分析的历史条件，机会主义的实践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它在那个“哲学家和诗人的国家”里那样得到更鲜明和更确切的表述。在德国，修正主义思潮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来了，不仅显示，并且已经充分地表达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整个上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以考茨基为首的，自称为激进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个集团的背离，则远远没有那么明显。我已经有机会在其他地方提到过这一点，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那种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考茨基的堕落开始于1914年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证实这点），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那个长时期统治整个国际的集团背离了真正正统和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意识形态发展的上一个阶段所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的背离不象修正主义者们那样急速。

我要重申，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那些走得最远的修正主义派理论家们，在发展了

适当的理论之后，就开始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另一部分，虽然仍旧坚持他们的理论原则，但没有能够，而且也不够努力，在实践中克服这些有害的倾向，这就是考茨基集团所采取的立场。但是在这个时期的末了，当历史直截了当把整整一系列在原则上和实质上都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时——我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时，这两翼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立刻”就都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实质上，这两翼——修正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都表现了一模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蜕化的倾向，即在最坏的意义适应在欧洲突然出现，也是欧洲发展的这个时期所特有的新的社会条件的倾向。它们表现了一模一样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真正革命原则的理论思潮。从一般观点上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区别：近几年中已经日趋明显，这种纯粹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权力和资本主义政体等问题上，已经带上了毫不掩饰的宿命论性质；而在考茨基和他的集团那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可以称为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区别界线是有条件的；近几年来，这个界线就逐渐磨灭了，这两条逆流开始日益明确地走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条航道。这种变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它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革命辩证法、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革命学说、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学说、关于专政的革命学说等等——而代替所有这些的，却是普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进化学说。至于这种背离是怎样明显出现在一系列理论性问题上的，本可以详细地予以指出，但我已经在一次国际大会上论及有关共产国际纲领的讲话中部分地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心要点之一，即关于国家权力的理论上，不论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或是考茨基那里，我们都看到了这种修正主义的背离。由于在国家理论的问题上存在着这

种修正主义，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考茨基派为什么也采取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就非常清楚了。我们都知道真正的马克思关于国家政权理论的公式。例如，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个学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要开始建立一个新的专政——一个“反民主的”，然而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一个完全特殊的独特的国家政权形式，然后这个政权开始消亡。可是，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在考茨基那里就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在考茨基和所有社会民主党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个问题总是被这样解释的：国家权力只是一种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的东西，就象一架先是被一个阶级掌握，后来又移交给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新阶级不必把所有的螺丝钉都拆下来，然后重新把它们按新方式装配起来。由于这个看起来合乎逻辑而又自圆其说的表述，战争期间便产生了护国主义的立场。战争爆发之初，这一类的论点可以在社会爱国主义的会议上无数次地听到。这种极端原始的论据，作为护国派的根据，获得不小的成功。如果某个假设的资产阶级国家明天将掌握在我们手里，那么当然把它摧毁是没有好处的；相反，我们应该保卫它，因为它明天就是我们的了。这个问题的提法完全和马克思的提法不同。如果因为国家就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就不应该摧毁它，那么，我们也不应该解散军队，因为它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不应该破坏任何国家的纪律，等等。所有这些都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不用说，当那些国家处在互相战争的打击下时，在理论前提上已经完全联合起来的考茨基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作出了那些相应的实践结论。

我要再说一遍，认为我们在这里犯了关键性的、灾难性的过失，是不对的。它在理论上是有充分根据。我们只是没有注意到，在所谓“正统派”——它和真正的正统派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内

部,也存在着内在的蜕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理论,关于贫困化的理论,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关于民主和专政的学说,关于策略的一些学说,如关于群众斗争的学说等等,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形。根据这个观点,我要建议所有的同志读一读考茨基那本著名的《社会革命》的经典小册子。这本书我们已经读过,但是现在我们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读,因为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在这本小册子中发现整个一座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歪曲和机会主义说法的“勃朗峰”,这些我们已经完全清楚了解。如果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考虑到资本主义秩序方面的某些新变化,考虑到经济与政治之间内在联系方面的某些新变化,如果他们把当代生活领域里的某些新现象放到他们的理论放大镜下面去仔细察看一下,那么他们在原则上总是从同一个观点,从工人阶级组织以一种进化的方式长入资本主义机构总体系这个观点来考虑这些新现象的。

例如,出现了股份公司这样一个新形式,他们马上就利用它来“证明”资本主义在民主化了。在欧洲大陆,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于是立刻作出结论,说也许连革命也不需要了,我们一切都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来取得了。由于他们以马克思为根据,他们马上就抓住一系列引文,抓住一些从上下文中割裂下来的论据和文句。尽人皆知,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时说过这样的话:“在英国,事情也许不用流血就可以了。”这句话马上就被大家拿去推广了。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关于街垒战有一次曾说过一些不很妥当的话。这句话立即被引用来作出全部结论了。就是这样,一切现象都被人从工人组织长入资本主义总体系的观点去考察,从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和平观点的观点去考察。久而久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最后就逐渐不翼而飞了。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每当那种时候,我们总是听到同样的话,同样的术语,同样

的措辞,看到同样的招牌,同样的旗号,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却看到完全不同的政治内容。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那里还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外壳,但绝对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剩下的只是那在上一世纪中叶社会动荡时期中发展起来的学说的文字外壳。革命的精神实质已经不翼而飞,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已只是那样一种学说,那种学说已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以及在客观上已蜕化并为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收买的各国机会主义工人党的机会主义实践相符合。甚至可以给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程度欺诈绘制一幅专门的社会政治地图。一个国家进入世界市场越广泛,它的地位越强大,这个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越贪得无厌,工人贵族人数越多越强大,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及本国国家组织联系的链条越粗大坚固,那么理论公式就越是机会主义化,越是伪善卑鄙,虽然它们还是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很可以绘制这样一幅地图,它能够极妙地说明社会政治发展这一方和意识形态(在这里就是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发展领域那一方之间的关联。

同志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种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面目完全不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面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支柱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前不同的。这个支柱就是一些最具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这些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当这种蜕化变质过程在社会领域里获得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时,我们就已开始获得在一切方面都背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理论公式了。

三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

我现在要谈谈有关列宁主义的问题。有人告诉我，在红色教授学院的一面旗帜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科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上的列宁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旗帜。”我觉得，这样的划分是极端不妥当的，与我们的红色教授们所自称的“意识形态战线上最前列的先锋队”绝对不相称，因为，这样地把理论与斗争实践割裂开，是绝对不许可的。如果把列宁主义视为实践原则而与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那么就会产生特别对红色教授学院这种机构有害的理论与实际的脱离。事情很清楚，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是独特的意识形态产物，乃是由于它本身是略有不同的一个时代的产儿这一简单原因。

它不能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简单重复，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是马克思所生活过的时代的重复。在那一时代和这一时代之间有某些共同点：那一时代不是有机时代，这一时代则是有机程度更低的时代。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时代的产物。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也是一个异常激荡、异常革命的时代的产物。但这也是自明之理，在这里，在社会发展的进程本身中，在对理论概括提供材料的经验材料本身中，在革命无产阶级而前提出的那些任务中既有这么许多新事物要求作出相应的回答和相应的反应——新事物是这样多，所以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是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观念的简单重复了。

必须以最断然的方式强调，绝对不能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我绝对没有意思把这一种学说与另一种学说对立起来。后一种学说（列宁主义）乃是前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完善和发展。但我想先详细谈谈社会和经济政策中的

那些新事实，那些新事实乃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实际上是要讨论，在这一领域内我们面前有些什么新的事物，所谓“新”，是指马克思所没有看到的新现象，因为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这些新现象不是还完全不存在吗？首先，我们面前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某种新阶段。马克思认识在当时刚过去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也认识工业资本主义。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是被认作一切资本主义的正统形态的。你们清楚地知道，直到恩格斯生前才开始形成象辛迪加和托拉斯那样的东西。至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连同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的大规模重新组织，即列宁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东西——事情很清楚，所有这一切现象的总和马克思并没有能看到，因为当时还不存在；也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马克思也未能对它们作出理论上的表述和概括。

这些新现象是应该在理论上加以掌握的，它们一旦在理论上被掌握，它们也就可以成为理论论断和原理的旧链条上的最新环节。这一切，都是金融资本领域中，都是这个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政策领域中的现象。有关建立和实现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这一问题，以及整整一系列从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头几十年所呈现的特殊具体结构中产生的问题，这都是马克思所未能知道的问题，这也是应该进行理论分析的问题。第二组问题——是有关世界大战，有关资本主义关系的瓦解的一些问题。不管我现在怎样估量资本主义关系瓦解的程度和深度，不管我怎样分析这种关系，不管我怎样具体地估量西欧当前经济情况，不管我怎样谈论这种深刻的危机和崩溃，不管我会对之作出倾向哪一方面的根本性的表述——无论如何这总是十分清楚的，这类在以前不存在的种种现象现在摆在你们面前了。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形态也好，或由它产生的资本主义机构

的瓦解和解体连同社会结构各方面（从生产基础到货币流通方面的现象）的瓦解的各种完全特殊的现象也好，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生前那一时代尚未存在的。这些现象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极有意义的新的理论问题，因此，不言而喻，随着这些理论问题也就必然产生以它们为基础并与它们相关联的一些相应的实践性的政策性的结论。这是第二类现象，这是数量众多，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类现象，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未能看到的现象。最后还有第三类现象，这是直接由资本主义关系崩溃时期（这一时期是这些纯资本主义性质集团在它们的战争中进行剧烈冲突的结果）中工人起义产生的；这些现象正是它们的资本主义竞争的独特形式，这也是马克思本人和他的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们生活和教导的那个时期和时代所不知道的特殊形态。至于现在，这些问题直接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相联系，这些问题同时也成为最巨大的社会现象，完全是客观性质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同样迫切地必须加以理论研究，这种现象有独特的规律性，这种现象向我们提出了整整一系列理论的和实际政策的问题。不言而喻，在马克思的时代对它只能作出最一般的表述，但目前的经验材料却提供了极大量的各种各样新现象，要求给予理论研究。这就是第三类现象以及由它们产生的问题和关系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政策的结论。这是第三类马克思所未能看到的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践上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在当时那个时代还完全不存在。最后还有第四类庞然大物般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堆完全是新提出的问题，这是同工人阶级统治的时代或时代的开端相联系的一类问题。马克思怎样提问题的呢？我要引用一句马克思的说法：“我的学说和它的实质不在于阶级斗争，而在于它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条界线，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事实，那么当然再往后我们就已越过界线了。马克思的学说的实质就是不可避

免的无产阶级专政，仅此而已。到此为止^①。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除此之外就不可能了，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还未成为现实的事实存在，伴随无产阶级专政而发生的种种现象还未作为纯粹的经验现象和观察材料可以加以理论概括，可以充当理论分析和实践反应的对象的东西而存在。这一切当时都不存在。因此，不言而喻，这极大量的全部现象是完全新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走到马克思本人所说过的境界：对我来说这是条界线。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一类处在这一界线以外的现象。这些现象愈新，它们在理论上也应愈新；因此，对这些在一切过去时代都未出现过的崭新现象的总考察中所包含的概念也应愈加具有独创性。这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第四类现象，这些现象既应是理论考察对象，也应是工人阶级方面的行为的系统化理论准则。我在这里提出了四类现象。不言而喻，这一切都不是别的，而只是不仅欧洲资本主义并且也是全人类发展中的一个伟大时代而已。整个这一时代，连同它的一切复杂性和具体细节，构成了那样丰富的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理论上、实践上的问题，这一大堆问题既是这样的丰实和庞大，那么自然而然，那位根据这些经验材料着手把理论问题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博学的辩证法家兼实践家就必然要越出马克思主义的旧形态范围了。

在这里我要对一个问题再作一点解释，以免发生误解。我们所称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它可以意味着两件东西：这可以是方法论，即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体系；也可以是整个一组特定思想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学说等等都包括进去，并且除此以外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原则，这就是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理解为一种方法或

^① 巴黎公社只为马克思提供了作出一系列天才预见的基础的一个启示。但马克思当然并没有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研究。

从理论上形成的方法论，而理解为这种方法的整整一系列具体应用，亦即由这种应用所得出的种种思想的整个总和。从后一种观点可以明白看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要比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广阔得多。理由是很清楚明白的。这是因为，在当时已有的那些思想总和中又增加了作为分析种种崭新现象，崭新历史阶段所得结果的一套新的具体原理。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突破。但我们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不理解为马克思那时候的思想总和，而理解为在马克思主义中构成的一种工具，一种方法论，那就不言而喻，列宁主义并不是一种变化了的和修正了的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与此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正是完全回复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术语混乱，由于一系列的术语以不同意义使用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如果我们自问，我们怎么才能完整地说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面貌，那么我认为，它可以看作是三种东西的结合，综合。第一，这是回复到马克思的时代，但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以全部新事物加以丰富之后的回复，也就是说，它是包括对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所作的分析成果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这当然包括对新时代向我们提供的全部大量新事物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是第一种。第二，这是斗争中的和胜利中的工人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和综合。第三，这是工人阶级的破坏工作和创造工作的综合；在这中间我认为最后一种情况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我要就这个第三种情况略为说几句，把它解释一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亦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言而喻，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有不同的实践任务，与之相应也要有一套逻辑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实践任务归根结底也规定着我们的理论推论和衔接，即把各个分散的理论原理连接在某

一体系之中，理论链条之中。当工人阶级以及革命政党进入夺取政权的战斗阵地时，在一切意识形态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应随时随地强调，重视一切矛盾着的方面，并对之作专门具体的分析，我们应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基本不协调，我们应仔细地看出、找出正在瓦解这个社会各种成分的东西，并对之作理论上的重新组合。这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原因：我认为，在这些隙缝中打进最锐利的，最起作用的楔子，对我们在实践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我们面前摆着破坏性的任务，我们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这也是不言自明之理，包括全部理论原则和环节的整个工作应正确地循着这条路线前进。对我们来说指出这一切矛盾在理论上是重要的，加深这些矛盾则在实践上是重要的；需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通过我们的宣传鼓动员，从一般性的理论原理向前推进，因为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破坏性的、推翻现行制度的根本任务。马克思的一切理论著作的全部实质也是循着这条路线建立起来的。当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时，在我们面前就产生了一个在保持工人阶级的特定的领导权下把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的任务。实际的利害关系产生着整整一系列在过去并不发生利害关系的问题，因此现在对这些问题就应加以极深刻地理解。现在我们应该建设，而不是破坏。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观点。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现在在报上看到一系列事物时，或是对当前现实生活进行一系列考察时都会说，那些他以前曾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的同样事物，现在都使他产生一种新的看法，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因为以前他在实践中应破坏某些特定事物，现在他却应该把它建设起来，设法粘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一股思潮要在整整一系列与这一类事情有关的问题中产生相应的理论反映和理论表达。这些问题在以前，在马克思的学说最初形成，由马克思本人创立的时代，是未曾提出来的。在第二国

际时代，这些问题曾从长入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观点提出来过，正因为这些问题是以长入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观点提出来的，就是说，正因为那些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进行和平的文化建设，而其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了使这个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适应，对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作逐步的进化的改造，那就很清楚，这种“建设”理论的萌芽必然要受到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敌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长入我们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国家，使各种组织长入我们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机构的机器这一观点下总结起来的。但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当我们已掌握政权时，那么我们就完全清楚明白，无论在实践上或理论上我们都必须有另一种观点。因为我们必须一方面进行破坏，一方面进行建设。我们应在我们面前提出一系列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给我们提供这种破坏旧事物和建设新事物的综合以及这两种观点结成某种统一体的综合。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又因为事情在于理论总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出了这种综合。在这里，我们非常难于从这一领域制订一些一般性的基本原则，因为这里我们又面对着整整一系列分散在多处言论，这些言论分散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集的所有各卷中，特别是在他的许多讲话和其他文献中；但完全清楚的是，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理论体系的列宁主义所提供的最新的、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在破坏性方面的理论上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建设任务方面，在马克思过去的公式中还很少根据。这里也就必须从头建设了，因此我认为，列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宝库的最巨大、最伟大的贡献不妨这样来表述：马克思所贡献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实践的代数学；列宁的贡献既有这种代数学，也有破坏性方面和建设性方面的新现象的代数学，还有它们的算术，即从更具体、更具实践性的观点来解代数学的公式。

四 列宁的理论与实践

在这些一般的议论之后，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一系列也有理论性的也有实践性的，足以显示上述论述的大大小小的特征。我觉得，列宁不得不零零散散地表述自己的论点这一情况显然表现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部行动以实践为主，而这又是同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行动的时代相关联的。行动只有理论在你们手中成为你们完全能掌握的某种工具、某种武器时，才能是好的，只有在理论体系和理论学说不是拖住你们、掌握你们的时候才能是好的。不记得我是在哪次讲话中曾说过，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掌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想用这句话来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最突出的特性，一个最耐人寻味的特性，这就是认清每一种理论体系和任何一个理论原理的实践意义。在我们之间甚至常常有人取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一系列理论问题采取过于求实的态度；但是，同志们，现在当我们已经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了多年，在我们已经看到并经历了不少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们这种取笑完全应该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因为这种取笑显示出的正是我们自己的习惯，知识分子特有的狭窄性，“书生们”的习惯，在狭窄的范围内从事一些专门工作的人，如记者、文学家、或多或少以理论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的狭窄的专门工作者的局限性。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任何文字游戏和过于专门的学问，——我们有时又不太喜欢他的态度，所以他挖苦了我们，——他也同样不能容忍多余的东西，而纯粹地从实践上去看待理论概念和学说。理论概念和学说除了实践上的意义之外有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显然是没有任何其他意义的。但是，由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专家，实践就使我们从心里感到厌恶；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入未

来的程度，对不起，要比我们大得多，因为对我们有一定吸引力的东西却是本质上使他起反感的。我觉得这种认识，对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不管它们有多么高深，都起着服务作用这种完全深思熟虑的认识，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有价值的、有积极意义的特点。

与这一特点相关联的、没有那第一个特点就无法理解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偶像化，即撕下任何原理、教条等等的偶像化外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异乎寻常大胆地提出的一些理论上或实践上的问题，在开始时经常使我们吃惊。你们都记得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可以从任何一个外国强国取得武器反对另一个强国，这使我们的国际主义良心深感愤慨，这时候，我们的“国际主义”是建立在没有从理论上认清当我们取得了政权之后，整个局势就改变了这一点上的。你们都记得这个口号——“学会做生意！”，它曾使许多好的革命者看不顺眼；它也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是同一系列理论原理相联系的。只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家、理论家兼实践家才能把这样的理论上的大胆，和这样的实际精神联在一起，他本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这非常锐利的武器，同时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它作为在一定环境中判明方向的工具；这个人非常了解任何一种新的外在的关系后面一定会有一种从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那方面的另一种行为反应。事实上，让我们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用一般形式来表述这一原理的。我绝没有打算用一些引文来使你们感到麻烦，我身边也没有带来什么抄好的语录，我甚至没有搞过这种引文；但是我记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许多意见与言论。他就错误所发表的最为概括的策略性原理之一就是：“非常大量的错误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把一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局势下完全正确的口号和措施机械地搬用

于另一个历史条件、另一种力量对比和另一种局势之下。”这是他的概括性策略公式之一。让我们考察一下我们的反对者的思想；就拿民主这样一个问题来看吧。我们大家在某一个时期也都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大家都要求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在我们解散它们之前的几个月都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只有懂得这些口号的相对的社会作用的人，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不能对资本家提出“请你们关闭你们的资本主义组织，给我们的工人组织以自由！”这样的要求的人，只有清楚懂得给我们工人组织自由这句话不可避免必定会演变成“给一切人自由”这样的公式，因而当我们过渡到另一个历史阶段和另一种形势时，我们又必须抛弃这个公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采取另一种方针。谁若不懂得这点，谁若是把旧东西偶像化了，他就跟不上事物的步伐，就要留在街垒的另一面。这是小小的例子之一，但这种例子是不计其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是以惊人的大胆而与众不同的。

我们再拿另一个问题的一般性表述来看。我这里说的是，关于在我们完成了革命之后所需要的进化观点的问题。请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个口号，例如“学会做生意”或是“一个专家比许许多多共产党员要好”。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理解这几个口号的实践意义。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为了要说出这些话，显然必须先对问题有严格的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形势既然变了，行动就必须跟着彻底改变。关于共产党员干部问题，关于在最初时期不可能不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问题等等，这都需在实践上提出口号以前先在理论上得到解决。假如，早些时，“买卖人”、“商业”、“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字眼，任何一个革命者听来都是极大的侮辱性字眼，所以，为了转到“学会做生意”这样一个口号，就必须对一系列有最大原则意义的全新理论原理的正确性有极深刻的信心。要知道，一些只是到现

在对我们说来才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列宁早已在理论上作过直到每一个细节的深思熟虑。要知道，只有我们的反对者的庸俗肤浅的看法，才会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象是一个石器时代的石像那样用斧子砍出来的人物。事实上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假如列宁同样抛弃了某些简单化的口号，例如我们那些“文明的”反对者听起来极可怕、极野蛮的口号“掠夺掠夺物”之类，这其实是深入的理论分析的结果，他考虑到什么样的口号现在必须抛弃，群众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什么是群众理解的，什么是群众不理解的。列宁提问题时总是力求与在推翻旧制度上起一定能量作用的最大多数群众，最大多数人民结合起来。这样做，要求很复杂的理论“深思熟虑”。当列宁说“必须学会做生意”时，这在当时听起来很反常。现在我们却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每一重大决定都是一次独特的哥伦布立鸡蛋的办法。当哥伦布把鸡蛋立了起来，那时就清楚了，事情只有这样办才行。“学会做生意”这个“简单的”口号正是以事先解决一系列最复杂的理论问题为依据的：城乡关系问题、流通过程的作用问题，一般地说，商业机构在流通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等等。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口号，这只是每一环节都经过周密思考的一整条理论原理的链条采用口号形式的实际表述。我们只有在一本一本本地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顺着一定的方向融会贯通他的思想时，我们眼前才会展现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决这些问题所走过的思想路程。列宁象战略家那样成功地完成的所有这些大转折之所以能够完成，都是因为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理论家，他能完全清楚地分析特定的阶级力量对比，估量它们，作出理论上的概括，由这些理论概括作出相应的实践上和政策上的结论。这里最根本的东西是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它从来都不是僵死不动的东西，它在列宁同志手中是根据实际现实的需要，时而

对着这边，时而对着那边运转自如的真正有威力的工具。这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用通俗的话来说，对于它来说，除去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之外，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它不知道任何偶像，它非常清楚地知道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主张，任何个别的理论原理的意义，它绝对不知道有任何僵化不动的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呢？当我们党内或党外发生了某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时，他立即以一定的实践的尺度去衡量它们，因为他善于把理论与实际联结在一起，清楚地辨认语言的外壳。我前面说过，假如说马克思掌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代数学和革命的代数学，那么列宁可以说是掌握了新时期的代数学以及（让我重复一遍）它的算术。我现在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以后还要在适当的时候仔细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这样进行分析的，在它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农民排除在外的，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阶级。这是最高级的代数学。很明显，要进行算术演算这里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这就出现了列宁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把在数学里相当于数论或簇论的最高程度的概括的代数学同算术，也就是代数式的算术解法结合起来，把大和小，（在实际方面）把对于巨大国家的电气化的操心与节省小钉子的操心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理论方面，研究从哲学问题开始的最重大理论问题，同时探寻、搜索可能会对将来的发展造成危险的每一个理论上表述得不正确的细节。这就是善于看到时代又看到每一个最小的细节，分析、考察象“自在之物”这类问题，而同时理解某一决议中的某一表述的理论意义（你们都记得，列宁在他的论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写了许多页关于不应该这样写决议的问题^①）。这就是那种能看

^① 即《不应当怎样写决议》一文，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206—227页。——编者注

清大大小小的全部事物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就是说，能够看清在政治战略和理论的棋盘上一切最大的事物，大的事物，最小的事物，最微小的细节的能力，这些东西应是按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和实际的政治行动观点安放在它们所应处的位置上的，这种能力表现在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杰出的综合之中。

五 帝国主义。民族问题。殖民地

同志们，现在我要详细谈谈主要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带来的新东西的观点看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问题。这些极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列宁在他的著名的著作里已阐述无遗，在这里完全无须再复述一遍或把它的简要内容再作一次申述。但是同志们，我现在请你们注意下述情况。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著作方面，你们不能举出任何一部著作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部著作那么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这部著作里任何理论原理和这些理论原理的数字示例，确实确实都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这些论点得出的实际的政治结论联系在一起的。

这不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单纯分析，一个理论分析：这个分析是在这样一种观点下作出的，它使人一看就明白，工人阶级随着统治阶级的发展、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所应走的道路。直接属于这个一般性问题的还有另一个在任何理论书籍中都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这就是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必须指出，这里，我觉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出了一部最伟大的理论著作。我再说一次，我们还没有一本把一切都归结在一起，并把它们系统化的书。但我们还可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系列著作中找到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完全正确的问题提法，这些提法已被我们的实践

所完全证实。这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实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学派。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对许多问题的抽象程度是那么高，要得出直接的实践结论，必须先制定整整一系列中间性的逻辑环节。我已经提到过，《资本论》分析了三个阶级。那不是我们的现实，那里讨论的是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所谈的问题不涉及世界经济、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互相冲突和国家问题，由于国家仍处于我们敌人手中，因而出现国家在一国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也就是说，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问题在《资本论》里都没有加以分析。为了把这个理论体系引向实际行动，特别是在我们这时代，必须制定整整一系列中间逻辑环节，这些环节本身就是极大的理论问题。在机会主义时代，研究殖民地政策问题的人，除了极个别之外，是一些最最露骨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主要是为在殖民地进行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作辩护。马克思作了许多单个的论述，还有许多一般性的论述，但是他当时未能在其应有的广度上提出问题，因为，当时这个问题不具有后来所具有的尖锐程度。而那些追随者们则并不能按照事情的实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当时资产阶级政策中最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即使不小心地用指头碰一碰这个问题也不行。后来希尔德布兰德先生之类的人登上了舞台，这样一类人发展各种各样有关殖民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的是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辩护。所以在这方面，确已建立的列宁学派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变革。它的实践意义现在是完全清楚了。列宁的这个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在它发展的最初阶段确乎不总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但现在它的意义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我们面临的是世界大战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处于崩溃的时代，按照尼采的规律，只要“一推”就倒的国家。为了推倒它们，就需要扶植使这些实体崩溃的一切因素，其中包括殖民地和民族运动的分立主义，也就是说，一切在客观上削弱这个作为资产阶

级最有威力的、最合理的组织的、钢铁般的国家巨人的那些破坏性力量。于是就由这里，由问题的这种实际提法中得出了一些特殊的理论性课题以及实际口号（分立权等等）。这里指的是这种预测：在最近时期将出现一些过渡性的革命、殖民地起义、民族战争、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由反对列强的斗争等等。所有这些预测符合资本主义关系总崩溃过程中的一系列过渡步骤，不言而喻，所有这些预测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做的复杂的理论性的思考工作。我劝那些对这方面的事感兴趣的人读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战争年代写的与罗莎·卢森堡论战的文章。你们会觉得惊奇，我们不是全体，也是绝大多数人要在成为事实之后才看到的那些最细微的转变因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么早已在理论上提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位灵活的策略家与战略家。这又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是以伟大的理论预见力为根据的，而这种预见本身又是他对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和具体性进行异常深刻分析的结果。另一个发展时期同样如此，这时工人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弄清楚所有那些表现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旧关系崩溃的产物，表现为它们的惯性的历史力量的种种现象，所有这些现象必须在理论上予以考虑，以便在日后在实践上予以消灭。这一切是以前完全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已分散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许多文章里，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有可能懂得他的思想，用这些思想作成冲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撞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利用无产阶级政权这一杠杆，根据另一些原则，建设新的政治结构，其中最大的就是我们苏联。这样，我们这里就有理论与实际在一些新现象的基础上的结合，这些新现象一方面是崩溃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新建设的产物。所有这一切被总结起来而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绝不是什么小事，它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仍将充当我们最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武器。只要我们记住，殖民地起义和民族战争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总崩溃过程中将起什么作用，假如我们设想其他大陆上继续革命过程，把它从西欧扩展出去，那么我们就可以体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多么强大的武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方面所制订的学说对于动员群众是多么宏伟的力量与出色的方法。

六 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

我认为，我们应该注意的下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的国家这一问题。这里，不言而喻，在列宁同志的思想体系中并没有原则上新的东西，他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一方面恢复了真正马克思的有关国家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作用的学说——我指的是摧毁国家政权和瓦解国家纽带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另一方面他把问题具体化了，或者说，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了算术式的解答，即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专政形式的学说。现在，对于我们说来，事情的这一方面已如此清楚明白，似乎不必对此再说一句多余的话了。对于我们，它已三倍地清楚明白，因为我们自己亲手在新的阶级基础上按另一种建设原则建立了国家；但我们又需记住过去，在总的历史前后联系中，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选取我们现在已非常清楚了解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如果我们去翻查有关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旧文献，我们就会在这里得到完全不可理解的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歪曲。我们不仅不能找到可以称为关于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关于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关于这些范畴在过渡时期的变化问题的进一步发展的新思想，而且也不能找到关于社会主义革

命过程本身,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后各种事物的状态的任何一句话。恢复准确的真正马克思学说,把这个学说本身具体化,就是说,给予工人专政的学说以具体外壳,这是工人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因为,不言而喻,怎样对待国家政权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个中心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总问题。对待敌视我们的阶级的态度,对待它的总力量的革命态度,首先并且首要的是对待这个统治阶级的最强大、最集中、结构最严密的组织,即它的国家政权的态度。另一方面,大家也都完全清楚,在不同的、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的基本杠杆,能改造现存生产关系的动力乃是胜利的工人阶级提出来并组织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这里就产生了一系列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辅助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名小册子《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总的论述。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发展的这个学说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到马克思本人所发展的那个观点。这是旧的马克思的正统观点与对一系列新事实所做的理论概括及对马克思在生前写他的著作时未能预见到的事物的预见的综合。我已说过,这个问题是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关键问题,是当代的中心问题,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理论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估计不足的。与此同时,还提出并解决了民主问题;这是曾被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被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完全偶像化了的的问题,它变成了盲目的教条,完全脱离了它的历史背景,因此变成绝对不正确的、历史上反动的政治实践结论。苏维埃政权现在已为资产阶级阵营中我们最大的、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们承认为合法的“现象”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思想、这个学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确实是伟大的。我们如果拿当今在全世界各地流行的不计其数的口号来看一看,那么无疑地,最得人心的口号之一,就是说能掌握、吸引并组织最大多数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口号,便是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你们都还记得弗

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长期侨居国外之后刚回到俄国，回到我们中间来的那个时候，你们都还记得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名的《四月提纲》是受到怎样对待的，当时我们自己党内的一部分人，而且并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竟都几乎把这个提纲看作是对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事情很清楚，这里没有一点同马克思主义矛盾的东西。相反，现在我们已完全清楚，这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现实生活令人信服地证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最坚固的存在形式，它对于胜利的工人阶级有一系列至为巨大的实际优越性。但同时，我们如果把这种普遍的承认与最初对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张的态度比较一下（这种态度甚至出现于我们自己的党员队伍中，更不用说我们的敌人了），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列宁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气魄多么宏大的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主张。在现实生活的狂风疾雨般的迅速进程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多新事物变为不言而喻的东西了。但当我们对这种新事物进行历史评价时，我们必须暂时忘记，我们对这个事物已经熟悉，我们必须记得，在今天以前是什么情况，这个理论思想曾受到过怎样的对待，从它引导出来的一些实践结论曾受到过怎样的对待。再说一遍，它们当时不仅没有得到承认，相反地，它们得到的是无情的打击。现在它们已得到普遍的承认，这说明，无论从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理论、这个国家政权的规范等问题的理论上的深思熟虑观点来说，还是从实践的观点上说，在这里确实已完成了某种极为伟大的业绩。请记住，这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虽然我也曾说过，对于我们来说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归根到底是实践。这还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因为关于阶级统治形式的学说即使对于资产阶级也是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关于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问题，对工人阶级同样是有极大的利害关系的；只是对于工人阶级说来这

种利害关系要大许许多多倍，而且困难更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各种不同变种具有某种历史的继承性，而无产阶级还从来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国家的组成已是年代久远的事了。它们的结构中的各种变化，国家机关的重新组织等等都有极丰富的、极长时期的传统作凭借，那时国家制度的形式都早已制定，大量的经验业已取得，等等。工人阶级却不得不在新的基础上从头开始建设，没有前例作为借鉴。它没有这种国家生活的连续性形式，在这里它必须进行崭新的工作。这一情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的发现——这种形式是富于生命力的，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能抵抗一切敌对影响和攻击，——这一切我们都应归功于列宁在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丰功伟绩，因为他是工人国家的理论家，它的积极的实际建设者，它的领导人，并且也是它在国际无产阶级中间的不倦的倡导者。

七 工人阶级和农民

最后，接下去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现实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需要再多谈了。但是我们愈快地在其他国家向前推进革命，我们就愈能看出，这个问题不仅对俄国具有意义，而且对一系列其他国家也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具重大意义的国家只是一些例外；农民问题在与革命问题结合中不具有最突出作用的国家是屈指可数的。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早已存在于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了。不言而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论也存在于总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德国所说的一句名言，他说，从胜利的工人阶级革命这一观点来看，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同时发生，可以取得最有利的力量结合。马克思预见到了从胜利的工人

阶级革命发展的观点看来最有利的一些事件。但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这种专门研究从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看来是头等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出的。当然，在这里在许多方面可以解释为，这首先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生、成长、并活动在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不使人对农民问题给予巨大注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但请你们记住，问题并不在于表面上承认它的重要性，而是真正地、异常深刻地研究这个问题，从提出最基本的深刻理论问题起直到得出实际政策结论为止。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最杰出的土地问题理论家。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土地问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最好的篇章加以讨论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最初作为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进行自觉的工作的时候起，就从事土地问题的研究；在这里有一系列最抽象性质的问题，如关于“土地肥力递减”、绝对地租等等问题，也有许多实践性质的涉及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关系方面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一系列这些问题都作了最详细具体的探讨和研究。我认为，在这一领域，在土地问题领域，没有一个人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做过那么多，那么真正重要的研究。而且，如果在我们面前是另外一个时代，在我们面前所涉及的只是最高度的抽象，那就可以只限于分析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任何象农民那样的封建关系的残余都不起重要作用，都可以予以忽略而不加分析。但当问题在于要开始演绎代数学的公式并把它们化为算术公式，或可以在思想中运算的一些范畴的公式，处于代数学和算术之间某一个中间地位的公式时，那么你们马上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认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自己一边应该有一个同盟者，即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促使人们去分析土地问题。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工农联盟，关于这两个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乃是弗拉基米

尔·伊里奇对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特殊贡献的基石之一。同时，在这里指出下列这一事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即这个学说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制定的，一方面是与民粹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与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的（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马克思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一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从政治观点，从革命实践观点来说，都具有充分的，可以理解的理由，因为在这里解决了工人阶级的同盟者问题；对于工人阶级，为了胜利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是与另一个根本问题，另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需搞清楚的根本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相联系的。必须从理论上把这样一种原理摸清楚，它有可能使农民摆脱自由主义者和任何其他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使他们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我们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生分歧的最大实践问题就是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是工人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或者是农民是高于一切的力量。民粹派的激进集团把农民放在首位。自由民粹派主张同应成为农民领导者的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孟什维克则主张工人阶级支持自由资产阶级。

在上列这些不同组合中，唯一正确的组合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组合，但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这是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实践背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这个角度考察了和提出了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总起来称为“土地问题”，放进巨大的历史范围中进行考察，同时也考察了它的一切细节以及从这里产生出来的一切派生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应指出，这个问题在今后还会起巨大作用，因为它一方面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相联系。我们如果能俯视我们今日这座行星，看一看国际规模的力量分布，看一看整个欧洲，看一看美洲的工业地区，

如果把整个西欧与所有的殖民地，与中国、印度、其余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对比一下，那就可以完全清楚，民族革命运动和殖民地运动，这两种运动的结合是工人阶级为一方、农民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如果在世界经济的总范围里西欧代表大城市，集中的城市，那么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就代表一个大农村。由于各工业国的产业无产阶级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它正在统一自己的力量向资本主义制度进攻，由于它率领千百万农民投入战斗，并且还要率领一切殖民地的千百万被奴役者组成的后备军投入战斗，所以这千百万殖民地的被奴役者无非是我们的国际革命中伟大的农民后援部队。因此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又归结到另一个我已提到的问题，即民族问题、民族战争和殖民地起义问题。

同志们，所以这个问题还要起更为巨大的作用。在这里，最初的基本主张也是列宁学派提出的。问题的基本原则、理论体系的奠基石以及在这里指出的实际路线，无疑地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人阶级领导作用，我认为在这里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个理论原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已无需任何注解了。

整个说来，这些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和制定，并由此作出总的策略性结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结论。整座大厦已经建起，我们必须把它完成，我们必须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进行加工，当然同时也要仔细考虑今后年代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新事实，那种独创性的东西。

八 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

如果非常一般地提出问题，我们大概可以指出五个基本理论

问题，这是列宁所拟定而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首先是关于工人革命胜利后长入社会主义的学说，或者说初具轮廓的学说。一般说来，“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是我们极为痛恨的说法。其所以令人痛恨，是因为这种说法代表着修正主义者、冒牌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叛徒的学说。这些人创立了一整套的理论，说什么革命是不必要的，革命决不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的产物；工人阶级完全可以用不着进行革命，因为资本主义是依靠其自身发展的内部固有的条件，通过有机的方式不经灾变而转变为适合于社会主义的形式的；无产阶级在经济生活方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方面逐渐向四面八方伸张其触须，这样，工人阶级就会不经过革命，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最终在国家机构中和经济领域里占据自己的战略阵地。

你们大家都很熟悉这种学说，它所贴的标签就是“长入社会主义。”但是，同志们，要知道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便开始有机发展的时期。如果你们已经取得了工人专政，那么很清楚，整个问题的提法，正如其他许多问题的提法一样，就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变了。因此，当我们要想提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当然，我们是拿单独一个国家来说的）以后情况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时，答案就是：这个国家内部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进化的道路而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真正长入社会主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确切地表述过这一点，但是可以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引出无数地方来说明这种思想。尤其是在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中，例如在论合作制的文章中，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在前一个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努力的中心是我们的革命路线即灾变的路线，那么现在，在我国建设的目前时期，我们政策的中心就是和平的组织工作。他在这一段话中所表达的意思，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然而，不言而喻，这一

论点需要从许多方面进行研究和领会，因为这里问题非常多。例如各种经济形态的进化斗争问题，例如国家曲线最初上升后来又下降的一定的过程问题，这个过程也是通过进化道路进行的。起初，我们应当巩固、加强执政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应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这个国家组织通过同样的进化道路开始消亡。在这里，任何第三次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相反地，一切反对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灾变性的发动，在客观上不外是反革命而已。正因为工人国家是一种完全特殊类型的国家，如同我们的军队一样，它本身就孕育着通过进化而自行消灭的萌芽——正因为如此，整个发展程序都是按原来的进化序列排列的。的确，只是在夺取政权时期以后，即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以后，才开始长入社会主义。不言而喻，这里应当具有特殊的规律性，并且这一时期矛盾的消除应当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矛盾的消除。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外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这些矛盾在这一时期的消失是为了在另一时期再度出现，而每一次新的集聚，每一个新的周期都导致整个制度崩溃的一切矛盾更加尖锐化，那么从工人专政开始的新的发展序列（我且不谈在芬兰发生的那种从外部消灭工人专政的可能性），就会是一种自然的序列，这里，矛盾的发展从某个时候起就开始消除，也就是说，我们制度的矛盾将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缩小再生产，并且制度的这种再生产通过进化的道路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扩展。整个发展性质较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原则上不同的意义。不妨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指出几处来证明这种思想。这是理论上的某种新的领域，它阐明了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规律性不同的新的规律性。这是新的东西，但十分清楚，它具有自己的实践结论和政治结论。

如果拿我们俄国目前情况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一些非常具

体的问题来看,那么十分清楚,从这些理论前提中应当得出一系列的结论。我们不是通过关闭莫斯科和外省小店铺的办法,而是通过竞争、通过增强我们的国营工业和国家组织的实力的途径来战胜新经济政策。我举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你们可以看出,这里有许多完全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过去我们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因为过去我们的社会地位是破坏者的地位。我们曾经是一个制度的最坚决、最勇敢和最彻底的破坏者,而现在我们是另一个制度的最彻底的建设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提出的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也就不同。显然,这里同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无任何割裂,因为这里谈的是在完全新的条件下继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这些条件的具体情况无论马克思或者恩格斯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可以做出某种概括的经验材料。

因此,我觉得关于过渡时期的文化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进行详细的研究,应当从理论的角度加以深入的研究。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散见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系列著作中,属于这类著作的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关于专家的作用和利用专家的问题的言论,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演说和原理,关于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同旧文化结合的问题和关于它们之间的一定继承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也必须从理论上详细加以研究,这确实也是当代最大的问题之一,而且我认为,现在已经可以说,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理论概念中,这些问题的某些基本原理已经形成。我们必须继续这一工作。这又是一个崭新的问题,谁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历史发展的上一阶段就提出来。即使是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未来的新任务。

其次是第三个问题,我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已经从云端降落到地上了,或者至少是接

近了。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以前是怎样提的，马克思又是怎样提的呢？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发展的起点和趋势。”这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和正确的说法。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篇论合作制的文章并分析一下他所提出的原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分析前人对合作制的旧观点时说，现在，当政权已经转到工人阶级手里的时候，问题的提法就根本改变了，如果我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使农民合作化了，那么，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但这一公式不会同样适合于未来的苏维埃英国。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论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演说、文章、文件、著作中，都一再强调地指出，我们在把这样一些公式运用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这里在建设的类型上可能有更大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产生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现有的材料基础上进行的。很显然，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在各个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具有共同特点的同时，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有其特殊的组织，另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则有另一种组织。如果说，资本主义甚至在它经历了几百年发展之后的没落时期，虽然经受了平均化趋势的强烈作用，在各个不同国家中还保持了重大的特点，——那么不言而喻，这些特点也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因为这一发展的起点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主义。

既然各国的革命都有自己的特点，那么社会主义建设自然难免会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在我国农民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英国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过去我国存在另一种资本主义，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另一种阶级关系，另一种农民，因此，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自然也就不同，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直到转变为包罗万象的世界共产主义制度为止所经历的那些过渡形式，自然也就非常

不同。正是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详细研究，它是一个根据，必须从中作出实际政治结论。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时候，他对我们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人提出的警告之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要既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第三类问题，这些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我们现在需要加以深入的研究和具体化。

同农民和工人阶级问题有关的还有一个非常新颖的问题，必须对它进行理论的分析。在我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一个同志（罗季特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问题的这一提法很值得理论上的注意，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样也做了很多工作。这就是对工人阶级专政下的两个阶级的社会进行理论分析的问题。这两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所研究的主要是对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阶级）的社会进行分析的问题，如果说那里是这样地进行了抽象的分析，那么现在，在消灭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关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问题的提出就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不言而喻，随着向具体道路的逐渐接近，会自然引起一系列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大改变问题的面目的修正。但是，这个问题也象工农联盟问题一样沿着同一路线发展，因为这些阶级不外是一定经济形态的阶级体现者，这不单是某种社会力量。每个阶级都是其固有的经济形态的体现者。如果我们把农民当作一种社会阶级的范畴来看待，那么就不应当忘记农民是某种生产单位的形态的体现者，这种形态有可能战胜我们，沿着我们所不喜欢的道路发展，也有可能沿着我们想要引导它走的道路前进。因此，社会阶级观点在这里具有其纯经济的意义和原因，而阶级间相互关

系的问题同时也就是经济形态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全部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我觉得，我在这里谈到的那种问题的提法值得大大的注意。

最后，还有一系列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研究过的并且对于我们大家，对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都有非常重大意义的问题。例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我们目前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由这些矛盾产生的各种与我们相敌对的倾向的问题。在建立工人专政以后，整个说来，事物将按照进化的序列发展。但由此决不能说，这时，特别是在工人专政的初期，我们就不会有非常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某些发展时期甚至能够继续增长。当我谈到直至建立共产主义这些矛盾有可能消亡的一般路线时，我是就一条很长的道路，就整个这条道路来说的。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这条道路的开端，我们就不会有矛盾的增长。这样就产生了所谓工人阶级蜕化的可能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对于我们大家都异常重要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不止一次地在其他许多会议上提出过这个问题，他第一个谈到不文明的无产阶级有被较文明的资产阶级吃掉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将凭借其文化素养战胜我们。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对我们确实有很大意义的危险。这一危险的根源，在于我们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倾向和工人阶级本身的矛盾地位，工人阶级一方面站在社会锥体的下面，另一方面又站在社会锥体的上面。工人阶级的这种矛盾地位，又引起了一系列其他矛盾，这些矛盾要经过许多年代，经过整个整个的历史时期才能得到解决和消除。这些问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基本上已经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决了，我们必须继续加以解决，并作出相应

的实际结论。因为工人阶级是在文化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一切革命都有内部蜕化的很大危险（这种蜕化应当并且将会由于反抗的倾向而得到克服，因此要在这一切有害的和有利的倾向的相互斗争和结合关系中来分析它们），这些问题在上一世纪中叶是不可能具体提出的，在本世纪初期也不可能提出。但是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材料，足以判断这些危险的具体形式以及我们为克服这些危险而应当支持和加强的那些倾向的具体形式时，就能够并且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我不能够详细地谈论一系列次要的问题，同样现在也不能够详细地谈论工人的策略和战略的一般提法的问题，因为在这一实用领域中有自己的总结；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即在应用理论的领域中，正如在应用力学中一样，也有自己的规律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有过很多很多的论述，但是他没有一本将所有这些都分章分节地写进去的书来奉献给你们。他那本论述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就是他对这一战略和策略的一般学说作一概述的尝试，现在我们是以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读这本小册子的。因为，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革命时代一般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锥形或小小的纲要，更正确地说，简单的纲要。在这部最优秀的著作中，为制订工人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全部要点，在研究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时，就可以象按照纲要一样地按照这些要点去进行。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也是属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形势下，即当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组成的很小的小组时，在1905年作为一个半合法的政党而登上政治舞台时，在它作为一个被赶入地下面拥有一些合法的触角的党时，在它曾经是一个完全不合法的党时，在它时而进攻时而退却，等等，等等，最后终于变成了统治的党时获得的如此丰富的经验，是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各种不同的力量、处境和形势的这

种五彩缤纷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非常多种多样的行为准则，对独特性的这种理解，对各种不同道路的这种探索，——所有这些，你们在任何一个活动家（不管是资产阶级营垒的活动家还是马克思本人）身上都是看不到的。这是无可争辩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问题的可以合并起来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组织问题或党内问题。在这方面，列宁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关于党、阶级、群众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学说，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无与伦比的榜样，这些学说现在经受了幾次革命的经验检验并在很大程度上深入到非常广泛的群众意识中去了，它们在我们阶级斗争的时代是经久不变的成果，只有在阶级斗争停止之后才不需要它们。在这方面和在这一领域内，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即在党组织的建设、党组织同其他所有组织、同非党群众（包括阶级以外的非党群众）的相互关系的领域内，——在这些方面，当然我们再没有而且不会有更优秀的学说了，因为这里包括了新的时代及其某些基本要点和胜利的工人革命运动的复杂结构。我们的说法是，在这方面我们想不出比列宁的学说更好的东西了，但是，当然在这里列宁的传统会继续被运用到具体的环境中去。再没有什么比把列宁主义变成教条更使列宁讨厌的事了。他对坏的意义上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评价很坏，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善于象鹦鹉学舌一样去重复着几年以前所写的东西。在私人交谈中他把这些人叫做老傻瓜。他在发表文章时力图运用不完全是纯理论的措词，同时他在自己的全部理论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除了固定的方法论，固定的方法论的内容之外，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谁不考虑事变的运动，谁不考虑特殊的情况，谁就提不出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的东西。看不见这种新的东西的增长，就不可能理解新的事变，因为生活就是永远的运动，而且它不断地产生新的形式、创造新的形势和关系。察觉这种新事物就是理论家和实

践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新事物的嗅觉比任何其他人都强。如果我们看一看他的活动以及他提出的理论原理和实际口号，我们就会发现他对这种新事物的高度勇敢精神和真正不可比拟的敏感。我们党的政策的巨大转变和相应的批评（这种批评或者是先于这种转变，或者是同它融合在一起），——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最出色的榜样，这一辩证法不害怕任何变化并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和战略中作出与这一新情况相适应的变化和改变来适应客观环境中的任何变化。

人们常常拿马克思去同列宁作比较，并且提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更伟大的问题。于是他们就回答说，列宁长于实践，马克思长于理论。我认为，没有一种能够称这些伟大的人物的秤，因为既不可能把在不同条件下成长起来和起着不同作用的不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也不可能衡量他们。这是做不到的。问题的提法就是根本错误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毫无错误地说，只要工人阶级还作为工人阶级而存在，这两个名字将一直决定着工人阶级的道路。这是非常明显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之后我们能以自慰的是，我们曾经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一贯的领导下生活、斗争、战斗并取得胜利。

译自《进攻》文集，莫斯科 1924 年俄文版
第 242—284 页。李德容译。

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

我国发展新时期的特点是我们的增长。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也是“当前局势”的特点。我们看到，苏联在国际政治方面有了发展（英、法等国已经承认苏联）；我国的工业（工业总产值在去年增加了30%）和农业（在粮食减产6%的情况下，技术作物的产量增加了19%；播种面积已经扩大，现有的牲畜等等日益增多；农产品的商品部分也增加了）已经加强；运输业有了改善；币制改革业已实行（币制改革预示着抱有取消派情绪的“缺乏信心的人”的完蛋）；国家预算的编制开始得到调整（废除了纸币发行税并且消灭了过去用发行税弥补的赤字）；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增长并且开始排挤私商，排挤的方法不是施加行政影响，而是进行经济斗争，也就是说，首先开展经济竞争，然后在经济竞争的基础上实行计划调整。一条蒸蒸日上的路线显得非常清楚突出。在分析局势并制定我们的实际政治路线时，也应以我国现实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为出发点。

一 经济高涨和阶级配置

我国经济力量的解放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在矛盾的形式中进行的，因此也就蕴藏着一种新型的危險。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谈由于私人资本的增长而发生的危險。这个问题十分清楚，全党也都了解。了解得很不够的是另一个问题：

即关于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直接相互关系问题，关于这两种经济范畴的社会体现者——工人和农民的问题，关于工农联盟的问题（但不是“一般的”联盟，而正是现在，正是在新的、已经形成的条件下的联盟）。在这里首先应该指出下列几点：

1. 新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到使农民能认识其剥削性的程度。国营工业，特别是国营商业，也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到能够从经济上揭露新资产阶级的程度（即处处都把东西卖得比私人企业主、商人、小业主便宜）。因此，农民阶级还没有“投票”赞成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反对私人经纪人。在这里现在还只是进行着斗争。

2. 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显露出来，而且在目前，对立的因素往往比统一的因素占优势（前者统治着后者）。农民和工人的直接利益的差别实际上在哪方面表现得最显著呢？在争取粮食价格的斗争上（如果卖主是工人，这里还应包括争取工业品价格的斗争）。直接利益的差别，甚至直接利益的对立，首先是以买主和卖主双方利益对立的姿态出现的（例如可以比较一下关于“限额”的问题）。

3. 生产力的增长也就是农民经济商品率的增长。因此，正是由此产生出对于直接利益对立的认识，对于分开两个阶级的事物的认识，而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却是“在新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国民经济的增长蕴藏着苏维埃社会两个劳动阶级分裂的可能性（说得更确切些，是这种可能性的一定因素）。

总之，过去工农联盟内部的摩擦是在经济贫困的背景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具有它自己的形式（余粮收集制及因之产生的不满情绪，征收等等）；现在问题是与经济的加强和不断增长的农民生产商品率联系着的不满情绪。

问题的这一而在思想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我们现在只谈经济）？

在工人(不了解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只看到直接利益的工人)这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连串情况: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巩固起来,我们已经把工业(我们的)从停滞状态向前推进了,我们正在为最高速度的积累,为“工业专政”而斗争;不需要对“乡下佬让步”了。为了给无产阶级的工业增光,应该从乡下佬那里攫取尽可能多的东西。迎合农民市场的需要是民粹派的观点,等等。

在农民方面则是完全相反的倾向:城市在掠夺我们,工人活干得很少,我们农民在养活城市和城市工人;应该稍微压一下工人,首先用抬高粮食价格的办法(再说一下,我们暂且不分析这种现象在政治上的表现)。

由此可见,工农双方都能使导致联盟分裂的倾向发展起来,而这种分裂对于双方都会是致命的。不言而喻,分裂的最大危险来自农村。而另一方面,分裂的最大责任则应由联盟的领导力量即工人阶级承担。

二 掌握经济领导权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已经指出(请参看我们发表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的反驳罗莎·卢森堡和杜岗-巴拉诺夫斯基的文章),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不依消费市场为转移的理论是纯属无稽之谈。但是我国工业的消费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市场——这一点是不应该忽视的。战前,全部工业产品的40%和轻工业产品的60%是在农村市场上销售的(尽管沙皇制度进行了“资本扩张”,情况确实如此!)。而且,也不应该忘记这样的“小事”:沙皇制度崩溃的最深刻的真正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内市场容量狭小之间的矛盾,所以沙皇制度企图通过对外征服予以补救。那

些把我们的政策称为“民粹派政策”的人，在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沙皇帝国的社会经济矛盾时不妨想一想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常识。说我们是“民粹主义”或是“农民倾向”的责难，在理论上也是十分荒诞的。要知道民粹主义者硬说，没有“第三者”（例如，农民）根本就不可能进行积累。这种论点是不正确的。但是，不能把这个论点同另一个问题混为一谈，这就是：如果工业已经为农民市场服务并且不能同农民市场发生关系的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体系已经形成的话，那么工业的行情、积累的速度等等就不能不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也将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场”这一情况（这一点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曾有出色的阐述），丝毫没有推翻上述论点，因为应当把无产阶级化同简单的贫困化（赤贫化），同一律贫穷区分开来。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是美国，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是爱尔兰，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沙皇俄国、印度。由于这种情况，美国资本积累的速度最快，爱尔兰则速度缓慢。在国内市场相对缩小的情况下，沙皇制度垮台了。

然而，直到最近，还有许多人不理解这个简单的真理，尽管这种不理解，这种讲求实用的杜岗-巴拉诺夫斯基主义，对于苏联的国民经济来说，在政治上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都必然会成为一种毁灭性的政策^①。

谁专从争取抬高价格，即争取瓜分既有的国民收入的观点来看待再生产以及国营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可以预言，他永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甚至还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

既然共产党人这样提问题，这说明我们这里至少存在着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和消费分配的观点（瓜分既有的、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却毫不关心未来的再生产过程），要不然就是，我们还存在着

^① 例如可以参看 M. 日尔科维奇的《市场容量和价格》一文，载《社会主义经济》1924年第1期第215页及以下各页。

维护工人阶级的狭隘的直接利益、背叛共同利益即共产主义的(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叙述)独特的工联主义和行会习气。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的基本错误何在呢?在于它没有看到整体,没有看到整个国民经济,因此不能了解国民经济各部分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换句话说,它没有看到经济的动态,而只看到它的静态。如果说,任务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在农民和工人之间一下子分完,那么,“真正工人的”政策就会是,要从这项收入中取得最大的一份。但是,这样就再也谈不上再生产的问题,谈不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问题,谈不到工农联盟的问题了。

现实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些前提,另一些目标,另一些任务,另一些路线。

工人阶级现在所肩负的责任是要关心国民经济,关心再生产过程,并且保证这个过程具有正确的(即共产主义的)路线。问题不在于以取得最大利益的方式来瓜分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要提高产量,从而使总的、有待“瓜分”的剩余产品不断地增加。

荒谬的、狭隘的、具有行会习气的“工业”观点,似乎在去年秋季的危机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自行消灭了。实际上,难道我国的工业组织真的不想“为了”工业的最大“利益”从农村消费者那里夺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吗?结果怎样呢?它们虽然有一两次(出卖少量的东西)而收益甚多,结果却陷入了绝境:市场缩小了,销售的危机掐住了工业的脖子,再生产过程停顿下来。可是,只要一压低价格,就会出现下列情况:1.工业发展速度大大提高,开始求过于供;2.工业利润并没消失;3.积累的速度加快;4.与此同时,农业也开始更快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5.结果是经济获得全面发展。

然而,却有这样一些聪明人,他们写道:

“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没有扩大,也不会扩大工业品市

场的总容量。”^①

现在，问题在什么地方已经十分清楚。经济政策的全部策略就在于要迫使（“动员”）那些弃置不用、成为“死资本”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主要问题就在这里，而绝对不能把瓜分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当作唯一的任务。相反地，“瓜分”本身，即分配问题，必须服从再生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剩余产品的总量才会增长，也只有这样才能既提高工人、又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在破坏工业的国内市场的情况下是不能把潜在的能源储备动员起来的。因此，去年秋季需要从降低物价着手，否则，“增加产量”是不可能的。

可是，某些同志却写道：

“摆脱现时处境的出路，不是降低价格，而是增加产量。”^②好象不用销售已有的产品就能“增加产量”似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观念：人们不懂得，整个问题往往在于动员受束缚的经济因素发挥作用，使之开动起来，保证这些因素的互相影响，使这些因素能够相互作用，由此产生的结果将是生产力的发展，亦即剩余产品的增长，亦即“瓜分”时所得的“份额”也绝对地增加。顺便说一句，“新经济政策”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意义就在于此。

顺便指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在我国，再生产最有利的客观条件是与领导阶级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相吻合的。这种情况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是不存在的。在取得政权以前，工人阶级的长远的、共同的利益并不是要维持社会的统一和掩盖社会的矛盾，而是要破坏这个社会。正因为如此，诸如彼·巴·马斯洛夫^③一类的“超阶级的”理论家的一切牢骚，他们维护国民经济的客观利

^① 前引杂志，第221页。

^② 苏尔丹·扎德，《销售危机问题》，载于前引杂志第212页。

^③ 例如可参看彼·马斯洛夫：《世界社会问题》。

益、放弃阶级的自私自利、保持和保证社会统一等等的号召，在革命时代的条件下从来都必定成为机会主义者的空话。在另一个时期，即在工业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的时期，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些前提下，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和长远的利益是同在社会化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生产最大数量的产品的条件相吻合的。

因此，注意农民市场容量的大小，关心农民市场容量的扩大等，不但不意味着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相反地还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和长远的（即革命的）利益提到首要的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谁不这样做，谁实际上就是在捍卫行会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但会造成同农民的分裂，而且在不久以后还会使工业的发展陷入绝境，因为农民市场缩小，则工业必然会停顿下来。

问题还有另一方面，这也是具有高度原则意义的一个方面。实行专政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决不鼓吹无产阶级的永恒王国。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消灭阶级。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时刻都在执行这样的政策，即力求把农民阶级提高自己的水平，从经济上和文化上改造农民阶级，溶化农民阶级，使农民阶级本身在无阶级社会中自行溶化。当然，这是“未来的音乐”。但是，革命的工人正在努力达到这一点。相反地，工联主义者、行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无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仅仅把农业看作国内的殖民地市场，并且认为，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王国将是永存的。这种“观点”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比较具体的提法上来。这么说吧，工人阶级应该保证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对于我国经济政策的各项任务，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一些促使经济体系中社会主义成份相对增长的措施。

解除对对立力量的束缚,只能看成是一种手段(因此,举例来说,不能把经济命脉交给外国资本,虽然生产力“一般”会因此得到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现在我们要谈谈关于保护关税政策和进口外国商品的问题。比如说,谈谈进口拖拉机的问题。

一种最简单的、“真正工人的”、“无产阶级的”、“工业专政的”意见大体上是这样一种意见:不许进口拖拉机,因为这会毁灭我国的拖拉机制造业,会破坏我国金属工业的发展的。给我们同样多的钱,我们差不多也能造出同样多的拖拉机来。即使国外给你们贷款,那也不能进口拖拉机;不能摧毁处于萌芽状态的我国拖拉机工厂。

这样的论据是否正确呢?绝对不正确。因为它过于简单了。在这里简单确实比盗窃还糟糕。我们假定,对于拖拉机的实际需求总数为5000台。假定在国家的现在可能的投资条件下,我们本国的工业只能生产1000台。我们再假定,从国外赊购多少拖拉机都可以,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所短缺的4000台。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进口这些拖拉机呢?

当然可以,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因为这样我们就能改变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从而也能改变工业本身的发展速度。

进口的拖拉机能起什么作用呢?进口的拖拉机能立即提高农业的产量。这意味着,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提高对于工业品(不论是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农产品的出口;拖拉机本身也将提出对许多工业品,例如对石油的需求;对石油需求的增加,又会对许多与石油生产等等有关的部门发生作用。而归根到底,这一切又产生了对于拖拉机的追加的需求。因为农业和出口等等的普遍高涨,越来越快地扩大了对拖拉机的追加需求。认为需求量不变,甚至认为积累速度不变观念,是完全荒谬的。换句话

说，不是消灭国内拖拉机制造业的基础，而是使之及时赶上去，只要生产规模一扩大，就可以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商品流转中去。这样，进口拖拉机的百分比也就会逐渐地减少。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拨款提供给本国的拖拉机制造业，因而自己只能生产很少量的拖拉机，又为了“原则上的”纯洁性和“神圣的抽象性”而保护工业，不进口拖拉机，那我们就会因此而放慢积累的总速度，从而也就放慢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且不管乍一看这是如何离奇，其中也包括放慢社会主义拖拉机制造业的发展速度。

这种政策之所以错误，仍然是由于不了解工业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产物，国民经济的这两部分处在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状态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应当得出的结论是苏维埃国家必须掌握经济领导权。只有当农民也看到以较快速度发展的好处，即看到：（1）工业品降价过程和农民市场的日益饱和；（2）有高度效能的农业生产资料在农民市场上出现；（3）苏维埃国家在当前农村生活的一切文化经济问题上握有主动权，这时候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由于价格问题的暴露而产生的摩擦才会停止和完全消除。这个任务必须提出来。这个任务必须予以解决。

三 目前局势下的经济和政治

如果工人阶级的经济领导权有了保证，那么，毫无疑问，它的政治领导权，即它在苏维埃社会中的专政，也将会得到保证。

我们在研究纯经济关系时分析过的那些摩擦，在政治方面也有表现。通过什么形式呢？用什么来弥补目前正在某些地方作为一种征兆出现的政治上的裂痕呢？

让我们记住，必须注意到这里还有一种恰好把这种“裂痕”同以前发生过、已在共同斗争进程中弥补了的裂痕区别开来的特殊点。这里的新的现象就是增长。这里指的是，在各类农民中间，即在富农、中农以及虽苦于农村人口过剩但在文化上逐渐成长的贫农中间政治积极性在增长，有了组织的愿望以及不断增强的主动精神。

由于经济结合做得不好，由于无产阶级没有掌握经济领导权，有时就会产生摆脱共产党人和共产党苏维埃的领导作用的愿望，就会产生建立一些反对或“纠正”共产党人和共产党苏维埃的特殊组织的要求，等等。同时还会出现埋怨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城市等的领导作用“不公正”，他们“压制”大多数农民的想法。不言而喻，这种思想及相应行动（如果有行动的话）的急先锋，是富农和农村高利贷者之流。他们确实由于不可能进行土地投机，由于劳动法典及其他无法无天的东西而受到压制。但是他们进行鼓动所依仗的是全体农民对于价格的不满情绪。他们还依仗我们经济和政治管理方式方法的陈腐过时，这种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经济关系，不能成为“发展的形式”。

我们的经济在成长，在复杂化，在发展，一句话，在前进，这一点看来是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的。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政治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既然在它下面“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它是不可能停留在原地不动的。

决不应该由此得出必须改变政权的阶级内容的结论。所有那些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新孟什维主义和新社会革命党主义的好喊喊喳喳的人物同弗兰格尔分子、米留可夫“民主派”和其他“民主派”合在一起曾不断地发出这样的预言。孟什维克的冒牌马克思主义所依靠的是资本在国家经济中“必然”胜利的前景。这样的预言在我们这里确实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此，我们丝毫也

不害怕孟什维克的这些狂吠的政客。

但是，在这一阶级统治的范围内改变这种统治的形式和方法，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难道管理的方法和形式没有改变吗？难道“全俄肃反委员会”没有改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吗？难道没有听到关于“苏维埃法制”的呼声吗？难道“苏维埃法律”规范的整个体系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吗？如果从狭义上把专政定为不受任何成文法律约束的政权，那么苏维埃的专政毕竟还受它自己的法律的“约束”。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因为适合于被围时期的经济，适合于征收、余粮收集制和国内战争的专政的形式，原来对于曾经宣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新时期来说，是不适合的，是矛盾的。

目前需要什么？需要使苏维埃制度加速“正规化”——这是第一。

经济刺激、经济预测和经济核算的作用，将随着农民从消费性的自然经济向生产性的商品经济的过渡（他们现在一直沿着这条道路飞快地前进）而不断提高。农民越来越合理地看待经济问题，各式各样的行政专横、“机构中的小缺点”、行政处理上的因循拖拉、敷衍塞责和荒唐无稽，将会使农民感到越来越痛心。战时共产主义方法的残余同农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必须消除。农民应当享有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权利，苏维埃法律，而不是靠现在还不知在什么地方的“控诉局”来抑制的苏维埃的专横。应当永远懂得，上边的行政干涉在下边就表现为严重的经济灾难。整个经济生活调整得愈好，就愈尖锐地感觉到各种违反现行苏维埃法规制度的独断专横的干涉。应当坚决地以“制度”取代“专横”。

说到这里，还出现一个吸引农民参加工作的问题，特别是谈到

苏维埃工作的时候。由“革命委员会”或“党支部”进行管理的方法，在战争时期曾经是适宜的。现在再用这种方法就不行了。在下边也还需要有这样一种管理形式，它能保证精确地订出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共同规范，它能保证摸透最广泛的农民阶级的心情、需要、诉怨和要求，它会有助于吸引最积极的分子参加苏维埃工作，把管理国家的一部分责任放到这些积极分子的身上，用当地事务和当地需要的经验培养他们充当管理国家的角色，并吸引他们讨论愈来愈广泛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问题。而这一切，只有在县、乡、村各级苏维埃活跃起来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些苏维埃应该成为认真仔细研究问题的小型劳动“议会”。当然，推行这种政策需要化费很大力量去“进行说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国各级党组织只能并且只应这样来对待农村的工作。

* * *

这就是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主要路线，本来还应该谈谈狭义的“文化”工作。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前已经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现在只提出一点，即积极性日益增长的农村群众有权要求我们占领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部制高点。不这样，我们就会被富农或反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从后方迂回包抄。

党应该采取坚决的加强工农联盟的方针。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采用新的方法行动，给工人和农民开辟沿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条主要路线前进的道路。

第一次发表于1924年。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4年第14期第25—35页。

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 如何毁灭工农联盟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

任何历史转折往往都会引起思想争论，这些争论起初是由完全“偶然”的原因爆发的，沿着“偶然”的方向发展，初看起来完全是一种莫明其妙的东西。只是经过一段时期，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花纹才显现出来，后来的分析会毫不费力地揭示出十分明显的阶级的或派别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有着十分明显的社会意义，并且起着十分明显的社会作用。

我们现在来重新观察一下我们革命发展中的某个转折点。封锁结束，得到许多国家的承认；同时出现了世界革命发展迟延现象。开始了相当迅速的经济高涨，同时出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新的相互关系。一句话，新的形势。党内对这种新的形势有所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立即达到那种所谓的“自觉”程度也是理所当然的。

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了《十月的教训》。看来，这纯属文坛争论。但这种文坛争论发展成了全党的政治运动。把这看作“个人”的争论是令人奇怪的。难道“个人”能够激起那种讨论、辩论的热情吗？显然，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能够促进争论、成为争论的基础的某种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在初期表面上是以“文坛”论战的形式出现的。

过去是那样。而现在已经看得相当清楚，这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全党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同国

内容客观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符合”这种形势，并且是由此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全党现在苦于去分析象“不断革命”问题那样的看来是“不切实际”的问题。新的形势要求制定周密的方针。因为新的形势是在发展的基本方面（外部世界，经济，国内阶级）形成的，所以党提出某些总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是全面地深入地通盘考虑我们的道路的表现。

这种情况表现在，个别的问题和个别的意见分歧现在已联结成基本的“理论”枢纽，联结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联结成较为严整的“理论”。在上次辩论中提出的零散的问题：币制改革和党内新老两代人的问题，价格问题和“机关工作人员”问题，“剪刀差”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计划”问题和“商品干涉”问题——这一切现在都归结为某些基本的方面，碰到了象不断革命论、对我国革命动力的估计、对我国革命前途的总的估计等这样一些总的问题。而所有这些本身极重大的问题所围绕的轴心就是工农联盟问题。

工农联盟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独创性的特征。对列宁的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对布尔维克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避而不答的任何企图都是枉费心机的。这里应当作出选择。这就是党对托洛茨基的著作反应如此强烈的缘故，因为党在这里看出了（十分正确地看出了）对列宁的理论基础进行修改的企图。

这些企图早已有之。但是这些企图过去并没有被察觉，因为当时处在战争时期，面临的一切任务都是直接的军事行动的任务。现在，正是现在，任务变得复杂得多了。不言而喻，当有人在吸取“十月的教训”的借口下，力图给党下一剂反列宁主义的重药时，党就激烈地予以抵制。

我们这里暂时出现了革命运动的某种沉寂时期。列宁认为，这不是致命的东西；我们拖着农民的笨重马车缓慢地前进。其实，列宁不是按照死板的公式来下断语的；工业发达，就可以进行无产

阶级革命，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灭亡。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我国革命的独特性，强调使我们能获得胜利的各种历史条件的特殊的配合（例如，参看他评尼·苏汉诺夫小册子的札记）。而托洛茨基同志呢？如果世界革命不是很快地到来，托洛茨基同志就只能看见灭亡。为什么？

因为存在着基本的区别，区别在于对动力的估计。

要知道，托洛茨基同志在 1922 年坚持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时写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1905年》，序言，第 4、5 页）。

列宁教导说：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冲突根本不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教导说：这种冲突必定会发生。列宁教导说：同庄稼汉和睦共处，我们就能得救，这点完全可以做到，甚至在西方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种关系也可以保持和巩固。托洛茨基则持另一种看法：如果世界革命不会很快到来，无产阶级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会在曾经协助它取得胜利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打击下灭亡。在列宁看来，农民在整个过渡时期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必然的同盟军，虽然是爱发怨言的同盟军；而在“不断革命论者”看来，农民必定会变成敌人，在列宁看来，从这里将产生的并且与此相联系的是特殊的“农业-合作制”社会主义的理论；持另一种立场的人对我国今后发展的道路的看法则完全不同。

在存在着这种根本区别的情况下，这种区别在一系列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必然暴露出来，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当然清楚。但现在已经产生了把这些“特点”、这些偏离列宁路线的观点汇集起来

的企图。我们想在这里分析一下这种反列宁主义概念的经济方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著作《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8册）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这部从构思上和问题的提法上都很有趣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在理论上是从类似托洛茨基同志的前提的前提出发的（这一情况只是表明，这里的问题也许不单单在个人）。因此，它是从理论上不正确的前提出发的。同时这一著作作出了一系列的实际政治结论，这些结论对我们的党来说，对工人阶级来说，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就是想在本文中，把这部理论著作当作不正确的、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工联主义的、行会的意识形态的典型来批判。

一 共产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王国”？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发现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的内容如下：

“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社会主义？——尼·布·）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愈小，就是说，社会主义积累就愈不依赖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相反地，社会（社会主义？——尼·布·）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农业这种形式的物质遗产愈大，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比重愈小，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愈要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即减少对后者的剥削，那么，社会主义积累

的重心就愈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依赖于自己的工业和自己的农业的剩余产品。”（所有的着重号都是我加的。——尼·布·）

这就是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基本规律”的表述。我们在这里暂时没有触及“规律”的实质。但是我们注意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下面两个论点，这些论点初看起来只象是术语不确切或是独出心裁地在文字上卖弄一番。

第一个论点：社会主义积累在某种程度上靠剥削小生产者来进行。

第二个论点：这些小生产者（即他们的经济的统称）无非是无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①，首先，我们应当研究一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这些论断。我们在这里完全有权大声疾呼“救命！”因为这些“文字标签”同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切传统竟矛盾到如此地步。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做也许会好得多：平心静气地分析这些东西并看看在这些标签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又为什么这些标签实际上无非是一整套对工农联盟的意义和命运的特殊观点的表现。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他的著作的一处写道：

“只有对理论完全漠不关心的时候才能够把社会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看作同资本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完全类似的东西。”（第90页）

这个见解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加任何批判和毫无保留地使用不可容忍的错误标记并玩弄类比法时，

^① 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叙述中不完全清楚，这里包括的只是以前的殖民地的农民还是所有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实际上，这无关紧要。因为，比方说，除大俄罗斯外，我们这里包括的是大量的农民。毫无疑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工人国家里看到了殖民地。

他自己就暴露出“在理论上完全漠不关心”。其实，正象我们下面将指出的，这里岂止单纯的“玩弄”。

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无产阶级剥削小生产者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正是这样描述的：工人阶级骑在小生产者身上。从而工农两阶级（基本上）社会的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关系。无产阶级是剥削阶级（而这在经济上是很好的），小生产者阶级是被剥削阶级。正在完成社会主义变革的国家愈落后，无产阶级的剥削性质就愈明显，因此，小生产者就愈是被剥削者。

大胆描绘的情况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如果认真（我们认为科研著作应是认真写的）对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表述，情况必然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工业是否能从小生产者那里得到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呢？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说来，是不是这里的价值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手中呢？是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是否能够最粗鲁地用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类比法（“理论上的漠不关心”）把这种特殊的关系称为剥削关系呢？是否可以根据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称为剥削阶级（从上面的论点必然得出的结论）呢？

不能！千万不能！倒完全不是因为这“很难听”，或者我们在这里在我的勇敢的朋友大胆地用事实本来的名称去称呼这些事实面前表现出思想上胆怯。而是因为这些“名称”同客观实际和我们的历史任务不相符，甚至相矛盾。

确实如此。我们来看看实际的和不容争辩的剥削关系，比方说，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是表现一定生产方式的一定生产关系。资本家阶级获得剩余价值。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整个过程经常地再生产（而且在扩大的基础上）这种剥削关系。换句话说，这里积累的职能在于，经常再生产出剥削关系。价值从一个阶级手

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这就会经常扩大阶级对立，就会经常再生产出资本主义主人和他的雇佣奴隶之间的关系。在任何剥削者的社会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情况。我们要重复说一遍：在任何剥削者的社会中。

价值从小生产者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工业手中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截然相反趋向，也就是克服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之间的对立的趋向。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要去巩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去消灭这些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及其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外围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对立的消灭也就进行得愈快。

是否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作剥削小生产者的过程？不行。因为这就是忽略过程的全部特点，不理解它的客观意义，玩弄类比法，用作者的话说，暴露“在理论上漠不关心”。而忽略过程的特点也就意味着不理解其历史实质。这可以说是理论上很大的“致命的”罪过，这种“罪过”必定反映在“有罪者”的实际的、实用的理论上。

现在来谈谈“殖民地”问题。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显然把殖民地的概念当作“第三者”（民粹派和卢森堡赋予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含意）的统称。这个含意应用到资本主义制度上是合适，还是不合适，这当然是可以争论的。但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提它，尤其没有必要去分析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否把殖民地理解为事实上已是殖民地的组成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经济的统称，或者是所有的小资产阶级经济的统称，这并不那么重要。问题在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毫不羞愧地把这个概念应用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换句话说，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来，在这个时代里，从经济观点来看，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中有无产阶级的“宗主国”，在农民经济（虽然不是全部的）中有小资产阶级“殖民地”。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也就是按

照残酷的剥削者同殖民地的剥削对象的关系确立的。正象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观点”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关于“剥削”的论断是“浑然一体”的。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偶然说错了话，不是失言，不是“表达不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有他自己的连贯性，有他自己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和这种“连贯性”是系统地发展起来的错误的逻辑和连贯性。

事实上，殖民地的概念的实质在哪里呢？在于它（殖民地）是剥削的对象；在于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它的发展经常停滞；在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经济和政治奴役的对象。殖民地从来不是“宗主国”的盟友，“宗主国”从来没有提出把殖民地提高自己的水平作为自己的任务，如此等等。

但是既然如此——而的确如此，那么，断定农民经济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外围就是无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这简直太可笑了。这是非常清楚的，大概不必进一步去思索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表述会是正确的。那就是当所说的不是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而是向永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向保存无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向无产阶级蜕化为真正的剥削阶级迈进的时候。那时剥削的概念应用到这种制度上是绝对正确的。指出小资产阶级农民经济是——不客气地说——“无产阶级的”殖民地也就会是同样正确的。

这是一个可怕的梦，但愿上帝保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文章中透露的特殊的行会的、工联主义的一整套观点可惜不是建筑在真正的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只不过是某种个人的理论上的标新立异，这种东西至少现在在我们队伍中是没人相信的。

二 “吞没”小资产阶级经济 还是对它进行改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还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和私有经济(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经济)之间的关系,他写道,有人荒谬地认为,似乎“包括在一个国民经济体系内的社会主义体系和私人商品生产体系可以在完全保持经济上的平衡的基础上同时并存。这种平衡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因为一种体系必定会吞没另一种体系。这里有可能:或者后退,或者向前发展(“向后发展”不是发展。——尼·布·),但停留在一个地方是不可能的。”(第78页)

如果把这个地方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那个其中说到“自己的(即无产阶级的)农业”的“基本规律”公式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了解,“基本规律”的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中的必然胜利是怎样设想的。国营工业破坏和排挤(“吞没”)农村的小经济,后者由无产阶级“自己的农业”取而代之(如何取代暂时还不十分清楚)。小经济通过系统的剥削(不等价交换,税收和各种不同的超经济的强制办法)被破坏(“被吞没”),而无产阶级则按照同原始积累的骑士相似的办法行事。

如果前途是(确切些说,如果前途可能是)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描绘的那样,我们会关心农民经济那才真是奇怪了。不过,在这里展开这个话题嫌早了点。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我们真是必须通过破坏(“吞没”)农业小生产而前进吗?这样做对吗?

我们认为,根本不对。我们认为,这个完全不是列宁式的(我说这个决不是为了枯燥无聊的论战)提法绝对不符合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既定道路。

现在我们提出什么,首先以什么为目标?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

列宁为了把小生产者变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公社社员究竟提出了什么计划，提出了什么天才的政治路线？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而是在有其银行、有其信贷、有其工业和运输业等等等等的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之下的农民合作组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否同意这个计划呢？

如果他不同意，他就必须提出一系列的理由来反对这个计划的“空想性”（或者什么别的东西，——这我们还不知道）。如果他同意，他的全部理论就毫无用处了。

因为本来就“象橙子树一样”清楚的是，在这个场合下问题根本不是消灭，根本不是吞没（通过“剥削”并且按照原始积累时期的方式），而是在农民经济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造它们。而这完全是另一种调子的歌曲，决不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唱滥了的“可怕的无产阶级的”（实际上是行会的）“歌曲”同出一辙。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里也玩弄同资本主义发展类比的方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里完全不懂得恰恰对他首先论述的农业国来说的过程的基本特点。我们使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及其机构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过程，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社走向那里的^①。

正象已指出过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虽然列宁的文章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黑的和白的都别买，
‘是’与‘否’都别说。”

^① 这里只指出了基本过程；当然，农业公社、劳动组合以及其他生产组织也将起自己的作用。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没有坦率地说“是”或“否”。

实际上他说“否”。

但是，在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小地方，“否”字说得相当坦率，虽然不无胆怯。关于这方面，他是这样写的：

“至于说到……国营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间的直接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完全可能和应当把象一般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样的新东西带到人类社会的经济史中去。国营经济使新资本主义服从自己时，也就使它的（原文如此）属下即再版的资本主义赖以产生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成分服从自己。但是除此以外，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小生产和国营经济之间的直接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的实质应当由下面这一点来决定。小生产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仍旧是小生产；另一部分按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合作化；第三部分绕过后面那种过程在某种（1）新的合作化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种合作化是小生产不通过资本主义也不通过国营经济简单地吞没小生产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作化的新形式（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看来是它的支流之一）还有待于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对那种还不存在而只有待于产生的东西进行理论分析。”（第100—101页）
就是这些。

首先，这里简直被奉若神明的伟大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谦虚使我们感到吃惊：他没有同提出了一个同时既是宏伟计划又是理论预见的列宁进行争论，他“只不过”声称，不能对“那种还不存在而只有待于产生的东西”进行理论分析。我们认为，这是诡辩。因为我们在我国刚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积累（不是吗？），在其他国家这仅仅“有待于产生”。然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明明已经急忙抛出了这种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基本——请注意！）。而这个基本规律说的是关于积累的运动，关于各个国家的积累以

及其他等等。所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那么谦虚完全是白费力气。不能自圆其说！

那么，实际上呢？

实际上，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来，农民经济是朝三个方面进化的：

1. 小经济“仍旧是”小经济。

2. 小经济通过资本主义合作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

3. 小经济通过暂时还不清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道路实现合作化而农业劳动组合和公社是它的萌芽。

首先，我们非常惊讶地指出，这里没有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列宁的合作制的地位。这里没有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即通过它我们凭借我们的命脉就可以把大量农民拉入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那种合作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反而提出了按其意义来说是次要的直接生产的“农业公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不见最主要的东西。

其次，国营经济将“吞没”谁呢？

显然不是公社。

按资本主义方式合作化的农民？

但那只是其中的某些少数。

真正的经济上的“社会化”应采取的下一个主要方法是“吞没”的方法（正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方面所说的，“干脆由国营经济吞没小生产”）。这就是对待大多数小生产者的方法。

是否应当说，这是道道地地的空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里没有看到那些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提出来的道路的特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认为，在无产阶级的政权下，农业进化的规律仍然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样。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作家所宣传的“非资本主义的进化”（“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成了现实。如果在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银行、资本主义信贷、资本主义组织人员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的条件下，农民群众（甚至群众）的合作组织必然“长入”资本主义，那么，在存在着无产阶级的命脉的情况下，在存在着无产阶级政权、银行、信贷、工业、人员、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等情况下，这些组织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将来完全不会往那个方向“长入”（现在实际上也不是往那个方向“长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了解这一点。但他在这里也有特殊的逻辑：“吞没”的思想同“剥削”、“殖民地”等等完全符合。这仍然完全不是那个调子，不是列宁的调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

三 阶级奴役还是阶级联盟和阶级领导？

在分析象苏联这样的国家里的力量对比时，应当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关系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另一种关系。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但同时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集中的权力领导农民。工人阶级“依靠”农民，因此，不能把它的专政看成是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那种类型一样的对农民的专政。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实际上正是那样看问题的。

我们的国家从准确的意义上说不是“工农”国家。而是工人国家。但是，工人国家依靠农民，——关系很特殊，因此应当在这种特殊性中“从理论上掌握”它。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恰恰没有掌握这个特殊性。

他的全部分析是建筑在同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的类比上的。那里是掠夺农民，而这里是则“剥削”。那里在这种掠夺的基础上形成了新事物繁荣的前提，这里社会主义积累规律也要求类似的前提。那里急剧地“吞没”旧的形式，这里的情况也一样，如此等等。

一句话，完全象在最融洽的家庭里！

但只是实际上一切并不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和“可亲可爱”。

在此以前我们是从分析各种经济形式的观点来谈这个问题的。而现在我们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尖锐地提出问题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出发点是，他把原始积累的骑士同小生产的关系和无产阶级同小生产的关系进行类比。

但总的来说，难道这不是可怕的类比？我们这样说仍然不是由于害怕现实及其可能有的“坏”味，而纯粹是出于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客观实际的愿望。

我们唱着各种关于工农联盟、联合等等的调子。因为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反对这种联合。要知道在我们的队伍里，这似乎被认为是公理。不是吗？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何时何地曾经谈到过这种积累的骑士同他们的牺牲者之间的联合？但愿哪位人士指出即使是某种相似的东西。

谁也不会指出。因为没法指出。因为这种联合的假设本身就是荒诞的假设。

而在我国，工农联盟过去是，现在是，我们希望将来还是现实的东西。

怎么能够作出这样的类比？怎么能够在这种类比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的理论，然后——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决定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

因此，仍然是这样的情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这种“类比”同上面分析过的他的论断“浑然一体”（不难看出，如果党接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种思想体系，党就会破坏它自己的力量——工农联盟）。

如果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类似之处，寻找同工农之间的关系相类似之处，那就根本不必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寻找过的地方去找。让我们自己努力去寻找吧。

现在工人阶级手中有政权和工业，农民手中实际上有土地和农业^①；农民是农产品的出售者和工业品的购买者；一般说来，工人则相反。正是在这方面直接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况且农民是旧时代的残余，虽然按其比重来说是很大的“残余”。

这根本不象积累的骑士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象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在他们关系发展的一定阶段中的相互关系，当然，即使在这里类比也是很有条件的并且远非全面的类比。

资产阶级手中有政权和工厂。地主手里有土地。利益的冲突发生在价格方面。由此可见他们的斗争有时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相当尖锐的。但同时（我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期）存在着联盟，即资本家和地主反对工人阶级的联盟。资产阶级领导这个联盟，资产阶级依靠地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些阶级近来的发展情况如何？情况是这样的：通过流通过程，通过银行，通过股份公司的形式等等，双方（即工业资本家和地主）在某种程度上都开始变成某种同样的东西，变成红利的获得者。红利首先可说是各种各样的收入的综合，——在我们所分析的关系方面，发展的基本趋向至少过去（和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从广泛的历史时期来看，工农联盟也有形式上相似之处。随着农民经济通过流通过程日益走上社会主义轨道，阶级界限将消失，将淹没在无阶级的社会之中。

当然，这是未来的音乐。当然，现在提上日程的是另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前途，以便了解我们想要“追求”的目的是

① 虽然土地从法律上讲是工人国家的财产这一情况具有很大的意义。

什么。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前途是根本不正确的。

四 工农联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同志的经济“政策”

根据上述理论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出了实际政治结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确认”必须“吞没”不幸的“第三者”，即“国内和国外的殖民地”居民，他写道：

第1条，“因此，我们来看一看看在我们的条件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第三种情况，也就是有意识地旨在剥削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的价格政策。”（第79页）

请读者原谅我们下面作这样冗长的摘录，我们毕竟不得不这样做，为的是认真地考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发展过程。为了便于逐一进行批评，我们从上述引文开始，对作者的各个论点编上专门的号码。

第2条，第59页。“无论如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经济包括农民经济的资源而自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的东西，而是从靠国家整个经济包括小经济的合理化而保证小生产得到的更多的收入中拿得更多的东西。”

第3条，第69—70页。“从私营商业那里夺过来的东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充作国营经济的基金。我所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因为这里的贸易政策可能不利于社会主义积累，而有利于那些竭力减少从他们收入中的扣款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者。这种政策是否合理，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一政策从经济

上说无疑意味着缩减社会主义积累的基金和给私人生产的赠礼，国营经济愈缺乏资本，在按其收入额来说是慈善事业(!)的商业中占用那部分生产本身所缺少的资本对它愈不利，赠礼对它就愈沉重。”(着重号是作者本人加的。——尼·布·)。

第4条，第99页。“向私有经济剩余产品扩展的(当然，在经济上可能和技术上可以达到的界限之内)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不仅本身是原始积累的工具，而且是这种积累的固定的后备，可说是国营经济的潜在基金。”(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尼·布·)。

因此，(1)应当实行剥削农民经济的高价政策(从社会主义积累观点来看这是重要的)；(2)这里应当(第4条)拿取经济上可能的和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一切；(3)但是，必须把“经济上可能的”(非常不明确的用语)政策理解为决不拿比资本主义拿得更少的东西的政策；(4)这样的政策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给农民的赠礼，是工业的损失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这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价格政策”方面的概念。“买贵一些的!”——这就是建筑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基本规律”之上的全部奥妙。

我们且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歪曲“党的”政策的这种奥妙放在批评的放大镜下看一看。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关于我党小资产阶级政策的第2条引文(因为大家都看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正是对准我们党的实际政策从弓弦上射出了他的分析批评之箭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思想在这里包含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不能以拿得比资本主义更少的东西为宗旨，第二个论点：我们将拿更多的东西，因为农民的收入将会更多，之所以会更多，因为农民的经济将会更加合理化，从而将会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第二个论点中有许多从好的意义上说是合理的看法。但这第二个论点同所有其他的论点相矛盾，

它是对列宁学说的无意的贡献，是隐设在作者庞大的反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贡献。

的确，如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我们将拿更多的东西，因为农民经济的收入将更多（“合理化”等等），那么，这同“吞没”理论怎样协调起来呢？其实，这里存在着令人吃惊的矛盾，而且决不是辩证法的矛盾，而完全是普普通通的矛盾！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实行“殖民地的”路线——剥削，攫取“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一切；那时我们将会使农民经济衰竭，会使其收入降低，会使农民经济消失和受到破坏，会使它被“吞没”。但那时没有地方会出现“更多的收入”、“合理化”以及“恩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三言两语给小资产阶级生产者许诺的其他东西。

或者无产阶级国家在农民经济的合理化不断发展和收入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确实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这的确是正确的政策。但那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论点都应当推翻。任何“吞没”小资产阶级经济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当然，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中农经济的主要部分，同时这不排斥由于人口过剩被推向城市和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也会发生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而使小经济部分地消失）。它们会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发生变化，变形。收入不断增加、合理化不断发展等等同时也意味着通过合作制把这些经济纳入我们社会化经济的总体系，应当坚持的不是消灭的方针，而是吸引农民经济参加国营经济体系的方针。

但如果我们随着收入的增加“将拿取更多的东西”，显然，我们决不是对农民经济中的“积累”（我们把这个术语放在引号内，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特殊术语）问题漠不关心。而如果我们也关心这种积累，那么，我们就不能局限于“尽可能拿得多些”的口号。我们也就不能象谈论“技术上可能的”那样来谈论“榨取”的界限。也就不能说给小资产阶级的“赠礼”对社会主义来说是沉重

的。我们也就不能说慈善事业等等。我们也就不能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极其简单化地表述这一问题。

在第3条“论点”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把全部问题归结为算术的加法、减法和除法问题。瓜分现有的东西，为的是使无产阶级工业获得更多的东西。从农民经济中扣除。不能扣得少，因为这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工业那里作了扣除和给农民经济增添了东西等等。

但是要知道，所有这一切是真正幼稚的“高明”，而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高明”。

因为问题决不局限于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在这里撇开私人资本）瓜分现有的“国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这里，不在于此。这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国民收入”，即提高生产力，而且要采取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那种形式。

而这是一个根本不能归结为对现有的储备进行简单的分配，对现有的数量做加法、减法、除法的那种问题。

因为任务在于经常提高这个“国民收入”的“现有数量”。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问题必然作为同农民经济中的“积累”问题相联系的问题提出来的缘故，农民经济是工业的市场，并且是属于纳入国营经济和逐步改造的经济单位的总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甚至没有提出国内市场容量的问题。然而这是我们经济的中心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只在他的著作中的一个地方写道：

“国营经济在这条道路上（即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道路上。——尼·布·）遇到的障碍并不在于它没有经济力量来实行这个政策，而首先在于私有经济的购买力很弱。”（第80页。着重号是

我加的。——尼·布·)

再没有别的话了。然而，看来正是对这个问题应当认真考虑一下。

如果这种“障碍”是存在的，是否可以不重视这一“障碍”呢？假设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愿望，我们不“从社会主义工业中”“扣款”，不搞“慈善事业”，而不顾“障碍”，推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路线”，坚持它“到最后胜利”。我们必然会得到什么结果呢？需求缩减，销售危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进行缓慢，工业凋蔽等等。换句话说，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反慈善事业的”以及其他的立场出发，完全会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错误的方法论上的根源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他把问题看成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瓜分现有的东西，而不是变化着的东西）；第二，他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工业，而不是把它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他的全部“联系”只在于扣款；他不了解，在农民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的函数）。

不客气地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而且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喂养母鸡就是搞慈善事业。出色的经营妙计！

但是，对无产阶级来说，农民是应当变成人的那种“母鸡”。而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事业，应当全力帮助他们。看不见这个目标，就是没有认清工人阶级的基本革命任务的特殊的机会主义者，是在这方面不会划算的怪客人，是害怕向流通领域投入一个戈比（似乎这就不会丢失！）的守财奴。应当采用最高的价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应当采用能保证社会主义工业不仅在一个经济年度得到日益增长的收入的那种价格，同时力求不断降低价格。而这种价格

政策不是建筑在简单化的公式的基础上：拿取“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一切。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价格政策的基础的庸俗观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本人感到自己的观点有弱点，他在一个地方说：

“（我有意不说‘在提高价格的基础上’，因为不仅在降低价格时可以征税，而且我们恰恰是在降低价格或者有时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征税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产品成本降低的情况下，降低的价格并不等于降低的成本的总数，而是小于这个总数，其余部分则充作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第 80 页）

但就是这个孤零零地隐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括弧里的、使作者的“工业”热情“减轻”的小地方也于事无补。

那么，请告诉我，难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这种“让步”，即“我有意不说：‘在提高价格的基础上’”，本身不是很奇怪的吗？

当然！未必能找到哪怕是一个会给自己提出年年月月经常提高价格任务的小地方。未必有谁会捍卫在自己的旗帜上公开写上这个目标的可爱的制度。也未必能找到一些会容忍这制度的傻瓜。所以，当着上帝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这个宣言给人留下了奇怪的印象。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描绘了价格降低或价格不变的前景。我们说：应当竭尽全力使价格降低，使我们这里不再有经济停滞，这样一来，结果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得胜利，因为在全国将有快得多的积累速度和特别快的社会主义工业积累速度，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业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和依靠整个国家机构的巨大而集中的力量。

对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慈善事业”说几句。列宁说：

“实在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

的工作做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因此，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尽量少卖聪明，尽量少耍花样。”（《论合作制》^①）

稍往前一些：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同上）

列宁说，我们应当竭力向农民表明我们的生产比资本主义的更便宜。引用列宁的这句话是多余的。

任何不抱成见的读者都会看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发挥的一系列观点同列宁关于工农经济联盟的理论“相距甚远”。实在的，现在是我们该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了：应当少“卖弄聪明和耍花样”而多有些列宁式的智慧，正象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平凡的一样，这种智慧也是平凡的，但由于特殊的朴实而平凡，应当看到并深深感受这种朴实。

五 垄断的寄生性还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

从另一个一般性的观点来看，价格政策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说，任何垄断都包含着某种保守的因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主义工业建筑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废墟上。他的这个论点也是完全正确的：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的这个垄断结构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无产阶级手中集中了非常强大的经济实力。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甚至正确到成了人所共知的公理。但普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3页。——编者注

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忘记的，所忽略的正是这一点：垄断资本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包含着阻碍了和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萌芽。资本主义的动力是利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竞争的机制进行的。因为进行了技术改良等等的任何资本家都获得超额利润（“级差利润”）。竞争把其他人拉到这里来，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先进的”资本家采用了更多的新技术，发展了规模更大的生产等等。斗争的方法是低廉的价格，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市场表现。资本主义同一切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相比，它的主要历史进步方面之一就在这里。当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自己的历史预定的循环时，它就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竞争的锋芒”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利润由垄断形式来保证。用不着着急。生产用不着以那种疯狂的速度向前发展。因为卡特尔的超额利润是有保障的。

的确，国际竞争没有停息。但竞争在国内的作用由于高关税而瘫痪了。这就是所谓的“腐朽”因素存在的原因。

现在看看我国的情况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这样写的。作者断言，我们应当实行“有意识地旨在剥削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的政策，然后接着说：

“这种政策是可能有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在历史上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自由竞争便造成了自己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价格，通过剥削小生产而获得了超额利润，从而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价格政策打下了基础。但是，把国内全部大工业集中到一个托拉斯手中，即集中到工人国家的手中，大大增加了在垄断基础上实行这样一种价格政策的可能，这种价格政策仅仅是向私有经济征税的另一种形式。”往后就是谈到“障碍”其中包括国内市场狭小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在上面的叙述中已经引用过了。（见本书第230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好吧。在我们这里结果怎样呢？

垄断的趋势增加了。

得到“现成的”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增加了。

这是事实。但增加了的寄生的腐朽和停滞的危险性是不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呢？什么是防止这种停滞的保障呢？

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极大的问题，我们要说：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应当考虑一下。如果他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就会重新改造他的整个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

我们这里没有竞争。有保证的利润不由私人支配。经济工作人员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干部，但他们也有人的弱点并且能够滑到静止的状态中去，而不是不安、担忧和关心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究竟什么推动着我们的生产前进呢？是什么？迫使（正是迫使）向前运动，保证这个运动前进，代替私有经济利润（对私人企业主有利）动力的动力在哪里？我们过渡时期经济的特殊机制是什么？

我们肯定地说，保障就在于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群众的压力。尽管我国目前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利润”形式，尽管我们的一切结算和成本核算是通过这些形式的，然而我们这里前进运动的一切杠杆却完全不同了。我们自己，也就是国家的领导人，首先是党，表现和反映（同时也“调节”，“监督”，“纠正”等等）这种群众需求的增长。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着市场和我们国营经济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已经开始从以利润为准则的经济类型转到以满足群众需求（而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为准则的经济类型上去。

这决不是说，在这种类型的关系下，我们的积累应当进行得慢些。相反地（这一点应当极力强调！），正因为我们将把满足需求当作自己的任务，正因为这些需求的压力将日益增大，因此，我们工业的领导人 and 整个国家将不得不千方百计改进生产，扩大生产，

使生产更廉价。我们发展的保障就在这里。当然，特别是在路途上发生的一系列困难的影响之下，对这一点，人们可以说，我们走的是“反对经济工作人员”的路线。但这可能是无稽之谈。我们已经提到过必须对“需求的压力”进行“调整”，“监督”等等。但是，客观地历史地看一看整个过程，不能不承认，我国经济进步的基本杠杆正在这里。

我们从不同问题的这个角度回头来看看价格政策，我们得出了这样的问题提法：

1. 我们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一目了然：这是垄断经济寄生性腐朽的最高表现。

2. 我们确定价格不变。这将是“正常的”腐朽，经济停滞，国内积累极端缓慢，经济萧条。

3. 我们确定越来越低的价格。这将是生产力发展、生产扩大等等的表现。这是前进运动，也就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运动，而且是以最高的积累速度运动的表现。

这里应当避免给不正确的反对意见以借口。

第一，应当注意到，正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本人正确指出的，在我们国营工业产品价格降低时，我们可以靠小资产阶级经济得到超额“利润”；全部问题恰恰在于，当我们口袋里有有保障的垄断利润时，我们应当是高枕无忧，还是向前进；而如果不降低价格，不发展生产力等等，就不能高速前进。

第二，从我们这方面拒绝利用我们的垄断地位是荒唐的；但是我们应当把这种利用引入这种范围，即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这是其一；其次，我们应当使任何的增长产生这样的结果：生产领域扩大，生产便宜，成本降低，从而在每一个随之而来的生产循环中的价格更为低廉。

或者不是这样。

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事情应是这样的：

我们应当保证有可能“在垄断基础上实行这样一种价格政策，这种价格政策仅仅是征税的另一种形式（而且某种税收仍然存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说的决不是以隐蔽形式的税收代替公开的税收。——尼·布·）。障碍……首先在于购买力弱”等等。

我们的观点则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应当规定使群众满意的尽可能低的价格等等。但这样做的障碍是我们的生产昂贵，成本高等等。因此我们应当用一切办法来降低成本。

不难看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之间的全部原则分歧。也不难看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政策完全导致他的垄断的寄生性的观点。

如果现在重新回想上面说过的所有的关于“剥削”、“殖民地”、“吞没”等等的话，仍然不难确认，所有这些理论论点都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可说是“垄断的自满自足”理论相联系的，这种理论有变成“垄断的寄生性”理论的危险；同“腐朽的”资本主义“类比”是充分的，但这种“类比”对“社会主义积累”未必有好处！①

①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一个总的理论论点，即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社会主义积累过程说成是两种规律——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的斗争的那个论点。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意见，社会主义积累规律部分地使价值规律失去作用，部分地“取消”价值规律，使它在这个时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在这里只发现：高级经济综合体的超额“利润”来源于：（1）这一事实，即个别的成本在这里低于社会的成本，即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2）垄断的事实。如果对很长一段时期进行观察，不难看出，第一个规律表现和依靠生产力的发展，而第二个规律多多少少同我们在正文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保守倾向相联系。另一方面，价值规律（在无组织的社会中它也就是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垄断的一定的限度。因为在分配生产力时存在着客观限度；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严重的危机就不可避免。最后，无所不包的“垄断”，即社会的普遍组织，把自发的价值规律变为有计划的有意识的经济政策“规律”，合理分配生产力的规律。因此，情况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说的要复杂得多。

六 从政治观点看工农联盟和普列 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立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观点威胁着工农联盟,即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观点过去和现在赖以立足的联盟。因为不难理解,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时期,如果不为其政治领导权、为其政治领导奠定经济领导权的基础,它的政治领导权、它的政治领导是不可能持久的。而这种经济领导权不可能通过别的方式而只能通过下述方式来实现:工业适应农民市场,逐步掌握这个市场,靠工业的帮助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方法,逐步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网,最后,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增长奠定新的技术基础(电气化)。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的政策意味着工农联盟破裂,或者至少是严重破坏。

同时非常突出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知怎地完全抱着旧“经济学家”的观点,把经济同政治截然分开,似乎政治不是“集中的经济”,而是某种“自在之物”,可以撇开它,没有它也可以本着“社会主义积累”的精神“办事”。

我们记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很少谈到推行自己的政策的主要“障碍”的意义,很少谈到国内市场容量的问题。现在我们补充一下,在提到这点以后,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说法:

“最后,我在这里不说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引起的……政治性的困难。”(第80页)

他信守自己的诺言:不多说。

不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著作中毕竟有一个地方反映出他的理论非常缺乏周密性和具有折衷性。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玩弄”自己的类比法（认真地“玩弄”）时，顺便写道：

“至于殖民地掠夺，奉行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自由加入某个民族联合的社会主义国家，原则上反对在这方面的一切暴力方法。这个原始积累的源泉对它来说从一开始起就是关闭的，并且永远是关闭的。

“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剥削一切社会主义前的经济形式，这就完全不同了。在象苏联那样的农民国家里，征税（向他们。——尼·布·）……应当具有巨大的、简直是决定性的意义。”（第58页）

我们不准备谈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小矛盾。我们要抓主要矛盾。我们要请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为什么在这种场合（涉及民族）政治动因（“平等的政策”）迫使作者修改（不过只在一页上，因为其他页码上说的不完全是那个）自己的“基本规律”，而在谈工农联盟的“场合”，作者仅仅宣称：“我不说……政治性的困难”？其实，这是无原则的，前后不一致的，首尾不相符的！

尤其奇怪的是，关于在以前的（以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殖民地中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问题，总的说来只是复杂化的、稍有改变的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看来，这个道理本来在书刊上、在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决议上反来复去说得够多了。但是，你看怪不怪！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的同志，在“这个地方”碰到了困难，虽然这个地方写得非常清楚明了。

从实质上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论据是颇为可笑的。好吧，只举他的“因为”民族问题而不容许进行“殖民地掠夺”的论点为例。那么，在不存在“民族问题”的地方象“圈地”（当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法这种东西是“可以容许的”吗？如果不容许，那是为什么呢？

只要提出这唯一的一个问题，就可以看出“普列奥布拉任斯

基”路线的全部虚伪性。

这条路线是同工农联盟的基本政策相矛盾的。

这种联盟的路线是过渡时期全部政策的实质。因为过渡时期最明显的特点主要是两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大生产和小生产、合理的计划和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等等等问题表现了主要的阶级问题，即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而且是全面地分割开，回避政治——这意味着不理解整个问题，看不到它的历史意义，忽略了对之无法回避、远离和躲藏的主要的东西。

或者我们在过渡时期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那么，这条路线应当是我们各种活动的基本原则。

或者这对我们来说是“漂亮话”。那么，我们可以容许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指出的“贵族的自由放任”。但那时，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这是反对工农联盟，这里是另一种的、非列宁式的对革命动力的估计，这里基本上是另一种关于整个革命进程的观念。

这样就应当作出抉择。

我们用不着证明，我们应当作怎样的抉择。因为列宁主义不仅被合乎逻辑的论据（甚至是最完善的）所证实，而且至少被三次革命的经验所证实。

七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规律”概观

现在我们想对“规律”的总的表述说几句话。首先，必须指出这一“规律”的内容本身的混乱，这种混乱初看起来是潜在的、看不见的、隐藏着。

我们设想两种类型的国家：具有数量不大的附加农业的工业国和具有薄弱工业的农业国。为了明确起见，我们用下图表示：



白的部分——农民经济。

黑的部分——工业和转归无产阶级的大农业。

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黑的部分（工业和大农业）落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当积累过程开始的时候，不难理解，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业剩余劳动的“比重”对社会主义积累将具有巨大的意义，在第二种情况下意义则小得多。但这种原理是真正的人所共知的真理，因为这只是下列事实的另一种表现：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业的“比重”比在第二种情况下要大得多。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同时提出了另一种原理并把它同“人所共知的真理”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因为有时则不然。也就是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谈到了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等价交换，而且得出结论说，似乎农民经济的比重愈大，相反地，交换就愈不应该是等价的。但是，如上所述，这并不尽然。假设我们面前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综合体。假设其中的农民经济因而占微不足道的数量（大农业生产和集中的工业占优势）。这是否意味着从农民转为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剩余劳动的比重是很大的呢？不，这种比重是极小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这里必定存在着等价交换？根本不是。因为恰恰由于技术经济结构

差别很大而不等价程度可能很大。甚至在工业品的价格(本身)非常便宜的时候,农民将得到不完全的等价物,因为农民在单位粮食上的个人开支大大高于大农业的开支,因此,即使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里所计算的那样,按照“两种制度”来计算,在交换时劳动价值的差异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问题并不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起来那么简单。

为了更仔细地看看“规律”,我们应当一开始就详细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积累”理解为什么,等等。我们听听作者本人是怎样说的: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是把剩余产品加入到生产的固定资本中去,这种剩余产品不是在社会主义生产的代表之间进行额外分配的,而是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相反地,我们把国家手中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种物质资源主要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在落后的农业国中这种积累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加速……时刻的到来,加速这个(即国营。——尼·布·)经济最后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纯经济上的优势……用第一种方法进行的积累,即靠牺牲非国营部门的积累,在这一时期显然占优势。因此,我们应当把整个这一阶段叫做原始的或预先的社会主义积累……我们苏维埃经济的基本规律恰恰是原始的或预先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国营经济部门内的经济生活的一切基本过程都服从这一规律。另一方面,这一规律改变并部分地消灭了价值规律……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谈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而且如果我们不理解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在苏维埃经济中所起的中心作用,我们对苏维埃经济的实质就一窍不通(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双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首先，我们要指出一些小事情。第一，不能把产品加到资本中去；第二，不仅追加的固定资本的加入被称作积累（而变成资本的原料呢？）；第三，不能把“在社会主义生产的代表之间进行额外分配”同“扩大再生产”对立起来（“不是”，“而是”）：例如，如果有新工人加入生产过程，这就是扩大生产。但是，当然，这一切都是比较小的事情。

当我们谈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基本的“定义”时，问题就重要得多。

他把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社会主义积累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把什么什么称作“社会主义积累”。“相反地”把什么什么称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他是根据这一点来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但当我们在这段话之后，确实在几行字之后看到“原始的”一词消失时，我们是多么惊讶！后来，当我们在基本规律的基本表述（我们在上面引用的）中看到这个词也消失了的时候，我们又是多么惊讶！那里是这样说的：

“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是整个苏维埃国营经济的主要动力。但看来这个规律具有万能的作用”（第92页；接着就是“公式”）。

那么，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告诉我们，说的是什么规律？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里发生的是偶然的错误，对这一切不必在意：在匆忙的工作中犯错误的人还少吗！但是我们认为可以找一找这种明显的混乱的某些根源。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原始积累时期主要是剥削私有经济的时期；正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强调的，在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最终取得纯经济优势”之前，这个时期一直会存在下去。

这里向我们提供了：（1）过程的物质经济内容；（2）它的历史

界限。

现在我们可以不妨研究一下这些论点。

看来，只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谈到基本规律等等，就可以认为，指的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那个国家的资本主义。

既然如此，“优势”（“决定性的地位”）相当快地得到了保证。这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这种优势在不正确的政策下可能失去。但是这种优势是存在的，因为在生产力曲线上升时，无产阶级手中有大生产的规律。

这么说来，非常明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基本规律所作的表述就不可能提出来。因为这个表述是适合于长得多的时期的。

但如果说，指的是技术上更进步的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

那就十分清楚，整个“原始积累”同积累是溶合在一起的。因为，比方说，苏联达到美国的水平，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一切就会列入原始积累栏！那么，“原始”就真正成了经常不断的了！

关键就在这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悄悄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一般的社会主义积累。同时把“原始的”规律变成一般的规律。这一切为的是把工业靠农业为生时期的政策拖长到电气化为止。

因此，在这些奇迹般的变化中，存在着那种与我们在上述一切分析阶段中所揭示的相同的逻辑。这就是不正确地理解既作为政治上有联系的阶级又作为一定经济形式的阶级体现者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应当形成的相互关系的逻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核心就在这里。不幸的是，这个核心是糟糕的。

* * *

惯于分析各种色彩的意识形态的读者立即会识别出这里是行会思想，这种思想同其他阶级“无关”，它不关心无产阶级政策的

基本问题，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问题。只要向这方面迈出一小步，我们这里完全会产生俄国类型的彻底的工联主义者的半孟什维克思想：蔑视乡下佬，把更多的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不为合作化的梦想和农业主义花一个戈比，为了“无产阶级”而加强对农民的压榨等等。这种思想就是从这里“生长”的。如果绝大多数党员群众拒绝接受（而且以一种很尖锐的形式）这种的或相似的“理论”，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理论”能够毁灭（只要它们有机会“掌握”群众，幸而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这种机会）工农联盟，也就是说能够毁灭工人国家即我们苏联赖以建立的花岗石般的基础。

第一次发表于 1924 年。译自《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 年俄文版第 63—97 页。

不断革命的理论^①

不断革命问题是对我国革命进程的一般评价问题，是我们社会各基本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关系的变化问题，从而也是我们应当从相应的理论分析中作出的那些结论的问题。

我们争论的现阶段，目前进行争论的形式，我们党组织内部现在所研究的那些问题的范围，都同去年提出的问题不同，我们目前争论的基本特点是，去年摆在我们面前的某些问题，有些现在也摆在我们面前，所有这些单个的问题联结成为一个基本问题，即对我们的整个革命的理解问题。而实际本质也就在于此。

我国现在所处的时刻是特殊的时刻。我们现在处于历史转折关头。这个转折关头同我们革命已经经历过的那些历史转折关头不同。但它并不因此而不成为一定的历史转折关头。我国任何国内转折关头的本质（而国内的转折关头当然是同国外局势有联系的），在于我们社会两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变。过去是这样，以后在很长时期内还将是这样。我们现在所说的转折关头同样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相互关系改变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谈到这一点仅仅是为了指明下列情况：如果我国正处于某种转折关头，如果这一转折关头要求我党回答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新的相互关系问题，那么非常自然地，首先“触

^① 本文是根据 1924 年 12 月 13 日在莫斯科组织宣传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的速记记录整理而成的。

及”这一问题的“不断革命论”就不能不同当前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意义上提出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争论反映了下列实践的、迫切的要求，要求在新的特殊环境下，从列宁对这种阶级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出发，一次又一次地研究我们社会各阶级间的基本关系，现在这些关系已同过去的不一样了；这场争论反映和表达了这样一种迫切的要求，即从列宁同志关于工农联盟学说的一般原理出发，找到对我们的“重大政策”的新问题的正确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说，我们的理论争论具有直接的、迫切的、实践的意义的缘故。说完这一简短的导言之后，现在我们来谈谈同托洛茨基同志分歧的实质。

不仅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而且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里党内大多数人同托洛茨基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大的。而现在所有这些意见分歧都得到了一般理论的说明。托洛茨基同志的最新著作以及由奥里明斯基同志作跋的那封信实质上（附带指出，我们完全撇开任何个人的色彩、任何个人的好恶、喜欢或不喜欢，而只谈政治路线）就象一架巨型探照灯一样照亮了我党大多数人同托洛茨基同志的个别的和局部的争论、不一致和冲突的实质。大家从托洛茨基同志的信中已经看到，在俄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在这个一般问题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和我们全党的立场有很大的差别。这一情况把托洛茨基同志所有个别的、局部的错误统一起来了；它把这些错误联结在某种共同的联结点，而这一联结点恰好又系在不断革命论上。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证明。

托洛茨基主义的形式逻辑和列宁的辩证法

如果我们看一看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我们有许

多人也和他一起犯过)，如果我们想认真地看看，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么，这共同之处可以说是用形式的、唯理论的、文人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社会生活问题；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特有的那种富有生命力的辩证态度，而是过去和现在托洛茨基同志在我国整个革命期间的特殊立场所特有的形式逻辑的态度。

如果出于局势的要求，需要揭示错误以消灭错误，那么列宁同志从不拒绝“挖掘”任何政治错误的“根源”。在关于工会、关于工会的任务的争论中，他用好几页的篇幅去谈辩证法，提出了一系列极其准确的出色的定义，这不是偶然的。他在生前的最后日子里坚决主张“学习辩证法”的必要性，这不是偶然的。现在，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分歧已排成一行一列，我们不难发现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以及过去我们许多人的错误）具有其专有的特点，是一种特殊的类型，这时候就需要揭示这些错误，挖出其方法论的根源。这样就能彻底查明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差别了。

列宁的辩证法以及党依据列宁的辩证法执行的政策的力量何在？列宁学说的力量何在，列宁在我国革命期间，在革命的激烈事变中，在革命的来潮和退潮中用以进行研究分析的那种天才的技巧的基础何在？关于这一点可以这么说，列宁同志除了能天才地预见伟大的历史前景之外，还具有三个特点，表现了列宁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三个特点：第一，首先是极其善于在每一个场合找到特殊之处，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每一个历史关头看到独创的、单独的、不会重演的东西；第二，善于看到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状态，看到一个历史时期怎么过渡到另一历史时期，一种形势、一种局势怎么过渡到另一种形势、另一种局势；最后，第三，是由上两个基本特点派生出的，即极其善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象我们的政治行话所说的，“当前局势”）区分出需要“紧紧抓住”的基本环节。

一般说来，对于列宁同志应当用同对普通的——甚至不很普通的革命者全然不同的另一种尺度去衡量。通常当我们说起社会主义或加括号的“社会主义”中的某一流派时，我们总是用相当广泛的公式来说明，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而这是“革命的观点”；而我们通常把那些持“革命”观点的人叫做“优秀的革命家”。这是通常的概念。然而这种尺度，这种标准，这种评价和这种态度对列宁的学说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对列宁同志这一高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学说的体现者使用这样的标准是可笑的。对列宁主义来说，从一般革命观点提问题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根本不是这个。这是不容争议的东西，从这种观点去看待列宁同志提出的学说是愚蠢的，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列宁同志教给我们的问题的那些提法看来，这是起码的常识。重复一遍，这不说明问题，说明问题的是列宁同志不仅从一般前景的观点出发，而且经常在这些一般前景的范围之内捕捉到这种独创的东西、这种从一种局势向另一种局势的过渡，并且经常异常准确、非常善于找到能把我们革命的车轮拉向正确的道路的那种环节。应当用这种观点，用这种尺度去衡量列宁同志，需要用这种尺度去衡量我党的政策，因为我党的政策是列宁党的政策，这个党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培育出来的，他奠定了党，他建设了党，在数十年时间里，在我们工人运动史上整个英勇奋斗时期领导了党。然而，如果我们拿这些标准去看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或者去看托洛茨基同志身上的特有的东西，那么我们会看到，托洛茨基主义立即不灵了。实质上，他还够不上可以也应当用以衡量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的那些尺度。我们许多人过去非常醉心于——而有些人现在也还醉心于那种提出某种宏伟前景的光辉才能，这种前景第一眼看去是极端革命的，而托洛茨基同志正是精于此道的能手。但是这一切只能用较低级的尺度去衡量，这仅仅同犯了机会主义罪过、同革命不

沾边的社会民主党比起来略胜一筹，因为它，社会民主党，是反革命的政党。他们赞赏托洛茨基擅长提出的光辉的一般革命前景。如果用这种尺度去衡量，那么一切优点都在托洛茨基同志那一边。但从列宁主义观点看来这只是“起码常识”。而如果以列宁主义的尺度去衡量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也就是说，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好吧，这很好，但是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怎么行动呢？应当怎样分析这光辉前景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呢？为了不是在纸上，而是实际上实现这一前景，应当做些什么样的实际工作呢？这里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复杂的理论分析呢？——如果从这些标准去看，那就立即可以发现，托洛茨基主义犯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它处于无力应付的境地了。它，托洛茨基主义，还未发展到这样提问题的水平。而这一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看得清楚。它还未达到我们有权用于目前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那种尺度的水平。我们已经说过，列宁主义方法的基本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真正表现是善于看到独特的关系，善于看到从一种关系向另一种关系的过渡和善于找到能把握住整个链条的那个基本环节。所以，在谈到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的时候，不论我们碰到的是大问题还是较小的问题，我们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恰恰看不到这种能力，也就是看不到那种使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列宁主义与众不同的基本点。因此他在实践中犯了这些错误。我们且从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期中举几个例子。先举关于“计划”的争论为例，这是从我们去年的争论中取来的例子。托洛茨基同志实际上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是，用制定较为理想，较为合理的经济计划的办法摆脱我们所处的危机。由此产生一系列发展我国工业所遵循的，或准确点讲，应当遵循的道路的实际建议。事实却不然，我们不是在执行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计划的基础上，而是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基础上，在货币改革，和降低价格政策的基础上取得

我们所取得的进展的。现在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货币改革和降低价格政策是真正促使我们的经济生活脱离半死不活状态的两个因素。最近一年我们在经济平衡中能取得这些经济成就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两个基本因素。所以非常清楚，托洛茨基同志按照计划这条线提出来的医治经济事务的道路包含着许多错误。哪些错误呢？让我们认真地看一看。首先反对派没有看到我国形成的局势的特点，看不到同国内整个状况和整个结构联系着的经济状况的特点；反对派政纲提出的实际上是抽象的花样、抽象的口号，它们可以归结为非常简单的东西，这就是任何计划都比任何无政府状态好，有计划的、调整好的经济优于无政府状态的经济。这听起来极端革命。用我们说过的标准来看，这个政纲是极其漂亮的。当然，谁能提出异议，反对计划？只有微不足道的小商人。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拟定”用语极其激烈的俨然“无产阶级的”路线：“啊哈，你们反对计划？但是要知道，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说，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们应当放弃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们应当向反社会主义的庄稼汉投降？”等等，等等。

结果似乎是，对“计划”表示异议者恰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倾向”，而托洛茨基同志的“计划原则”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性”在其同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体现和表现。

但是，这正是庸俗的“表面现象”。而如果从这表面现象再深入下去，那么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图景。因为问题根本就不在于什么东西“一般说来”要好一些，是“计划”还是“无政府状态”，是社会主义还是商品经济，也完全不在于我们在走向计划，走向社会主义，等等；问题在于，在存在大量的小业主、市场起巨大作用、纸币破产和销售危机的情况下，如何朝着我们现在实行的计划的方向迈出下一步。实际问题就在这里；而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没

有估计到我国现状的特点；尽管他在“争论以后的时期”里的著作中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摆脱加于他身上的这种政治责难——他对农民经济不够注意，但他“眼下”又犯了这种毛病：对农民经济估计不足在这里表现于对市场力量估计不足，不懂得市场经济的神经，即货币体系的全部意义，孤立地对工业作片面的分析。时局的特点，它的基本特点并不在于生产本身的毛病，或说得准确点，主要的不在这里，而在于同农村结合的崩溃，因为在高价政策（和销售危机）下，在苏维埃纸币破产（它失去任何购买力）下，要拽着工业前进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多么强调哪怕是极端美妙的“计划”也不行。因此，托洛茨基同志所看的并非需要看的那个方向。他没看到时局的特点。其次，他没有估计到从一种形势向另一种形势的过渡。我们的任务在于，在我们存在大量小经济的分散的农业中，逐步并且非常缓慢地从无计划经济向计划过渡。但是，为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需要一系列措施，没有这些措施在实践上就通不过，为了从一个阶梯升到另一个阶梯，需要摸索出这些措施来。为了真正地哪怕略为转向计划，需要登上什么样的阶梯呢？这是列宁的“环节”问题，是在这个时刻应“抓住”什么环节的问题。这个“环节”就是货币改革。换句话说，为了在事实上向计划经济再迈出现实的一步，需要从一个可以叫做“通向货币改革的阶梯”的阶梯出发，使自己站到“货币改革的阶梯”上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事实上继续向经济计划迈步。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环节，把它忽视了，整个反对派也同他一起把它忽视了。众所周知，在我们党内争论之后，反对派中的某些同志极端怀疑地看待我们的货币改革，预言它必然要遭到破产，恳求宽恕苏维埃纸币。实际生活说明完全相反。因此，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不善于找到需要抓住的那个环节。图式取代了分析。抽象取代了具体。形式逻辑取代了辩证法。托洛茨基主义取代了列宁主义。

现在我们且举另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鄙人”和托洛茨基同志一起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我们说的是布列斯特和约。我们再次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在这里极其明显地（虽然是在全然不同的条件下）犯了同一类型的错误。当时（即“布列斯特时期”）的特点何在？它首先表现在哪儿？特点在于，庄稼汉不想打仗。“关键”就在这里，这是应当首先注意到的，是应当以此为出发点的。我们这些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跟我们一道托洛茨基要求些什么呢？我们制订了“计划”，看起来非常漂亮的计划：革命战争。不错，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中间性的口号：“不战不和”。然而与此同时他当时也说过，死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剑下要比死在背口袋的人的打击下为好。直接交战、英勇搏斗——这也就是他所看到的最近的前途。这些“计划”看起来非常好，被看作唯一革命的计划，任何人，只要他不往这个目标走，在我们看来，他就是投降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他们那一伙和同情托洛茨基同志的那一伙都认为，如果党以庄稼汉从前线逃跑这一事实为出发点，那我们就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党。梁赞诺夫同志关于这一点谈得特别多，他当时曾经退党，因为我们似乎失去了我们的无产阶级童贞^①。从这里看得很清楚，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考虑到

^① 我们引用梁赞诺夫同志的几处发言，因为这一发言从似乎阶级分析的观点最尖锐地提出了问题：

——我知道，——梁赞诺夫同志说，——我们参加的那个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刻应当作出抉择，应当解决这样的问题：它是依靠农民群众，还是（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依靠西欧无产阶级。列宁同志以及党内跟他走的那一部分人宁愿依靠农民——我们以后找个时间来分析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一派内我已经给列宁同志的政策下了定义。列宁想利用托尔斯泰的口号，——按照我们所处的时代略加修改。托尔斯泰建议用庄稼汉、用傻瓜的办法建设俄国；列宁则建议用庄稼汉、用士兵的办法建设俄国。我们现在已尝到这种政策，庄稼汉和士兵政策的果实。”（《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出版社版第87页。）

托洛茨基同志对考虑农民的情绪很不感兴趣。他完全指望西欧无产阶级的直接发

正确分析的第一个要求，没有考虑到时局的特点，没有对它作出估计，而这是那些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想把党引向胜利的政治家所必需做到的。无与伦比的列宁主义分析的天才技巧首先就在这里。第二个问题，就是考虑不考虑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问题。在布列斯特时期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具体过渡表现在哪里呢？需要懂得，怎样才能从庄稼汉开小差阶段过渡到抵抗敌人的革命护国阶段上去。左派共产主义者也好，托洛茨基也好，他们全都不能理解这一点。最后第三个问题：为了易于向另一个阶段过渡，即从开小差阶段向“计划”亦即护国过渡，需要抓住什么样的“环节”呢？这是什么样的环节呢？这一环节就是缔结和约。为了解散腐朽的旧军队，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在反对地主保卫土地的基础上着手建立有保卫国防能力的部队，为了让出空间、赢得时间以创造胜利斗争的条件，为了这一切需要“抓住”这一环节。托洛茨基同志也没有看到这一环节。这就是说，关于“环节”问题在这里也是非常清楚地摆着的。这一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看得清楚。这就是说，出现了跟“计划”问题上的错误同一类型的错误。美好的“一般”革命前景，用光辉的语句写出或说出然而在实践中毫无用处的“理论”是僵死的理论。如果按照这种理论郑重其事地进行领导，那么得到的恰恰是同写在纸上的相反的东西。

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所特有的一般错误类型。要懂得目前的

动。他说：“……我所属的那一派则认为，对我们来说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以革命化的方式影响德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就可以不割断我们曾进行的宣传的继承性，不至于造成宣传上的历史的间断……现在必须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的无产阶级，面对那个不是由我们造成而是由国际形势的本质产生的政治悲剧，如果德国党不支持我们，就要它负全部责任。”（速记记录第81页）（不能签订和约，因为如果签订的话我们的全部宣传就会破产，就会象“滑稽剧”那样。）（第80页）（正象文中所说的，“纯血统”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也持这样的观点：伴随着和约的将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向农民方向蜕化。）

许多事件，必须看到这个一般错误类型。

最后我们在这里还要指出，列宁主义摧毁一切常见的被偶像化了的语言文字外壳。它决不是一贯执行“左的”政策的。它执行正确的，即符合无产阶级的总利益和考虑到时局特点的政策。因此，它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无与伦比的武器。

对我国革命的一般估计

现在我们谈谈对我国革命的一般估计。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取名为“不断革命论”。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对我国革命的一般估计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最新著作之一或“最新著作以前的”一部著作中，在论述“新方针”的小册子中，就此写道：

“至于谈到不断革命论，我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放弃我在1904、1905、1906年以及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就是现在我也认为，我当时所发挥的那些思想的基本思路，比那时许许多多布尔什维克所写的东西远为接近列宁主义的真正实质。不断革命（这是作者本人所加的着重号。——尼·布·）的用语是马克思的用语……不断革命的准确翻译是经常的或不间断的革命。这些词语所包含的政治概念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在取得这一或那一政治成果之后，革命并没有结束，而要继续向前发展，对我们来说它的唯一的边界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俄国条件下这意味着作为政治终点的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也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依靠农民并开辟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工人政府。因此，不断革命思想是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战略路线完全一致的。……在我当时的著作中没有任何跳过农民的企图。“不断革命”理论是通向列宁主义，特别是通向1917年

的四月提纲的道路。”(《新方针》,“红色处女地”1924年版第50页及以下各页。)

在《1905年》的序言中托洛茨基同志写道:

“……在1905年1月9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虽然事隔十二年,但这个估计被全部证实了。”(《1905年》,国家出版社1922年第2版序言第4—5页。)

最后,在致奥里明斯基同志的信中托洛茨基同志写道:

“我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全是我不对……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

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的文章分做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分析革命的内在力量和关于革命的前途……的文章,另一类是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的斗争等等的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为这些文章从1917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

这样,托洛茨基同志现在断定:

1. 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因为它已为经验所“完全”证实;
2. 不断革命论比所有其他的理论远为接近列宁主义的实质;
3. 从1917年起,不断革命论完全符合我党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
4. 不断革命论决不是建立在对农民估计不足的基础上的;
5. 总的说来,不断革命论对我国革命的动力作了完全正确的估计。

托洛茨基同志对自己的理论产儿说了这么多的赞美之词,这样也就使自己的党内路线昭然若揭了。

为什么我党1917年以前的全部历史在托洛茨基同志眼里几

乎等于零？因为按照他的看法，党直到 1917 年才持不断革命的观点。

为什么一般说我们党是在 1917 年“诞生”的？因为它到那时候才用不断革命的标志重新施洗。

为什么研究革命前同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斗争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不断革命论掩饰了托洛茨基同志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错误。

如此等等，如此等等。

总之，1917 年作为列宁主义诞生的列宁主义（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同样精神”的文章）的实质在于不断革命论。毫不奇怪，主要的列宁主义者和遗训保存者（出于谦虚，不是遗训的作者）是托洛茨基同志，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历史的布尔什维主义，而是贴着列宁主义商标的托洛茨基主义。

然而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报刊上谈得够多的了，让我们放下它转而分析一下托洛茨基同志理论的实质。

托洛茨基同志是这样提问题的：

不断革命论是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就可以找到根据的理论。“不断革命”即“不间断的革命”是以最后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为极限的革命。因此托洛茨基就在自己的一系列最近著作中说：你看，这已经得到实现，——不断革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无产阶级已在我们这里夺得国家政权。然而，要知道，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以前还反对不断革命论，因为他们恰恰断定：我们这里的革命应是资产阶级革命。在 1905 年，直到二月革命以前，我们确实这么说过。结果谁正确呢？是不断革命论，还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结果正确的是不断革命论，而布尔什维克从 1917 年起变“好”了，因为他们放弃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接受了托洛茨基对它所作的解释，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作出的结论。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切。

首先应当指出，不断革命论中最本质的东西决不是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场终于进入工人执政阶段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了不断革命，因为工人阶级确实掌握了政权。^①但这里有另一个问题。而这另外一个问题构成了不断革命论的“本质”，首先需要谈谈这个本质。但是事先必须说一说，马克思是怎么理解不断革命论的。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中引了马克思著作中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并对它作了完全正确的解说。马克思写道：“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②这样说来，马克思是怎么理解不断革命论的呢？马克思所理解的不断革命是这样一种前景：在革命进程中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而革命不断地“沿上升路线”发展。譬如说，地主被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一派，例如自由资产阶级取其位而代之。革命没有就此结束。自由资产阶级被推翻了，激进小资产阶级取其位而代之。激进小资产阶级被推翻了，本来意义上的城市贫民依靠同贫农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取其位而代之。最后，连这个政府也让位给工人阶级的政府。不言而喻，这仅仅是个图式，但却是个“正确的”

① 在这里应当看到“不间断性”的相对性，因为完整的革命阶段意义上的不间断性恰恰并不存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过了整整10年才爆发“第二次革命”。列宁同志在《论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文中写道：

“弄清楚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阶级对比，是革命政党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解决得不正确，他只是重复他那1905年的‘独创的’理论，而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

可见，第一，在“不断”革命中曾有过暂时中断，第二，这种中断及以后的事变推翻了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及其对阶级力量的估计，因为历史使农民处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早就认为不可能有的地位。见本文。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编者注

图式。^①那么，不断革命论的实质在哪里呢？马克思的，即正确的不断革命论的实质在于，它考虑到革命的社会内容的不断变化。在这里它的内容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革命进程中各斗争着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断变化，革命在发展中不断地从一个阶梯向下一个阶梯迈进。革命从封建阶梯进到自由资产阶级阶梯，然后从自由资产阶级阶梯进到小资产阶级阶梯，接着又由小资产阶级阶梯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梯。马克思的（而不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含义就在于此。我们能不能反对这种理论呢？不能，因为它是正确的。我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其含义也就在于此。我们

^① 不过应当记住，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图式用于现实。在这里也需要顾及社会力量的具体对比。例如，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在于，它只有在同自由资产阶级斗争中才能进行到底，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在战胜沙皇制度以前已成为一支反革命力量了。由于不懂得这一点，孟什维克实际上走上了叛卖的道路。列宁就此写道：

“实质上这些人们（新《火星报》的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尼·布·）是这样盘算的：他们想限制、缩减自己争取自由的斗争……《前进报》（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尼·布·）说：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十九（和二十）世纪革命中三个主要力量和三个主要阶段的著名原理恶劣地庸俗化了。这一原理就是：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限制专制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第二个阶段是争取共和国以满足‘人民’，即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能满足无产阶级。《前进报》写道：‘这幅图景一般和整个说来是正确的。’的确，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向这三个不同的公式化梯级上升的运动，这些梯级之所以不同，是看在这个上升运动中，在最好的场合下有哪些阶级能够伴随我们。但是，假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三个梯级的这个正确公式理解为在任何一次上升前，需要给自己预先定出一个极为微小的限度，例如不多于一个梯级，假如我们在任何上升前，根据这个公式‘为自己拟定一个在革命时代的活动计划’，那么我们就是庸俗透顶的人了。”（《列宁全集》第8卷第432—433页。）

换句话说，不能把图式直接用于生活中的任何场合。“跳越”是可能的。如果一般地否认跳越的可能性，那就是庸人作风。然而，

“希望任何一个爱挑剔的读者也不要从我们的话中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仿佛我们不顾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宣传‘旨在’必须跃过梯级的‘策略’。”（同上，第433—434页。）

可见，社会力量的对比，顾及这种力量对比，“归根结底”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无所畏惧地把革命向前推进，但与此同时善于从既有的社会力量对比出发，从而实际实现对革命的领导——这就是列宁主义的策略。

的革命经历了许多阶段。1917年2月我们这里地主制度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府加上与之并行的工农政权(苏维埃)所取代;接着又出现了新的改组,我们这里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同自由派结成联盟取代了自由资产阶级的位置(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一起建立的“联合政府”)。我们在十月夺取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执掌了政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后又进行了更换,我党成了唯一的执政党。因此,我们这里革命的曲线整个说来总是上升的。(我们说“整个说来”,因为在革命的这种前进过程中有过一些中断,——只要提一下七月事变就够了;必须看到这一状况,因为它对实践来说起着不小的作用。)这一过程表现于国家政权的结构,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归另一阶级、从一个社会集团转归另一社会集团,直到出现一种稳定的局面为止,这就是工人阶级执掌政权,工人专政获得坚实的基础,而共产党成为执掌国家政权的唯一政党。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也就是从历史事变的真实进程的观点看问题,同时自问,这是不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实质,那么对这个一般问题我们应当回答说:不是。而这个“不是”也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谈这一中心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勾画出一个基本轮廓,作为今后进一步阐述的对象。

总之,如果托洛茨基同志的设想同后来出现的现实是一致的,那么他在1905年决不会提出他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的那些口号。众所周知,1905年托洛茨基提出口号反对布尔什维克:“打倒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换句话说,1905年托洛茨基同志在我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阶梯提出了只有在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梯才能实现的口号作为直接口号。而在托洛茨基身上缺乏同当时现实的联系。换言之,我们在政治上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提出的基本指责是,它忽略了所有的中间阶段,而这恰恰是不断革命的特点;在这些不同

的革命阶段中不同的阶级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并互相取代，这些不同的阶段要求我们提出适用于这些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服务于一个目标的特殊口号；只有这样才能进行革命。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把最后面的、终端的环节提到最前面来，而这时却不具备这样做的任何前提。他跳过了一系列中间阶段，如果我们党听从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而不是象它实际上领导的那样去领导革命，那么我们干脆就会掉进无底深渊。不管多么离奇，实质上托洛茨基同志扼杀了不断革命思想，因为如果把“结尾”放到“开端”上去，那就没有过程，没有过渡，没有“不断革命”了。

托洛茨基同志是否懂得我国革命的特点？托洛茨基同志是否看到革命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转变”）？是否会“抓住”需要的环节？对所有这些问题不得不给予否定的回答。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问题提得极为简单：俄国只可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早在1905年托洛茨基同志就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俄国只可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里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是注定要毁灭的，如果西欧胜利的无产阶级不给它以国家援助的话。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我们的革命》）

托洛茨基同志的出发点是不懂得我国革命的特殊进程，而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结合。托洛茨基同志不懂得这一革命开始阶段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实质就在于摆脱封建羁绊和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也造成了这一革命的民族特点。”“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最终证明了，它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

才是必不可少的。”^①

托洛茨基同志“没有发觉”我们这里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些阶段。

其次，托洛茨基同志没有看到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些特点。

托洛茨基同志也没有看到下列特殊国际条件，在这种条件下，甚至没有西欧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也能躲过去、巩固下来并得到发展，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一起取得最终胜利。

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的论断也是公式化的：或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会取得稳固的胜利；或者是虎头蛇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会死亡。或者是西方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这样就会得救；或者是没有这种援助——那时就无救了。

而实际上生活完全推翻了这些公式并给予全然不同的答案。既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从一种革命过渡到另一种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而是既来自无产阶级，也来自殖民地的援助（还有来自资本家的“援助”，他们以自己的内讧援助无产阶级国家）；不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不是死亡，而是生存，等等。现实要比仔细描画出来的干巴巴的“不断革命”图式远为丰富多采。

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看不见现实，所以他在政治上是无力的。

由于列宁和我们党看见了过程的所有阶段、过渡和特点，他们事实上能够每次都抓住需要的环节并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胜利。

^①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著作中未发表过的一章。见《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第28期第166、169页。

我们党没有任何理由要用列宁的我国革命理论去换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论。

对我国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的一般估计

上面我们谈了我国革命的各阶段，现在必须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也以一般的形式提出，但是要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变动的观点对它进行观察。众所周知，我们所进行的争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归结为工农联合问题，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或“联合”中的领导权问题。现在，在我国革命和我国专政的第八个年头，我们极其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先作出明确论证的，然后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和实践大厦的基石之一。只是到现在这一问题才被充分地提出来。因为就实质而言，这里讲的不只是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的工农结合问题，而且也是国际革命的最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因为象殖民地问题这样紧要的现代问题，这样一个涉及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从世界革命观点来看，无非是以西欧和美国工业无产阶级为一方；以殖民地农民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结合问题。

不错，殖民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农民的态度问题，但并不完全归结为这一问题。它有其特殊之点，在这里完全划等号是不对的。然而，同时也非常清楚，就其社会基础而言，它是个农民问题。如果我们谈到工人阶级现在如何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说，工人阶级支持殖民地的起义，也就是实现自己对农民—殖民地运动的领导权。如果我们提出在工人夺得政权的情况下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将出现什么情况的问题，那么在我们面前同样会出现胜利的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农民的态度问题。如果

我们问，为什么欧洲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懂得农民问题的意义，不给予注意，不提出对我们很有意义的那种问题，那么事情根本不在于我们是农业国，他们是工业国。他们那里也有自己的“农业附属地”，只是它不是位于宗主国，而是位于遥远的殖民地外围。欧洲社会民主党不够重视农民问题，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是同它轻视殖民地问题的革命提法这一点直接联系着的。在社会民主党那里，要么是直接敌视殖民地运动的路线（社会帝国主义），要么是表现为一字不提的路线。托洛茨基同志醉心于自己的“欧洲主义”，不止一次地强调“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亚洲农民性（他正是这样看待布尔什维克的），这说明在这种“欧洲主义”中有某种社会民主党人轻视农民和殖民地运动的东西，尽管托洛茨基同志个人还是相当注意殖民地问题的。

关于阶级的这种提法，对阶级的作用所作的“欧式”估计使托洛茨基同志得出这样一种具体的看法：如果得不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给予的国家支持，俄国革命就必然要灭亡。

如果说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抽象的图式取代了具体的分析，那么这样做所造成的结果则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典型革命，而“非典型”的革命则事先就注定要灭亡的这样一种观念。然而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一种革命，在这种革命里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人民”阶级。换句话说，只有在没有农民的社会里才会有这种理想的革命。

然而，这种“理想的”观念完全不符合实际。如果我们看看世界经济，我们就会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占居民的微不足道的少数。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国家，那么我们必须看到，它们是由一小撮人口稠密的无产阶级化的“宗主国”和大量的农民的殖民地构成的。法国的绝大部分是在非洲，英国的绝大部分是在亚洲，等等。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如果不依靠印度

和埃及农民的同情，如果不引导他们投入反对资本的战斗，如果它不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如果它不能领导这人类的大多数，不拥有领导权，那么它能做些什么呢？

不用说，托洛茨基同志很清楚殖民地问题的全部巨大意义。但是可惜，对殖民地的这一正确观点，同托洛茨基同志 1905 年在其不断革命论中对农民所作的估计是完全不相容的，而这一估计的提出者今天仍然顽强地认为是正确的。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是绝对无法自圆其说的。

现在已非常清楚，对无产阶级来说这个问题该怎么摆。

在夺得政权之前，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

夺得政权之后，直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人阶级在国内战争中必须保证自己能得到大部分农民的支持。

而以后怎么办呢？难道可以把农民仅仅看作是同资本和大土地占有者斗争中的炮灰？

不能。对这个“不能”应当彻底弄清楚。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无论如何必须同农民和睦相处，因为农民是居民的多数，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只有不懂得经济的世界联系才会使某些人丢开这一任务不管。但是这一任务不可避免地迟早会提到日程上来的。因此必须懂得，无产阶级在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它不得不领导农民跟自己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必须善于做到这一点，否则它就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

不言而喻，要领导农民跟自己走，就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为了实行正确的领导，需要看到所有过渡，所有阶段。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列宁写道：

“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可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新的过渡时期：军队的复员，战争的

结束,获得比以前长得多的和平喘息时机的可能性,比较巩固地从军事战线过渡到劳动战线的可能性。单是由于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一点,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已经有所变化。”^①这在更大的程度上也适用于革命过程中的意义巨大的一系列阶段。

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完全不懂得:

1. 关于农民问题的一般提法;
2. 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方法;
3. 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工人阶级和农民相互关系的不同阶段。

农民问题的提法在托洛茨基同志为《1905年》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显得很突出。如我们所看到的,托洛茨基同志在表述(在1922年1)不断革命论和强调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时写道:

“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最后一句是对的。但事情的实质并不在这里。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事情的实质在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要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在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6页。——编者注

国家里，无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如果没有外部的援助，并且是国家援助，那么由于这一不可避免的冲突，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定会垮台。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特别是在积累了大量国际运动经验的今天），托洛茨基的“解决办法”实质上并非解决办法，正如他的“不断革命”实际上不是不断革命一样。

因为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防止的，等等，那么就是无产阶级取得世界胜利，这冲突还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防止的。农民在我们地球上占绝大多数。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办法使这大多数跟自己走，那么，或者国际革命也注定要破产，或者它应推迟（照库诺夫的看法）到地球上形成无产阶级的多数之后。不能设想，要炸毁“地球之界”，等待天上的纯无产阶级力量的援助，并且还是“国家形式”的援助！

由此可见，如果展开问题，全面地看问题，那就很容易看出，托洛茨基同志是推开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这种冲突只是可能的。而这两者决不是一回事。如果无产阶级政制比资产阶级政制对农民更为不利，如果农民脱离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冲突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支持和加强工农联盟放在政策的首位，那么这并不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是不会发生的。怎么具体地做到这一点，讨论这一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从对农民的上述估计产生了托洛茨基在反动年代提出的影响农民的方法。关于此事列宁同志写道：

“最后，马尔托夫同志引的托洛茨基的第三点意见是最错误的，而他却认为是‘正确的’，这个意见是：‘哪怕它（农民）这样做（‘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并不象往常拥护资产阶

级制度时那样自觉。’无产阶级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不觉悟和成见上面（而资产阶级制度下的统治者却正是指望和依靠这些东西的），也不能认为在革命时期农民的哪怕是寻常的不觉悟和消极的状况会保存下来。”（《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①）

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这时需要从字句转向行动了，局势也特别困难，这时列宁写道：

“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20年12月22日）②）

难道这里不是对待农民的完全特殊的态度？难道这种态度不是同对农民这个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必要盟友的一般估计联系着的？

但是，为了能够“说服”，需要善于把农民“挂到”适当的环节上去。而在这一点上最清楚地暴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甚至缺乏正确地看问题的能力。

托洛茨基在1905年放过土地问题，不懂得时代的症结就在于此。孟什维克也不懂得这一点，列宁曾完全正确地指出，他们“同民粹主义大战的时候……忽略了民粹主义的历史现实性的和进步性的历史内容，没看到民粹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反对自由派地主资本主义而主张民主资本主义……的理论”，为此列宁把他们的“思想”说成是“荒诞”、“愚蠢”和“叛变的”思想。（见列宁论普鲁士和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1卷，第452页。——编者注

美国的发展道路。给斯克沃尔佐夫的信，《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5月号第178页。^①)

托洛茨基同志甚至现在还断定，他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正确的，其中没有一点跳过农民，他也不认为对农民“估计不足”。为此托洛茨基同志毒辣地讥笑自己的批评者。他写道：

“最近某些集团(!)津津乐道的论据之一是指责——主要用间接方式——我‘低估’农民的作用。然而请仔细地找找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新方针》第50页)。在我当时的著作中没有‘跳过’农民的任何企图”(第5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而在1915年，即已在大战期间，列宁是这样评价托洛茨基的立场的：

“托洛茨基的独创的理论是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论革命的两条路线》^②)

“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们的忙，这班政治家们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③

接着列宁出色地简要描绘了革命的阶段，这些阶段的内容和我们的任务：

“而这(即发动农民。——尼·布·)就是现在问题的症结。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而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农民、为尽量发挥农民的革命力量、为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16卷第116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399页。——编者注

吸收‘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将来还要为此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对于这种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和政权下获得解放的运动，无产阶级将立即（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加以利用，无产阶级不是用来帮助富裕的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用来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①

这样，同托洛茨基同志相反，列宁同志认为他的理论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不管托洛茨基同志多么想抵赖自己的这一基本的、主要的错误，但他是抵赖不了的。捉迷藏是不行的。这里需要清楚、准确、肯定地说清楚谁正确。因为非常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一种认为农民是盟友；另一种认为农民是不可避免的敌人。一种理论认为，我们能够进行争取对农民的领导权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另一种理论认为，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一种理论认为，必然发生尖锐的冲突，另一种理论认为，如果实行聪明的政策，就可以避免这种冲突，等等。

这种“不断”理论的“不断的”问题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不断”对立，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国革命的阶段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

现在可以从问题的这些一般提法转入具体的提法了，也就是分析一下，我们党和托洛茨基同志是怎样看待革命的各个阶段的，党和托洛茨基同志是怎么估计阶级力量对比的，这种力量对比对1905年、对以后的时期、对二月革命、对此后至十月这段时期、对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9页。——编者注

十月革命、对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最后，对目前阶段来说是各有特点的。这样就容易看清，托洛茨基同志在每一个时期都在重复我们一般地指出的所有错误，而这些错误乃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本质。

现在我们从分析 1905 年着手。

布尔什维克当时的立场可归结如下：我们把 1905 年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要推翻地主，推翻地主政府，给农民土地，它要清除封建主义的羁绊，建立工人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我们把这看作自己的目标，这种专政在该发展阶段还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对这种观点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很有份量的指责。他说，第一，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第二，布尔什维主义理论是反动的；托洛茨基同志断言，布尔什维克除了某些革命的方面外还有反革命的一面，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恰恰在于，他们想同庄稼汉合作。这一点在托洛茨基同志的《1905 年》一书中也可以读到，现在我们从此书中引一段话，从这段话马上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同志对局势的估计：托洛茨基同志写道：“现在有人建议用合作的庄稼汉给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加上一个客观的反社会主义的‘保证’”。（1922 年第 2 版第 284 页）这段引文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其含义是：布尔什维克建议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议通过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做到这一点，这个专政将彻底摧毁所有的封建制度残余。

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对此提出异议呢？他说：布尔什维主义反动的一面就在这里，因为想建立一个庄稼汉同无产阶级一道参加政权结构的制度。什么是庄稼汉？庄稼汉是小私有者。什么是小私人所有制？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观点看来，这是一股反动力量。如果你们布尔什维克想让庄稼汉充当自己在政府中的合作者（这一切是在 1905 年说的！），那么你们就是反动分子，因为你们

想用这种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保障”去加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死亡。

托洛茨基同志接着说：

“……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同上，第 285 页）

在对 1922 年版所作的附注中托洛茨基同志用这样的手法对这一耸人听闻的说法作了周到的“解释”：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即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的‘极大的危险性’）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在 1917 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不是没有内部斗争地）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第 285 页）

说党，并且还是在列宁领导下，“在 1917 年春天”转向了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论断是多么可笑。我们可以暂且指出，这种很能宽慰作者自尊心的“思想”使得大家懂得，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如此害怕我们党蜕化。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事实上布尔什维主义是以庄稼汉为友的主义；它具有庄稼汉的反革命特点，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孕育着反无产阶级的、农民小私有者的政策的“巨大危险”。“在列宁的领导下”，它从托洛茨基同志的“无产阶级”理论中取得“武器”，“重新武装了”。没有发生“危险”。这样，“1917 年春天”列宁“在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有勇气向托洛茨基同志学习，列宁得救了。怎么办？需要大力进行党的“不断化”（因此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写作活动），因为这也就是社会主义保障，是反对以“合作的庄稼汉”为代表的旧布尔什维主义内部所固有的“反社会主义保障”的保证。需要用“新方针”加紧教育青年党员，他们身上还没有“反社会主义的”“巨大危险”的有毒种

子。而如果这一说教对党不起作用（“老近卫军”的罪过就在这里），那么，这也就是小资产阶级“蜕化”危险之所在。

这样我们看到，去年关于老近卫军蜕化的叫嚷是具有非常深刻的基本原因的，是同“不断革命论”紧密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托洛茨基赌咒发誓地宣称，这个理论已被“全部”证实了。

现在我们转入问题的实质。

1905年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反对“庄稼汉”在政治上是合适的。这是事实。他在这里看到“巨大的危险”。1905年托洛茨基同志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个立场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它适应局势吗？托洛茨基—帕尔乌斯的口号“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时是否正确？这些问题应当给予回答。

关于1905年和1905年的特点及以后的革命任务，列宁写道：

“这个土地问题现在在俄国就是民族问题。”（列宁论普鲁士和美国的发展道路。给斯克沃尔佐夫的信。①）

“关键”正是在这里，这对不对？时代的基本任务在于发动农民反对地主，把地主的专制政治上层建筑连同地主土地占有制一起摧毁，这样做对不对？执行发挥农民的革命可能性的路线，对不对？

绝对正确。那时候问题的提法只能是这样（必须记住，那时俄国还没有托拉斯工业，还没有帝国主义战争，西欧无产阶级还没有闹风潮，等等，也就是说，不具备“1917年春天”已形成的那些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庄稼汉却受压制而不敢反抗，处于愚昧无知状态，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反抗地主，才刚刚参预政治生活）。当时的任务在于，工人阶级通过争取土地的斗争引导农民参加反对整个半封建制度的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116页。——编者注

托洛茨基同志眼睛看的完全不是这扇大门。他不懂得历史时代向革命政党提出的那些要求。

如果看看 1905 年革命，完整地看看这全部阶段，同时自问，为什么 1905 年革命被击败了，为什么它失败了，那么现在对这一问题是不难回答的。1905 年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城市运动和农民土地运动之间没有建立结合。1905 年革命在城市的发展顶点是 1905 年的 12 月，这就是莫斯科工人的十二月起义；土地运动的顶点——农民在地主庄园“放火”，是在 1907 年；换句话说，农民后卫队开始投入革命的时候，城市中的工人革命先锋队已被击溃，被摧毁。由于这两阶级在行动中没有建立结合，我们失败了。甚至在执行我党的对农民的方针下，我们也还是遭到了失败。而托洛茨基同志当时还批评我们过于注意庄稼汉了，他这就犯了双重错误。在他的领导下革命是永远不会取得胜利的，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尽管作了许多保证，但还是跳过了农民革命阶段。他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对阶级力量的估计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象托洛茨基同志所做的那样，断定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似乎就在于不断革命论呢？！

列宁就那一革命时期和那一阶段写道：“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从这个根本错误中产生了一些局部错误，马尔托夫同志以同情和赞许的态度摘引了两段话，又重复了这些局部错误。为了使问题摆脱马尔托夫同志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至少我们要指明，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断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前提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或者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显然，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看来，或者从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这都是错误的。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

强大政党的存在为前提，也决不是以一般政党的存在为前提。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和党的问题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级的‘联合’根本不是以某个现存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为前提，也根本不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得清楚：无产阶级和农民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的‘联合’，但是当时农民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①农民起什么样的作用？——1905年托洛茨基问道并回答说：要么它是资产阶级的直接走狗，要么农民拥有自己的强大的独立政党。

由此作出了不可能有工人阶级和农民专政的结论，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最尖锐的冲突。换句话说，这里早就排除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在需要号召农民去同地主斗争的时候，托洛茨基已经表现出害怕农民了。托洛茨基害怕那种唯一能战胜沙皇制度的阶级“联合”。

可见，这里有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革命进程中为农民规定了全然不同的作用，这种观点不懂得布尔什维主义的精髓，这种观点如果在起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取得统治地位，那么它就会断送整个革命。

现在我们且越过托洛茨基同志同孟什维克打成一片的反动时期，谈谈我国革命的下一个阶段。拿1917年的二月革命来说吧！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列宁在“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关于农民问题）倒向了不断革命论，那么那时候这位“重新武装起来的”列宁写了些什么呢？在1917年，第一次革命的12年之后，在另一种较为成熟的条件下，在我国资本主义向前迈出巨大的步伐之后，在进行了好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在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奋发已成为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4页。——编者注

事实之后，在西欧出现革命征兆之后，这位天才的无产阶级战略家说了些什么呢？列宁是怎样评价这一新阶段的呢？他在论证自己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提纲（即托洛茨基认为完完全全是按照他的精神写就的那个提纲！）时说：“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也就是说，列宁说，如果他在1917年说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所说的话，那么他列宁就有一下子跳过几个阶段并掉进深渊的危险。列宁接着说：“但我说的不是这回事，而是另一回事。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俄国现在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李沃夫等人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①就是说，列宁说，如果认为我国革命已进入可以提出纯粹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阶段，那是愚蠢的。为什么这是愚蠢的？因为农民土地运动尚未过时。农民还没有把自己的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它还没有把地主扫除干净，它还在向前进。我们的任务在于利用这支革命力量，从而通过这一阶段把革命朝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列宁在这里也考虑到了局势的特点，因为他是辩证地推断的。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总的说来得到证实了，但“事情的具体演变……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论策略书。对时局的估计》）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的方式非常奇特，因为它是同资产阶级政权并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9页。——编者注

存的(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特殊之处就在这里,1917年的特殊条件就在这里。“按照旧方式,结论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才可能是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①

因此,根据这一奇特的局势,列宁说需要转向下一个革命梯级,即面对小资产阶级苏维埃。他还没有提出“共产党人的苏维埃”,他强调农民占多数的苏维埃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一论点。不是直接跳向工人专政,而是小心地迈步越过所有的障碍,仔细地考虑一切可能性,最细心地分析各有其特点的所有过渡阶段。这难道同托洛茨基同志的口号,同他的理论有什么共同之处?请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我们在经济关系领域的政策写了些什么。我们摘引《根本问题之一》一文。列宁同志写道:

“俄国大多数农民会不会要求和实行土地国有化呢?无疑是会的。这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呢?不是。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土地国有化这一措施是同资本主义相容的。但是,这也是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一个打击。”

列宁接着说:

“俄国大多数农民会不会赞成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呢?会不会赞成由一个全国性的国家银行在每一个村庄设立代办所呢?会的,因为这一措施无疑地对人民方便有利。甚至‘护国派’也会赞成这一措施,因为它能够使俄国的‘国防’力量增强很多倍。从经济上来看,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是不是可能呢?没有疑问,完全是可能的。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呢?不是的,——列宁强调说——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再其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27页。——编者注

次，俄国大多数农民会不会赞成把糖厂主的辛迪加收归国有、受工农监督并使糖价降低呢？一定会的，因为这对大多数人民有利。从经济上来看，这样做是不是可能呢？完全可能。”^①等等，等等。

请注意列宁是怎么看待问题的。他不断地提问，“农民”会说些什么？这决不是偶然的。相反地，这里包含着无产阶级领袖所特有的高度的革命冷静态度。这段引文是否表明，布尔什维克采取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观点了？没有的事。在按照经济路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过渡的意义上，列宁极端谨慎地“引导”群众“转入”下一个革命梯级。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和为什么这样做？为了不脱离农民基地，为了逐步地把庄稼汉拉向工人阶级。因为列宁并不把农民看作一定要打破我们所有人的脑袋的必然敌人，而是把它看作可能的同盟者，它有时会发出怨言并常常给工人阶级带来麻烦，但是要善于使它听命于无产阶级，使它成为我们争取无产阶级经济制度斗争中的一股合力。在1917年仍然谈不上托洛茨基同志在1905年已经提出过的任何“工人政府”，而只能同这种口号直接展开争论。列宁说：“我没有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我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我没有说：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说：采取如此这般的措施，这些措施是有利于庄稼汉的，但还不是社会主义，但它们同时也给私有制的统治以打击。”读者看到，这里多么天才地善于发现从一个阶梯向另一个阶梯的过渡，多么天才地善于把握住时局的特点，多么天才地善于抓住需要抓住的那个环节，以使革命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再往前走。我们接近了十月。这里有两个事实是不应忘记的，这就是：一方面，在十月胜利中诞生的革命政府是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7页。——编者注

党人的联合,另一方面,我们采取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并予以贯彻执行,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这个依靠庄稼汉的知识分子组织,在决定性关头被开始夺取庄园的这些庄稼汉吓倒了。列宁显然出于应当吸引农民的考虑,采取了勇敢的策略手段并且说:“你们农民在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下制订了这样一个纲领。好极了。我们来帮助你们贯彻它。”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还依靠农民,在农民中间还有声望。大家都记得,例如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当时多么有声望。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吸收他们参加了政府。而托洛茨基同志那时一点也没提到“合作的庄稼汉”的“反社会主义保障”!用这一政策,用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和吸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的办法,我们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都听命于无产阶级。这对不对?对的。而这同“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一致吗?甚至这一点也不一致。承认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同关于以“合作的庄稼汉”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保障的争论一致吗?当然不一致。这根本就文不对题。还是这样,在谈了这些以后能不能说,有1905年标志的托洛茨基著作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毫无矛盾?能不能断言,布尔什维主义按照托洛茨基主义“重新武装了”?托洛茨基同志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完全不知所云。

而接下去我们这里出现什么情况呢?接下去我们这里是下一个阶段。我们这里革命的深化是沿什么路线进行的呢?顺便说一说,是沿着我们不得不在农村点燃阶级斗争的路线进行的。在十月,工人阶级和几乎全体农民,包括富农在内,是一起反对地主的。为什么?因为摧毁地主对富农也是有利的。

我们是全体群众一起向地主进击的。我们推动全体群众这样做对不对呢?对的。而以后革命是否就停留在这一点上呢?不,它继续向前发展。它怎样发展?通过农民的分化和农村的残酷阶级斗争。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表现在当时的贫农委员会政策

上，贫农委员会在当时是必需的。这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在上层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暴动反对贫农委员会的政策，并且当时富农和部分中农离开了我们，而我们则开始依靠贫农和另一部分中农。这就是说，革命转入了下一阶段。那时候出现的已经是目前形式的工人阶级专政。由此可见，革命的发展并不象托洛茨基同志想象的那么简单。托洛茨基同志把工人阶级专政放到过程的开端，而没看到通向这一专政的阶梯和途径，没看到力量的具体对比，没看到力量对比的变化，没看到革命的各阶段，没看到更换口号的必要性，也就是没有看到胜利地领导革命所必需的一切。而现在他却说：“一切都是照我的意见完成的，因此我是正确的。”一点也不是照您的意见完成的！因为如果我们“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行事，那我们就永远也达不到目的。正因为党是“照列宁的意见”，而不是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行动的，因此我们建立了工人专政。正因为这缘故，我们今后也将“照列宁意见”前进，也就是说，我们要领着农民并依靠农民走向社会主义。

我国革命的特点

现在必须对我们的分析作一总结，如果看一看托洛茨基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给予什么样的一般评价，再看看我们掌握政权之后，我们在国内巩固了工人专政之后，列宁给予什么样的一般评价，那么这个总结就很好做了。在《十月的教训》中托洛茨基同志曾这样写道：“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为独立的革命来看，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出现得过迟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它受到各种矛盾的冲击，这些矛盾立即在两个政权的并存中表现出来了。这样，它势必要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要么处于某种资产阶级

寡头制度之下，使俄国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对于二月革命以后所出现的时期，可以有两种看法：要么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巩固、发展或完成时期，要么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1917年，第1分册第XVIII页）

可见，托洛茨基同志是这样提问题的：我们把二月以后的时期和二月革命要么看作是这一种样式，要么看作是另一种样式。在这里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巩固和完成时期，那就只有这种看法才是正确的。要么我们应当把这一时期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前奏”，那就只有这种看法才是正确的。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公式。“或者，或者”，“要么，要么”。一般评价作出了，对照表制订了。

列宁同志的估计如何呢？让我们打开全集第18卷，看看论苏维埃政权四周年的文章。此文写于我们执政四周年的时期。列宁说了些什么？请看：

“不论无政府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国际上这一类型社会阶层的俄国代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讲了不知多少糊涂话。……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终于）能够前进多远（他这是在苏维埃政权存在四年之后写的！——尼·布·），能够完成无限崇高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哪一部分……”^①说得多么谨慎！下面是该文的另一段引文：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65—566页。——编者注

“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①

请看，问题的提法有多大的差别！在托洛茨基那里是要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社会主义革命。而列宁呢？在列宁那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不能用万里长城把这一阶段同另一阶段隔开。不能在“要么，要么”中选择。俄国革命的特点也就在于此，这就是一种类型的革命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如果从形式逻辑公式的观点去解决问题，那么托洛茨基就完全“正确”了。而如果从生动的辩证的现实和列宁的战斗艺术（而他的艺术也就在于革命的辩证法）的观点出发，那么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极其动人的“计划”就仍然是僵死的、没有生命的、纸面上的东西。而列宁的理论是完全符合列宁这位巨匠的实践，天才的“领导实践”的；现在在阶级关系急剧变化，新问题成堆的时候，为了澄清生活中的混乱，弄清极端复杂的事变，新的口号是必需的，但不需要托洛茨基同志那样的粗劣的作品（那怕用的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这就需要一直拉紧绳子，适应情势并使这些情势趋向于一个目标。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改变了，——再迈出一小步，提出另一个口号并把这一路线实行得不致陷入深渊或大错特错。当托洛茨基同志说：说我似乎低估农民，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就没有错——现在谁都看得很清楚，他有多少对的地方。——完全错了！——说我跳过几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就没有错。——完全错了！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68页。——编者注

至于说最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点上他对了。这是没有意见分歧的。然而当他给自己摆功，说布尔什维克是按照“不断革命”论行事的，因而取得了工人专政，他这完全是自欺自慰。因此，既然托洛茨基坚持自己的错误，那么非常自然地我们必须说，现在，国家又处于转折关头，农民问题被全面提出来了，不断革命问题也提出来了，有人继续坚持不断革命的观点并想把全党拉上这条道路，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不想离开列宁的立场，因为离开这一立场，我们就会断送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上消灭托洛茨基主义，无论如何要使全党站在列宁主义旗帜之下，因为工农联盟问题是个中心问题，这是所有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我们想稍微谈一谈对另一时期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时期我国革命的一般估计。

列宁为理解我国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独创的东西呢？夺取政权以后革命是怎样发展的呢？这里有几样东西在我国的论著中尚未得到它们应得的评价。一般说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应再读一读列宁的著作，因为列宁身上有一个特点：他写得很单纯，常常被许多同志，特别是知识分子忽视——确实大家都觉得“单纯”，而不去认真思考这些“单纯的”东西。而现在，当我们碰到一系列麻烦事，当从许多“小”问题中又冒出对我国革命进程的评价问题、关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等等问题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重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写的全部著作是极其有益的。

拿我国革命的今后前途问题来说。托洛茨基同志说，他对革命动力的估计，他在1905年所作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那么这就是说，在西欧工人阶级胜利以前，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我们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由于自己的反革命的合作者而灭亡。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按照列宁的看法，我们

的任务在于“同庄稼汉和睦相处”。列宁就是这样规定我们行动的总路线的。列宁根本没有说过，如果西方工人阶级没有及时夺取政权，我们就一定会完蛋。为什么？因为只要我们能聪明地行事，我们能同庄稼汉和睦相处就行了。这样一来，去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心理状态现在就可以理解了：革命受延阻，于是用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冲突作赌注加在别人的赌注上。这怎么能不绝望，怎么能不大喊：“救命啊，救命！”而实际上局势并不是绝望的：如果我们不干蠢事，如果我们走工农联盟的道路，我们就能支持下去。只要别干蠢事，只要不犯大错误，只要在这关头极端谨慎小心，只要不大喊大叫地去反对庄稼汉，而竭力贯彻保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政策。我们觉得，意见分歧的基础是在很深刻的理论前提上的分歧，这一分歧就我们所知还没有人分析过，还有待于分析，并且毫无疑问在我们今后的文字争论和理论争论过程中将会得到分析。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通常的、书本上的概念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它大体上可以表述如下：如果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如果它是处于农民从而也就是小经济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怎么也无法胜任庞大的任务，因而此无产阶级必然地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下灭亡。这种观点来自通常的、书本上的、学校里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提法；我们必须说，可惜，在我们自己党内非常广大的党员头脑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提法。

而这一观点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可惜，他的一篇有关小作品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至于他提出来的那些思想没有得到详细研究，那就更不用提了）。我们指的是他论苏汉诺夫的极其出色的文章。这是一颗完全意义上的理论宝石。我们认为引几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中所写的这一真正天才的札记是非常恰当的。

“他们（社会民主党人。——尼·布·）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

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如果不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不作某些改正（从世界历史总的进程来看，这种改正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当作模范的。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免要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近似东方正在开始和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那又怎样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

那又怎样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①

这一思想广阔深远具有非同寻常的独创性的论述是革命辩证法的出色运用。我们看到的是对我国革命特点问题的极其深刻的认识，只有这种认识才能成为正确的和卓有成效的政策的基础。

实际上，通常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是大工业、成熟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具备这一前提，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一定要灭亡，因为结果将是革命的流产。列宁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列宁说：整个说来这是正确的。但在特殊条件下这一正确的观点变成不正确的了。需要看到，这特殊条件是些什么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例如我们俄国在进行世界大战，地主在统治国家并奴役庄稼汉，西欧工人在闹风潮，东方殖民地在起义，等等，所有这些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尽管俄国落后，这一般原理如果完全搬用于具体场合，那就不正确了。这就是关键之所在。我们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札记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解他的整个立场的钥匙。

列宁同志说，一般定理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傻瓜才不懂得，光靠一般原理是活不下去的。请看一看这样一种时机：由于西方的战争和革命、东方业已开始的革命等等特殊条件，工人和农民获得了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掌握工厂并在新的基础上前进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环境之中（资本主义危机等等）。列宁从四面八方攻击了关于革命、关于无产阶级胜利的可能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9—691页。——编者注

性等等通常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对庸俗的、流行的、书本上的观念作了很大的修正；他质问说，你们从哪些书本上看到不可能有这种例外？不言而喻，这样提问题一点也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相反地，这种提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极其巧妙的运用。因为这里抓住了革命的特点，也许是我国革命所特有的、不再重现的特点。而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呢？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关于这一点当然是一点影子都没有的。他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就象“大家”所想象的，就象社会民主党本本上就此所写的，就象通常所议论的那样。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不发达的工业。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但必然灭亡。而列宁同志说，不，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内状况和国际条件可能使这成为不是必然要发生的。

由此产生了不同的预测，不同的前景以及在实际政策的一系列局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由此产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总“计划”：不要脱离庄稼汉的基地，逐步发展工业。要记住，农民经济积累每一戈比的钱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积累每一卢布的基础。在自己的全部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中都要紧紧地抓住庄稼汉。通过合作社改造他们，把他们联合到合作社里来。你拥有银行和贷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对他们进行改造，不要因为他们是私有者而感到发怵。要记住，他们是需要你们予以改造的同盟者。要有耐心，不要赶忙，不要冒险妄为，不要摆出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这会吓走庄稼汉的，如果有时这种道德吓了庄稼人，那就把它装在口袋里，要善于谨慎、明智地引导他们跟自己走，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然而，问一问托洛茨基同志，他那里那怕一星半点地提到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提出的合作制没有？他在哪里写到过，他对这抱什么态度？关于必然灭亡的议论是否同列宁的计划矛盾？

现在就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谈一点意见。在这一点上事情也

不象托洛茨基所想象的那样。照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西欧无产阶级将以国家的方式给予援助：它夺取政权并以此帮助我们从小农的死亡泥坑中拔出来。然而无产阶级没有取胜。但它难道没有帮助我们吗？难道就没有另一种也给予我们援助的力量——殖民地人民的力量了么？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的错误何在？全在于用形式逻辑去处理事物。他没有看到形式的特点、特殊“时期”的特点，这种特点排除了托洛茨基同志所特有的那种问题的提法。在托洛茨基同志看来，要么是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要么是我们的灭亡；要么是国家援助，要么是什么也没有。而现实生活是怎样的呢？而实际生活是一系列半胜利加上殖民地运动，加上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危机。实际生活要丰富多采得多。而这就是特殊的国际局势和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的独特形式，是无法塞进托洛茨基的逻辑公式的狭窄棺材的形式，我们时代最灵活的认识工具——列宁主义把这些全都考虑进去了。

如果中央委员会在农民问题上持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那就会使“国家走向灭亡”。这样的中央委员会确实会毁灭我们的革命，因为它在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纯“无产阶级”政策的幌子下执行的实际上是半孟什维主义的行会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必然把我们推向无底深渊——我们会失去同农民的联系，会突然碰上确实是致命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必须采取极其明确的政治立场的原因。在这里一切个人的爱憎好恶都应置之度外。

托洛茨基同志重又提出了构成托洛茨基主义实质的思想体系；但是我们党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它许多年来与之进行不断斗争的这种观点。不断论对我们来说并非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一旗帜重新飘起，那我们就不得不打起来，因为我们党只有团结在一定的思想政治轴心周围，才能把事业进行到底。但是在这一轴心，在我党立足的地基之下安放了炸药——而现在正这么做，那么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党是无法前进的。我们的革命尚未结束。我们还未完成自己的事业。我们根本就没打算退休，但是要知道，我们迟早不得不让下一代去决定革命的命运。我们必须在党内保持并加强布尔什维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性。我们党还要存在几十年。我们党的历史决不是从1917年10月开始的，也不是在1917年10月结束的。我们党还要存在几十年。我们党是否应当关心保持思想的继承性，我们是否应当用列宁主义思想去教育高等学校学生和共青团员？或者我们应当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旧争论，把它们送进博物馆吧；我们有另一些问题；这些争论与事无关。”不能这样回答。因为这些“旧”争论同新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防止稍稍改造和修正，用“不断革命”手法修正列宁学说的企图。“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讨论这些问题，仔细衡量所有的论据，研究我们的党史，把我党过去的历史同当前的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就是我们使我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保证。

——译自《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年俄文版第98—142页。

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

(1923年10月的教训)

我们现在认为，试图对去年的经济讨论作出批判性的总结远非是多余的。“总结”就是从反对派同志的共同性的错误观点入手来分析反对派的经济纲领，对于这些共同性的错误，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已经作了揭露。由于去年提出的一系列个人性质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所以这样做就尤为必要。从另一方面说，似乎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对中央的批评是错误的。的确，请好好回想一下，他们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宣传了什么。

比如说，在著名的四十六人声明中断言：

“目前形势极端严重，我们不得不……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今年7月底开始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包括党内的）后果，无情地暴露了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很不称职。

中央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体系，在经济方面没有做到收支平衡，结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这些成就停止不前和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的这些成就是自然而然地取得的，不能归功于不称职的领导，而是在不顾这种领导，或者毋宁说，在缺乏任何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

如果不迅速采取广泛、周密、有计划和果断有力的措施，

如果目前这种缺乏领导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经济动荡，与此相联系，必然造成国内形势复杂化，并使我国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全部瘫痪。”

大家知道，没有发生“我们的活动和力量”“全部瘫痪”的任何情况。在经济方面，在党内以及在对外政策方面，“一切情况都是相反的”。在经济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成就决不是由于采取反对派提出的路线而取得的。但是，仍然应当从那些确实真心诚意想要把我们的党从可怕的毁灭的灾祸中“拯救”出来的许多同志的这些错误中得出一些教训。对1923年10月的教训也应当加以批判分析。我们也提醒我们的读者对这一分析予以注意。

一 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阶级（无产阶级的基本战略路线）

在论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的文章中，我们同时指出，在我国革命的进程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具体发生变化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又是怎样站稳脚跟的。从形式上看，托洛茨基同志所希望的东西已经实现（但是他不会也不能导致这种结果，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个过程的各个过渡阶段）。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完全没有正确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毁灭”论等等）。

在这里，我们想用肯定的方式作出，更确切些说，拟定过渡时期关于各个阶级的问题的一般答案，因为这个问题不够明确，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

列宁同志写道：“……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

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国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足以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①

在这个简短的摘录里，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提法的全部实质。但是必须彻底弄清这个实质，或者至少弄清它的一些主要方面。

首先，这种阶级合作的论断，会使从资本主义世界脱胎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吃一惊；而容许同资产阶级合作的说法也许会使这种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吃惊。可见（啊，可怕！啊，可耻！）我们“甚至”要同资产阶级合作。怎样理解这一点呢？怎样对待阶级斗争呢？这一切与我们的总的观点又怎样协调起来呢？这个从阶级斗争理论向（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理论的有争论的“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就是我们“蜕化”的开始吗？

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大概是不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我国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已经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这一系列问题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是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就是炸毁整个社会、分裂社会和摧毁国家的路线。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就是巩固整个社会的路线，就是反对分裂社会的路线，就是加强国家（直到国家开始“消亡”的阶段）的路线。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7页。——编者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主张进行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主张走向共产主义的进化的发展，因为现在不是要摧毁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让它“消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主张在社会内部进行国内战争。

而在无产阶级自己实行专政的条件下，当要巩固专政的时候，它就拥护国内和平，惩罚破坏这种国内和平的行为。

可是，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反映整个社会统一的某种“阶级合作”的外壳，那么，这决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停止，而是阶级斗争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另一方面，这种阶级斗争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分裂和没有崩溃的时候，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而在顺利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开始“消亡”）。

无产阶级专政，即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存在于这个“政治上层建筑”下的各个阶级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我们所有的导师通常都把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看作几乎仅仅是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如果用庄重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革命的上方宝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不可能透过历史的帷幕，比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和他们在俄国的伟大继承人看得更远。但是，列宁在提出合作的论点时，也就提出了今后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在无产阶级国内和平”时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全部复杂的职能的问题。由于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看清在对待各个阶级态度上的全部区别。事实就是如此。

专政的职能对白卫匪帮、地主资产阶级、叛匪等阶层及其残余势力是进行镇压，也只能是镇压。

无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对新资产阶级则抱另一种态度，因为

这个新资产阶级在当前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是社会所需要的一个阶层，它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和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着对社会有益的职能；对待新资产阶级决不能只限于用镇压的办法。在这方面还有无产阶级的合作，而在这种合作之中就包含着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总路线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资产阶级，到一定的时候就战胜它。主要是用经济排挤的方法去战胜它，同时用自己的人和各种机关、设施等代替拥护资产阶级的人和各种机关的方法去战胜它。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用革命的宝剑机械地一挥来砍倒。只有在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战胜它；私人资本现在正在被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排挤出去，它在经济上（由于在凡是适合的地方都施加了国家的压力）正在从自己的阵地上被挤出去，让位给各种更加完善的经济形式。在这里也有镇压，但这不是重点。在这里也有合作，也有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胜利时）在排挤和消灭的基础上将会战胜阶级敌人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形式。归根到底，我们要撵走“耐普曼”。

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政权以间接的方式表现着所有这些类型的关系。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与耐普曼合作，那么，这在社会上绝不意味着国家政权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和耐普曼的政权。任何相对稳定的社会（除了共产主义社会以外）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各种阶级的统一。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社会里国家政权都是各个阶级参加的联合的全民政权。奥托·鲍威尔先生之流的论断就是建立在这种人所共知的混合体的基础上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形成了另一种关系。在这里有镇压的因素吗？有，但程度非常小（附带指出，对无产阶级也可能用强制手段，因为先锋队有时候要压制自己的后卫）。这

里有合作吗？有，但程度非常大，而且是在各种阶级分歧和阶级摩擦的程度都很小的情况下。在这里（在社会主义胜利时）发展的总趋势也是既制服各种经济形式，又制服一种社会阶级类型。但是这种“制服”在这里并不等于排挤或者消灭。“制服”在这里是逐渐地改造个体经济，改造个人主义的社会类型。

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间接地表现这种合作的类型。但是，在这里它也不会不是一个依靠农民和领导农民的无产阶级政权。

总之，我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

1. 镇压；
2. 合作和斗争；通过排挤来加以制服；
3. 更多的合作，更少的斗争；通过与排挤相反的改造来加以制服。

当然，以上是一些扼要的论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说，它们都是以向社会主义发展作为前提的。如果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将由党和工人阶级的具体实践、具体斗争和具体路线来加以解决），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就会导致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来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合作”就要破裂，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推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有时也可能遭受很大的危险，但总的路线毕竟向好的方面发展，因此，整个说来，这个联盟会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将会退却。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所应当争取和保卫的这条路线，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路线，而工人阶级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和主导力量。归根到底，这场斗争将决定何种实际结局，将决定列宁所说的“两种结局”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实现哪一种结局。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而来提出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在一定时期内（由

于资产阶级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曾是“民族的代表”。当资产阶级社会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整个社会的领导力量时,这种论断是含有一部分真理的。当资产阶级学者们抹杀“等级制”的阶级性时,他们就是开始在犯错误、说谎和进行诡辩,他们撒谎说,似乎“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他们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注定要处于雇佣奴隶的地位,它如果不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翻身。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则是另一种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工人阶级领导整个社会。但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是力求在实际上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农民,把它提高到和自己一样的水平。农民绝对不是注定要过自己的“农民”生活。恰恰相反,它将经常(如果我们向前迈进的话)“在合作社的锅炉里烧炼”,因此,它一定会离开自己个人主义的“粪堆”。统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在不断地尖锐化,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领导的无产阶级和被领导的农民的关系,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相反,正在相反的意义起着变化。

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两个阶级的对立,到一定的时候是一定会消失的,因为农民阶级将日益成为一个配角,成为一个落后阶层和社会主义社会工作者的后卫即“一般”劳动者的后卫。

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未来完全搬到现在,而忽视现在的阶级斗争和工人与农民之间阶级摩擦的各种不同形式以及农民内部的分化等等问题,那就是最愚蠢的马尼洛夫精神和用感伤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基本的总前途,那也同样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任务是复杂而又困难的,因为具体的发展是极其矛盾的。但是,每一次都必须善于抓住具体实际,坚持自己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是由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

问题的总的提法即总战略计划所决定的。因此，列宁在1922年4月决定我们的总路线时说：“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群众一道前进，用事实、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正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如何来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前进。……”

如果说，我们党内还有反对这种极缓慢极谨慎的行动的论调，那也只是极个别的。”^①

二 经济结合问题和反对派对问题的总的提法。所谓“工业专政”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我们在前面从阶级关系的观点全面分析过的东西，也适用于相应的经济形式，这些形式也决定着社会阶级类型及其特点。

应当始终认识清楚，我们这里有某种客观上存在的经济“整体”，即所谓“国民经济”。它的各部分是互相矛盾的；这里存在着许多对抗。这些对抗同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其相互关系的那三种阶级对抗一样，是沿着同一条路线发展的。但同时也存在着这些部分的相互依赖，它们的“合作”。换句话说，它们虽然处于相互的斗争之中，但却是社会整体的从属现象。阶级斗争、阶级合作和阶级联盟现在正是通过各种经济形式的斗争实行的，这些经济形式的实际体现者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农民经济在国家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表现在农民的社会比重上，但不是“成正比的”，因为农民仍然由于经济结构而被分为各个农户。无产阶级工业只有依靠农民市场，才能起经济上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农民经济中的积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56页。——编者注

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无法长期进行的。一个依赖另一个。我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两半最迅速地互促成果的问题。因此，如果想要解决某个大的经济问题只从一个经济部门出发，那么一切尝试都预先注定要失败。因为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必然要超出工业的界限。正象我们基本的、主要的、决定性的政治问题是由无产阶级决定的，但可以说不是“无产阶级内部性质”的问题一样，决定性的经济问题也是处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相互关系之中的。正因为如此，工农联盟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千百万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结合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

“应当知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借以为生的农业结合起来。以前没有这种结合，所以现在我们先要建立这种结合。我们作一切事情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①

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是这样说的。应当向农民证明，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我们必须证明这一点，不然农民就会把我们抛到九霄云外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应当明白这一点：负债（对农民。——尼·布·）的人总是要着急的。要知道，全国农民不再给我们信贷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如果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农民就会要求现金交易了。”（同上，第29页）^②

从这里产生了“学会做生意”的口号。因为城市新经济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结合”、相互影响是通过商业来进行的。而当1923年秋我们这里的城乡商品流转停止的时候，这就是结合的危机。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6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37页。——编者注

反对派同志究竟怎样对待问题呢？他们想要怎样解决当前的棘手的问题呢？他们那时向何处看？从哪里去找答案？

反对派的经济学家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的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不仅必须提出基本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国有化工业同农民经济结合的问题，而且必须解释为什么这种结合在过去那段时期内没有搞好，为什么农村同私人手工业和私人商业资本的结合却发展得更为顺利。基本的原因是，缺乏把国营经济各部门的工作统一起来的计划”等等。（《真理报》1924年1月1日）

皮达可夫同志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解释说，只有国营经济才谈得上计划，并说中心问题有两个：“我们将怎样管理我们的国营经济”和“应当怎样实行计划”。

他继续说：“如果我们以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特别强调的不正是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结合的问题。”（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红色处女地》出版社1924年版第23页。）

托洛茨基同志在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第一封信（1923年10月8日）中确定了结合口号的“实际经济内容”：

“计划经济，工业硬性集中；工业和商业附加费用的硬性降低。”

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由托洛茨基同志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为了加进关于农民经济的意义的一段话而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托洛茨基同志表示反对，指出在关于工业的决议中不容许加进这段——自然是正确的——话。经过为时很久的谈判，在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坚持下还是加进了这段话。

这些摘录和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所有同志口头上都承认农

民经济的意义。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彻底考虑这个问题，这里正是过去的反对派所犯的大部分错误的根源。

事实上中央的论敌是在不越出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他们是从国营经济内部、有时甚至单从工业“内部”来“解决”结合问题的，他们的全部论述难道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

他们把工业和农民经济割裂开来而孤立地考虑这个工业，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他们的结合口号的“实际经济内容”忽视了这一口号真正的“实际经济内容”，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城乡“分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工业品价格高；这种价格同国内（农民）市场的容量的矛盾；货币在商品关系发展中不断贬值，货币关系——一般商品流转特别是城乡商品流转的条件——崩溃；同时在农民经济中进行积累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非常困难的（买、卖和以货币形式进行积累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完全的分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在国营经济范围内或更干脆，在工业范围内寻求解决结合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对问题的实质完全不懂的表现。

可以对党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和“反对派的立场”之间的差别作如下的概述：

中央的立场：毛病在于国营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主要在于流通领域（行不通的价格，苏维埃纸币的濒死状态）。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只有推动流通过程运行，我们才能很好地医治国家的生产（迫使降低成本，使生产合理化等等），城乡之间的“物质变换”（“结合”）也才会得到加强。

反对派的立场：毛病在于缺乏计划，这可以说是国家计划的毛病。因此，它存在于国营经济部门，实际上存在于国营工业部门。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通过“国家计划”治好工业之后，我们自然会解决结合的任务。

这样说来，中央是从流通（货币、价格、商品）走向生产，而反对派（听起来多么象“马克思主义”）则是从生产（合理的计划）走向流通。

当然，不应当从平常的、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区别。这里说的只是整个问题的重心。我们认为，有了这个附带条件，我们对问题的提法就是唯一正确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无疑是这样的——读者便可以看到“反对派错误”的特殊逻辑，这种逻辑的根源完全在于“对农民估计不足”，这是批评者同志竭力否认（在口头上）的。

这个基本的缺点也存在于托洛茨基同志维护的“工业专政”的论点中。

托洛茨基同志写道：“……在国营联合企业内部，‘专政’权不应当掌握在财政金融手里，而应当掌握在工业手里。当然，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专政’一词的意义在这里是很有限和有条件的：它是与财政金融所要求的‘专政’相对立的。换句话说，不仅对外贸易，而且还有恢复稳定的通货的工作，都必须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托洛茨基同志在回击批评时继续说：“当然，这决不会是针对结合即整个国营‘联合企业’和农民经济的正确的相互关系的。相反地，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才能逐渐把这种‘结合’从华丽的辞藻方面转到经济现实方面来。”（托洛茨基《新方针》，第71—72页。）

托洛茨基同志进一步用事实来证明他决不主张加速工业积累的增长。事实确实如此：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没有坚持这样做，而其他人却坚持这样做。但是我们感到，这些“其他人”较好地做到了首尾一致。因为从“工业专政”，即使从托洛茨基同志在《新方针》

中所阐述的那种“工业专政”中，得不出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那些结论。

请看事实上托洛茨基同志是怎样确定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营工业之间的关系的。他主张对财政人民委员部实行工业专政。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提一个小意见。不能把我们的财政人民委员部视为同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部一样的机构。我们国家的预算结构基本上和原则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预算结构，因为我们的“国营经济”原则上不同于任何资产阶级大学的古典“财政学”上的“国营经济”。它包括全部大工业、全部运输业、国营商业、苏维埃经济等等，即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民经济”。因此，我们这里不可能有“国民经济利益”和“国库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我们且不说对预算的阶级鉴定，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托洛茨基同志毫无根据地认为，财政人民委员部同运输业等等一样，都是“国营联合企业”的一部分。（见《新方针》第71页）。

第二，托洛茨基同志忽视了这样一点：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活动不仅包括全部国营工业，不仅包括全部国营经济成分，而且包括全部私有经济成分（虽然“按另一种方式”）。

第三，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考虑到，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财政资金的分配（预算）以及（间接地，通过国家银行）贷款问题都是通过财政人民委员部进行的，也就是说，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示等等）国民经济（而不仅是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实际的协调。

第四，托洛茨基同志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货币制度（它是对国民经济的所有环节都具有意义的商品经济总和的基本前提）是

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发生直接联系的。信贷制度和银行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对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业专政应当存在，这就意味着不理解这个工业同非国营经济成分，即首先是同农民经济的实际联系。

托洛茨基同志纯理性地、一般地、抽象地提出问题，这一点从他关于通货的论断（在货币问题“热”的时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归根到底”一切都“服从于”大工业发展的问题，因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主导因素等等，等等。问题仍旧不在这里，不在这些政治经济的“基本知识”。问题在于，在一定的具体的时间，在一定的具体的条件下，货币制度问题可以成为一个“环节”。而那时一切都应当“服从”这一问题。但这已经是另一个论题，下面我们就要谈到这一论题。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反对派经济理论家的基本错误（“方法论上的”错误）；他们孤立地考虑工业，他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因此，根据他们对问题的提法，他们还不能提出整套正确的措施，因为他们不朝他们应该看的地方去看。

最有趣的是，这种错误按其类型来说完全重复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他人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实际上，那时他们是怎样论述的呢？

“新经济政策”、经济自由等等，这很好。这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同工会有什么关系呢？这同国营工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工业“问题的特殊性”在托洛茨基那里成为反对关于农民经济的作用的一段话的论据）。

当时他们就是这样论述的，实际上象折衷主义者那样看不到提上日程的大问题的一般联系而进行论述。

孤立地分析工业、也可以说是对工业实行实验室闭门疗法的这种错误，去年又重现了。不难理解——不管犯错误者本人是否承认还是不否认这一点，这种错误是同不理解农民经济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下面的论述中将进一步得到证实。

三 关于“计划”问题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计划问题在辩论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反对派把“计划”、“计划因素”、“机动性计划”等等看作免除一切经济以及其他任何灾祸的灵丹妙药。

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计划经济和一般计划；我们早在去年就已经不再简单幼稚地提出问题了，不再盲目地把党拉向后退、要党去议论“玻璃的用途”。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何实际地接近，即使是稍微接近名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应当再次回想一下，情况是怎样的，具体的广义的“经济形势”是怎样的。

基本事实就是工业和农民经济几乎完全分离。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没有可能和没有前途。农民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因为他们不关心其商品率的增长；农民经济的产品价格低得可怕，出售对他们无利可图；工业品的价格非常高，他们没有可能购买。所以，从农民经济方面来说，为买而订立预售合同也不再有什么意义。这种情况由于货币即苏维埃纸币惨跌而极其尖锐化。保存苏维埃纸币是十分危险的——这种纸币的购买力不仅每天在下降，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下降。货币“积累”是不可能的，因此随着扩大一般商品经济的阻力的增大，实际的积累停止了。甚至有限的单独的农民经济“计划”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甚至无法初步估计和计算经济因素，税收等等就不用说了。

这就是农民经济的概况。

工业的情况又怎样呢？首先是销售没有可能。工业走入了死胡同，工业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就是说遇到了容量小的国内农民市场。销售的过程停止了。因此，生产和积累也停止了。货币贬值，存在着无数的“指数”，匆匆忙忙试图解决难以解决的任务，即试图在经济因素普遍不稳定的情况下寻求准确的计算标准，这就使这里没有可能进行准确的计算、核算、统计成本和平衡等等。个别的企业、托拉斯或某个更低一级的生产单位甚至缺乏最起码的计划的起码的基础。

这样一来，在国民经济两大部分结合的基本方面就出现了完全的绝对的分隔。而任何一个基层生产单位，无论农民方面或国营工业方面，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制定“计划”，因为多灾多难的苏维埃纸币正奄奄一息。

反对派同志在这种条件下究竟怎样建议采用计划经济的呢？

皮达可夫同志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如果象李可夫同志那样对待计划经济问题，即制定包括农业在内的苏联整个国民经济计划，那么，我们当然要说：在目前存在着规模极为庞大的农民经济的情况下，制定这样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谈到计划和经济管理时，首先（而“其次”呢？——尼·布·）出现的是国营经济管理问题，使这个管理具有自觉性和系统性即计划性的问题。”（速记记录，第20页。）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建立那种国营经济管理体制（我要强调：指的是整个国营经济，不是农民经济，也不是私有经济，而正是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国民经济），那么，我们就会完全明白，我们应当以某种工作计划去适合我们的这种经济。”（同上，第22页。）

这个初看起来无可非议的表述值得仔细研究。似乎这里面真有关于计划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奥学问。在即将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将看到，这些表述有多么片面，不辩证，僵死，实际上“令人怀疑”。

皮达可夫同志嘲笑目前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但是，只有把“计划”理解为符合他的“纯净的”思想的东西，这种嘲笑才是合适的。不过这种理想的计划，就是对那种甚至只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国营工业即同国民经济的私有经济成分没有任何联系的国营工业来说，也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这里只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程合理化（使之具有自觉性）。农民经济和国营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否处于这种趋势之外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看出，这个问题也包括在“计划”问题之内，现在就已经包括在内。我们更具体地分析一下，是否可以不考虑税收而制定经济计划？不行。是否可以不考虑大致的收成（即便是初步估计）而考虑税收？不行。是否可以不考虑农民市场的容量而制定工业计划？不行。是否可以不管价格问题而提出市场容量的问题？不行。如此等等。

托洛茨基同志同皮达可夫同志不一样，他在一处几乎接近正确地提出问题，但马上又从这里跳开了。他在《新方针》中写道：

“当然，对农民市场进行预测……无论如何不可能精确。单单因为收成等等情况的变化无常，这里严重的差错就在所难免。这些差错将通过市场以局部的或者甚至普遍的产品不足、混乱和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如此，但是只要更加认真地、把计划领导推行到国营经济所有部门中去，使这些部门不断地统一步伐，那么这些危机就不会尖锐和持久，这是很明显的。”（第70页）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估计（同志们！要了解，也是“有计划地”估计）城乡相互关系方面的“差错”问题，但马上又跑去议论“独立

自在的”国营经济部门!

整个问题的提法使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计划（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也不是理想意义上的，而是具体的实际意义上的）领导的最主要的问题模糊起来。请把我们不仅仅同国营工业有关的“计划”的公式阐明一下吧。“计划”是什么呢？在托洛茨基看来，计划就是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配合”。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消灭比例失调的现象”，或“消灭无政府状态”。但是，只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不懂得，在比例失调的概念中也包括同消费的“配合”，也就是在目前情况下同农民市场的总和的“配合”。根据托洛茨基的看法，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嗯，在对待农民市场方面的差错是会有有的，但重心在于“国营经济”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而实际上呢？实际上情况是这样的：国营工业内部的这种相互关系（“配合”）本身决定于同农民市场的相互关系。管不着这种相互关系的这种“计划”就不是计划，因为这种相互关系正是整个计划的基础。应当充分考虑和永远记取这一点。

如果在考虑基本的相互关系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发生错误，我们工业各部门之间的任何最“协调的”“配合”都无法免除最大的震动。

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彼·伯·司徒卢威在他的《经济 and 价格》一书中谈到经济的基本的“二元论”，也就是说，在任何经济中都必定有两个“因素”：自发的因素和自觉的因素（“计划”，“合理化”）。他认为经济普遍合理化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这样认为。但我们同时看到，合理化是一个过程，是“计划因素”在增长。我们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自发过程的任何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这种合理化因素，这种“计划”带到这一过程中去。但实际上应当善于在这里采取能够切实促进社会经济合理化因素增长的措施。这里有各种类型：对分散的农民经济的调节（很弱，因为

现在只有能做到这种程度)，这是一种类型；根据对大致的收获量的统计进行的核算，这是确定税收额的基础，我们说这是另一种类型；国营工业的大体上准确的生产规划，这是“结合”的第三种类型，等等。我们的“计划”工作恰恰是很复杂的。尽管制定计划是很复杂的，但我们认为，这一点仍然是清楚的：农民市场的统计问题是制定计划的基本工作之一。

如果是这样，那总会有人提问：在国家经济中，是否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即关于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更确切些说，关于流通过程和这一过程的条件问题是作为有决定意义的，作为列宁的“环节”，作为压倒一切其他问题和任务（当然，从相对意义上说）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这可能还是不可能呢？

当然是可能的。1923年秋我们就有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国民经济生活的“关键”就在于此，正是应当朝这里看，才能找出治病正确方法。

在反对派的理论家们那里有时在这一方面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意识，例如，他们的决议中（《真理报》1924年1月1日号）有的地方就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国营工业的发展是自发地，而没有同农业的发展保持平衡，那么，这就是没有计划和领导的结果。”

“没有”是说得太厉害了。但差错是有的，——有谁否认过这一点呢？有严重的缺点——有谁不同意这一点呢？但在什么地方：“这里”？“这里”又是哪里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对此不能草率地作出回答。如果反对派说：计划，计划，还是计划，还是国家计划，那么，党内大多数人则断言：根本问题在于不正确的价格政策和没有稳定的通货，朝这里看看吧，就在这里修补、校正和改善结合吧。这将是实际上向计划推进。

下面我们就来更具体地分析这些问题。这里我们还要引证反

对派经济学家决议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地和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的错误。

决议（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决议。——尼·布·）把实行计划领导的可能性同建立稳定的通货联系起来，从而把推迟实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尼·布·）解释为出于事先实行币制改革的必要性。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因为如果没有财政同其他国营经济和国民经济普遍的和不断的协调一致，保证真正稳定的货币流通是不可想象的。

一切有关“计划领导”的见解看起来多么奇怪。首先，它完全不存在。然后，象机器神一样，它完全存在。毫不含糊。一切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硬性的”。但要知道，理论是由生活检验的。难道不是吗？在这个观点下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反对派的“计划”建议没有被采纳。被采纳的是另一个“计划”。结果怎样呢？我们的情况，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得到了改善，我们稳定的通货即“真正稳定的货币流通”也巩固了。

但是对不起，这本来不是“不可想象的”吗？

不过，只有反对派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前提是“可以想象的”，那上述情况才会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稳定的货币流通”使反对派的经济纲领绝对不稳定，并毫不费力地把反对派打翻“在地”。

因此，对于反对派关于计划的一切议论，可以引用列宁的下面一段话作为座右铭：

“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人员不善于处理问题，他们用知识分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空想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这里有过并且现在还有日常的粮食计划和燃料计划。我们在这两种计划中都犯过一些明显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是不容有两种意见的。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决不会去编制毫无意义的提

纲，而会去细心研究事实、数字和材料，分析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且说明：我们在某某地方犯了错误，要用某种方法来改正。实事求是的行政人员一定会根据这种研究，提出建议或自行采取措施，来调换工作人员，改变汇报制度，改组机构等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看到过用这种或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统一的经济计划的事实。”^①而在另一处（在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列宁同志写道：

“关于计划，米·发表了一通谬论。最大的危险（请听！——尼·布·）就是把国家经济计划问题官僚主义化。这是莫大的危险。米·看不见这种危险。我很担心，连您也用另一种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看不见这种危险……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商品交换和计划工作》，莫斯科国家计划委员会出版社1924年版第16页。）^②

还应长期牢记这番话，以避免列宁同志所说的那种“巨大的危险”。

四 价格政策

上面我们看到，工业遇到了狭窄的国内市场，首先是农民市场。（另一个问题，即农民经济的产品和粮食出口的价格问题象“医治”的方法问题一样清楚，不必进一步去分析了。）因此，“首先”应当研究一下，实际的价格同工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什么关系。在讨论危机的性质问题时，有些同志在争论中不止一次地愤慨地对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74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编者注

“生产过剩危机”的提法表示抗议。他们说，当农民迫切需要某种商品时，但却买不到，这是什么生产过剩危机！？在“四个福音书作者”的决议中，危机被描绘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调和预测不周的危机”。似乎并非任何危机都是失调的危机！似乎如果完全“协调”（即充分的合理化和全面的计划），还可以谈危机！

对“生产过剩”的抗议是建筑在对市场经济的整个机制的非常天真的想法之上的。这样说来，不能说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过剩危机，因为生产需求的饱和从来不是事实，而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总是生产不足。当谈到生产过剩时，常常说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常常说的是一定的价格。只能这样提出问题。但是，这还不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在垄断经济条件下关于价格的制定问题，关于卡特尔超额利润的高度问题，关于为了加速商品周转、扩大市场和从这一端实行发展工业的政策而放弃一部分超额利润或全部超额利润的可能性问题。

我们在反对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的文章中，已经在一般表述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且对它作了透彻的分析。

因此我们根本不打算在这里重复全部论据。我们要研究的仅仅是反对派的经济领导人是怎样“找出理由”来反对中央建议的降低价格政策的。

例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理论前提是：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告诫党说：“同志们，我们不当轻视我党的理论，因此，当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就应当理解我们面前出现的一切倾向的意义……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根据我们苏维埃经济的经验来确定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在于，每一个单独的企业（比较大型的、技术较高的）在竞争中

都击败了手工业。消费者-购买者购买比较廉价的商品，因此决定了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的命运。这最经常是在国家对这一过程采取曼彻斯特态度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国家也支持另一些形式的工业。

同志们，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的个别企业，甚至个别托拉斯，在纯粹的竞争中会遇到逐渐蜕化和变为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的各种危险。它们的力量并不在于它们通过这种方法（即显然是通过低廉价格的竞争方法。——尼·布·）可以取得胜利，而在于整个国营经济，整个国营经济综合体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切都比新经济政策强”（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34页，所有着重号都是我加的。——尼·布·）。

这是多么“恶毒”！甚至“国家的曼彻斯特态度”也用在那些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观点的人身上。

他的论点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新奇的是，他把“计划性”即我们国营经济综合体的相对统一性与低廉价格政策对立起来。这就是奇怪的地方，这就是真正新奇的地方。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再说：

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比资本主义的工业优越，因为它是或者可以是一个握得比较紧的拳头，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况去全力降低商品的价格，用低廉的价格去打击私人工商业者等等。——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没有这样说，而是得出这样一种“理论”：因为私人资本家分散行动，进行竞争，打击竞争者，以低廉的价格争取买者；

又因为我们不应该有个人主义、曼彻斯特精神等等，所以……就不应当卖得便宜，——否则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方法。

这就是逻辑！这就是“方法”！这就是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任务的了解！

反对派不仅没有看到他们应该看到的东西，当别人把他们推上正确的道路时，他们却停步不前。由于对农民经济采取君主式的蔑视态度，所以人们就没法“发觉”经济政策的真正“大象”，即降低价格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不降低价格就不能使工业真正振兴起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下述论点也是饶有趣味的。他就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我们从外部通过征收直接税或者通过一定的价格政策来获得价值。当然，每个人都会说，征收直接税的方法是最危险的方法，它会导致同农民的分离。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如果农民通过纳税，使我们可以积累 3 亿卢布，另外，比如说，通过从国营工业得到的利润积累 2 亿卢布，那么，我们共积累 5 亿卢布。

如果让农民……通过纳税提供 2 亿，通过一定的价格政策提供 3 亿，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得到款项，得到某一既定的款项，这样难道在政治上不是更有利，难道这不是很清楚的事（速记记录第 35 页）。

乍一看来，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数学推论，但是这种推论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它是以某种一成不变的已知数为前提的。

难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没有听说过，通过加快周转，可以得到好处吗？

难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没有听说过，通过价格，不过是要通过出售更多数量的商品（即扩大市场），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吗？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那里能找到即便是一点影子来证明周转速度不能加快（它是“既定的”），出售商品的数量始终不变这

种情况吗？

如果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这样简单的方法来讨论问题，那事情就会变得毫无出路了。幸好反对派经济学家的意识是一回事，苏维埃经济的现实存在是另一回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成了垄断偏见的俘虏，——他的不幸就在于此。

甚至连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什么地方。例如，十月号的《经济学家杂志》登载了伊夫·居约的一篇文章，题为《购买力因降低价格而提高》。这位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论点（当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即“降低单位（产品）的价格，可以提高它们的总价值，因为这种降低引起了需求”（第144页）。居约先生认为这是真正占领市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否会说，居约先生是企图使法国资本家上当呢？

加速周转，扩大市场，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生产，从这里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价格，进一步扩大市场，等等。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道路。我们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实现同农民的结合。我们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政策，就是因为我们具有我们国营经济相对计划性的优越性。

皮达可夫同志就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结合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比价的问题（谢天谢地！——尼·布·）……我们就是这样来对待调节价格问题的。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说明不应该这样经营我们的国营经济。我们本来以为（在决议中就是这样说的），用单纯的相应的命令来降低价格，迫使托拉斯减少附加开支，减少利润，改进生产，这样，价格就一定会降下来。我断言，结果并非如此，因为问题不仅在这里，而在于进入市场的商品的数量……（第25页）”

皮达可夫同志指出，即使托拉斯的出厂价格低廉，私商也可以按昂贵的零售价格出售。他由此得出了下述结论：

“我们这样调节价格所造成的结果，不是农民同我们工业的结合，而是私人资本的积累以及私人企业主同农民的结合。”（同上）

如果皮达可夫同志抱怨商品数量少，那么，弗·米·斯米尔诺夫同志对下面这种情况也表示愤懑，即到了秋天——

“大大压缩贷款，迫使我们的商业机构在市场上抛售在夏天储存的全部商品，而这种抛售恰恰又是在农民缴纳最大数量的农业税的时候。”（速记记录，第70页）

可见，首先是“商品数量”的问题，并且又是危机的性质的问题。如果说到农户的需求，那就要看到严重的生产不足。

如果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角度谈问题，那就要看到生产过剩。

但是，销售危机本身为什么没有促使价格降低呢？

非常简单：因为有工业中的百分之百的垄断，即工业至今仍享有有保障的国家贷款，因此它没有足够的积极性用较低廉的价格去占领市场。

这种已经产生了垄断的腐朽和停滞现象的特权地位找到了反对派同志这样的辩护士。为了消灭这种停滞现象，应当驳倒党内反对派的行会的和狭隘的观点，这种观点妨碍人们去观察国营经济以外的事情，因而对国营经济本身也是有害的。

关于私人资本会发财的论点，确实是为了不降低价格而臆造出来的可怜的诡辩。正因为考虑到差价会落入私人中间商的口袋，所以必须扩大合作社的宣传鼓动，撕掉私人中间商这种强盗所戴的面具，在经济上揭露他们，并建立自己的商业，加强合作社商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前进。害怕这种斗争，就是“害怕狼，就不进

入森林”。

一些反对派的同志说,承认“生产过剩”会造成工业的收缩。除非生产过剩不是同不合理的价格联系在一起,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忽略了这种联系。相反,中央的观点是迫使国营工业不吃现成饭,活跃起来,去寻求市场,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就。垄断的傲慢态度被打掉了,这种傲慢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美德不在于努力改进同农民的结合,而在于享有行政特权,想要什么就拿什么,遇到困难和商业周转不灵就向国库伸手,靠对社会主义祖国有功而索取贷款。

实践完全证明降低价格的政策是正确的。商品周转扩大了,工业起步了,各种经济因素开始迅速得多地动员起来了,资本的使用开始更有效了,就是说,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降低价格对工业带来多少好处,可以用下列对照表来说明。

出厂价格降低情况

从1923年10月1日至1924年10月1日下降30—35%

	同战前价格相比(%)		
	1923年10月1日	1924年10月1日	降低(%)
制革.....	322	218	33
食品.....	325	211	35
硅盐酸建筑材料.....	304	208	32
五金.....	207	177	15 ^①
纺织.....	271	177	35
燃料.....	210	173	18
电气.....	176	160	9
造纸.....	179	141	21
化工.....	175	124	29
石油.....	117	101	28
整个工业.....	247	177	29

① 或30—35%,如果考虑到10月份和11月份价格降低情况。

值得指出的是,某些商品价格下降了。例如,钉子的价格下降47%,鞋掌——48%,染料——52%,薄呢绒——61%,马合烟——71%,毛纺工业品——46.5%。

在价格如此下降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业毁灭了吗?根本没有。工业第一次开始迅速扩大。当然,把工业的扩大仅仅归因于价格的下降,是荒谬的。但是,这种政策无疑加快了周转,消除了由于对我们国营工业的经济政策进行垄断的歪曲而造成的停滞不前的因素,有助于克服“销售”危机。在对高昂的价格进行首批的打击以后,在外省的和莫斯科的市场上,都出现了商品流转的活跃情况。到1924年秋,已经供不应求。

商品流转的扩大,可以从下表(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材料)中看出:

在工业品价格降低30%的情况下,工业产值从1 191 000战前卢布增加到1 548 000战前卢布,即已增加了30%。在这里,不仅轻工业增长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生产国家固定资本的重工业也开始增长。棉织品成品的数量(以产品计)增长了43.8%,铁矿石增长了109.5%,生铁增加了121.5%,钢增加了69.7%,轧钢增加了51.9%^①。

这并不是“违背中央的意志”,而是违背(在一定的意义上)反对派的意志发生的,就是说,是在中央的支持下发生的。因为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看到了应当看到的问题之所在。

现在看来,几乎所有的人事后都承认,降低价格的政策大大推动了成本的实际降低。可以用价格降低得特别显著的纺织工业部门的下列数字,作为说明这个过程例证(当然,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降低价格,但是,谁也不会对这个因素所发生的非常巨大的影

^① 1923—24执行年度国营工业的初步工作总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统计局统计月报第9号附刊)。

各辛迪加在 1923—1924 年的销售额

(单位: 千卢布)

辛迪加的名称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总 计
全苏纺织辛迪加·····	28 755.2	50 758.0	74 528.6	99 927.7	253 979.5
%	100	176	259	347	
全苏制革辛迪加·····	9 165.9	9 941.0	11 014.0	14 407.9	44 529.8
%	100	108	120	158	
盐业辛迪加·····	7 885.2	9 177.7	11 082.0	8 850.0	36 994.9
%	100	116	140	112	
石油辛迪加·····	7 562.6	6 873.4	3 218.8	9 293.8	26 948.6
%	100	90	42	123	
硅盐酸建筑材料专业公司·····	3 156.8	3 351.1	3 954.4	4 972.6	15 434.9
%	100	106	125	157	
五金辛迪加·····	1 654.1	3 294.9	5 393.5	7 749.5	18 092.0
%	100	193	326	468	
农业机器辛迪加·····	281.4	2 690.3	964.1	776.6	4 712.4
%	100	960	344	276	
植物油辛迪加·····	861.7	280.0	618.5	1 205.3	2 965.5
%	100	32	71	140	
马合烟辛迪加·····	397.7	855.5	1 597.4	1 975.2	4 822.8
%	100	217	405	501	
火柴辛迪加·····	855.9	52.4	—	—	908.3
%	100	6	—	—	
油脂辛迪加·····	121.3	426.4	377.0	664.0	1 588.7
%	100	352	311	548	
淀粉饴糖专业公司·····	44.1	26.7	—	—	70.8
%	100	60	—	—	
罐头专业公司·····	31.4	—	—	—	31.4
%	100	—	—	—	
乌拉尔冶金专业公司·····	11 061.5	11 895.7	18 106.7	17 590.1	58 654.0
%	100	108	164	159	
总 计	71 832.8	99 633.1	130 855.0	167 412.7	469 732.6
百分比	100	138	182	233	

响去进行争辩)。

成本降低情况(一年内)^①

棉纺织业	49%
粗毛纺织业	40%
细呢绒纺织业	70%
精梳毛纺织业	53%
亚麻纺织业	50%

这个过程也将促使价格进一步降低,从而最牢固地掌握市场,其中首先是农民市场。我们利用我们国营经济统一的一切优越性,利用我们现有计划(不是绝对的、不是“完整的”、不是完善的)的一切可能性,我们一定能在这个基础上减少成本,降低价格,越来越有力地加速商品流转,越来越有效地利用单位资本,越来越加速城乡经济相互影响的速度,从而成倍地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结合”,并同时扩展我们的国营工业。

应该懂得,我们的“官办”工厂丝毫不应当沾染资产阶级国家“官办工厂”的官僚主义,丝毫不应该具有垄断资本主义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不懈地努力扩大生产。在市场的条件下,把保持价格低廉的方法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那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把国内战争的方法看作是“资产阶级的”。

五 币 制 改 革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反对派分子对币制改革采取的态度。他们实质上不承认币制改革是加强经济“计划性”的必要前提。

^① 数字引自国营工业中央管理局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同志的报告。

他们认为币制改革不是那回事。

如果仔细想一想这种情况并且在这里找一找这样对待问题的最深刻的原因，那么，这里就暴露出反对派纲领的主要缺点：不理解国营工业同农民经济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点：

第一，对市场、市场联系的形式和稳定的通货估计不足，不了解稳定的通货是健全的市场商品流转和商品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二，希望苏维埃纸币能继续“拯救”我们。这种希望也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发挥的“社会主义积累”的整个理论有联系的。发行纸币确实是一种秘密的税收形式（顺便说一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完全没有必要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上说他首先发现了这个真理）。而既然社会主义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应当（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这是政策的基础）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而决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低廉的价格来进行，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想抓住这种可爱的、美好的苏维埃纸币的巨大欲望。

可以说，这两点都同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残余有关，同不理解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政策的特殊方法有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周转的速度必定是只有土里土气的守财奴和吝啬人才会轻视而会划算的“管家人”不会轻视的一个数量。

因此，在这里，全部智慧归根到底是要勾画一条“路线”，且慢进行币制改革，国营经济可以躺在计划上，因为在这里可以不用现款结算，另一方面，可以用切尔文结算；积累将依靠“第三者”通过下列办法进行：（1）货币发行税（为此应当保存苏维埃纸币），（2）采用高价政策。逻辑——当然是特殊的逻辑——在这里也就暴露出来了。这里产生了对经济政策的基础的一般观点同个别问题，即目前条件下的币制改革问题之间的“结合”。如果注意到，苏维埃纸币的贬值由于其普遍影响（因为苏维埃纸币在农村流行，而大宗

交易则已用切尔文)首先打击了农民经济,那么情况就更加清楚,更加明朗了。

因此,客观形势和工农联盟政策使得币制改革和调整货币经济的大胆尝试势在必行。而这时反对派同志的“有计划的”逻辑阻碍了这一改革的实行,并预言,如果我们开始迅速和坚决实行这一币制改革,就会发生各种灾难和不幸。

应当回忆一下,列宁同志一般是怎样估价稳定卢布的问题的。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倒数第二次公开演说)上,他说:

“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我们的优秀干部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而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①

弗拉·伊里奇在这里谈到了稳定苏维埃卢布。结果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但这丝毫没有推翻列宁的论断。为了进行币制改革,当然要求有一定的勇气:应当抵制“工业专政”,应当向工人群众呼吁,在当前最紧张的改革时期暂时忍耐一下,作出新的牺牲。如果整个事变进程强迫接受这个任务,那就应当去解决它,应当使其余的一切同时服从这个任务,服从它的解决。而我们的论敌不仅不理解任务的全部重要性,不仅反对使其他任务和问题的解决服从于这一任务的解决,而且从思想上暗中破坏改革,用国家灭亡和切尔文(当时还是幼小的和“没有桌子高”的)完蛋来恐吓党。

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党团内讨论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报告时,弗·斯米尔诺夫同志说:

“在这种严重的财政状况下……要努力把我们的货币流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1页。——编者注

通置于不能任意发行的切尔文的基础上，……这使人们极为担忧……当秋季的活跃结束时……周转额通常开始紧缩时……这种紧缩就要冲破苏维埃纸币的薄薄的外壳。这将是切尔文的紧急时刻。”（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代表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剪刀差”问题的报告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对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报告的讨论，第33页）。

斯米尔诺夫同志在1923年9月11日给政治局的短信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应当注意到消灭苏维埃卢布的必然性和银行券变为贬值的通货的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这位同志在另一封短信中谈到了灾难性的形势——

“目前时期我们苏维埃卢布的情况，今后时期银行券的情况”，——正象这封信的另一处所谈到的——“一般对国民经济来说，特别对国家预算来说，当然意味着奇灾大祸。”

斯米尔诺夫同志的第三封信中说的也一样。一句话，全线出现了“灾难性的形势”。

反对派同志作为真正的论据提出来的主要理由是，在预算有赤字的时候，必然只好“不正常地”发行切尔文并这样把切尔文变成新的，可说是“另一种样式的”贬值的通货。这个理由当然有相当大的逻辑份量，但只有在反对派的某些前提下，这个理由才具有无比强大的逻辑份量。

这就是：如果对“财政人民委员部专政”提出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即如果维护“工业专政”、反对“我们财政政策的独立自主的（象托洛茨基同志在给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第一封信中所称的）性质”的那些人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币制政

革必然会彻底失败。

这里当然应该作出选择。实行币制改革，必须要有“严格的财政计划”，必须对各种预算实行无情的“砍伐”，必须把一切开支缩减到最低限度等等。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是反对财政自理。但这种“自理”是必须有的，因为应当认真对待整个币制改革。否则真会出现斯米尔诺夫同志所预言的，或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同样预言过的那种前景。（因此产生了关于顺差的派生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单独研究这个问题；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反对顺差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对币制改革的观点有关的。）

在这里实践表明，说得粗俗一点，反对派同志“坐在胶皮靴上”^①。

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反对派总的来说打出了停战的信号（只须回忆一下，皮达可夫同志在这里说过中央的经济政策一般是“正确的”，而在四十六人声明中，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完全相反”），就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已经在匆匆忙忙退却。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说：“我们在讨论中不反对财政改革，因为我们自发地认识到了实行改革的必要性。”（速记记录，第37页。）

不反对？赞成吗？没有预言必然失败？如何评价这些预言呢？“既不赞成，又不反对”？当然，这几位同志客观上是反对改革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继续说：“尚在夏天就有许多同志警告中央……两种通货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切尔文将排斥苏

^① 即失败的意思。——编者注

维埃纸币，当我们的预算出现赤字时，我们可能自发地(1)面临稳定通货的必要性，这就使实行改革具有一定的(III)危险性。”(同上)

正象读者所看到的，当时问题并不是“一定的危险性”，而是“奇灾大祸”。实质上：在那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严格的财政政策，如果不克服危机，如果没有改善我们的工业和商业的原则，如何能做到没有赤字的预算？又如何能不实行币制改革而建立“正常的”无赤字的预算呢？当城乡马上要出现新的分离时还在“等待”，这的确意味着必定断送我们的经济复兴事业。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代表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屈服。他还安慰自己说：

“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我们经济战线上的事变的发展使我们能摆脱困难，使我们能避开暗礁。在预算有赤字的情况下，基本上(1)仍然可以冒实行稳定通货的风险”。(第37页)实在，当然，

“实行币制改革的方法本身表明，我们的经济完全是自发的，无计划的。”(同上)

现在已经没有剩下任何慰藉了。不仅没有慰藉，连半点慰藉都没有了。甚至厄克特之辈，甚至最凶恶的敌人，要“否定一切”，都否定不了我们苏维埃币制改革的成就。现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结果是：中央的“自发的”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稳定通货，而关于银行券要遭殃的“有计划的”预言的正确程度，同关于在“首尾不一致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将全面崩溃的“有计划的”预言的正确程度是一样的。

事实上，短短的数字调查很能说明问题。

1922年4月份，全部苏维埃货币中的黄金价值总共为4 000万卢布。到1924年1月1日，货币流通额为30 200万卢布，到10月

1日为62 200万卢布，^①到1924年12月11日，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72 500万^②。

由于商品流转额增加而造成的货币量的增加，表明了经济振兴的极明显的过程。卢布的购买力没有降低，它同美元和黄金的比价是稳定的，切尔文是“正常的”通货并且在外国交易所“正常”流通等等，等等。

商品流转额的扩大使我们有可能不破坏通货的“稳定性”而扩大发行量。同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工业领域内有可能计算、核算成本和利润，进行企业平衡、制定预算、生产计划等等；因市价变动而受到的损失消失了。有可能切实定出经济领域的方针；支付工资正得到妥善安排，从工人方面因市价变动而受到的损失正在消除。在农民生产中开始有可能同样估计各种因素，对扩大生产进行刺激，因为有可能使农民半自然经济进一步“商品化”；农民得以免除货币发行税。在流通领域，城乡之间的桥梁拆除了。首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正常信贷的可能性；开始有可能开展银行活动，甚至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存款；为农民将来存款和加速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下的积累过程奠定基础。最后，我们的国家预算得以调整。

另一方面，在讨论“计划”问题时，我们已经指出了我们国家预算正常化的极为巨大的意义；正因为我们国家预算的结构是特殊的，这种预算仿佛是一种国民经济的中央簿记。我们不具备调整好的国家预算（而不进行币制改革，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预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计划，甚至我们所能接受的那种条件下的计划都不可能。因为无论采用哪种生产计划，不管它们怎样相互“协调”，它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要“飞走”，因为币制改革的自然而然的

^① 见索柯里尼柯夫：《预算和通货》，“经济生活”出版社1924年版第52页。

^② 代表大会委员会情况通报第9号。

失败把它们推翻了。

这样，我们不顾反对派的反对而确立了同农民的结合，从而向计划经济前进了一步。

六 社会主义积累和同私人资本的斗争

我们在分析关于价格政策的争论时已经部分地涉及了在社会主义积累问题上的分歧。另一方面，我们在反对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的文章中也涉及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不仅同价格政策有关，而且同固定资本问题有关。不难看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互相联系的，而如果对国营经济和个体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的出发点不同，那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也会不同。毫无疑问，工业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得到国库的支援。但即使不管这种支援该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这里也有关于我们工业政策的核心基本争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社会主义积累方法：反对派的方法和正统派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首先想对这两种方法加以说明，因为这两种“方法”表明了两条政治路线。可以说：

(1)一般说来，反对派的目标是获得单位商品的高额利润；相反地，中央的目标是获得单位产品的最低利润，这样，总的来说，在市场扩大的条件下就能提供大量的利润。

(2)也可以这样说：反对派指望卡特尔的超额利润，而中央关心的是低廉的价格和农民市场容量的扩大；

(3)同样还可以换另一种说法，即：可以说，反对派的政策是把重心转到垄断国家的支援上，而不去组织各种经济因素，不去进行技术改良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但是中央的立场首先正是从此着眼的；

(4)在拨款方面,反对派的重心放在国家补贴上,中央的重心在于向银行贷款过渡。

(5)反对派指望有可能在高价的基础上立即获得一笔用于工业的巨款;中央指望组织经济因素,加速周转,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

去年讨论中互相斗争的两种“工业政策”的区别就在于此。人们常常认为,反对派主张高额利润和社会主义积累的高速度,而中央主张最低的利润和社会主义积累的低速度。这些流行的说法有个缺点,那就是这些说法既正确又不正确;这些说法是庸俗的,因为它们没有表现出事物的本质,而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并且只看到直接在鼻子底下的东西。中央不是笼统地主张最低的利润,而是主张单位商品的最低利润。中央不是笼统地主张积累的低速度,而是主张不脱离农民经济,归根到底是要获得比较高的,最高的积累速度。

人们常常不明白,决不能单从资本周转的角度去考虑任务,任务是关系到许多年的,是关系到资本周转的整个链条的,在那里,单是社会资本的周转或国营工业总资本的周转,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人们也常常不了解,作为“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总和的资本流通时间,不是某种固定的、预先已知的、一成不变的数量。而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会对保证可说是社会主义积累的适度条件的措施产生完全不正确的看法。如果我们靠卡特尔的高价获得高额利润,同时缩小国内市场的容量,或者阻碍它的发展;如果因此我们阻碍资本周转的加速或甚至延缓这一周转(譬如说,当商品存放仓库的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间,等待买主,增加“保管费”等等,就会延长周转的时间);如果我们仍旧这样不去努力进行技术改良和寻求降低成本的各种方法,——那么,在我们的经济行动的最初阶段,无论我们拿多少,归根到底我们会受到损失,因为积累

的速度不可避免地会减慢。相反地，如果我们从单位商品上拿得少些，但逐年扩大能够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农民市场的容量；如果我们拿得少些，同时，既缩短“生产时间”，又缩短“流通时间”，从而尽量加速资本周转；如果我们这样来加速城市和乡村，国营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相互影响，那么，我们开始走得慢些，随后满可以赶上、超过我们经济政策的第一种（“反对派的”）方案所要求的积累速度，并把它远远抛在后面。但是为了看到这一点，应当看看比自己的鼻子更远的地方，须知这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这时应当摆脱自己的“工业的”狭隘框框，看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各种成分的联系和互相依赖，以及它们互为条件的运动。

列宁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在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我认为，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①

难道这不是中央在去年的讨论中实际上维护的经济论点的政治表述？

“积累速度”的情况就是如此。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固定资本再生产的问题。因此，在这里，去年的争论就直接同当前的实践问题结合起来了。

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反对派同志在这方面的思想常常发生偏差，迷失方向，“就在这个地方”左右摇摆。

例如，皮达可夫同志对固定资本更新过程的概况作了如下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8页。——编者注

说明：

“我预先要说：我们未必能找到十分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或者更确切些说，须在另一种情况下，——在苏联被包括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之内的情况下，才会有完全顺利的解决办法。在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对我们来说，就只有靠自己的资金和力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这是非常艰巨、困难和充满国内矛盾的”（尤·皮达可夫：《论固定资本再生产问题》，第5页。《固定资本问题》，论文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出版社）。

说我们要解决问题是困难的和很不顺利的，这是对的。但是那种绝妙的想法，即在包括在全（必须立即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内的情况下，事情才会完全顺利的思想，完全同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相符合，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立即会在“世界范围内”消失（见我们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文章）。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说的是巩固的“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体系”，——而这样一来，问题本身已不存在了，因为“巩固”本身的前提是这个问题大体上已经得到解决；或者说的是同取得政权相近的时期，即“年轻的”专政时期。但那时（即当问题确实还有可能存在的时候）则还应考虑到“国外”。在那里，对它来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破坏固定资本的情况？那里在国内战争时期就不会发生额外破坏？

正象托洛茨基同志按照社会阶级路线没有把问题考虑周全一样，皮达可夫同志也把问题搁在一边，没有解决它，因为本来大家都知道，一提到“世界范围”就说“顺利地”而且“完全地”解决问题是可笑的。

固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失败”在我们这里有过，在国外就

更不用说了。“在国外”，这个问题也不得不解决。忽视这一点确实是不切实际的，是要抽象掉那些根本不可“抽象掉”的东西。

而社会主义的“外国”仍然会帮助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帮助的基础是什么？社会主义欧亚（可能是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的基础在哪里？在于被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其国家组织分割、隔离的客观上互相补充的经济部分比较紧密的结合。加速、促进物质变换，有可能加速经济周转，——我们在这方面会赶上旧的，并且会超过它，会越来越快地达到生产力的强大发展。计划经济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这一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会促使计划和经济过程的合理化因素的发展。

但是——唉！——直到最后的时刻反对派同志恰恰不理解问题的这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皮达可夫同志纯粹静止地对待整个问题。

他有四个“可以想象的补充不足的（因为没有生产出来；众所周知，固定资本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吃光用尽了”。——尼·布·）价值的来源”：

（1）以提成（不超过固定资本一般折旧提成水平）为基础的折旧基金的积累。

（2）生产的加强和工人剩余价值的积累。

（3）占有农民的剩余价值。

（4）外债（同上，第7页）。

另一个反对派经济工作人员И·贝克同志同意这“四个来源”，并作了下列补充：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完全正确：在我们这里，在生产基础上（作者显然想说：“在国营工业的生产基础上”。——尼·布·），这些来源可能最少，‘在生产过程的综合体之外’（仍旧是同样可怕的术语，我们当然不会对它负

责。——尼·布·)，这些来源可能最多(同一文集：И·贝克《对折旧基金的监督》)。”

对周转速度只字未提！对较有效地利用单位资本只字未提！对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只字未提！甚至社会主义工业从另外的地方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东西，应当从加强资本的利用效率的角度来使用。但作者甚至没有觉察这个中心问题！

既然他们那里是静止状态和孤立工业的王国，他们岂能觉察。他们从“另外的来源”吸取东西，而没有考虑到，应当使这种“来源”活跃起来，没有考虑到我们谈的是互相促进，并且是日益加强的互相促进，而不是简单的分配。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有害的观点，完全出于他们的共同立场。奇怪的是，他们至今没有看到这一点！

为了公道起见，也为了某种理论“利益”，我们还是应当高兴地指出，我们的朋友皮达可夫毕竟似乎开始——终于！——研究对他来说至少是脱去了“隐身帽”的问题。

我们这里有皮达可夫同志在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区域工业局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速记记录。读者，你们也知道，皮达可夫同志“根据几乎全年的分析”得出了怎样的“基本结论”呢？

这个“基本结论”(基本——不要对此掉以轻心!)就是，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潜力”。

“第一个潜力是我们国营企业的所谓的积压资金，第二个潜力是我们的资本周转速度不够快。”

这真是“晚做总比不做强”。

皮达可夫同志列举了下列有关积压的流动资金的说明材料：

煤炭工业	流动资金总数	2 900万卢布	活资金	1 700万卢布
石油工业	流动资金总数	15 700万卢布	活资金	8 200万卢布

电气工业	流动资金总数	6 400万卢布	活资金	2 100万卢布
木材工业	流动资金总数	4 300万卢布	活资金	1 600万卢布
造纸工业	流动资金总数	1 800万卢布	活资金	1 600万卢布
橡胶工业	流动资金总数	5 200万卢布	活资金	3 200万卢布
			等等	
全部工业	流动资金总数	101 200万卢布	活资金	73 700万卢布

现在请看，皮达可夫同志关于周转的速度说了些什么，让我们看一看和听一听：

“我们经济工作人员几乎不注意的第二点(哼！哼！又是：晚做总比不做强！——尼·布·)……这就是我们资本周转的速度问题……我指的不是纸币资本周转，而是价值本身的物质运动，价值从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转化为劳动力，转化为制成的商品，又再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重新转化为货币的周期和速度在我们这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这一年内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不是灭亡！——尼·布·)去年我们整个棉纺织托拉斯周转的速度 1.53 次，即托拉斯的资本一年内周转 1.53 次。在这一年，我们获得了 1.85 次的周转速度。看来成绩不大：速度从 1.53 次提高到 1.85 次。这产生了什么结果？……我作出的有关的概算提供了下列情况：由于周转速度从 1.53 次增长到 1.85 次，我们产品的增长额……为 11 300 万卢布……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赢得了 7 500 万卢布的周转资本”。

这一切再公正不过了。这一切的确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一切当然同固定资本的更新问题有密切关系。

但是……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打击了“反对派”的基本“观点”。所有这一切证明“首尾不一致的”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谁首尾不一致呢，这就是皮达可夫同志。

皮达可夫全年思考的结果是，周转的速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事实上在此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没有注意”这个主要问题。

为什么“没有注意”呢？

为什么皮达可夫同志不久前尚在他的《论固定资本再生产的问题》一文中，即在可说是理论纲领性的文章中，甚至也没有提到这个“冷静观察的头脑和伤感的心”的结果呢？

许多“经济工作人员”的这种盲目无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好吧，请认真地想一想，亲爱的同志们！

在全部我们的（不过不是全年的）分析之后，不难说明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它在于行会的、狭隘的工业方针，这个方针妨碍它自己的体现者看到工业范围之外的地方，并且使他们恰恰不理解现在人人都在叫喊的结合问题。

许多经济工作人员之所以“不注意”，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过多地依靠国库和依靠垄断。只有同行会的和有局限性的意识形态决裂，他们才能理解某种另外的东西。但是，去年的同“价格方面”的努力有关的危机毕竟“把辩证法印入了某些经济工作人员”的脑海里……

我们的国民经济和我们的国营社会主义工业核心的普遍增长，也使我们有可能推进我们的商业和合作制。同私人资本（大家知道，它大部分是商业资本）的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在莫斯科商品交易所的流转额中，私人资本在出售方面的作用从占总流转额的12.2%（1923年10月）降为5.5%（1924年8月）。在购买方面的有关数字将是：10月占20%，1924年8月占10.7%。

根据70个省交易所的情况：

在出售方面，私人资本在这段时间内的作用从 13.5% 降为 7.1%；

在购买方面：从 17.2% 降为 10.1%^①。

关于贷款的资料也表明了排挤私人资本的同样情形。（见下列图表）

四个银行按主要债务人类别分配债务的情况^②

（苏联国家银行，工商银行，苏联对外贸易银行，莫斯科市银行）

	1923年10月1日			1924年9月1日		
	单位， 千卢布	占总数的 百分比	10月1 日总数的 百分比	单位， 千卢布	占总数的 百分比	对10月1 日总数的 百分比
国营工业……………	155 565	46.6	100	391 995	54	252
国营商业……………	36 753	11	100	75 860	10.4	206.4
其他国营机构……………	14 531	4.3	100	32 380	4.5	222.8
合作社……………	58 853	17.6	100	112 197	15.5	190.6
信贷机构……………	21 766	6.5	100	56 269	7.7	258.5
私人……………	26 963	8.1	100	10 373	1.4	38.5
未按户头类别分配的…	19 704	5.9	100	47 259	6.5	239.9
总 计	334 135	100	100	726 333	100	217.4

关于“私人”一项的有着重号的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现在未必有同志会认真地肯定说，同去年相比，私人资本主义会有相对稳固的地位。反对派在这方面的预言说中的程度就象在所有其他方面的预言一样。去年的实践充分说明，有的地方已经偏到过于“损伤”私人资本的方面去了，这种“损伤”造成了我们的

① 1922—23 和 1923—24 执行年度的苏联国内商业。附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国内商业的报告后面的统计资料汇编。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出版社。1924 年，第 27、28、30 页。

② 1924 年国营工商业会议。1924 年 12 月 10 日会议全体会议所附的报告汇编，第 146—147 页。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所不能弥补的缺口，而私人资本部分地转到纯投机性方面并涌向粮食和原料的采购工作。但这指的已经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里主要的教训说明，必须减少行政上的热心并把重心转到经济影响方而来。

* * *

我们就要结束我们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分析了。我们知道，这个纲领的个别论点根本不是——过去也不是——由于党的领导层犯了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错误而造成的比较“偶然的”修正案。因为从反对派的全部“修正案”中听到的是同一个调子，看到的是同一条路线。揭露这条路线，暴露这条路线，把它指给全体读者看看——是本文的基本任务。但是，我们不仅努力指出这条路线，而且要证明整个这条路线是不正确的，从它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

从上述一切必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反对派在这里暴露出不理解我们建设的最基本的问题，即工农联盟问题。而这就是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毛病。

第一次发表于1925年。译自《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
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俄文版第143—190页。

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①

同志们！在对文学政策的若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先对下述情况有所认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如果一般来说，这种提法是对的话，那么，同其它问题比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就要更加善于在刀刃上行走。你们可能站在完全正确的立场上，但只要你们执行政策时差之毫厘，就会在政治上干出蠢事来。为了不致作出某些轻率的决定，我打算用这一警告开始我的发言。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深思熟虑，必须完全根除那种通常说的“大轰大嗡”的方法。然而，事实上，同志们，你们现在却正在按此方法行事。瓦尔丁同志说：“在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到处充满了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对不起，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在你们的代表会议上，毫无中央委员会的精神。我们还知道，你们公开提出了抗议，反对关于让沃隆斯基同志重返《红色处女地》杂志工作的决定。每逢作出实事求是的决定时，你们就反对一气，还说什么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在你们头上缭绕。这种说法似乎不符合实际。你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纠集了一群无产阶级作家去打着中央委员会的精神这个旗号，尽管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其次，为什么你们要滥用老头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呢？我想，而且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好的。我将在这里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我所持

^① 本文是1925年2月布哈林在中央委员会讨论文学问题的会议上的发言的速记稿。

的立场，然后，我再讲一下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立场。

我首先要谈的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我将尽可能地把我当时观点说清楚，然后我再谈谈列宁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在这次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明确地论证了他自己对文学，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喊声：“那么，波特列索夫呢？”）没有必要把波特列索夫也牵连进来，因为他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提出这一问题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完全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长期性。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忽略了在各个不同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平衡性。比如说，我们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有许多敌人包围的具体条件下存在着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将是漫长的，因为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平衡的。在一个国家中已经夺取了政权，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尚未夺取政权等等。在这方面，先决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延长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总的来说，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个意思还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夸大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中，夸大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速度。他的理论错误就在这里。他正是从这一政治错误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他把事情设想成这样：所有阶级都同时向共产主义迈进，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得最快，比实际情况快得多，于是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便起了变化，变成人类共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特点。未来共产主义文化的这一特点发展得相当快，比脱壳而出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快得多。然而，还可以提

出第二个问题：一般来说，在文化方面是否有无产阶级独有的特点？我认为有，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谈论过多次了。我要说，波格丹诺夫在这方面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他有一些很正确的好的想法。似乎可以说，有一种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波格丹诺夫是这样称呼它的，你们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同正在进攻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特征结合起来了。从人类共性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特点并不全都具备共产主义性质^①。其次，无产阶级还有一些特点，都市主义的情绪，城市的特点——这些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特点，因为共产主义是要解决城乡矛盾的。这些特点立即会泾渭分明地把人类共性和无产阶级性区别开来。一方面，这些特点是这样一种结合，即这种集体主义加上革命性，加上城市；另一方面，它又是另一种结合，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都市主义，不同于马利涅蒂^②等人的未来派的都市主义。这是完全清楚的。在文化方面，无产阶级是有其特点的。毋庸置疑，这些特点将不可避免地固定并记录下来。在城乡矛盾尚未完全解决的那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未能完全解决城乡矛盾也是自然的事情——这个时期将给整个文明打上烙印，包括文学在内。不管我们如何实行消除城乡矛盾的政策，无产阶级文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它消亡的过程快得多。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的消亡和积累这两条曲线相互交叉。托洛茨基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消亡比形成快，而我认为正相反，无产阶级文化的形成比它的消亡过程更快。自然，这里说的不是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过程，而是指相当长的一定的发展时期。

① 比如：同人们进行斗争的心理，阶级战士的心理并不是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特点。

② 马利涅蒂为意大利人，是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未来派的创始人，对俄国未来派有影响。——编者注

现在我应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反对这种无产阶级文化观点的。他同这种观点作斗争是事实。我曾经维护过我在这里谈过的立场。现在你们都点头同意我说的，那就让我讲下去吧。而且你们自己也知道，归根结底，我没有任何理由诬蔑自己。所以，我要说明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最坚决地反对这一系列观点的，他在同我的几十次谈话中都提出过反对意见。他给我写过一些便条，甚至“怂恿”雅柯夫列夫同志写文章。雅柯夫列夫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指示写那篇文章的，事先，列宁读过那篇小品文。瓦尔丁同志！我就这件事曾同列宁谈过。当时我提出了最后通牒，我说，如果他坚持要在《真理报》上刊载雅柯夫列夫的小品文的第一稿，那么，我将给以极其尖锐的反击。于是，弗·伊·劝雅柯夫列夫在自己的文章中删去一些段落。这曾经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你们还要站出来说，伊里奇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何必这样呢？我谈谈我对弗·伊·的立场的理解。他在有些地方曾经谈到过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他写过几篇就民族问题反驳李普曼和谢姆柯夫斯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曾谈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如果我们想全面研究这个问题，那么就应该仔细想一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说出下面这句话时，他是怎样想的：“你们带着你们那些废话见鬼去吧等等。”我谈谈我是怎样自己为自己解释这句话的含意的。也许（我不说想必，而说也许）弗·伊·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高谈阔论，大喊大叫并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我们反而会把这一事业葬送掉。时机尚未成熟。现在还必须从字母学起，学会洗手等等。他认为，没有必要高谈阔论，因为我们在实践中还未能实现它之前，高谈阔论依然还是高谈阔论。在我同弗·伊·争论过的所有问题中，有两个问题至今我也不同意他的意见，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不过，应该说一下，

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弗·伊·在自己最后写的论合作社的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以前他认为，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有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小岛，而其余一切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这个小岛也被淹没了。现在他认为，我们正在壮大起来。如果把这种观点继续阐明下去，那么，他会这样说：“是啊，如果我们的小伙子们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没有问题啦，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所以，应该往后面拉他们一下，喂，别骄傲自满，我国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正是这种想法决定了他的论据，他的论据应成为解决教育我国干部这一重大的社会教育任务的行之有效的推动力，这一教育目的是必须使干部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骄傲，有的放矢并用尽全身之力拉车前进。这就是弗·伊·的实际指示。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理论上的提法，但我完全同意其实际结论。应该接受这一指示，在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指示。没有必要说什么列宁曾经支持过我们，这是胡扯。

让我们实际运用一下这个标准。我举伐普^①的宣言，根据瓦尔丁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为例加以说明。第一点是：

一、“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强大武器。如果马克思的指示，即‘任何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永远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无产阶级的统治则不能允许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继续占统治地位。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期内不逐步掌握一切意识形态阵地，它将失去统治阶级的地位。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不仅不可能是中立的，而且它还积极地为一定阶级服务。”

这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的原则。下面接着写道：

二、“如果这一切对于一般阶级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对

^① 伐普(ВАПП)，即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编者注

于我们现时代——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在各阶级之间进行最尖锐的战争的时代来说则是双倍地正确。这就是为什么下述说法乃是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即认为似乎在文学领域内有可能实行各文学思想流派之间的和平合作以及和平竞赛。布尔什维主义同这一反动的乌托邦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在这里就有理论上的错误了。第一个大前提是，文学不可能不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规律。这绝对正确。第二个前提是，如果这一切对于一般阶级社会来说是对的，那么，它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现时代就双倍的正确。这一前提对不对呢？对。接下去谈的是什么呢？接下去谈的是苏维埃社会内部的政策。这个问题讲得就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这很简单。我国社会有两个磨擦面——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我国社会面对的是资产阶级世界，在这方面，阶级斗争是尖锐化了。对内应如何提出问题呢？在这方面暴露了对下述情况的无知，即在国内，我们的政策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这是基本的。根据中央委员会的直接指示，在同托洛茨基同志辩论时，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在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的文章中正好谈到过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提出过坚决反对的意见。相反，所有的人都承认我说得对。阶级斗争正在消失吗？没有。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说的呢？他说过：我国社会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合作的社会，资产阶级也可以参加这一合作。过去什么时候提出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合作呢？从来也没有提出过。那么，这里出现了什么情况？出现了阶级斗争职能的某些辩证的改变，正因如此，我们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合作。我请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实际情况吧。我们曾经不得不让步，以便让这些阶级去填补我们无力填补的漏洞。他们是在一定意义上，一定时期内来填补漏洞的。我们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些阶级的。如

果你们把小商贩赶走，这也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这些理论原则对不对呢？（喊声：“这也是相对的”）我认为这是对的。为了弄清楚这一切，应该把这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即领导问题区别开来，这是不同的两个问题。大家都必须记住这一点。我在这里谈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被人们庸俗和肤浅地加以解释，正如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正是在这方面需要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我想对你们谈谈关于奥托·鲍威尔的情况，虽然这与本题无关，但还是很有意思的。他是这样来描述我们的社会的。他说：开始时，确实出现了那种情况，即在苏俄确实存在过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这一专政已经被苏维埃共和国的三种力量的联盟——即农民、工人和新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代替。苏维埃政权反映的正是这种力量上的平衡，而且重心不断地从无产阶级一边移向其他阶级一边，于是，他举出新经济政策之类为例，说什么重心从无产阶级移向庄稼汉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为什么不对？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被简单地混为一谈了——即社会上的联盟和政权中的联盟。我们在社会中同农民结成联盟，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权是依靠庄稼汉的，但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它可能有官僚主义弊病等等，但它毕竟还是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可以允许新资产阶级在我们社会中出现，允许它跟我们合作，但决不允许它接近政权。我们作为主体，作为政权，可以机动灵活地行事。我们对待农民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待新资产阶级的态度，我们正是通过这一办法来维护在我们这个社会，在我们当前面临的条件下，在现在这个时候作为领导力量的专政的职能。

所以，同志们，大家都很清楚，事物发展的总的前景同一般形式下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提供的前景完全不同。这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从你们的提纲的观点看，这就是加剧阶级斗争。

瓦尔丁：不对。

布哈林：那又作何解释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又何必把这一切写成文章，推行自己分裂社会的路线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点。在你们的说法中，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国家的观点区别开来。如果你们说这指的是苏维埃国家，那么我就要说，难道对资本主义国家不也可以这样说吗？完全清楚的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大错特错了。

罗多夫：形式各不相同。

布哈林：形式各不相同——这是什么意思？形式各不相同这首先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采取的是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式，而在苏维埃国家中则完全相反。这一点本来是应该说清楚的，这两者是迥然不同的。

我应该继续说明的是，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结论。阶级斗争在进行，但形式不同了。我又提出了一个准确的公式。对待农民采取改造这个农民的方针，而对待新资产阶级，则采取利用，加上从一定时期起和平排挤的方针。当然，我们不号召采取暴力行动。所有这一切在我引用过的那些文章里有非常准确的表述。这一事实在你们的什么文章中有过反映呢？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你们要来决定政策，那么这一重要的说法就应该在你们的提纲中有所反映。我现在要问，有这个反映吗？我断定，没有这个反映。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我们对待各阶级的一般政策也应该适用于我们的文学界，但应作很大的“修正”，因为文学界有其它领域中所没有的很重要的特点。对比一下，各不相同。专政不是消失了。一般来说，瓦尔丁的下述说法是对的，在文学界必须提出领导权问题，但是，恰好在这方而应该注意我提出过的在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条件下各个阶级的结合问题。

领导权问题无疑是存在的，它甚至日益重要了，但是，我们也

遇到了一系列麻烦。麻烦存在于下面一些事实中。同志们，请你们注意地听我对这一基本区别的解释。不只是现在，还在很久以前，当我同“岗位派”辩论时，当我作了那个“岗位派”的许多同志们常常提到的报告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应该说明一下的理论上的想法。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怀抱中，我们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由此出现了下述情况：当我们取得政权时，我们通过自己的斗争和直接的革命变革，我们便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我们已经有了这个领导权。我们是在巷战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得这一领导权的，这一斗争已经作出总结，总结了我們过去的组织工作的成就，政治上的磨炼和政治经验，总结了为进行胜利的革命而必备的一切特点。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艺术、科学和其它领域时，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独掌领导权了呢？我确信，还没有。既然我们还没有成熟，既然我们正处于虽已取得政权，却尚未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同志们，完全清楚的是，我们应该提出取得这一领导权的任务。或者象我说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文学和文化等领域中争得社会领导的历史性权利（喊声：“对呵”）。

于是，从这里就产生了关于取得领导权的方法，关于不致在这方面犯错误以及关于与同路人的斗争等等问题……如果我的话确实是对的，那么，十分清楚，不应提出“岗位派”提出过的提纲，说什么把国家出版社交给我们好了，我们将把文学界整肃一番（瓦尔丁：“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们早就采取这样的态度了，而且你们自己的全部活动和方针都有这种倾向（听众席上的喊声：“我们一直承认领导权原则”）。你们承认的是伐普的领导权原则，不要自欺欺人了。（瓦尔丁：“要拿出证据来，而我们有证明文件。”）就这样，你们提出了这种垄断原则，尽管你们没有任何权力这样

做。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应该这样提出问题的：“请先建设，然后再领取报酬”，在这里，在目前情况下，领导权问题同政治领域中的情况不同，那么，在这方面它同政治有无一定的共同点呢？我认为有。有工人阶级及其无产阶级评论家们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的毫无争议的领导权。这是一开始就有的。这是我一开始就能够看到的東西，尽管我不是什么专家，对艺术形式和风格问题一窍不通。从社会革命的观点，我可以看出来并说出来，这个人是黑帮分子，那个人是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说，从总的情况看来，我们已经成熟到有权掌握历史性领导权的程度。在这里我还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问题。各种专门性的问题，这是一回事，基本问题，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对社会进行批判性领导的一些问题方面我们已经成熟了，与此同时，在其它问题方面我们尚未完全成熟。整个问题在于，要提出一些可以使我們成熟并取得在历史上存在下去的权利的方法。

现在，这里就出现了“同路人”的问题，非无产阶级作家问题。这里立即涉及两个问题。对他们的政治态度问题和同他们在文学上的联合问题，这是同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我们自身的自我教育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同时解决，因为他们是互相以某种社会关系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岗位派”的错误何在呢？首先，我们对待“同路人”的态度怎么样？第一个方面是社会评价方面。我们对待同路人的态度是由对待有关社会政治力量的总的态度决定的。与加剧阶级斗争有关。在这里我们是否应该加剧阶级斗争呢？不应该。对农民，我们必须改造他们，对明显的黑帮分子，则应彻底消灭之。对同路人也应该这样——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改造，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应予以“驱逐”。这样做对不对呢？如果这完全正确，那么，在组织上就不应象农村党支部的某些共产党员所做的那样：他们对待农民就象对待牲口一样。你们的立场就是

农村党支部那些人的立场，他们由于农民未交统一的农业税，就去“压榨”近半数的农民。（瓦尔丁和罗多夫：“拿出证据来。”）当人们又喊又叫的时候，你们却说，拿出证据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证据可言呢？罗多夫同志，您怎么啦，还是小孩子吗？如果这样辩论下去，当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瓦尔丁：“应该拿出证据来进行辩论。”）（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不是批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是批评问题，因为批评是政治的一部分。在改造人的问题上，应该有一定的分寸感，但你们既没有丝毫的分寸感，还采取了过火的策略。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自我教育，教育我们自己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一般方针是什么呢？应该首先指出自己的缺点。我可以这样来归纳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学政策中有两大偏向：一是共产党人自大狂，一是丧失立场。不能说其中哪一种偏向好一些，这两种偏向都有害。但是，如果有时可以说我们的某些同志犯了那种可以称之为丧失立场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并非客观环境所使然，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偏向是共产党人的自大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们最近这次代表会议，你们在会上攻击了我对杰·别德内依的文章所作的注解（瓦尔丁：“我今后还要攻击”。）您用这个可吓不倒我。问题的实质在于，基本错误就在这里。所以必须同这种共产党人自大狂进行斗争。要反对这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恶痛绝的共产党人自大狂。这是他的政策的核心。这种共产党人自大狂现在对文学界比对任何其它部门都更危险。为什么比其它部门要更危险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尚无自立能力。如果你们举一个我们已经取得了99%的成就的部门来比较一下，那么我们在这一部门中什么也没有，尽管我们吹嘘说取得了50%的成就；而在这个我们还没有什么成就，尚无自立能力的部门中，却出现了共产党人自大狂——这

意味着，我们从开步走的时候起便可能把事业毁掉。所以，如果让我们选择，让我们说，哪一个更有害或更有利，是那个骂我们的弟兄，说我们还一无所有的人呢，还是那个说你们是大地的精华的人呢？我看，更有害的恐怕是那个说你们是大地的精华的人。因为，如果我骂无产阶级作家，这绝不意味着我暗中否定他们有权发展自己，这只不过表示：请注意，不要骄傲，因为骄傲是最危险的东西。罗多夫同志，难道不是您把几个人毁掉的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您周围的那些人和弟兄在一切方面都在沿着最普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文丐道路进行自己的探索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

罗多夫：我们正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

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您还是住嘴吧。这里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我现在谈谈与领导问题有关的组织工作和谈谈有关这一领导的界限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在岗位上》杂志的同志们把领导问题简单化了。关于领导问题，我应该说，我们暂时还不可能实行全面领导，因为我们还有一系列东西不懂，而且我确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也不可能学会这些东西。我举一个别的领域的例子——新生活领域的例子。能够说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否认一切领导的吗？中央监察委员会甚至曾试图逐章逐节地制订一个文件，但是，后来还是不得不把这些章节收回来了。必须原则上说，这件事是由我们领导的。但是，难道能够这样说：让政治局作个决定，规定每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妻子吗？扎尔金德同志曾试图这样做。他说，如果一个共产党员遗弃了妻子，就让他妻子出席支部大会，支部大会将作出决定，这个共产党员是否站稳了阶级立场。我认为他这是胡闹，这是市侩的劣根性，是多管闲事，那么，在文化领域中，我们有没有类似问题呢？肯定是有的。我说不上来，未来

的家庭形式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男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妻子、而女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丈夫。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党来“领导”是不可理解的。是不是原则上可以说,我们永远也不问这个问题呢?不可以。对文学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可以说,从总的方面可以决定一系列问题,党将在这方面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在一系列艺术的形式问题上,在形式、风格的创造等问题上不能做这样的结论。如果你们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你们说事情就是这样,那么,请允许我斗胆地由此作出结论,而结论将是下面这个样子。你们曾力求躲避的形式问题对艺术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吗?我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是否应该说,我们对下述这些问题是很感兴趣的,诸如创造新风格问题,这些不同风格的共存问题,多样化的可能性或者是否有可能建立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问题?我们对这一切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呢?感兴趣。但是,我们能在这方面提出详尽无遗的指令吗?不能。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由政治局直接进行领导,那么,我们将如何加强这一工作进程呢?也许你们以为可以通过无产者的无性妊娠达到吧?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只能在分子的运动过程中成长,我们将在这里开辟最广阔的竞赛天地(听众席上的喊声:“正确。”)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在这方面就要放弃自己的所有主张。瓦尔丁同志声言,似乎在上次会议上,就在这个会议厅中我说过,政治局未给普希金下达过如何写诗的指令,因此,瓦尔丁得出结论说,似乎我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也应该通过贵族文学那样的方法来培植(瓦尔丁:“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内容上。”)我说过,政治局未给普希金下达过任何如何写诗的指令。既然如此,请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我说过,关于新的风格问题,这是个非常重要和专门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在下述情况下得到解决,即党不是把所有人都攥在一个拳头里,而是使大家有可能展开竞赛。“岗位派”的同志们,如果把权力

交给你们，你们将提供一些什么可能性开展竞赛呢？（听众席上的喊声：“我们是宽宏大量的。”）如果你们先证明，你们确实能够宽宏大量地对待别人，就可以把权力交给你们，但是，要知道，你们那里明明写着，说布尔什维克的美德就在于不可以宽宏大量地待人。你们听见了关于“不可宽宏大量”的说法，但你们并不知道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为什么而发的。（听众席上的喊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但是，文学形式问题等等——难道这不是意识形态领域吗？我承认，迄今为止我并不知道，这是属于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力领域。不过，要知道，其它一切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我再重复一下主要意见。我想，不应煽动斗争的激情；我想，不应加剧瓦尔丁同沃隆斯基之间的阶级搏斗，在这些搏斗中沃隆斯基代表的是女性的消极一方，而瓦尔丁则代表积极勇敢的另一方。然而，在不点出具体人名的情况下，我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现在应集中注意力进行反对共产党人自大狂的斗争，在这一战线方面，我们应铁面无情。我们应在提纲中提出为竞赛开辟最广阔的天地。为什么你们认为，中央委员会一定要把自己象发针一样别在某一个团体身上呢？组织起一千个、两千个团体吧，除莫普^①和伐普之外，能成立多少文学小组和团体就成立多少吧。你们以为，政治局必须跟在每一个文学团体身后并把它们都象别针一样别在鼓动部身上吗？第一，这样一来，瓦累依基斯会因此而患精神病；第二，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认为，党的一般路线是应该有的，这一路线在精神上大致应与我刚才讲过的话一致。至于谈到具体问题和课题，那么，这方面需要最广泛地展开竞赛。我在这里应该说，瓦尔丁同志并未站在他原来想站的岗位上。您在文艺政策方面所处的地位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经济政

^① 莫普(МАПП)，即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编者注

策方面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主张进行一般的领导和开展最广泛的竞赛。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我们才能解决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

第一次发表于 1925 年。译自英国普瑞德克斯出版社 1979 年俄文版。原载苏联《红色处女地》杂志 1925 年第 4 期。王燎译。

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

(1925年4月17日在莫斯科组织
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现在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特别注意研究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的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又非常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现在我们都感觉到我国经济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的速度现在怎么也不能说是慢的。但是，在估计到这个事实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新的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对它估计不足。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现在通常所谓西欧资本主义“稳定”的过程。在西欧，首先是在中欧，现在资本主义正在增长和恢复被战争损害了的健康，这点大概无需怀疑。值得大大怀疑的仅仅是，这个恢复过程究竟保持多久。但是毫无疑义，在这段时间里，即在今年，在近几个月，这个过程表现得非常肯定，对它不容有什么争辩，它是非常明显的。

诚然，当我们估计整个世界局势即总的国际形势的时候，我们还看到有另一种趋势，表明存在着巨大的革命风浪。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谈到中国、殖民地运动等等。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同样不容有任何怀疑。但是，再重复和强调一次，在地理上离我们最近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在资产阶级经济正在恢复；这种情况在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到关于我们国内经济形势问题的提法。

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我们被敌人包围着。如果一些时候以前，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我们取得进展的同时，资产阶级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江河日下，那么现在我们就不能这样说了。我们在增长，它们也在增长，这就是眼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整个世界历史图景中的某种新现象。这种现象在不久以前是没有的，而现在有了。

由此立刻需要作出一个自然得出的结论：现在我们和我们的邻近的资本主义敌人同时在增长着，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发展速度的问题，即关于我国发展快慢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过去它未具有这样的意义，那是因为我们的资本主义敌人在下降，而我们虽然慢，却在上升，显然，在我们和我们的敌人同时提高的条件下，关于提高的速度问题就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应当指出世界局势中的这个新的现象，党不仅要看到局部、小事情、次要的具体的细节，而且还应当习惯于通过局部看到总的情况。

我们党应当看到这种整个重新配置力量的情况，并由此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由此得出的第一个论点就是我国农民经济发展速度对于我们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从问题的这种提法出发，我们首先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对我们十分重要的就是不断地加快经济周转的速度，应当把加快经济周转速度理解为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和普遍性的问题，它现在对于我们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加重要。

我们说，我们应该在经济方面更快地增长。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尤其是在我们的国营工业中，争取尽可能快的积累，因为国营工业是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知道，现在从外国资本那里是难以指望得到很多东西的。因此，本国经济

周转和本国资本周转的速度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加快本国整个经济中的各种经济液汁的流转，如果我们加快资本的周转，我们积累的速度就会快得多，经济增长就会大得多。

这是起码的道理。但是应当对它进行研究，因为经济政策的所有其他问题恰好都有赖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就实质讲，如果不算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初几个步骤，我国的经济政策经历了三个时期，而其中间那种形式，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时期。那是蜉蝣，生活一些时候，很快就死亡了。

第一种形式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第二种形式就是我们提到的那种蜉蝣，即在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制度，也就是我们发现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完全不适合于现实情况之后而迈出的第一步；最后，第三种形式是我们从1921年采取以来迄今仍在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虽则年头已久，但它的名字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它永远显得年轻。

上面已经指出，中间阶段即地方商业周转阶段，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的蜉蝣。这是走向真正的、正确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道路上的一小步。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在自己的地方性的范围之内，它冲出去了；商品流转越出了由我们党所制定的苏维埃政权的最初的法律规定给它设立的堤岸，结果我们出现了多少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市场紊乱、交通不便和一系列经济不协调现象都没有能把它阻挡住。

列宁在他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中——这本书我们应当读，而且应当反复地读，因为每次从新的角度读它，每次都发现其中有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出色地断定，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是“堵塞的”周转制度。从这个观点看来，把新经济政策叫做“开放的”周转制度是非常自然的。

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即完成了应该较

为正确地分配现有储备的那样一种经济形式的作用，当时的特点与其说是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不如说是消费现有的储备。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并不是由工业活跃了农业和农业活跃了工业这一点决定的；问题不是要在工业内部活跃各个部门，不是要创造条件使得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容首先是合理地组织消费，而这种消费又首先应当包括军队和留在城市里的那部分工人阶级。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完成了这个历史作用。但是十分明显，当需要恢复经济的时候，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这一点反映到我们党的意识中来了，也就是我们开始认识到需要“开放”商品流转，除去束缚它的羁绊。

我们起先开放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结果，发展着的经济或者说刚刚开始发展的经济的要求，已作为需要扩大这种经济周转范围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在各个阶级的意识中反映出来了，而尤其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反映出来了。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我们还要再开放一半，开放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何在呢？在我们党的很多同志看来，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只归结为一点：农民向我们进攻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造反了，我们退却了，仅此而已——似乎全部问题就只归结为这一点。但是，问题当然不仅在于这一点，确切些说，不完全在于这一点。列宁在论粮食税的小册子里就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正常的经济政策（它和战时共产主义相反。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把战时共产主义叫做国内战争的广阔战线强加于我们的“可悲的需要”），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一系列经济成分从前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堵塞不能互相促进，现在能够互相促进，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农民对增加生产不感兴趣。他的所

有的剩余产品都被拿走了，他不能合法地卖东西，他经营的个人刺激因素被摧残了。因而出现了经济的完全“脱节”。商品流转被封锁起来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业也必然要停滞不前。而且就在最大的工业内我们也出现了由于对个人利益注意不够而产生的不良现象。如果我们没有计件工资制之类的制度，我们就堵死了私人的个人主义刺激因素，甚至堵死了在工人阶级中也有的这种刺激因素。当我们转而采用了计件工资制和其它的报酬形式时，我们就以这把钥匙甚至把工人阶级成员的个人利益的因素也打开了，使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从整个经济来看，建立城市和农村的商业联系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使得城市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农村的繁荣，同时使得农村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城市的繁荣。换句话说，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只有从这种联系和从这些经济成分的相互影响中，才能得到这种经济的增长，即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高涨。

你们可以有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最优秀的、最熟练的劳动力；你们在农民经济，甚至是没有被破坏的农民经济中，可以有相当好的工具；你们可以有最年轻力壮的、健康的“理想化的农民”，而不是半饥饿的农民。但是如果你们不给各种经济成分以在经济上互相影响的可能性，那么你们的工厂就会停工，你们的农民经济就会衰落；你们将会出现普遍的倒退。

必须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经济部门、各种各样的经济成分联结起来，以便保证它们经济上的相互繁荣。从这点出发我们制订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的那些口号；因此，我们首先在贸易方面前进，这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贸易恰恰是这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一种经济成分能够影响另一种成分，首先是使得城市和农村

能够相互影响。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我们所经过的各个经济阶段，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发展叫做由“堵塞的”经济周转到越来越“开放的”经济周转的发展。

而经济发展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过去认为无产阶级一取得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会取得成就，这种陈旧看法是多么不正确。

粗一点说，过去我们把事情想象成这个样子：我们取得政权，把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抓到自己手里，马上开始计划经济，即使冒出一些什么小事情，我们有的追究责任，有的加以制止，这样就完事了。现在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事情完全不是那样。

攻击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政策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在大量荒谬和愚蠢的言论中，说出了某些不愚蠢的和相对正确的东西。攻击共产主义的最聪明的评论家之一，奥地利教授米泽斯^①在1921—1922年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的书，发挥了下述一些论点。他说，我们同意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的意见：应当抛弃一切感伤主义的胡说八道而这样提出问题，即最能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共产党人的那种所谓“破坏性”社会主义不是导致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导致生产力的下降。这点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共产党人忘记了私人的个人主义刺激因素和个人的首创精神的巨大作用。资本主义有缺陷，这不假。但是资本主义竞争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驱使生产力前进，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工人阶级所摊得的那一份也就多一些。既然共

^① 米泽斯，路德维希·埃德勒·冯(Mises, Ludwig Edler von 1888—)，经济学家，生于奥地利。曾任维也纳大学教授。后赴美国在国立经济调查局工作，1945年以后任纽约大学教授，1946年取得美国公民权。著有《货币及流通手段的理论》、《公众经济——有关社会主义的研究》等书。——编者注

产党人想根据命令、用强制办法来建立生产，那么他们的政策必将遭到而且现在已经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

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从它的经济本质的观点来看，无疑有些地方是象这幅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画，一切有学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预言了它的死亡。因而当我们开始放弃这种制度的时候，当我们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就嚎叫说，这是从共产主义思想退却的开始：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阵地，他们输了，现在他们在回复到可敬的资本主义。这些人是这样看问题的，但是输了的，其实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我们曾经被置于一定的形势之下，当时我们是根据需求和可能进行活动的。但后来我们认识到了应当如何继续前进，而现在可以说，我们的敌人在这场争论中输了。我们在斗争中保卫了当时需要保卫的最重要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转向新经济政策，这就从实际上开始驳倒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上述论据。为什么呢？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我们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者的经济主动性，从而允许私人积累，这样，我们也就在一定意义上使他们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整个经济服务。我们开放了商品流转，这样，就有可能去发挥私有小生产者的经营兴趣，刺激生产的扩大，通过实行形式上和过去一样的工资制度——计件工资制等等，调动工人落后阶层的个人主义的刺激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他们前进的动力不是共产主义思想，而是私人利益；我们使大家这样工作：让无产者以自己的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去促进整个生产的高涨。

我们过去的想法是，我们认为几乎立刻就能达到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的想法不同。我们抓住主要的经济命脉，安排主要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国营经济以各种办法，有时甚至通过市场关系和私人资本的残余竞争，逐渐地越来越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越来越

越加强自己的威力，并且逐渐地用各种方法把落后的经济单位纳入自己的组织，而且这照例要通过市场来实现。

我们以什么方式排挤直接的敌人，私人资本家呢？用竞争，用经济斗争。如果他们卖东西便宜一些，我们就应该做到卖得更便宜。顺便指出，这就是我们现时情况下的阶级斗争。

这样，由于我们的经济实力的加强，我们就能通过多年的、困难重重的同私人资本残余等等的经济斗争而走向计划经济。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在一个时期内给予我们国内的——不仅我们的，而且甚至我们敌人的——各种经济力量以自由；我们应当把他们置于这样的境地，即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将同时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因此可以说，如果我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的想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在这里我们是错了。不是立即，而是通过排挤、战胜和改造一系列过渡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银行等等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现在全党毫无例外地承认，发展的进程将正是这个样子。这点现在已经在共产国际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草案中肯定下来了。

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经济政策，即利用一切经济力量并且真正提高国家生产力的经济政策，我们只有在不用“封闭”的办法，而是通过进一步突破战时共产主义框框的办法来管理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实行，而且我们越是扩大经济周转，就越会成功。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使事情复杂化了。不言而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单是发展生产力，也不单是获得经济的高涨。如果现在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整个国家非常便宜地交给美国资本，那么很可能在它投进自己的全部剩余资本之

后，在最初时期内可以比我们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当然，这是假设撇开俄国无产阶级几十年间一直进行的反对资本的残酷阶级斗争这种前景）。

我们需要我国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和这样的经济高涨，即与此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形式，要不断排挤和削弱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需要取得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而不是把我们引导到完全复兴的所谓“健全的”资本主义。

我们觉得，当我们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同志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曾有一个战略计划，而当他写论合作制的文章，即给我们留下在经济政策原理方面的最后遗嘱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战略计划。这两个计划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无疑是相互联系的。

列宁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里所发挥的议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中首先必须克服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从经济的观点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小业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而为了克服这种自发势力和分散性，需要有勇气利用大资本，主要是租让资本作为中间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在一定意义上组成经济联盟，这个联盟用各种绳索把我们的主要敌人——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束缚住。

列宁同志写道：“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①

第一个战略计划就是这样。

请注意一下在这方而列宁同志所写的关于合作制的下面的一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5页。——编者注

些话：

“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既然小业主占优势，既然有交换的可能和必要，那么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愚蠢或犯罪。”^①

这第一个战略计划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必须达到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需要向农民经济作一系列让步，因为农民在逼迫我们。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应该联合大资本主义同盟者——租让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战胜它。这个计划规定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因为合作社是这样一个环节，它首先帮助资本主义成分、农村的富农成分。但是这并不可怕。我们通过合作社把这些成分联结于为无产阶级专政所节制的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保持和这些资本主义成分的联盟，战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亿万原子。这个计划就是如此。

如果我们把现在刚刚叙述过的东西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最后一篇论合作制的文章中所写的东西加以比较，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一系列解释。关于合作社，那里已经不再说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环节了。

“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既是私人企业，又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2页。——编者注

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①

或者象下面所说的：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在我们看来，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②。

与此相应，那里的整个战略部署与小册子《论粮食税》中所讲的不一样，而且根本不同。计划的基本路线，这就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

工人阶级的最大思想家、最大理论家和天才领袖所提出的两个计划就是如此。有两个计划，这当然不能解释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过去是那样想的，而后来根本改变了。这两个计划并没有根本矛盾。但是在从列宁同志的第一个方案到第二个方案，到论合作制的信这段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在列宁同志面前开辟了某些新的前景。

我们已经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而是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能保证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另一方面，我们也指出过，只有在流转极其迅速的情况下才可能发展生产力。那么现在请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些商店，那里差不多只有一些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招牌，而没有半点商品；有一些工厂，那里挂着红旗，上面同样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那里也没有任何东西，工厂处于停工状态；有一些银行，即银行的房屋，那里同样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是几乎连一文钱也没有；有大量的苏维埃纸币在市场上泛滥成灾，上面同样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是它们有一个不大的缺点，即它们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6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87页。——编者注

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有这一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开放所有的闸门，开放我们详细讲过的整个流转，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时我们就会有丧失我们的经济甚至我们的脑袋的巨大危险。

这点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加上经常由这种自发势力产生出来的、随着每一次流转变得越来越大的小资本家可能把我们吞没掉。但在保证生产力按社会主义方向增长的同时，在保证有一条使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康庄大道的同时，我们应当在使自己不受威胁的限度内，为整个这种流转放松缰绳；应当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竞争能力的条件，以便在展开经济斗争而不是实行压制的过程中战胜自己的竞争者。当我们刚刚开始实行现在的商品流转和在这方面走了胆怯的几步时，我们非常懂得经济命脉所具有的巨大意义。但在我们掌握这些命脉的时候，它几乎空然无物。我们有铁路，但它们不通车；有银行，但银行里的货币已经贬值，如此等等。这就是说，那时应当十分小心谨慎，所以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这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有了我们叫做第一种方案的那个计划，即他的第一个战略计划。当时首先应当设法巩固自己的经济命脉。用什么巩固呢？当时设想的唯一来源，就是外国资本，即租让制。当时设想用它来支持经济命脉，以巩固自己——这样做的结果获得了一定的机动能力。

在由第一种方案到第二种方案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那时发现外国资本不太愿意投到我们苏联境内。现在我们拥有的租让合同非常少，可是那时更少（顺便指出，只有当我们自己巩固起来的时候，外国资本才会开始相当大量地涌到我们这里来）。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很好地发挥我们内部的力量，这是连我们中间最大的乐观主义者也没有指望过的。我们在没有旁人的援助、也没有为这种援助而支付利息的情况下，从腐

烂恶臭、饥饿严寒中相当迅速地爬了起来。这些在列宁同志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

最后，与此有关的第三点：事情的结果是，经济命脉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充分巩固起来了。我们有了不愧为经济命脉的经济命脉，也就是说我们的铁路开始通车，我们的工业开始生产，我们开始组织银行，我们开始着手整顿我们的国家财政体系。

既然我们实际掌握了经济命脉，所以很自然地发生了阶级力量的变动。如果我们没有银行，而建立小资产阶级合作社，那么它就会压垮我们。而如果我们有了银行，那么它就会从属于我们，我们贷款给它。如果我们两手空空，那么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战胜我们，如果他是我们银行的存户，他就不能战胜我们。我们给他帮助，而他也给我们帮助。到最后，也许富农的孙子还会因为我们这样对待富农而向我们道谢。

很自然，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新的方案。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和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的结合。从那个时候起，即当我们把生气勃勃的、比预计的要更加兴旺的工业拿到手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就应加以改变：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对我们的危险要小一些。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和私商作斗争的办法，不是用脚踩他和关闭他的店铺，而是自己努力生产，东西比他卖得更便宜、更好和质量更高。

如果我们自己是强有力的，如果在我们手里集中了真正的经济实力，如果我们掌握了真正的、强大的经济命脉，那么开放经济周转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我们自己在增长。

这是一个新的形势，在这个形势下自然而然地在列宁同志那里能够产生一个天才地预见到种种事件进程的计划，这个计划即使在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指路明灯。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小资

产阶级经济刺激因素的发展置于这样的条件下，就是要使它随着私人的不断积累而日益保证我们经济的巩固。以前，我们无产阶级经济遭到了破坏；当时小生产比大生产更加有利，单单掌握了大工厂，实质上我们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但是当经济高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每一分钟、每一小时都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力量。将来我们的工厂开工越充分，我们的生产就会更加成为群众性的，城市将会更多地领导农村，工人阶级就会更加从容、更加巩固地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

当全线崩溃的时候，和城市相反，农村却加强起来，小生产就具有对于大生产的优越性；当高涨开始时，城市的领导作用就渐渐成为不可战胜的，而且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时期，所以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如果在日益增大的进步中加强起来，就一定能取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二

在工人阶级中间和在我们党内常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用狭隘的情绪对待农民；他们说，农村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必须抛弃，因为不懂得我国工业取决于农民市场的道理，在现在是最有害的事情。

社会主义的工业是由农民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来决定的。那么，什么是农民经济的需求呢？农民经济的需求有两种：一种是消费的需求，即对纺织品、印花布等等的需求；另一种是生产的需求，即对农具和各种生产资料的需求。

农业的消费需求由什么来决定呢？比方说，农民对纺织品的需求量由什么来决定呢？它取决于农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速度。

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首先是由农民经济的状况、水平及其

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的。这种需求将随着生产需求的发展而发展，也就是说，这种需求的发展是以农民将来采用日益增多的优良农具、提高经济技术和耕作方法等等，从而改善自己的经济，使它向前发展为限度的。显然，农民经济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不要把一切都吃光用光，而要用一部分资金去购买农具等等。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留了战时共产主义关系的某些残余，它妨碍着我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富裕的上层农民和渴望成为富裕农民的中农，现在不敢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敢盖铁皮屋顶，因为怕被宣布为富农；如果他买机器，他就不让共产党员看见。高级的技术变成了秘密的技术。于是，富裕农民对我们妨碍他积累和雇工表示不满；另一方面，遭受人口过剩痛苦的农村贫农有时也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去当这种最殷实的农民的雇工。

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我们过分热衷于得罪富裕农民。但因此中农害怕改善自己的经济，害怕受到严厉的行政压制；而贫农则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们去富裕农民那里干活，等等。

我们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手艺人也采取了很严厉的政策。我们通过征税的办法几乎拿走了他们的一半产品。当我们的工业十分薄弱的时候，就会担心小生产者损害社会主义大生产。农村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农村大量的农民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活干，但必须吃饭；在手工业者中间同样有人口过剩，这种过剩的（隐蔽的和公开的）人口是城市的一种可怕的压力，加剧了失业现象，因此，显然失业问题的重心与其说是在城市，不如说是在于农业的过剩人口。

当然，这些现象现在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但是，这是挂在我

们脚上的大秤砣，它妨碍我们更快速地前进。如果我们把在我们的政策影响下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体系作一系列的修改，那么我们就用更快的速度前进。

我们在城市有新经济政策，我们在城乡关系方面有新经济政策，但是，我们在农村和在手工业方面却几乎没有新经济政策。

这里在相当程度上盛行的不是经济斗争，而是实行行政压制的政策。愈往后，我们在经济斗争中就愈不能使用行政压制的遏制手段，而是要使用我们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对付私商，用法律手段关闭他的铺子是一回事，而要在经济斗争中排挤私商，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那些受过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教育的农村工作同志，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对拒不交税的人只有实行拆屋顶的政策，才是最好的经济政策；如果出现了小铺老板，不是建立合作社来反对他，也不是在经济斗争中排挤他，而是压制他，“加印上封”，等等。

当富农用机关枪来反对我们的时候，必须直接掐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那时采用这些方法和手段是有益的；这些方法现在却阻碍着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必须取消对富裕农民和对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农的许多限制。而反对富农经济的斗争，必须用其他的手段、其他的方法和其他的途径来进行；应当用各种新的方法进行斗争，并且坚决进行下去，以便不因这种转变而产生对富农的所谓指靠。

总之，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

从农民经济的积累中，我们将得到什么呢？农业积累就意味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到良好的促

进作用。

当然，我们在执行这种政策的时候，应当极为小心谨慎。在我们党内，现在有一些派别，它们带有一点富农倾向；有人说甚至要让富裕农户放手积累，这样提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看见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为我们的中农、贫农和雇农而鼓励各种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这样说：需要发展富裕农户的经济，是为了帮助贫农和中农。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用我国财政政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从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方面所征取的各种税收正在增加。我们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资金，都分配在国家的各种需要上面，即用在我们的工业、文化建设、苏维埃机关等等方面的需要上。我们允许私人资本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贸易，同时，我们用征税的办法，从资本家所取得的经济财源中征取一部分资金，并通过国家预算、银行贷款以及我们所控制的许多渠道，把这部分资金用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当然，可以封闭私人资本家的店铺，但是，封闭了店铺，我们自己却不能胜任自己所承担的那些任务，反而宣布说，我们向私人资本宣战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暂时还没有力量什么都自己干，因此我们容许私人资本，而抽取它流出的利润，再把它们分给工人阶级和农民。哪一种办法更正确呢？当然，第二种办法更正确。它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我们将增强全部经济的威力。从阶级观点来看，它也更为正确，因为我们能从资产阶级的纳税中（也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中）直接得到一笔额外财富，并用它来办我们的事业。

富裕农户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可能会有些怪人，他们会建议向农民资产阶级宣布“巴托罗缪之夜”^①，他们会证明，这完全符合

^① 指发生于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夜间即圣巴托罗缪节前夕的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编者注

阶级路线，因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有一点很糟糕，这会是极端愚蠢的做法。我们完全不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一无所得，并且会失去很多东西。我们宁愿让资产阶级农民发展其经济，但我们从他们那里将比从中农那里取得多得多的东西。我们将把从资产阶级农民那里取得的资金，通过贷款方式贷给各种中农组织，或者用另一种形式贷给贫农和雇农。我们从富农那里所得到的额外财富，可以用来真正帮助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经济，但我们不要把这个富农钉死了，这会使我们自己在经济上受到损失。我们力求增加我国的国民收入总额，加速我们的经济周转；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帮助中农、贫农和雇农。谁不懂得我们积极对待农村积累的这种含意，而认为这种政策只是“开放富农”，谁就犯了富农倾向的毛病。

当然，我们现在不应当因此就要掩盖、抹杀和害怕资本主义关系的某种发展。我们不需要用单纯的行政压制去克服它们，而需要利用这种情况给贫农和中农以经济帮助。谁不明白这个问题，谁就有富农倾向。

在我们的报刊上，现在还透露出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有如下述：

有些同志在正确估计农村某些现象的时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用行政压力去克制富农，而要看到这样的前景：由于分化，我国将产生资本家和雇农；阶级关系将愈来愈尖锐化，事态不可避免地发展到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用暴力去剥夺富农。这样一套观点已经在书刊上反映出来。资本主义在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在尖锐化，我们应当在农村掀起阶级战争，一直进行到削弱和剥夺富农为止。我认为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在实践上是荒谬的。如果我们要在农村鼓吹积累，同时却允许并安

排在两年后举行武装起义，那就会害怕积累。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持有这种论点的同志们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在这里讲过的这种条件下，这个专政按其任务来说不只是国家的强迫机关。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两者联合起来的一种威力。在我国的国家机关中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我国的全部工业、全部铁路和矿山等都列入国家预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国家政权结构与资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政权结构是不同的。不言而喻，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整个社会上所引起的那些变化，除去别的不说，一般也会大大增加国家政权的力量，因为在经济因素中增加了国家经济的全部威力，而国家经济加上国家政权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一个不小的砝码。

因此，重要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这种状况。重要的还有：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得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威力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因此，显而易见，工人专政这一事实在其他社会因素中，在决定社会发展的其他力量中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人们经常说：经济决定政治。这是对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但是，要知道，在我们的政治中包含了相当多的经济，因为在我们国家政权的机构里，已经包括了各种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我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谈到过的经济命脉也包括在内。这一事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和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上划了一条分界线。实际上，在有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的情况下或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农村可能是一样的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实必然要引起某些深刻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如果变化只在于国家的政治外形，而其他一切都

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保持不变，即假定无产阶级掌握纯政治形式的国家政权，而工业却控制在资本家手里，那么显然，农村的各种关系就会按照旧的方式确定下来。区别只会在于：我们竭力实行行政压制，但压制的结果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垮台。

如果我们不没收大资本，而只是在纯政治领域内活动，那么我们会垮台。我们的力量不仅在于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的力量还在于我们把这个政权及时变成了改造经济的杠杆，现在，我们的命运要由我们所掌握的作为我们国家机关组成部分的经济命脉这样一些力量的对比来决定。

同志们，如果问题是这样（无疑是这样），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将日益成为领导的经济力量，那么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结论：灌注到农村发展中去的这股急流，同过去的历史时期相比，它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发展。

因此，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列宁在《日记摘录》和在他的《论合作制》一文中以如此天才的明确性和如此有力地提出过，我们不能忽略这篇文章，因为这是论述我们对待农民的政策的最重要的东西。根据积累的经验，现在必须对列宁的原理作一些补充，但这些补充丝毫不能抹杀列宁同志在第二个方案中所发挥的天才的战略计划。

大家知道，我们和民粹派之间进行过很大的争论。许多俄国民粹主义者以及许多外国人，发挥了一种就某一点来说相当严整的所谓农民经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他们创造了所谓农业的“非资本主义”进化的理论。并且在民粹派营垒中有一个占优势的派别，他们认为，农业中的小经济一般地比大经济更有利，在农业中机器不可能有多大益处，等等；但是在俄国民粹派或半民粹派中间还有一个派别，诚然是一个很小的派别，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认为使用机器，这是拯救农业；还认为，大经济比小经济好

得多,有利得多,合理得多,但是他们断言,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农民的农业要通过一条完全特殊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向大经济,而他们正好提出合作社作为这样一条道路。

苏汉诺夫是承认大经济的全部或几乎全部优越性的这个派别中的一位俄国大理论家,他在一本当时引起广泛议论的著作中,提出了比较严整的一套论据。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农业中大生产比小生产优越,这是对的,但是农民要通过一条完全特殊的道路,即通过合作社走向大生产。这种合作社,即劳动农民的合作社,是一种特殊现象。它逐渐发展成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巨大力量。苏汉诺夫断言,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错了,因为他们认为农业在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前进。相反地,其特点是“非资本主义化”。它有自己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合作社。

西欧好多所谓“农业合作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案发挥了同样的概念,同样的观点体系。当然,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观点体系。首先应当看一看,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什么有意思的和有教益的东西;那里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使农民在经济上从属于自己。这里不应当受迷惑。我们看到,在西欧(这里说的不是殖民地,而是象法国、德国等这样的国家),绝大多数农民跟着地主和资产阶级走。在这些国家,反对农奴制的资产阶级土地革命早已成为过去。那么,资产阶级和地主究竟怎样把农民完全或几乎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资产阶级影响农民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而现在则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合作社。如果我们拿象德国这样一个受战争之害最大,因而那里的阶级对抗表现得最激烈的国家来看,并且试试分析农村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就在这里遇到一些惊人的事实。

全国土地同盟是联合农业人口的最大的组织，它拥有两百万以上的成员。但是这个组织的社会结构颇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成员是由哪些阶层组成的。德国全部农业无产阶级有一半参加这个同盟，大地主、伯爵、公爵、男爵等等组成同盟的上层领导人；在德国这样先进的国家，半数农业无产阶级参加由男爵、公爵、地主操纵的组织！这个同盟是一个庞大的机器，它拥有庞大的机构，而机构的官吏主要是军官，这些军官又拥有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集中化管理机关，它们依靠庞大的合作社网，拥有许多与工业有联系的银行。

法国也是这种情况：有七个大的组织，在这些组织里农民受地主支配，只有一个小小的组织是我们的，但按其人数说，实质上几乎等于零。一些大将军、帝国主义分子领导着好些最大的合作社机构。美国不久前发生了巨大的农业危机。在这个国家，由于工业品价格高昂，美国托拉斯极力扩大的所谓“剪刀差”而造成的尖锐的农业危机，使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农场破产了。银行家们设法用许多信贷机关把农场的合作社组织抓到了自己手里，完全把它们控制起来。

在芬兰，一个相当强大的农民合作社组织完全掌握在两家私人银行手里。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点的呢？用很狡猾的信贷政策，用非常巧妙的调整关系的政策。结果，即使存在一些不是剥削类型的组织，而是劳动农民的联合，它们也逐渐变成了受地主和资产阶级操纵的组织，最后完全成了一般的资产阶级地主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能有其他出路。

拿信贷合作社为例。信贷合作社既然要营业，要发展，就必须与其他机关，首先与银行保持某种联系，因为信贷合作社储存着一些多余的资本，它不能直接把这些资本投入流通。合作社想要暂时把自己的资本存放起来提取利息也好，希望直接或间接取得贷

款也好，它都得去找资产阶级的银行，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其他的办法。

如果银行给许多合作社组织提供贷款，它当然希望它们繁荣；它们也愿意互相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逐渐加入资本主义金融体系。

资本统治条件下的供销合作社和其他形式的合作社的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地主和资本家能够用巧妙的政策联合农民来反对工人，并且能够使农业无产阶级的一半人与男爵、公爵和伯爵们合作，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同比起男爵来与我们无比亲近的农民建立联盟，我们就是大傻瓜。如果农民通过合作社组织能逐渐进入工业的和银行的资本体系，那么在我国专政下，在我们国家政权和农业机关的相互关系下，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民就能够通过合作社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关系的体系。

但是，应当看到，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将通过各种矛盾的形式发展下去。在这方面，我们有过许多幻想，它们妨碍了正确的政治工作。这些幻想有的至今仍然存在。

许多同志现在惯于根据战时共产主义的原则夸大各种集体生产联合组织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作用。我们应当在农民中间千方百计进行联合成集体农庄的宣传，这是正确的，但是，断言这是推动农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康庄大道，这就不正确了。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吸引农民来参加我们的社会主义组织呢？只有用使农民关心经济利益的办法。合作社应当用使农民获得直接利益的方法来吸引他们。如果这是信用合作社，农民就应当得到低利贷款；如果这是销售合作社，农民就应当用比较有利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从而得到好处；如果农民想买什么东西，就应当

通过自己的合作社买到它，农民应当通过合作社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并且用这种办法继续建设合作社。

因此，我们要用利益来吸引作为小私有者、小业主的农民。这一点也不可怕，因为，归根到底，由于自己经济的发展，农民将会使其自身和他的经济沿着转变成我们全国社会主义体系的一小部分的道路前进，如同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长入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系一样。假定我们谈的是一个储蓄所和某一个信用合作社。假定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持有存款的富裕农民想把钱积存起来。他把这些钱存到哪里去呢？当然是存入与我们国家银行有联系的储蓄所。因此，农民便会关心我国银行和我们国家制度的巩固，而且非常关心。如果这个银行通过它的信贷机构提供给农民以比在沙皇制度下低的低利贷款，那么，关心程度更会日益加强。我们举一个对我们利益最小的例子。一个富农，他因剥削雇农而有了积累，取得了剩余价值，要把这笔钱存起来。他把钱存到哪里去呢？最后是存入我们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得到某种利益呢？我们得到了利益，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额外的资金，而资金的增加就使我们能够贷款给中农合作社，并促使全体农民走向经济的高涨。我们利用富农存款，是为了支持农民的其他阶层。

我们举了信用合作社作例子，而供销合作社的情况也是如此。这里也存在着它与无产阶级国家银行的联系，存在着银行的调节作用和在这些银行中的积累，在出口日增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

因此，农民合作社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逐渐长入各种社会主义关系的体系。事情不是从生产开始，而是从流通开始，这完全用不着担心。事物发展的逻辑一定是，紧随在流通领域的合作化之后，必然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实现生产的合作化。

农业本身必然要工业化。例如，我们的榨油合作社是与榨油

工厂联系着的，或者，我们有些生产马铃薯地区的合作社是与各种马铃薯加工厂联系着的。各种合作组织已经开始拥有并将要拥有罐头加工厂、蔬菜晒干厂和醋渍厂等等。

供应拖拉机和扩大电力网提供了由流通过程合作化转向生产过程合作化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是否能够顺利发展呢？不，不容易，也不顺利，因为发展将通过各种矛盾的方式来进行。我国农民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农村的阶级斗争不会立即消灭。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否认这一点就是荒谬的马尼洛夫精神。恰恰相反，阶级斗争在最近时期会增加起来。但由此就得出“第二次”革命的结论，却是荒谬的和不正确的。

问题很明显，在一些合作组织里，贫农将占优势，在一些合作组织里，中农将占优势，在另一些合作组织里，占优势的却是富农。自然，在集体农庄里首先是贫农占优势，而在信用合作社里，有许多地方，最初会让富农占上风，我们在选举管理委员会时将与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全都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那么就用不着再进行一次革命。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从当前一切有利的情况出发，使我们能够从加快的经济周转中，从由于商品流转的普遍增长和国营经济、私人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的国民收入中取得资金，以帮助中农和贫农群众。

现在是否可以和需要进行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宣传？不，我们现在是另一种形势。我们应当通过经济途径行动，以使用各种经济措施，首先是通过合作社，推动农村居民的基本群众前进。

最后，我们认为必须从阶级理论的角度谈谈这一问题。

按照农民这个词原来的含义，农民只有在封建社会里才是一个阶级，而且是一个基本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级，因为农民分化了，分为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封建成分。

社会上的封建残余愈多，农民就愈是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在十月革命时，我们是同连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一起行动的。这是因为，当时我国不仅有非常强大的资本主义残余，而且还有很强大的封建残余。由于封建关系在我国还很强大，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一个阶级。由于资本主义在我国已经发展起来，农民又不是一个阶级。

由于我国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农村的资本主义关系还不发达，因此留下了这个农民的大量中间阶层——中农。而由于我们进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这种中农已经成长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

通过合作社和税收制度以及其他办法，我们在经济上将会强大起来，但这已经不是建立在掠夺性分配(说得庸俗一点)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高涨的基础上；我们将在经济上使中农和贫农提高起来，这样，我们将日益使中农和贫农的生活水平接近较富裕的农户的水平；然后在这种提高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达到更高的程度，那时，农民同无产阶级相比，作为一个特殊阶级就会消失。

应当看到，这种明确的前景虽然还很遥远，但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我国是工人专政，但是，这个工人专政有农民作为同盟者，工人专政从经济上和文化上帮助农民愈多，农民通过合作组织加入我国总体系和吸收共同文化就会愈多，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得愈多。总之，我们要把工农的划分变为劳动者先进阶层及其落后阶层的划分。

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工人对农民的主要作用是要起领导作用。

在我国是工人阶级专政，但是，工人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回事，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又是一回事，而对农民的关系

系则又是另一回事。必须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专政同农民建立了联盟，它在争取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应当领导农民。

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3—14
页，第9—10期第3—15页。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 关于合作制问题的发言

(1925年4月29日)

同志们! 首先请你们和捷尔任斯基同志原谅, 因为我把一个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挤进关于冶金工业问题的辩论。但是, 同志们,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我有权请求你们准许我作一个临时发言, 因为我昨天没有能够回答针对我的公开论战, 因而可能使与会者造成一种印象, 认为我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等中间的标新立异者, 而拉林同志是奉命在探讨农民经济问题时给我指路的开导者。不过我不准备充分论述问题的全部提法, 况且我想日内我能全文印出一个专门的报告, 阐述同我们土地政策有关的那些基本问题, 从而每一个党员和与会者都能看到我这一方的充分论述的论据。

同志们, 我认为有两种倾向, 两种不正确的问题提法是目前党内农民问题上存在的主要倾向。我首先谈谈第一种倾向。某些同志认为下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活跃整个国民经济, 现在需要使农村中的上层阶层得到发展, 甚至开放(即给以发展的可能性)富农经济, 更不用说富裕农民经济、中农经济等等。

事物是彼此联系的, 你们开放了农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 从而也就开放了在它下面的各社会经济阶层。但是这种倾向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另一半任务——为什么要做这一切呢? 按照我的理解, 问题的正确提法至少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发展这些关系, 是为

了增加整个国民收入的总额，是为了增加得自农业的收入总额，是为了同时增加周转，增加得自国营工业的收入总额；是为了增加国库的一切收入，是为了由此增加能够掌握在工人阶级国家政权手里的款子，这些款子，如果拿我们的农村政策路线来说，应当以农业贷款等形式支持农业人口基本群众的经济，即首先支持中农和贫农，支持他们的合作社和集体农庄。

我认为下述说法仍然是十分正确的：我们正在农村中发展新经济政策，而这在以前几乎是没有的；我们现在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有了从前实质上没有的经济命脉。由于我们掌握了这些经济命脉，因而我们面临的危险变小了。所以，如果你们完全公道地问我们是不是指靠富裕阶层，指靠富农，我觉得对此应当给予否定的回答。“指靠富农”的是说这种话的人；发展富农经济吧，无须作更多的事情，其余的一切都能随同解决。我们将发展资本主义关系，这就是一切。

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有这样的看法：“你们干吗在那里空谈农村中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你们那里发展的将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关系，不管这多么令人不愉快，但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

这种看法正确吗？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这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富农倾向”。这些同志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作用；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好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任何无产阶级专政；好象我们没有为无产阶级政权所掌握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好象我们没有银行系统、农业信贷等等！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在土地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关系得到异常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这里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它不仅是国家政权，而且还是经济大铁拳。无产阶级专政对经济发展的整个进程作了“一些修正”，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整个发展进程。

这些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列宁同志所谈的那些地方。我们资助合作社建设，也就是资助社会主义建设。因而，如果我们说现在应当开放富农经济和中农经济，那么我们同时有一系列措施来限制由此产生的剥削趋向。但是，我们终究让富农存在并进行积累。为了什么呢？为了得到额外资金，以便资助合作社制度，首先是合作化的中农群众，使他们合作化，通过相应的信用贷款支持他们。十分清楚，不能把这个重大的经济战略和“指靠富农”混为一谈。为什么呢？因为“指靠富农”或者即使“指靠富裕农民”就是开放富农经济，仅此而已。而现在建议做的和我试图论证的则是为了利用这个“开放”过程来给予支持和资助。给谁？给我们真正指靠的农村中的反资本主义成分（客观上反资本主义的）。如果要问在农村中我们指靠谁，那么我们应该回答：指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因为列宁同志在不久前发表的草稿——论粮食税的小册子里所提出的论点对我们仍然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我凭记忆引证）：“勤劳的农民，勤劳的中农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中心人物。”^①

这样说正确吗？是的，是正确的。我们正确地确定了路线，把它具体化为合作化的路线，不是为了叫喊“合作制，合作制，合作制的，还是合作制的”，而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心人物。而为此必须开放我们的商品流转。在这里可以作一种类比。我们曾经容许私人资本，但是不久前我们能够依靠我们的经济命脉挤压它，以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收到了出乎我们所希望的效果。我们能够把私人资本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能够“放松”，也能够“挤压”。当我们处

^① 列宁的原话是：“现在增加农产品成为（已经成了）关键和枢纽……因此，在农业方面要‘指望’中农。”

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高涨的‘中心人物’。”（《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2页）——编者注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放松”它的时候，能够说我们“指靠”资产者吗？我看不能。我们“放松”并看看，这会不会增加国民收入和经济实力。这是不是“指靠新资产阶级”呢？我看不是。现在就需要用这个观点对待农村关系的新阶段。这不是“指靠富农”，而是消灭从前大体上在城市里有过的那种制度，有一次我曾经谈到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商店都在我们手里，那时每个商店都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那时在这些商店里一无所有，什么也买不到，什么也吃不上。以后我们“开放了”私商，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东西，或者直接地，或者（更多地）通过商品总流转的加强，使这个价值的增殖加强我们自己的阵地。谁只看到问题的一半——放手发展经济、在农村放手实行新经济政策，而看不到另外一半——帮助我们所依靠的所有阶层，谁就有了“富农倾向”。

但是在这里发过言的拉林同志却有另外一种倾向，相反的倾向。如果第一种倾向是说：开放富农，仅此而已，那么拉林同志则陷入与此相反的极端。在他那里是怎样的呢？在他那里没有中农。在他那里，就象在谜画中一样，中农不见了。你们可以千方百计地找这个中农，但是找不到。在列宁同志那里，中农曾经是“中心人物”。现在中农还是中心人物吗？是的。但是在拉林那里，中农在哪儿呢？它消失了。拉林同志说：“资本主义关系”，一端是农业雇工等等，另一端是农业资产阶级。这很好，这是尽人皆知的。可是，这是不是和整个现实相符呢？这和整个现实不相符，因为拉林同志忘记了“中心人物”。他抓住两端说，这就是事情的全貌。这不是事情的全貌，看到两端而没有看到农民基本群众是不正确的。富农和富裕农民有多少呢？百分之三左右，不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说我们这里几乎有了农场主。这当然已经是夸大了。不错，最近的将来在我们这里农场主也将会得到发展。但是，当我们确定整个政策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尊重现实的比例，我们应当在正确的

对比关系中认识农村群众的所有阶层。在拉林那里，中农消失了，中农没有了，应当白天打着灯笼在拉林同志的观点里寻找这个中农。由此就产生出他的特殊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对待农民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继续。这是从中农不知怎么消失不见的一种观点中产生出来的对待农民的旧政策、非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继续。可见，拉林同志的观点是：中农不见了，只有富农和无产者，而我们“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据说就在于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而阶级斗争的这种尖锐化将把我们引向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尖锐化”将导致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即剥夺另一个阶级。这是由拉林同志的整个立场得出的结论。如果他昨天企图在我们面前用开玩笑来搪塞，说到那时苏维埃政权将很强大，足以用“一道命令”实行这个革命，那么要知道，这样说是不行的。我们不会“一下子”变得那样强大，能用“一道命令”就消灭拉林所描绘的覬觎政权的这个最强大的阶层。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富农变得特别强大，它拥有雄厚的力量，由于中农根本不存在，所以（从那样的前提中十分自然地得出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剥夺它。但是在拉林同志的发言里的这种剥夺好象是在滑稽歌剧里所表演的一样。先是用敌人人多势众吓唬人，以后又用一纸命令一下子就把敌人“赶跑了”。在这里前后不符，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如果我们不得不象拉林同志所想的那样实行剥夺，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进行“第二次革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借“命令”来支吾其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说我们必然会使我们的农村出现第二轮纯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城市中的一切——或者差不多一切——将是无产阶级的，而农村中的一切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在城市中一切将象现在一样，而在农村中我们将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资本主义关系，最后我们要“剥夺剥夺者”。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即当我们在农村中实行第二次革命的时候，那时两边（一边是城市，另

一边是农村)在我们这里就拉平了。这就是由这种观点得出的结论。我再说一遍,既然昨天拉林同志同他在自己的《农民社会性的增长》一书里所谈的相反,企图用“命令”这个词来开玩笑搪塞,那么,同志们,要知道,这个玩笑是对现实中所存在的东西未经周密分析的结果。拿拉林同志的任何一本著作来看吧。我手边有他的小册子《农民社会性的增长》。例如,那里写道:“是谁的眼睛盯着农村呢?是无产阶级。而这是鼓励集体农庄,而不是鼓励富农。”他那里有集体农庄和富农,而根本没有中农。他的全部认识就是我现在描述的这样。它正确不正确呢?当然不正确。这里主要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主要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在我们这里不单纯是“资本主义关系在农村中的发展”,而且“还”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纯粹的”政治,而且还是经济大铁拳。在拉林的这个计划中只有“富农”和“集体农庄”,并没有中农,请给我指出,在拉林的这个计划里,流通过程即销售、采购、信贷等等方面的合作社在哪里呢?它在拉林同志的“计划”里几乎完全没有位置。这样的(错误的)“拉林式的”观点在我们党内是存在的。同志们说,集体农庄是真正的合作社,而销售、采购和信贷都“不重要”。这种观点就是同中农消失不见的看法和有关同志的一般理论观点联系着的。中农消失了,因而它的合作社也消失了,列宁的建成社会主义即合作制的社会主义的整个计划也消失了。这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不能以它为指针,所以我们不能接受拉林同志的观点。

我觉得,昨天拉林同志在他的发言中施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小计:他提出了使农村政治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口号,来代替“整个地”“使农村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并且把这种尖锐化说成是在“活跃苏维埃”的情况下的一种争夺影响的无害的斗争形式。我们应该以活跃苏维埃为指针,顽强地为自己的候选人而斗争等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根据由他的问题提法必然得出的第二次革命的前

景来看，从这里到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口号还相去甚远。如果考察一下正确描述的前景，那么我们的农村将会怎样呢？资本主义关系会发展吗？会的。在合作社里会有资本主义分子吗？或者象列宁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会“化学地分离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吗？会的。如果我们在商品流转很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帮助中农类型的合作社，那么得到发展的会不是富农类型的而是中农类型的合作社吗？也会的。而集体农庄形式的贫农合作社也会更加发展吗？是的。那么农村中将会有哪些成分呢？贫农合作社——集体农庄。销售、采购、信用等方面的中农合作社。一些地方还会有富农合作社，它们大概会在信用合作社中拥有自己的据点。这整个阶梯都将长入我们的银行、我们的信用机关的体系，并同时长入我们一切经济机关的体系。总的说来我们这里会是怎样呢？总的说来我们这里会是这样：如果富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如果贫农和中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社会主义合作社。这将是一幅五彩图画。以这些关系为背景的阶级斗争的情况将是怎样的呢？它在我们这里会不会尖锐化呢？很可能，一开始，在最初时期，它会尖锐化。是不是可以设想它从一开始就消亡呢？这种看法当然是最愚蠢的胡说。但是，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总路线，布尔什维主义路线，我们整个时期的政治路线在于有意识地加紧阶级斗争呢？这一点我恰恰不这么认为。实际上，现在我们正在通过有关雇农的法律。我们加上一条修正：取消八小时工作制，代之以非八小时工作制，在这一方面有更多一些的“自由”。这是什么，是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吗？不，这扯不到一起去。我们的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完全另外一些形式进行的，所以我们的路线应该是：我们应当加强这些特殊形式，而放弃以前的阶级斗争方式。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很简单，甚至为富农做工并受富农剥削的雇农，尽管受富农的

支配,但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一定程度上却支配着富农,因而可以通过法律,以一系列最独特的形式迫使富农,自己的“主人”服从自己的阶级意志。我们有合同,我们有工会,我们有工人立法,我们有征税制度,最后,我们还有信贷政策。我们将怎样进行和组织阶级斗争呢?当然是在选举时争取我们的政治候选人当选。这是无疑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根据莫洛托夫同志讲的那些方法进行搏斗。但还有其他的阶级斗争形式,不应当忘记这些形式,它们在整个历史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事情的本质。当我们对富农的课税多于对其他农民的时候,当我们资助中农的时候,我们是干什么呢?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正在执行消灭农民差异的路线,因为我们在提高中农和贫农,帮助他们,把农民由贫农变为非贫农。难道我们应该把贫农看成永久的贫农,看成穷酒徒吗?当然不应该。我们使贫农登上更高的经济阶梯,而另一方面对富农更多地课税。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这里重心由以前的阶级斗争形式(机械地“打掉门牙”)转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可能有的这些新的阶级斗争形式。这也就是整个局势和我们整个政策的特点。而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有意识地沿着“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路线前进呢?丝毫不是这样。我们正在把重心转移到其他斗争形式上。这是不是说我们能预防机械格斗的企图呢?不能。如果我们不幸发生了战争,我们应该还去组织贫农委员会,如果富农举行暴动来反对我们,我们将采取恐怖手段对付富农。如果在我们这里阶级力量平衡的破坏造成这样一种对比关系,即上层阶层得到增强而反对我们,我们将有这种危险,那么我们将派出我们所有的炮兵去对付它们。但是我们有意识地追求的东面,我们的总路线(它是我们的合理政策的根本)则应该是由阶级斗争的这些形式转为另外一些形式:向上层部分征税,用农业信贷以及建立技术基础即电气化等等来帮助另一部分(而后这点要

在更远的未来实现)。可见我们对发展进程的认识和拉林同志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

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在拉林同志那里，中农消失了。实际上，如果按照我的看法提出关于开放的问题，那么我们这里是有中农的利益的，是有“中心人物”的利益的；而拉林同志那里是没有的。如果提出关于合作社的问题，那么我这里既有销售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采购合作社等等，此外也有集体农庄。拉林同志那里，实质上只有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强大的东西，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在他那里，这就是康庄大道。在我这里，阶级斗争的重心转到我现在所谈的完全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在他那里，阶级斗争主要是采取打掉门牙的形式。在我们这里，总的前景是使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在他那里是“第二次革命”。可以看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提法，是对我们农村的革命进程和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肯定说，我们现在所能说的一切都说明，对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立场，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放弃的。列宁同志所维护的立场正是这个立场。但是从这个立场当然决得不出结论说，我们应该袖手坐等，等候一切“自行到来”。请回忆一下列宁同志是怎样提出关于合作社的问题的。他说过：一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认为，如果我们转入新经济政策，那么合作社就成为不必要的了。而我说（这是列宁同志的话），正是由于我们转入新经济政策，合作社才具有巨大的意义。

现在，一般地说，我们在农村正更坚决得多地转入新经济政策；我们转而更大力地发展商品流转，我们转而活跃苏维埃，这意味着发挥农民的政治主动性。但是，正是由于我们这样做，我们党的队伍的团结和我们基本骨干的加强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果说在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我们经历了党内危机，那么在过渡到现在

我们在农村正在过渡的那种局面时，我们在农村也开始经历党内危机了，这种危机现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我们的支部目前处于涣散状态。

因而解释我们政策的工作具有更大的意义。

所以，依我看来，多么需要解释我们实行的策略的好处。我们还没有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只是摸索出最初的几步；需要非常慎重。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持拉林同志的那种认识是走不远的，那样我们会忘记中农这个列宁同志在其论粮食税的小册子和最后几篇策略文章中所指靠的“中心人物”。我们目前没有理由放弃这个政策，在我看来，李可夫同志在这里提出和维护的决议所遵循的是这条路线，而不是拉林同志的路线，拉林同志根据的是另一种前提，它必然造成对我们党有害的另一种政治后果。

译自《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 年俄文版第 181—189 页。

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

一 我们正在摆脱贫困。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没有地主和大资本家的经济

从1924年起，我们，原沙俄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开始相当迅速地挣脱骇人听闻的经济破坏，开始医治沉重的创伤，开始根除在以往的年代中非常普遍的动荡和混乱现象。现在，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谁都看得很清楚，这个大国的经济正在开始站稳脚跟。我们看到，无论在哪一个生产部门中，到处都呈现出活跃、高涨、向前迈进的气象。

在我国，农业是全部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工业发展得比较差一些，它的发展也取决于农业的增长。而农业，在我们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农民的经济，是两千多万农户的经济。

在帝国主义战争年代，在国内战争年代，在大破坏年代，这种农民经济遭到了破坏，陷于破产和贫困。可是现在，任何人都看到，我国的农村正在慢慢地开始积蓄力量：播种面积在扩大，生产在增长，新的农作物在增加，农民正在由三区轮作制转而采取多区轮作制，有的地方正在出现新的机器和拖拉机；总之，这里也在慢慢地开始取得进展。诚然，到处仍然是贫困和愚昧的汪洋大海。但是，如果把现在的情况同国内战争年代相比，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正在挣脱贫困。

回忆一下以往的年代吧。在城市里多数工厂停了工，优秀的

工人上前线打仗去了，城市里没有燃料，没有原料，没有粮食。大工厂不开工，商店空空如也，城市迅速消失，人们为了寻求一块面包由城市跑到遥远的农村去，以便更加接近土地，以便好歹挨过光阴，以便在什么地方弄到一块面包或一袋马铃薯。可以说，一切城市都已“四分五裂”，都靠乞讨度日，城市的人都已流离四散，遍及全国。

而现在我们看到，城市正在迅速地重新开始发展，工厂正在恢复生机，新的房屋正在开始建筑，城市生活正在沸腾。饿得筋疲力尽的工人阶级，在经历了骇人听闻的破坏年代之后，正在开始恢复元气。它（工人阶级）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保证自己能过越来越好的生活。我们正在慢慢地开始建设一些新的工厂。电站的建设正在慢慢地前进，即使在农村的茅屋中，电灯也不再是稀罕之客了。

我国的交通运输业也在迅速地发展。在这方面只要把以往的年代同现在的情况比较一下就行了。我们大家都记得，当时为数很少的列车是怎样缓慢地爬行着，车箱的玻璃被打得粉碎，里面挤满了多得不可胜数的象蚂蚁一样的背着口袋的人。当时全国简直被打成了许多碎片，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往往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机车墓地”（一堆堆旧的，被破坏了的，生了锈的死机车和被打得稀烂的、残缺不全的车厢），就是当时充满我们的交通运输业的无秩序和大混乱的见证。

现在，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整顿了我们的经济。铁路运输和水上运输都在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开始给国家带来直接的利润。破坏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原来的那些混乱现象永远消失了。

再回忆一下我们的苏维埃货币的命运吧。我们记得，我们的苏维埃纸币越来越贬值；人们成俄磅地携带它们，就象携带着一堆堆废纸一样。国库就靠这些可怜的苏维埃纸币来维系。当时的经

济和国库已经达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

而现在我们有“硬币”，银币和铜币早已在城乡流通，我们的切尔文牢牢地站住了脚。现在每一个农民和工人，每一个农户、工厂、矿山都可以进行计算，可以制定自己的经济计划，可以事先知道，他们必须和可能开支多少，他们该花多少钱。国库可以正确地计算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并且在自己的巨大的经济中正确地制定计划。

由此可见，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在向美好的未来迈进。我们的国家正在变得富一些，我们开始向贫穷和困苦开战了。

我们国家所拥有的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属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诚然，我们容许私商和中介人存在：在有些地方，在我们自己干不了的地方，我们容许私人资本家经营其业务。在有些地方，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无力举办的某些企业租让给外国大资本家，而外国资本向我们的国家缴付租金。但是，如果我们对我国的全部经济加以考察的话，那么，私人的和租让的工商企业所占的份额是并不很多的。绝大多数的经济，是工人国家的经济，或农民的经济，或各种手工业者的小经济。

这些事实首先说明什么呢？

这些事实首先说明，工人和农民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完全可以不要资本家和地主的帮助，不要那些曾经在数十年和数百年当中一贯发号施令的主人和管理者，而独自建设自己的经济。

这个情况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象1917年10月在我国发生的这样伟大的变革。过去，无论在什么地方，任何国家，劳动人民群众一次也没有能够把资产阶级制度的指挥官赶出自己的安乐窝。过去，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人和农民都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资产阶级制度的辩护士，地主和资本家的辩

护士，向来一个劲儿地嗡嗡叫嚷说，劳动群众——工人和农民——即便是想的话，也没有能力搞好经济和管理国家。他们又说又写：“头脑简单的”、“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永远不可能搞好如此复杂的事情。而在十月变革以后，几乎每天、每小时都有人预言我们必遭灭亡。就在十月变革前几天，俄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最聪明的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写道，布尔什维克任何时候也不敢夺取政权。而当布尔什维克，即依靠着农民的工人阶级政党，“夺取了”政权时，劳动人民的一切敌人就都幸灾乐祸地期待着它的垮台。然而，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巨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日子却过得蛮好，地主已经永远从我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了，资本巨头们则在一些外国的首都苟延残喘。

劳动群众自己能把事情办好，这一点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于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一前所未有的范例将不断地激发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去对世界进行伟大的改造、伟大的重建。这一范例以经验和事实驳斥了资产阶级制度的辩护士们所说的没有资本家和地主就不行的神话。这一范例正在鼓舞一切革命战士、新社会的建设者的斗志和信心。

二 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取得了 胜利？（工农联盟）

如果说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排除一切困难，摆脱最艰苦的处境，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是由于在我国，建立了另一种联盟，即工农联盟来对抗地主和资本家联盟。

在一切国家中，富人（银行家、工厂主、大地主、铁路和矿山的所有主等等）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他们奴役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群众的意志。只有当整个工人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影响的

时候，只有当它，这个工人阶级，把广大的农民阶层从资产阶级的这种影响下夺取过来，帮助农民摆脱这种影响，使他们走上新的轨道、走上独立自主的新道路的时候，资本家的国家和地主的国家的死亡时刻才会到来。只有建立起劳动者阶级的联盟，工农联盟来与资本家和地主相对抗，与富有阶级、非劳动者阶级的这个联盟相对抗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能战胜旧制度，巩固新制度。这个真理必须永远记住，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真理，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指望获得进一步的胜利。

这个真理首先由我国革命本身的进程所证实。且拿我国的十月胜利来看看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胜利的原因何在。显而易见，之所以能够取得十月的胜利，正是因为斗争过程中工人同农民互相携起手来了。农民的主要要求是什么呢？农民的主要要求就是要求土地与和平。工人阶级的主要要求是什么呢？工人阶级的主要要求就是要求把资本家的工厂变为人民的财产，就是要求和平，要求苏维埃政权。农民如果不支持工人，他们决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从工人这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不全力支持农民的要求，他们也决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就建立了、铸造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或“同盟”，这个联盟使得我们在伟大的十月的日子里比较容易地取得了胜利。问题是由工人和士兵的非常齐心协力的共同行动解决的，而士兵是与我们的农民血肉相联的。士兵希望和平，农民也希望和平；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士兵也希望得到土地；农民希望镇压地主，士兵也希望镇压地主。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支持和传播所有这些要求，并使之成为他们手中的战斗口号。农民的要求同工人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工人的要求同农民的要求交织在一起。我国绝大多数居民的这一联合攻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十月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我们为什么在延续了好几年的国内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呢？要知道，在我们取得十月胜利之后，外国资本家也起来反对我们，他们迫不及待地帮助俄国资产阶级。要知道，许多强国的资产阶级用一切手段——既有军事政治的，也有财政的——支持我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我们的苏维埃国家曾不止一次被战火所包围，被敌人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要知道，曾出现过这样的时刻，那时苏维埃共和国统共只剩下几个受敌人进攻部队紧紧逼迫的省份了。要知道，曾出现过这样的时刻，那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城市彼得格勒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要知道，曾出现过这样的时刻，那时邓尼金已迫近奥廖尔，而在莫斯科那些白卫阴谋分子已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和军官队伍，准备行将到来的对“共产党狗崽仔”的镇压。要知道，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好几个月之内被截断了石油、煤炭和粮食的供应。要知道，在整整几年当中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四面八方被包围的要塞里，在这里已经开始出现饥荒和瘟疫。尽管如此，在这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地主、资本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极其残酷和紧张的国内战争中，我们毕竟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的原因何在呢？

这些原因在于，第一，西方的劳动群众，有时是自觉地，有时好象是只听从自己阶级本能的呼声似地站在我们一边，反抗自己的上司、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长官，而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阻止那些国家的政府充当刽子手去扼杀胜利了的俄国革命。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外国军队的某些部队举起了红旗，从我们的战线上撤走了。

我们的胜利的第二个原因，内部原因，还是我国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牢固的军事联盟。农民支援工人同从四面八方进逼的敌人作斗争。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一军事联盟，是这两个阶级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战斗联盟的继续和发展。

不言而喻，这一军事联盟不是悬空的，而是以根本利益的联系为基础的。农民同敌人作斗争，从而保卫了不久以前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土地。敌军的屁股后面跟着一大批资本家、大地主、公爵、伯爵、男爵等等，他们被赶出了自己的领地，只想把那些居住了几百年之久的、古老的、世袭的贵族之家夺回去。当农民的子弟——我们的红军士兵忍饥挨饿、冒着严寒、身患伤寒、光着脚板在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边疆的时候，当他们用刺刀打退敌人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保卫从地主的压迫下获得解放的伟大事业。他们看到，如果不同把自己的优秀子弟送上前线的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就不可能巩固已经夺到手的土地。他们之所以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因为他们看到，在革命的、阶级的搏斗中，工厂的儿子们英勇地捍卫革命事业，为了战胜敌人不惜牺牲一切。他们还看到，在这场空前的斗争中，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可靠的堡垒。工人阶级从自己这一方面也同样看到，如果地主卷土重来，那就意味着资本家卷土重来，意味着恢复整个旧制度、失去在十月战斗中夺得的工厂，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被消灭。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国内战争中的军事联盟，是以当时我国的这两个劳动阶级所面临的基本的和根本的任务的共同性为依据的。为了供应红军，支援前线，支援在城市中忍饥挨饿的工人，当时不得不极其坚决地把所必需的一切统统收集起来；诚然，这个时期的这种沉重的负担曾不止一次两次地使得某些农民阶层发生了动摇。这些农民阶层由于不堪忍受斗争的这种沉重负担，而又不理解作出巨大牺牲的必要性，曾不止一次两次地跑到敌人那边去，跑到白军、立宪派、高尔察克分子那边去。但是国内战争的严酷的经验每一次都向他们表明，在白军的营垒中是找不到出路的，因为那个营垒不仅是工人的而且也是农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营垒。高尔察克们和邓尼金们用枪炮逼得农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事业是正确的并懂得同工人阶级密切合

作的必要性。通过这种以血换来的痛苦的经验，我国的农民越来越相信，为了取得对于敌人的伟大胜利，就必须作出牺牲。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团结，就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们之所以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的第二个原因。对于地主和资本家联盟的胜利，乃是工农联盟的胜利。

当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军队的残存队伍被赶到大海里去了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又在新的基础上、在人数众多的各族劳动人民和平地、自愿地共同相处的基础上，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革命的红旗下团结起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一些新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我们已不再是一个被围困的、在进行战斗和抵抗的要塞了。国内战争结束了。必须尽快地转入和平劳动。必须着手修补破烂的经济。而为了这一切，便必须采取另一种经济政策，一种适合新时期、适合伫立在我国各劳动阶级面前的新任务的经济政策。过去之所以必须实行余粮收集制，是为了千方百计地养活军队，养活忍饥挨饿的工人阶级中留下来的一部份人，如果没有工人阶级，整个革命事业就会完蛋。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时期来说，即在必须过渡到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发展我国的工业的时候，实行余粮收集制和禁止贸易是完全行不通的。于是就实现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资本主义列强对我们的武装斗争的残余，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后来就完全消失了。我国的经济开始上升。我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它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动摇之后，一个接着一个勉勉强强地承认苏维埃政权是旧俄罗斯帝国土地上的“合法”政权。这里，又以新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怎样保证我们的最终胜利的事业、巩固劳动人民的政权的事业、发展我国的经济的事业、建设新的社会、新的秩序、新的关系的事业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这样回答：只要我们善于在和平的、非战争的新条件下重新巩固工农联盟——过去，在我国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它保证我们取

得了胜利——，我们就能取得最终的、完全的胜利，我们就能真正建设一个劳动的新社会。这就是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自己提出无产阶级和工农联盟问题的原因。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老问题，因为现在说的是新的条件，比过去更加复杂的条件。我们在发展，我们在经济上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不过，我们的共同敌人是什么，却不象在过去的国内战争时期那样看得清楚。因此必须认清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危险，这样才不致栽跟头，才不致把我们为之战斗了多年的事业搞糟。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

由于有工农联盟，我们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才站得住脚，我们才开始重新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在这个工农联盟中，领导作用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在我国，工人阶级不是劳动居民的大多数。劳动居民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尽管如此，工人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领导力量。为了了解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战胜地主和资本家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详细地研究这些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一切国家中，也包括我国在内，城市对于农村来说向来是吸血鬼。一切科学技术成就、一切文化成果首先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农业过去和现在都被摆在第二位。它们在自己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远远落后于城市。城市把一切优秀的力量、把那些最精明能干的人都吸引过去了。农村始终是荒芜的，它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都贡献给城市了。现代社会的全部文明、全部教育都集中在城市。关于世界各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的一切情报都集中在城市。国家机构的基本枢纽、政府机关、强大有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工具，过去和现在都设在城

市。农村必然处于闭塞的状态，多少世纪以来，农村就其知识、文明来说，都落后于城市。

这个基本差别一方面给工人，另一方面也给农民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一点。工厂的工人阶级同任何私有制都没有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老板。它每日每时都看到，它在为这个老板干活。它开始仇恨和不信任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每一个工人都习惯于同其他同样的工人肩并肩地劳动。工人们大批大批地集结在大工厂、矿井和矿山中生活着，劳动着。他们不仅学会仇恨和不信任资产阶级，揭露它的一切骗局，而且学会给它以共同的反击。他们时时习惯于这样一种想法：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战胜敌人，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在推翻敌人之后以新的方式建设全部经济，以新的方式管理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的国家。城市的文化毕竟使工人掌握了某些手段，他们可以凭借这些手段把自己的队伍组成一支步伐整齐的大军，去同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进行战斗，识破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农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农民是一家一户在自己的单独的经济中进行劳动的。除了不多的一些例外情形（如割草等等）之外，他不习惯于同自己的乡亲们一起共同劳动。他有单独的、私有的经济，他看到的首先是他自己的这个小经济的利益。农村的生活条件使得他很少越出村子的界限。迄今为止，还有一些农民甚至从来没有到过县城，有些农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

当然，这不是农民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但是，这毕竟是事实，而这个事实、这种实际情况，是必须予以考虑，必须予以注意的。

此外，农民决不是单一的。富裕的小饭馆老板、农村的高利贷者、富农叫做农民；拥有几个雇工、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得利润、对他们严加控制的殷实的东家也叫做农民；全家自己为自己劳动、不靠

剥削他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业主也叫做农民；没有马、只能勉强糊口而且往往还要在别的什么地方打一点零工的贫农也叫做农民；最后，农民经济只构成次要生活来源的半雇农、半工人也叫做农民。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大多数农民注定只能过勉强糊口的生活。但是，每一个农民都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财产，他主要寻求的出路是：扩大自己的经济和财产，以便进入农村居民的下一个更高的等级，就这样一级一级往上爬。农民既然拥有财产，并且希望增加自己的财产（虽然，实际上，这种希望在大多数场合下只是一场空想），所以，他们对比较大的私有者，从而也对资产者怀有某种敬意和某种信任。因此，他们没有学会以与资本直接对立的工人阶级所特有的那种仇恨去仇恨富有阶级。一部分农民甚至对大私有者持某种敬意，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同敌人直接冲突的经验，才能在农民的心目中揭穿他们的阶级敌人。因此，资本家和地主欺骗农民比欺骗工人要容易得多。

另一方面，农民不习惯于进行经常的共同劳动和共同斗争，所以不能对自己的敌人实行坚持不懈的反击。农民分散在各个村落里，象一盘散沙，他们从未成为、也不可能成为象城市工人所组成的那种步伐整齐的有组织的大军。

如果同时考虑到，城市生活向来给城市居民以多得多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文化、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的本领等等，那么不难理解，工农同盟中的领导权必然应当属于工人阶级。根据我们上面所说的一切面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有组织、有能力领导广大劳动居民阶层的力量。必须再三强调指出，农民的觉悟较低，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不仅对工人阶级本身，而且对农民也有利。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则工人和广大农民阶层都会遭受失败。

在我们研究工人和农民向地主和资本家的联盟进行冲击的时

期，情况是这样。而在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之后，在必须管理国家，必须经营从资产阶级和地主那里夺取过来的全部国家经济的时候，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里对问题也必须十分审慎地进行研究。当工人阶级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都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生长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农民都处于被压迫阶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工人阶级也不可能提高到学会管理的程度。要知道，全部高等学校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政府、军队、经济、科学等等当中的一切命脉，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可能从本身当中造就为了亲自组织和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来组织全国的整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所必需的一切力量。当劳动群众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要承担前所未有的重担。这时候，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必须考虑经济和管理的所有一切领域。他们需要技师和工程师、化学家和农学家，法官和行政管理人员，科学家和教师，——总之一句话，为了领导国家走上经济繁荣和全面繁荣的道路所不可缺少的一切力量。由于工人阶级本阶级中过去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在劳动群众夺取了政权之后，利用上述力量中的大部分力量的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他们过去总的说来都是真心实意地、不是胆战心惊而是凭良心为现在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旧制度服务的。因此，劳动群众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新任务：要使上述一切力量服从自己的目的，并且根据加强和巩固新制度的需要来改造他们。

如果说工人阶级一下子没有足够的力量，因而它在同敌人作斗争和百折不挠地消除他们公开和隐蔽的反抗时，不得不利用那些起先对它抱敌视或半敌视态度、到后来才转到它这方面来的力

量，那么农民就更加没有力量，正如我们以前看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农民必然更加落后、更加没有能力识破敌人的计划和从事正确的政治。

工人阶级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受到压抑，仍然有能力领导一般的政治和这种政治的总的方向；它尽管不可避免地要犯一系列错误，归根结底，毕竟能学会战胜横在它的新道路上的困难。

不言而喻，农民也迟早会通过经验越来越多地学会经济和政治建设事业。过去，各劳动阶级的任务仅仅是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联盟，如果说，当时无产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作用是必要的，那么，在夺取政权之后，这种领导也决不会是多余的或者不那么必要的。相反地，可以说，尤其是在初期，在巩固和发展新制度的第一阶段，在出现一大堆新的、极其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必须千方百计地保证这种领导。问题决不在于，工人阶级一定“想要”居于首位。问题在于，不管某些农民阶层是怎么想的，为了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利益这种领导也是必要的。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工人阶级失去了它对农民的领导，那么事情就会完全不可避免地以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工农事业获得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不过问题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因为工人阶级本身也不是单一的。工人阶级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尽管不象农民内部的各阶层、集团和阶级那样，彼此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毕竟必须予以注意。例如，拿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农业工人即雇农来看。农业工人是雇佣工人，他们大部分与任何私有制都没有联系，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一般劳动条件（农村和一般的农村条件；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落后；工作很分散；劳动条件与农民经济中的情况极为相似；如此等等）大大妨碍

他们觉悟的提高，与在国内各文化中心过集体生活和进行集体劳动的城市工人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对整个工人阶级进行考察，那么我们会发现，这里既有农民出身的人，也有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出身的人等等。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工人，他们可能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工人，在吸娘奶时就吸取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方式、无产阶级的习惯和观点。许许多多的其他条件以不同的方式给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以影响。因此，毫不足怪，工人阶级就其觉悟程度来说从来不是——直到现在也仍然不是——完全单一的。最觉悟的工人比其他工人能更清楚、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劳动群众的道路和根本利益，他们联合在劳动人民的最先进组织——共产党内，这个党最彻底、最英明地为消灭资本政权和建设未来的新社会而奋斗。既然无产阶级的最觉悟的部分都联合在党内，那么显而易见，在无产阶级内部，领导作用就应当属于党。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说：那些最落后的工人阶层，他们落后，就觉悟程度来说他们比不上工人阶级的其他阶层，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过错”，——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另一方面，完全可以理解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失去了党的领导，如果党的领导被某种方式取消了，那么，这对于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取消了工人阶级的最有觉悟、最先进和最有组织的部分的领导。

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工农事业的胜利，为了劳动群众事业的胜利，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第一，需要工农之间的联盟，同盟；第二，在这个联盟中领导作用应当属于工人阶级；第三，而在工人阶级当中领导作用又应当属于共产党。如果在工人阶级内部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或者，如果取消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那么工农的全部事业就必然遭到失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就必然获得胜利。

不过，还可以提出一些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不相符合，有时甚至互相对立的事例。例如，可以指出，农民出卖粮食而工人购买粮食。出卖粮食的农民但愿价格高些；购买粮食的工人但愿价格贱些。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这种矛盾。但是我们并没有说过，工人阶级和农民，这是同一个阶级。我们从未说过，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应当正视真理，而不应以任何空洞的废话来掩盖事实真相。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着这些分歧，但是，在对于这两个阶级具有更加根本的、更加基本的意义的利益和问题面前，这些分歧退居到次要的地位。正如地主和资本家也从来不是同一个阶级；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利益矛盾；城市资产阶级也向地主购买粮食和原料，而地主则向它出售粮食和原料；反之，资产阶级向地主出售工业品，而地主向资产阶级购买这些工业品。尽管存在着这种相当重大的矛盾，资本家和地主的联盟，尤其是在前一个时期内，毕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到处都存在着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即在资本家领导下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同盟，它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统治力量。地主和资本家不是一个阶级，相互之间有区别，但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互相结成同盟，结成联盟，他们在经济生活中和在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阶级斗争中，越来越联合在一起，同样地，无产阶级虽然与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它还是应当同农民结成同盟，结成紧密的联盟；而农民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应当支持无产阶级，同它结成联盟，自愿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工农事业的共同胜利才是可能的。

四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斗争

农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城市，这一情况产生一个

非常重要的现象。这就是：农民通常不能扮演完全独立的角色，它不可避免地要么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要么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它常常动摇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个基本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利用自己地位的优势，利用自己的财政手段、自己的政治统治、自己对科学、学校、报纸等等的垄断，进行经常的、顽强的、从不间断的斗争，使广大农民阶层服从自己的统治，其中包括思想统治，而向农民传播这种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又往往是自然而然倾向资产阶级的比较富裕的农民阶层。工人阶级也进行斗争，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向农民说明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必要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同广大贫农群众和部分中农的利益相对立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同盟会牢牢站住脚呢，还是事实上会受到工农同盟的严重威胁，这个问题取决于农民倒向哪里、摆向何方——是无产阶级一方还是资产阶级一方。根据我国革命的实例可以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如何企图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和对大私有者的过份信任，使农民充当反对无产阶级的炮灰。根据我国革命及其发展的实例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出，只要无产阶级政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就可以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夺取过来（这对于农民本身是有利的），建立一支锋芒针对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的由农民组成的、非常重要和强大的补充力量。

二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在战争问题上欺骗农民。资产阶级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和对祖国的忠心，企图把它按照英法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指示、在这些资本家的皮鞭驱使下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描绘成正义战争、非掠夺性的战争、纯粹防御性的战争。资产阶级利用农民的爱国和私有者的心理，企图把我国革命中最革命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描绘成一伙德国奸细、德国间谍，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国出卖给德帝国主义。还必须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所有报刊实行疯狂的诽谤，资产阶级曾一度取得

了一定的——从它的观点来看——效果。我们党和工人阶级曾不得不经历了一些艰苦的时日，当时社会革命党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着农民，而且同我国的另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一起完全执行我国资产阶级教给他们的政策。只有我们党的坚持不懈的工作以及革命和战争的经验——群众本身通过这种经验逐步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是完全正确的——，才使得资产阶级的欺骗和资产阶级关于战争问题的谎言被彻底揭穿了。

资产阶级同样企图极其巧妙地利用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某些偏见。广大农民群众希望获得地主的土地（而这正是我国农村的一个世世代代的理想），强烈地希望把这些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可是，另一方面，某些农民阶层，首先是那些比较富裕的阶层，一方面不太需要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大私有者怀着毕恭毕敬之情，所以自然就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资产阶级企图通过自己的一伙奴仆，通过社会革命党，阻挠农民实现夺取地主土地的天然愿望。他们用各种办法断言，“在立宪会议之前”决不可夺取土地，没有一个特殊的法律决不可把地主从他们的领地上赶走；他们恫吓说，如果农民“擅自”（即不等待上面发布任何命令）夺取土地，驱逐地主，对他们作应有的处置，那就一定会出现可怕的械斗和严重的土地混乱现象。当时只有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工人阶级的党主张立即没收地主土地，在各种会议上向农民大声疾呼，说农民什么也不用等待，什么人的话也不要听，应当自己向地主夺取土地。我们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景：资产阶级的代表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一起盘踞在政府里，那个政府逮捕了农民的土地委员会，因为它们对地主土地采取了不太客气的态度。相反地，当时我们党进行了极其坚忍不拔的工作，向农民说明，粉碎地主和把地主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发挥农民的革命毅力（当时首先必须在土地问题上发挥他们的革命毅力），我们才能

造成革命胜利的真正可靠的保证。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等的共同计划，就是拖延解决土地问题的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对整个旧制度的支持；这个计划之所以遭到了失败，是因为在土地问题上农民不跟资产阶级走，而跟工人阶级走，不跟资产阶级和各妥协党的温和口号走，而跟工人阶级政党所提出的彻底的革命口号走。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取影响农民的这种极其残酷的斗争，后来仍在继续进行。当然，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这一政权。资产阶级完全明白，如果农民在关键时刻支持工人阶级，这样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我国的资产阶级很好地考虑到了已被推翻的沙皇制度遗留给它的经验，它记得，1905年地主的沙皇之所以能打败革命人民的力量，就是因为当时工人阶级没有及时地得到农民的支持；直到革命运动的先头部队——城市工人阶级已被打败和击溃的时候，农民才迟迟举行发动。沙皇制度当时之所以能把革命镇压下去，就是因为它能够把革命的大军各个击破。因此，资产阶级曾竭尽全力去分化工人和农民，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在十月那些日子的前后，当苏维埃政权为争取生存而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在自己的代理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帮助下，企图用“民主”的口号欺骗农民；为了反对苏维埃政权，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提出了所谓“民主”和“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即资产阶级统治和领导的口号——一部分是直接领导，一部分是通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来领导。有人指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背叛“平等”的口号、“自由”的口号等等。当时是战斗的时刻。无论如何必须以坚强的手腕无情地和英勇地制止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一切反革命阴谋。资产阶级和地主在我国有一大批支持者，其中不仅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而且有官僚、职员、所谓知识分子（医生、律师、教员、教

授、神甫等等)许多阶层,更不用说原来沙皇军队的军官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完全公开地主张恢复旧秩序。而在必须以一切手段进行无情的斗争和解除敌人的武装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了“平等”和“自由”的口号,也就是说,给阴谋分子以进行活动的自由,给原来的地主以欺骗农民的自由,给资本家以利用自己的金钱来收买和组织支持者的自由等等。如果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在这种条件下,被提出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民主”要求,实际上无非意味着要求给资产阶级以各种各样的自由,那么,资产阶级对此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它准备实行双手沾满鲜血的将军们的军事专政,不过当时它首先必须欺骗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哪怕是一部分,必须使农民脱离工人阶级,从而用“民主”和“立宪会议”的欺骗性口号来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堡垒。资产阶级曾经抱着如下的希望,这是很有道理的,即:如果它通过自己的帮手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和排除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立刻”对付得了根本没有能力实行任何坚强领导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实际斗争的经验表明:什么地方一部分农民跟着这些欺骗性的口号走,转到立宪派一边去,那些地方的事变进程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如下的结果,即不久就有某一个沙皇将军出来称王并开始掌握独占的权力。南方是这样(邓尼金、弗兰格尔等人),东方也是这样(高尔察克等人)。农民通过切身经验认识到立宪派的“民主”导致什么结果之后,就重新倒向苏维埃政权,重新摆脱资产阶级的领导,转到无产阶级这方而来,——这一次是更加牢固、坚决和奋不顾身的了。于是,重新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就在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外国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的斗争中创造了真正伟大的奇迹。

实际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这种争取影响农民的斗争，现在也没有停止。尽管我们的经济有了增长，我们仍然有一大堆困难。原来的经济破坏的后果仍然象沉重的秤砣挂在我们的脚上。工人阶级和城市工业不能马上以相当低廉的价格提供足够的商品。苏维埃政权和领导党正在竭尽全力尽快地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向农村输送尽可能廉价的商品。要跳得高过自己的耳朵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的国营工业只能逐步地解决向它提出的各项任务。

建设庞大的国家机构、保证必要的国防、整顿全部管理事务等等，需要大量的开支。为了支付这些开支当然就必须征税，其中包括向农民征税。这些税收象一副重担压在已经破产和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身上。工人阶级不能马上，而只能逐步降低这些税收，只能逐步改善税收制度本身，根据实践经验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

年青的国家在其诞生的初期没有足够的、忠于革命事业的、能干的内行人才；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前从来没有学习过管理国家。因此，毫不奇怪，参加全国范围的建设事业的工人和农民犯了一系列对农民有严重影响的错误。培养管理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所需要的足够的人才，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的各统治阶级花了好几百年、好几代人的时间培养了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而苏维埃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在我国统共才存在几年。因此我们的管理体制中的种种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现象和所谓的“机器失灵”。

于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就利用所有这些缺点，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打进楔子，破坏和分裂工农联盟，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的领导，并且把他们当中的哪怕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置于资产阶级的支持者的领导和思想影响之下。

还应当想到，争取影响农民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的这种阶级斗争，目前在我国以非常特殊、非常独特的形式，即以争取同农民实行经济结合而斗争的形式进行着。我们的国营工业和国营商业正在进行这种反对私人资本和私商的斗争，后者也在拚命地为加强自己对农民的经济影响而斗争，即为实现同农民的经济结合而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斗争正在以种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无产阶级只有真正提高自己的工业，安排精干的商业机构，并且向全体农民表明，国营经济能够比私人资本家、私商、私人中介人更好地满足农民居民的迫切的经济需求和需要，才能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

五 旧制度能怎样偷偷地回来

现在，全部大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大批发商业都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都由国家政权支配。新资产阶级和旧资产阶级残余拥有的资本比较少，但是，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善于随机应变，会钻营，很能干。私人资本正在运用这些手段同我们进行不断的、殊死的、简直是疯狂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以流血厮杀的方式进行，尽管如此，对于我国的整个命运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懂得，哪些条件能保证工农联盟的胜利，哪些条件可能导致地主和资本家联盟的胜利。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阶级的任务和城市工业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使之能充分地、廉价地满足农民居民的需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一个私人企业主例如私人小工厂厂主，比国营工厂生产得更为价廉物美，那么，不言而喻，这个私人企业主就会获得同农民的真正结合，他在农民的心目中就会提高自己的在经济上的声望，自己的威信；反之，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民的心目中，国营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威信就会下降。如果我们的国营商业，我

们的商业代办由于自己无能，由于自身机构的杂项开支很大，由于经营管理粗枝大叶等等，出售的商品很昂贵，而一个惯于精打细算的私商出售的商品比较便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私人商业的评价就会比对国营商业的评价要高得多。私商的经济威信就会高过国家机构的经济威信。私人资本就会获得真正的结合、真正的影响，而这一切就意味着争取在经济上影响农民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战胜了工人阶级。

可以说，现在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将出现谁同谁的结合——是私商和资本家同农民结合呢，还是无产阶级工业同这些农民结合？阶级斗争的结局就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一斗争是在和平的形式下进行的，我们在进行这一斗争时并没有刀枪的声音，这丝毫不关重要。尽管如此，这一斗争却具有真正巨大的意义，它，这一斗争，实际上决定一切。

如果私商和资本家将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取得越来越多的位置，如果正是这些阶级将建立自己同农民的经济结合，那么这就意味着现在整个工农联盟必须建立其上的那个基础的破裂。如果资产阶级真的能够在经济上越来越排挤国营工业和国营商业，那么这就必然带来资产阶级对农民的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经济，十分明显，只有苏维埃政权表明自己能够实现对全国的经济领导，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影响的生长，才能保证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的增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情况恰巧相反，那么，由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影响农民变为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影响农民就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如果农民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并且接受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的影响，那么，这就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和资产阶级制度的建立，即新资产阶级和在伟大革命时期被打败了的旧资

产阶级的残余的政治统治的建立。这样一个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必然是废除一切国有化，工厂就会转归私人所有，转归私人工厂主所有；土地的国有化就会立即被废除，而且会容许充分的贸易自由和利用这些土地进行投机活动；就会开始疯狂地收购土地，首先是掌握在没有足够农具的贫农手中的那一部分土地。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会发生农民大量丧失土地的现象，以及巨大的土地额（储备）集中于狡猾的土地投机商手中的现象，一部分土地投机商本人就会变成新地主，另一部分则把这些土地转卖给其他的富人，使得那些富人也成为地主的补充阶层。不言而喻，这些新地主会开始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民，迫使他们交纳大量租金。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恢复与被我们的革命扫除了的那些制度——工人阶级和农民为了消灭它们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极为相似的制度。

新的统治阶级势必全部偿还沙皇政府的一切债务和克伦斯基政府的一切债务，为了有可能偿还这些真正巨额的债款，它们就一定会要农民交纳骇人听闻的贡赋，把农民的税收增加许多倍，并且会无情地压榨工人阶级，以便试图按照厂主的原则来办私人工业，不言而喻，不仅苏维埃机关会被消灭，而且工人阶级对生产过程的一切干预也会被消灭；所有的工厂委员会都会被取缔，工会将被剥夺掉各种权利，工人阶级会被彻底取消其在生产中的任何指挥作用。那时农民很快就会明白，他们上当了，工农联盟的破裂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了重大的损失，这只有利于富农上层，有利于那些剥削阶层，即农业资产阶级。那时群众就会重新卷入伟大的运动，农民就会开始重新磨快斧头，向新地主举起干草叉，而全部历史就要从新开始，不过那时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工人阶级和农民都被削弱了，资产阶级则更加有经验了，资产阶级从全部外国资本——它不再象 1917 年时那样，由于自身的帝国主义纠纷而陷于四分五

裂——方面得到的援助也多得多了。

当然，事实上，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情况将截然相反。我们的国营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我们的合作社将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排挤私商和私人中介人，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将越来越成功地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过来，置于自己的影响和领导之下，吸引他们参加积极建设新制度的事业。我们不会走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必将沿着而且现在正在沿着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沿着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既然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阶级夺得并巩固了国家政权，这就是可能的。

六 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证明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企图事实上无非意味着普遍贫困和“贫穷的平等”。工人阶级的敌人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摧残、蹂躏了我们的国家，从而造成了它的贫穷和破坏，他们却说这种贫穷和破坏恰恰是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中产生的。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国家的财富增加到空前的高度；然后使全世界的财富增加到空前的高度；不是增加个别人、个别百万富翁集团、个别私人资本家、投机商、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等等的财富，而是增加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的财富，增加我们国家和从原来统治阶级手中夺取过来的各国的财富。我们应当成为最优技术、最优耕作方式、最优劳动组织方法的传播者，总之，现在，当我们已经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夺取了政权的时候，我们的作用、我们的使命首先就是要充当一切经济改进措施的承担者。在工业方面，这里所说的改进就是要建设新的、越来越多的大工厂，就是要采用电能，就是要把一切工业的劳动都置于电气化的基础之上，就是要比

较正确、比较有计划地组织工业和工业劳动；——以便日益走向这样一种秩序；那时全部工业都将用一个总的计划统一起来，在这个计划下，任何东西都不会白白浪费掉，不会有任何多余的消耗和开支，因而，在这个计划下，产品的生产成本将越来越低。但是，这样一种工业的独立的计划经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民市场而生产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我们的农民经济。为了制定一个精确的工业计划，必须知道农民经济将消费多少，必须准确地估计这些农民经济向国营工业要求多少产品和哪些产品。要使工业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的可能性，就要使农民经济本身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还必须使这种农民经济本身越来越有组织，成为这样一种经济，在那里，单个的农户和单个的小经济越来越走上彼此互相联系的道路。常常听到农民抱怨说，他们生活得比工人差，每天工作得更多，什么八小时工作制连想也不可能想，等等，等等。但是，不难理解，这一切都是因农民经济本身比工厂和大生产落后得多造成的。农民经济跟工业生产领域中各种手工业者的小经济的情形完全一样：手工业者也囿于自己的小经济，虽然整日整夜地劳动，但还是根本不能同大工厂相比，因为大工厂中有很好的机器，很好的劳动组织，能很好地利用燃料、原料等等。由此可见，如果农民想要真正长期地使自己的生活动得到重大改善，就必须走自己联合起来的道路。不言而喻，决不能认为，似乎可以说服，甚或似乎应当说服农民马上通通把自己的份地联合起来。一些旧习惯、旧的经济方式在人们当中非常根深蒂固，所以要急剧地打破这些习惯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农民从自己的私有经济即单个的小农户的利益出发，必然会走上自身联合的道路，从而越来越和睦地同无产阶级的国营工业结合起来。可以设想这种发展是怎样的呢？这种发展将通过合作制进行。任何一个农民经济都希望更好地、更有利地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任

何一个农民经济都希望尽量合算、尽量廉价地购买它所需要的城市工业的产品；既包括所谓消费需求方面的（购买布匹、靴鞋之类的直接消费品），也包括生产需求方面的（购买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如良种、农具等等）。同样，每一个私人小农民经济都希望能在处境困难时得到利息尽可能低的贷款。这种情况不仅不和私人经济的利益相矛盾，而且是直接从这些利益中产生的，是由这些利益造成的，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农民走上合作联合的道路。过去，在任何地方，在世界各国全都是这样的。为了更廉价地采购工业品或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如优良种子或良种牲畜等等），农民曾组织采购合作社。单个的农民组织起来，一起建立了合作社，选举了合作社的理事会，缴纳股金，从而有可能通过更加有组织的方式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里不是一些各自为政、自担风险的单个的人，而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在进行活动，它有可能更好地了解在什么地方购买和购买什么东西比较合算；卖主对它自然比对个别人要更加信任一些，因此愿意实行一定的赊购；另一方面，因为这样的组织比单个的人、单个的农民购买的东西多得多，因为批发价格总比零售价格要便宜，所以非常明显，在这种合作的采购当中农民购买者节省了为数很可观的一笔钱；在这里，如果考虑到实行共同运输和有组织的分配，比每一个农民必须单独套上自己的牡马进城去，并单独运回他所需要的商品，也带来不少好处，那么很显然，实行合作采购时这一类开支也会大大减少。所以，单个的农民经济就在丝毫也不破坏它所习惯的经营方式的条件下，同时，在自己的私人小经济的利益的影响下，建立公共组织，即采购合作社。

或者我们举另一个例子，即出售牛奶、蛋类、猪肉、粮食等农产品的情况来看。一个单个的农民或农妇携带着罐子、木桶单独跑到城市市场上去，这是一回事；如果农民们联合在一个共同的销售合作社中，那么他们由于更加熟悉市场需求情况，由于能更好地组

组织供应，由于能节省各种杂项开支和交通、运输、贮存费用等等，一定比他们单个地、无组织地进行活动能占到便宜，从而得到更多的收入。共同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在某些生产部门中很快地导致把生产本身组织起来。例如，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其中也包括我国，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情形：那些加入牛奶销售合作社的农民很快地就产生了兴趣，想通过自己的合作社共同销售各种各样的奶制品，如奶酪、黄油等等。由此前进一步就是组织共同的合作的黄油制造厂或合作的奶酪制造厂。一些单个的农户就组织共同的黄油制造厂，预定和共同购买各种必需的机器，如分离机等等。各单个经济所生产的牛奶都运到这个黄油制造厂来，接着，通过合作社有组织地销售黄油、奶酪等等，从而得到相应的进款。结果，除去为维持和发展共同的合作社而作的某些扣除之外，每一私人经济所得的进款，必然超过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单个的生产者所得的进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农民已由组织贸易转而组织共同的生产了。

例如，在一些生产马铃薯的地区就有这种情况。那些地区的农民往往感到必须组织自己的、从事马铃薯加工的工厂——淀粉厂。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合作社企业，如加工干果干菜，在农民从事葡萄种植业的地区就合作生产葡萄酒，在农民主要从事捕鱼业的地方就合作生产鱼罐头等等。

最后，合作的信贷组织也丝毫不同私人农民生产者的利益相矛盾。相反地，信贷合作社正如销售和采购合作社一样，在组织个别生产行业方面，同样必然给这些农民经济带来好处；因此，在一切国家中，农民都在走这条道路，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不过，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条件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在我们苏联有本质的、非常巨大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必然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之下。实力雄厚的大工业

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以极其强有力的银行为首的庞大的信贷体系属于一小撮大资本家，交通运输业和铁路也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国家手中。实际上，整个城市都受资产阶级控制；城市对农村的影响——此外，地主和资本家上层、大地产所有者在农村中左右一切——是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组织，如果要得到发展，就必然要受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经济领导，逐渐同这些资本家和地主的经济组织结合起来，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自身也变为以利用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某种资本主义组织。可以设想，实际上无论哪一种农业合作社都有闲置的资本，只要合作社是发展着的而不是奄奄一息的，就必然形成闲置的资本。不言而喻，在许多场合下——并且这种现象将越来越多——这种闲置的资本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入各种银行机构（或者存入私人银行，或者存入资产阶级国家所掌握的国家银行）。在这种场合下就出现合作社组织同资产阶级银行的“溶合”。合作社无疑依赖于银行，而且通过这种经济结合受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导（并因而受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采购合作社，那么这些合作社就不得不同资产阶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即大工厂主的组织打交道。这样一来，这里就必然出现同大资本组织的经济结合和经济依赖关系，这些组织通过一整套关于供应、关于信贷债务等等的相互合同同合作社联系在一起。

信贷合作社的情况同样如此，它们更加密切地同资产阶级银行联系在一起，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银行。由此可见，由于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一般发展条件，即使合作社组织是农民中的非剥削阶层的组织，即不是富农的组织而是劳动农民的组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合作社由于其发展的一般条件，由于它们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所设置的框框内进行活动，按照事物的进程本身必然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庞大经济机器的部

件，必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合作社组织正在长入到一般资本主义机构中去，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同它一起生长，而且本身正在变成一种资本主义企业。

最后，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全部科学、技术、教育、学校、报刊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合作社的干部（理事会理事、领导和管理人员、顾问、农艺师、会计师等）一般都出身于资产阶级阶层。因此他们在合作社中推行有利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路线，这条路线极力抹煞劳动和资本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的对立。在西欧和美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领导农民合作社组织的甚至是大地主、神甫以及真心实意为之效劳的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代理人。

如果某个合作社组织想要实行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旨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策，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必然陷于破产，它就会遭到实力雄厚的各种资本主义组织的独特的经济抵制；它得不到贷款，或者只能在比忠实于资本主义的其他合作社更苛刻的条件下获得贷款；它就不可能在与其他合作社同等的条件下在任何地方买到它所必需的工业品，等等。

所有这些原因决定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道路。

在我国制度下，即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条件。在我们这里，合作社发展的总的框框不是由工厂、矿山、铁路、银行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点决定的，而是由全部大工业、交通运输业和信贷体系都由无产阶级国家支配这一点决定的。由此可见，如果说，在我们这里，在我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条件下，城市将越来越成为农村的经济领导者，将越来越搞好经济结合，那么，只要我们的国营经济得到巩固，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日益增长的结合。农民合作社必然长入无产阶级经济机关

的体系中去，正如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条件下它长入资本主义经济机关的体系中去一样。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想要走上同资本主义对抗的发展道路的合作社组织，都逐渐被资产阶级的信贷和其他经济机构所扼杀，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恰巧相反，正是劳动合作社，即中农和贫农合作社将获得全力支持，同富农和农村财主即农业资产阶级的合作社相比，它们能得到各种优惠。最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的全体干部，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合作社职员和领导人员，都不是由资产阶级组成的，他们经过专门训练，并且在相应的学校和实际工作中得到这样的专门训练和培养，以便能精益求精地进行工作——为建设新社会所必需的而不是为服务于大资本所必需的工作。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统治下农村发展条件同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下农村发展条件之间的全部巨大差别。决不可认为，我国制度下的发展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会是一样的。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的专政，决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我们的国家之所以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因为它属另一个阶级支配，而且因为它手中掌握着全部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因而它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经济力量，这个力量给国家的全部发展，其中包括农村关系的全部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

如果农民合作社将整个地长入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的体系，那么，这将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经济领导，这将意味着工农联盟的加强，这将意味着我们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大步前进。

事实上，在国民经济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我们的国营工业将日益增长，它将通过合作社越来越紧密地同农民经济联结在一起。农民经济本身将在自己不知不觉而又是始终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逐步地、缓慢地得到改造。以前那些分散的、零散的、在经济上相互间毫无联系的农户，将在采购、销售和信贷的基础上日益互相联

合起来，而且在这一事业中实现同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的结合。另一方面，将来农民会从共同采购和共同销售，会从一般的信贷组织逐渐过渡到组织自己的合作的黄油制造厂和一般的农畜产品加工厂。

农民通过切身经验越是相信过渡到集体的劳动形式是有利的，则上述的组织过程就会进行得越远，越深刻。农民将通过共同购买机器过渡到集体使用机器。农民经济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就象黄油制造厂那样，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与此同时，城市大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的物质资料的越来越多的积累，将提供加强农业电气化的可能。向一系列的农民经济提供电力，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向集体耕种土地的形式过渡，因为一过渡到采用电力，以集体的形式利用电力的全部优越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因为如果不是由单个的农户而是由这些农户的整个联合体消耗电力的话，则分摊给每一个农户，每一单个的农民经济的开支就会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从商业合作社组织开始的组织农民经济的过程，将通过在农产品加工方面组织生产，逐步发展到直接意义的农业生产本身。这个过程随着向电气化的过渡而彻底完成。越来越成为有组织的农民经济的体系就这样增长着，农民经济由单个的、分散的单位变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农民经济逐渐改造自己固有的本性，同国营工业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而这样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经济链条，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

我们正在通过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尽管现在我国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非常落后。当然，在经济和技术落后的条件下，这条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尽管如此，这却是一条可靠的道路。只要我们对农民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一定能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七 工业和农业应当互相帮助

我国国民经济的普遍高涨，工业的高涨和农业的高涨，这是我国革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某种“病症”的增长，就是说，包含着某些特殊的矛盾，如果劳动人民的最觉悟的部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的党不善于及时看出并向广大劳动者阶层充分阐明这些矛盾的话，它们可能是危险的。问题在于，农民清楚地记得而且经常想着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把地主的土地给了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消灭了我国的整个地主阶级——这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随着向和平经济工作的过渡，随着农民经济以及国营工业的开始高涨，农民经济越来越成为商品经济，就是说，它的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产品是为销售而生产的。农民经济越是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则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就有越多的产品投入市场，换回货币，并且用这些货币去购买农民经济所不生产而又是它所需要的其他商品。这些产品首先要由我们的国营工业提供。这样一来，农民就在市场上同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的国营工业打交道。这里，如果问题涉及到农产品，则农民以卖主的身份出现，而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阶级以买主的身份出现。如果问题涉及到国营工业的产品，则已组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以卖主的身份出现，而农民以买主的身份出现。但是，众所周知，在市场上买主和卖主的利益是对立的，买主想要按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商品，卖主则想要按较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在目前这个时期，即在建立既包括农户也包括国营工厂的统一的有组织经济以前，经济愈发展，价格问题，即关于农产品的价格和国营工业产品的价格问题，就会成为愈为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利益的矛盾。这个矛

盾必然造成我国两个基本劳动阶级之间的摩擦，这些摩擦是对工农同盟的某种危险。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否存在着利益矛盾——无法解决的矛盾呢？在这一矛盾后面在工农之间是否同时隐藏着某些更加根本的共同利益？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阶级的根本的和完全共同的利益就在于它们携手并肩地向社会主义前进，而如果不巩固工农联盟，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就不可能携手并肩地向社会主义前进。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这个最根本的利益，表现为在根本上互相依靠的工业和农业必须互相帮助。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我们的工业首先是为农民市场而进行生产的。从前它在自己的发展中就依赖于农民市场，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它必然比在旧制度下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农民市场；第一，我们正在失去国外市场，因为我们不执行沙皇制度所执行的那种掠夺政策、侵占新的地区的政策；第二，我们正在取消舰队、海军设施的订货以及许多巨额军事订货，因为我们正在大大削减我们的军事开支，因为我们只限于国防一项，绝无任何侵略目的；因此必须重新装备一系列的工厂，使它们由生产军用品转为生产民用品，首先是农业劳动所必需的用品，即各种农具；第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影响的政治需要也促使我们更加重视农民市场。

由此可见，我们的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农具和机器愈多，它改进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同样，没有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农业要发展，就必须获得它自己不生产的。

要由我国的各工业部门提供的种种产品。假使有朝一日我国的工业的生命停止了,那么农业就必然会奄奄一息,它肯定只能采取最简单、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在最好情况下它也只能永远停步不前而不可能取得丝毫明显的进展。反之,如果工业(制造农业机械的金属工业和生产各种肥料的化学工业等等)发展了,那么农业就会开始以工业作为自己的强有力的助手和支柱,这个支柱最后定能改变旧的耕作方式,并且迅速地把发展整个农业生产力的事业向前推进。由此可见,工业要得到发展,需要农业取得成就;反之,农业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业得到发展。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是最根本的东西,它本身应当决定领导党的正确政策;领导党的责任首先就在于,使局部的和暂时的,眼前的和短期的、次要的和从属的利益服从长远的、最共同的、最根本和基本的利益。

现在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政策应当不是打算实行一年而是打算实行多年的政策。现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不是设法保持政权(因为现在苏维埃政权已稳稳地、牢牢地站住了脚),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是,要实行一个打算实行许许多多年的政治计划。如果问题仅仅是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分配我国一年的劳动而获得的国民收入总数,如果问题仅仅涉及这一点而不涉及其他,那么,显然,向工人阶级说“不要拿得太多”,或者说服农民节衣缩食,这都是荒谬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两个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都必然会根据自己的直接利益来考虑问题,并且力求从国民总收入中,即从国家的全部收入中,拿到尽可能更大的份额。

但是,我们决不是活一年,而且希望决不是活一年;我们希望活许多许多年,我们希望一直沿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摆在两个阶级面前的任务,决不象上面所讲的情况那样简单。如果这个任务仅仅在于分掉永远一成不变的收入,即国家的总收入——它是不变的,永远固定的,一个不变

的常数——，那么，当然，任何迅速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会永远踏步不前。但是，问题根本不是这样。问题是要不断地提高国民总收入，不断地增加我国每年生产的商品的数量和价值，也就是说，增加国民收入，整个社会的总收入。

只有国民收入的总额增加了，才有东西可以进行分配；如果国民收入的这个总额一年比一年不断增加和增长，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就能每年分得一个越来越大的价值额，这两个阶级的物质状况就会迅速改善。因此，无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观点来看，都必须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首先保证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生产力得到发展、亦即保证国民收入一年比一年得到越来越快的增长。

应当根据这个观点来讨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同样地也必须根据这个观点来讨论价格政策的问题。假定，有一批工人对我们说：“大工业掌握在我们工人手中，我们可以随意规定高价格，为了使我们的工业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让我们规定高价格吧；如果工业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有可能给工人更多的工资，因此，工业产品的高价政策是对我们有利的；对这种政策的任何背离，都意味着向小资产阶级让步，都意味着背离纯粹的无产阶级路线。”

这样一种意见对不对呢？当然不对，这种政策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一种行会的、狭隘的、笨拙的、目光短浅的政策，就是说，简直是愚蠢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前提是不了解国营工业和农民的农业之间的基本联系，它会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国营工业本身经过很短的一段时期，在遇到农民市场的很低的购买力的时候，就会停止发展。在这种政策下，也许可以在最近几年内以破坏农民经济为代价获得相当高的利润，但是，在经过不长的一段时

间之后，这种政策就会悲惨地自食其果。国营工业必然会丧失销售市场，因为在这种条件下销售市场肯定会急剧缩小，结果，不但不会有工业的进一步的发展和不断的前进，反而会出现把工业远远抛到后面去的惨重的危机。如果继续实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会遇到长期的工业停滞，——如果不是倒退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原地踏步。

另一方面，假定某些广大的农民阶层能够实际上实行一种政策，通过粮食和原料的非常高的价格摧毁了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可能。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尽管在一个经济年度内所得甚多，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由于不可能补充自己的农具而吃苦头，更谈不上过渡到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经营方式了。由此可见，这也是一种近视的、狭隘的、看不到城乡联系的政策，这种政策必然导致国民收入的降低，从而导致我们苏维埃社会两个基本阶级的物质状况的恶化。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比较次要的矛盾；从正确理解的工农利益的观点来看，必须实行一种能使生产力有最充分的发展余地的政策。工人阶级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观点来看，必须竭尽全力尽快地搞好自己的生产，尽可能廉价地生产国营工业的产品，并且尽可能廉价地出售这些产品，一方面，从日益增多的大量出售的产品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每年都越来越扩大。

决不可把执掌政权的工人阶级的地位同还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地位混为一谈。当工人阶级还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关怀整个国民经济，关怀国民收入的增长，关怀整个社会的完整性都不是它的事。恰巧相反，它的基本和根本的利益就在于摧毁、打碎、破坏资本主义社会。而当工人阶级是执政的阶级时，它成了整个社会的领导者，关怀国民收入的增长就是它自己的事

了，关怀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它自己的事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利益也就是它的切身利益。必须了解这一点，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必须从这一点出发。由此可见，工业和农业是互相联系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必须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工业和农业必须互相帮助，这是巩固工农同盟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向社会主义前进是不可设想的。

八 合作社的发展和农村的阶级斗争

当我们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合作社的增长实质上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增长，这还决不是说，这一整个过程将顺顺当当地、没有内部摩擦地进行。相反地，可以说，通过合作社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在最初时期，即在国营工业还无力使全部农业建立在电气化基础之上的时候，将伴随着农民的各个不同集团和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而这些不同的集团和阶层对工人阶级也各持不同的态度。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现在，我国的农民当中存在着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许多阶层。无疑地，这些不同的农民阶层将以不同的方式建立合作社，而且在合作社建设的进程中将为争夺影响而互相进行斗争。就是合作社组织所提出的任务和目的本身，也视它们是由哪一个农民阶层办的而有所区别。例如，如果我们说的是贫农，是没有马匹、无法耕种自己的土地、没有农具和起码的生产资料的农民，那么我们会看得很清楚，这些农民阶层必然会向往各种直接意义上的集体农庄。他们不可能现在就组织销售自己产品的合作社，因为实际上他们还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出卖；他们首先得经历一个能站住脚并且把自己的生产稍微提高一点的发展阶段，然后才能过渡到把自己的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在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一发展阶段的时

候,就是说,当他们还在遭受极度贫困的时候,他们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在集体的基础上共同购买农具、役畜、机器以及共同使用这些役畜和机器。因此,集体农庄是组织贫农经济的自然形式。但是必须指出,直接向这样一种经济的过渡要求同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旧习惯彻底决裂,因此很难设想,集体农庄运动会包括贫农的全部广大群众。正在发展和日益巩固的中农经济,当然将组织到我们上面说过的三种主要的农业合作社,即采购、销售和信贷合作社中去。农民的基本群众,基本核心首先是中农。因此,合作社的基本形式也就是相应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富裕的大农民同样将力图建立自己的合作社组织,其中包括信贷合作组织,并且将设法使这些组织成为自己的据点。由于农村中阶级斗争要经过很长的时期才会开始消亡,由于最近的将来在我们面前会出现一个农民分化的过程,即一方面分化出一个富裕的农民上层,另一方面分化出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以非常明显,在整个合作社组织的各基层组织之间以及在同一些合作社内部都会出现阶级斗争,即出现关于管理委员会的选举、关于负责人员的选举、关于股金和股金的数额、关于合作社组织的章程、关于管理委员会应当实行的政策等等的问题;在所有这些个别问题上,不同的农民阶层之间将展开一系列的(当然是“和平的”)搏斗。

因此,将出现一幅五光十色的画面。在总的合作社组织网中,既有富农组织,可能有时是纯粹的富农组织,也有贫农组织和中农组织,还有混合型的组织。但是,这幅画面毕竟会有某种基本的底色。应当看到,尽管出现农民分化的过程,但农民的基本核心,即中农这个如列宁同志所说的“我国农村经济的中心人物”毕竟会保持下来。如果说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面对着资本主义城市和资产阶级专政,中农阶层也能保持相对稳定,那么,在工人阶级专政下,农民的分化决不会更快,相反地,只会更慢些。另一方面,随

着国家政权日益有可能给予贫农和中农以物质援助，我们会有一个趋向于均等的新的转折，不过已是建立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的了。过去我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剥夺过富裕农民和富农，并且把从他们那里拿来的东西交给了贫农，也就是说，使富裕者贫穷些，从而达到了某种均等，例如在贫农委员会时期，情况就是如此。而现在，情况将是另一种样子：中农和贫农将在自己的合作社组织的帮助下，日益迅速地摆脱贫困，他们的合作社组织将得到工人阶级国家政权所给予的物质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的特殊照顾、特殊优惠、特殊支援。

整个国民经济愈发展，我们的国营工业增长得愈快，这些农民阶层得到的支援就会愈加有力，它们就其生活水平来说将赶上富裕的农民上层，不过它们的上升将不是通过剥削，不是靠别人的劳动，而是由于改善自己经济的经营方式和通过合作社组织把许多农户的力量联合起来，就是说，它们将过渡到越来越集体化的经营形式。因此，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不是由富农式的而是由“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我们的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异物，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将来这种富农合作社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例如，假定我们这里有一个信贷合作社，它由在当地享有极大权威的富农来领导。这个富农合作社如果想要繁荣起来，也必须象其他合作社一样，同国家的经济机关发生联系；例如，它会把自己闲置的现金存入我们的银行，以便取得一定的利息；即使这一类合作社建立了自己的银行组织，它们仍然非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强大的信贷机构发生联系不可，因为后者掌握着全国的基本信贷资金。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将走投无路，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

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经济组织的业已大大增长的实力预先规定的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如果富农成了我们银行的存户，不管愿意不愿意，如果他开始通过种种关系同我们的经济机关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塞进一定的框框之内。当然，一般说来，可以设想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富农经济异常迅速地增长起来，富农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比整个国营工业中的积累要快得多，因此富农超过所有其余的经济，并与私人商业资本勾结起来推翻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这种设想是完全难以置信的。因为设想富农经济会比整个国营工业增长得快，这就意味着设想某种直接违背实际情况的东西。在我国国民经济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已经站住了脚的、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大工业将发展得最快。这种增长将决定一切，将足以保证使富农或雇佣一些农业工人的富裕农民非服从我们的总的制度不可。

无产阶级国家关心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发展；不言而喻，它不能对劳动合作社和富农式的合作社抱一视同仁的态度；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它将用一切办法支持贫农合作社和中农合作社。这里也将表现出阶级斗争：在最接近无产阶级的那些阶层同富农或农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给它们以阶级的援助。

九 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形式

在我国目前有三个阶级，其中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制度的基本阶级，而第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富农、耐普曼等等），只有当它在某种程度上和在一定条件下“被容许”与工人阶级和农民“进行合作”时，才存在。我们在前面

已经看到,从现今工人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所处的地位中,可以得出关于工人国家政策的一系列根本结论。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基本的和主要的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任务是破坏社会,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的任务不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和新产生的社会,相反地,是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它、巩固它、领导它。由此又必然得出另一些结论,即涉及到我们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本身的一些结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阶级斗争不会立即停止和消亡,而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期、直到一般的阶级划分最终消失为止。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关于阶级斗争的主要途径的问题以及关于阶级斗争的形式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正在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事业是破坏这个社会,它的经常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地激化和燃起阶级斗争,直到这种阶级斗争采取最残酷的形式,即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国内战争和武装斗争的形式。在这一斗争中旧社会被彻底摧毁,最后各阶级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所谓“下等的”、受压迫的阶级得到翻身,而剥削者则成为这样一个阶级,它的反抗遭到镇压,它在被摧毁以后不得不服从新政权,即由底层升上来的阶级的政权。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任务是实行激化阶级斗争、把它变为国内战争的路线。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工人阶级政党是国内战争的政党。一旦工人阶级依靠广大农民阶层取得了政权,事情就倒过来了。既然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打碎,既然它已被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那么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巩固这一专政、保护它不受任何侵犯。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就成为国内和平的政党,这就是说,它要求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各阶级、阶层和集团服从工人阶级;它要求它们保持国内和平,这时工人阶级就要惩罚和追究国内和平的一切破坏者、一切阴谋分子和怠工者——一句话,妨碍和平建设新社会的事业的一切人。

工人阶级在打退敌人的一切进攻并保证和平建设工作之后，它在本国就不再鼓吹国内战争，而是鼓吹在一切阶层——包括新政权过去的敌人——都完全承认这一政权、承认它的法律、它的机构的基础上，以及在服从这些法律和机构的基础上的国内安定。与此相适应，阶级斗争的形式本身也发生变化。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资产阶级我们曾鼓吹发展斗争直到使用武装力量。当然，如果现在资产阶级还企图手持武器来反对我们，就象它在1917、1918、1919等年所作的那样，那么我们立即就要动用我们的武装力量，给这个敌人以应得的惩罚。但是现在在我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和稳定是如此明显，以致我们社会的资产阶级阶层(耐普曼)也非常清楚：进行积极尖锐的政治斗争来反对新制度的一切企图，都完全是徒劳的。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些阶层都必须容忍事物的现存秩序。在一定范围内资产阶级被允许进行经济活动。现在我们决不禁止私人贸易，我们容许一系列私人企业，我们不再封闭私人商店，就是说，我们给予这些阶层以某种生存的可能性。这是不是意味着停止阶级斗争呢？不是，决不是。不过这种斗争大大地改变了自己的形式。从工人阶级方面来说，斗争在继续进行；我们的立法保护工人的事业，保证工会有一定的权利，迫使私人企业主支付保险费，剥夺这些企业主选举政权机关的权利，等等，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以相应的方式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课税的征税制度，这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对资产阶级的征税，同样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来自国营工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方面的竞争，这也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国家给予合作社企业以特惠和优先权，国家给合作社组织以特别资助，即以资金支持它们，国家通过立法保证它们有更多的权利，——这一切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如果在市场的竞争过程

中，国营工业、国营商业、合作社逐渐排挤私人企业主，那么这就是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不过不是在各种力量的机械的冲突中的胜利、不是借助武装搏斗而取得的胜利，而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形式中取得的胜利，这种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来说是不能设想的。

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形式也同样发生变化。诚然，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不过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例如富农或者靠剥削他人发财并且钻进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人现在开始向农村通讯员开枪，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可是，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苏维埃机构还软弱无力的地区。随着这种机构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地方农村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十分明显，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还在几年以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对农村的上层阶层施加直接的行政压制：起先是不断没收和征用比较富裕的农民的财产，并把没收的财产分给贫农（在贫农委员会时期）；后来，实质上是采取一套经常的和任意的压制措施，这种压制使得农村中的富裕阶层，首先是农村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而有时则成为完全不可能。在城市中从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起，我们就容许私商和私人企业主的经济活动，而在农村中，实际上给农村资产阶级设置了种种障碍，这些障碍大大地限制了这种活动，或者使之几乎成为不可能。现在（1925年夏）我们开始实际上废除这种制度，给予农村资产阶级分子以很大的活动自由。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再进行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决不意味着我们拒绝支持贫农和中农去反对剥削阶层。我们只是改变反对农村小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我们正在过渡到新的、在现今条件下更合适的阶级斗争

形式。

在城市中我们根本不封闭私商的店铺，我们容许他们“工作”。结果，我们因此而大大活跃了全国的商品流转。这些商人向我们的国营工业和我们的国营批发商业购买商品；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自己的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运销网还很薄弱，他们在全国各个角落销售我们的商品。当然，在这当中他们发一笔财，获得商业利润或者一部分商业利润。尽管如此，不论他们的意愿如何，由于商品流转的全面活跃，他们就促进了我国国营工业的增长、我国国营商业的增长以及国内全部资本——其中包括我们的国营工业和国营商业资本——的迅速周转。因此，生产本身这部机器运转得更快了，积累过程进行得更快了，因此，我们的国营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基础、根本基石）的实力也就增加得更快了。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资产阶级阶层的征税，获得了补充的资金来充实国库。物质价值的这种增加，一方面是由同总的商品流转的活跃相联系的我们自己的企业的加速发展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税收造成的，我们用这些增加的物质价值去兴办为劳动阶级的事业、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各种企业。从我们这方而来说，这种政策也是一种阶级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支持劳动者去反对剥削世界的残余。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政策的形式，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完全不同于我们简单地封闭私商店铺的那种形式。由于阶级斗争的这种新形式，我们不仅不吃亏，反而大为得益，因为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是在福利普遍增长的基础上强大起来。

诚然，过去我们不可能立即实行这种政策。那时，我们掌握的工厂不开工；我们发行的大量货币是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纸片；我们的银行只剩下它们的建筑物；铁路不通车；大企业不具备进行生产的最必要的条件（没有原料，没有燃料，甚至不能供给挨饿的工人以面包）；——在那样的时候，如果给私人经济活动

以自由，如果给予私商和私人小资本家以充分的贸易自由，那是极其危险的。当时，我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同他们竞争。我们手中没有足够强大的和有利的斗争手段。在经济破坏的条件下，小资本家周转他们的小资本要容易得多；他们比我们的那些空空如也的官方机构要灵活巧妙得多。如果我们给予所有这些分子以充分的经济自由，而不保卫我们自己，即在经济斗争中没有巩固的阵地，那就会出现非常巨大的、极其可怕的危险，成千成万的这种小资本家就会淹没我们，就会在竞争性的经济斗争中战胜我们。因此，当时我们不得不比较谨慎地行事，在经济斗争的战场上，即在新形式的阶级搏斗、阶级斗争的战场上，保障自己有牢固的阵地。这样的阵地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大工业、交通运输业、银行体系（信贷业务）以及国家预算和国家财政。

随着我国的发展和这些所谓“经济命脉”的加强，我们就能日益坚决地放松我们对私人中小企业主的压制。例如，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用不着害怕这种贸易自由了，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在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且利用这种贸易自由，来加强我们的经济命脉，进行胜利的经济斗争。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种政策推行到农村中去，使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对农村中的比较富裕的阶层不采用简单的行政“强迫”、“压制”措施。那么这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打算放弃对农业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呢？丝毫不是。我们容许城市资产阶级（耐普曼）从事自己的“营业”，这并不是放弃对他们的阶级斗争，同样，在农村中实行相应的政策，也决不是放弃斗争。我们只是改变斗争的形式。为了反对农村商人的店铺，我们不必设置直接强制和暴力的机关，而要开办优秀的合作社店铺。为了反对那些以无法无天的利息放债或者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向无马的农民出租马匹的农村高利贷者，我们必须首先建立一批我们自己的信用社，很好地组织低息的

合作社贷款，并且由国家政权提供援助。我们的商品应当比私商的商品物美价廉，我们的贷款应当比高利贷者的贷款额大息低，合作社应当比私人商业经营得更好，更能满足当地农村的需要。我们必须把这些大炮摆在我们同农村剥削分子作斗争的前沿阵地。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把这种适合于城市的政策搬到农村中去是否正确呢？要知道，城市的经济斗争条件与农村的经济斗争条件之间，存在一个对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而且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城市里，我们已经有一批多少组织得较好和工作得较好的“命脉”；这就是我们同城市耐普曼作斗争的重炮。可是在农村中哪有这种“命脉”呢？在农村中我们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对付富裕的上层呢？我们可以用来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打击农村富农的经济拳头在哪里呢？在农村中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富农分子在经济上会比其他农民群众强大得多，从而他们会不会压倒我们而成为整个农村生活的主宰呢？

对于这一非常正当的问题，我们应作这样一种答复：对付农村资产阶级的命脉就是无产阶级的城市。决不能把事情设想为这样，即农村完全独立于和不依赖于城市而发展。我们已经说过，随着国内生产力的增长，城市对我国农业的发展的影响将愈来愈起决定的作用。而这种城市的核心，它的无产阶级的工业，它的银行体系，它的立法，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面向农村”，就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农村中的中农和贫农分子的强大支柱，反对农村富农阶层的支柱。

无产阶级的城市和劳动的农村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合作社，合作社正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连接点，它首先体现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结合，而加强这种结合是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国家在合作社内部给贫农和中农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反对富农和农业小资本家，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合作社的增长

就意味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经常不断的生长。国营工业和国营商业同农村合作社结合起来（而合作社又从商业过渡到生产本身）；就将逐步排挤私人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农民经济将被吸引和吸收到总的国家—合作社组织中来，正如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将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组织（首先是手工业合作社）而被吸引和吸收到总的国家—合作社组织中来一样。随着各种私人企业主及其私人经济的被排挤，随着国家—合作社经济的组织性和完整性的提高，我们将逐步地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即接近计划经济，那时，一切都属于全体劳动人民，那时，全部生产都是为了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

但是，最近几年内在农村中将要出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局部发展，除了引起纯粹的经济斗争以外，即除了引起不同经济形式的相互斗争以外，还必然会引起其他的阶级斗争形式。例如，受雇于农业资产阶级的雇农可以完全没有自己的经济，他们进行的斗争不同于譬如说中农和富农之间或者贫农经济和富农经济之间的斗争。富农和雇农之间的斗争涉及雇佣劳动条件方面的种种问题（劳动日的长短、工资、劳动报酬形式、一般工作条件等等，等等）。但是在这里，作为现在执政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雇农，其阶级斗争的路线也具有另一些形式而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那些阶级斗争形式。这是由于雇农在富农经济中可以说居于自己的主人之下，而同时，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又站在自己的主人之上，尽管个别雇农并不意识到这一点。这个事实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国的全部立法其锋芒是针对剥削者的，它的每一项条文都是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工会和雇农的工会享有法律认可的、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的权利；我国的法院惩办违反这些法律的企业主，等等，等等。因此，雇农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决不是为了摧毁富农的经济并加以瓜分。现在我们不能老是看陈年

黄历。雇农正在以其他的形式进行阶级斗争，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和自己的国家政权即苏维埃政权，迫使农业企业主答应适当的劳动条件，而且在有必要约束农业企业主时，就诉诸本阶级的法院。同样，雇农作为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仅协助把农业中的雇佣工人组织起来，而且全力协助把贫农和中农组织起来，因而他们是城市产业工人和广大劳动农民阶层之间的活生生的结缔组织。这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旧的斗争形式了。例如，雇农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往往不得不举行罢工。但即使在这种冲突中，情况也有所不同，因为在雇农背后有全部政权机关对私人业主施加压力。

十 我们应当把宝押在谁的身上？

我们还应当从另一个方面来研究一下我们刚才阐述过的那些问题。因为有些同志不明了问题的实质，对我们党对农村所采取的政治方针感到困惑莫解。例如，在有些人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议论。

他们说，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半无产者、雇农、半雇农、小农、一般贫农的联盟。我们的政策的这条路线，体现了“真正无产阶级的”路线，体现了“左的”、真正“纯粹无产阶级”的方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把我们的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了农村。过去我们把宝押在贫农身上，在农村中依靠象贫农委员会那样的组织；后来我们宣布了支持中农的口号，中农开始冒尖，成了“我国农村经济的中心人物”；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不知不觉地由把宝押在贫农身上转到了把宝押在中农身上，就是说，我们的方针向右转了，离开“纯粹无产阶级的”路线了；再过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已开始谈论给予富裕农民，甚至给予富农以广泛的经

济自由了；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更加“向右”转了，而且，看起来，我们会把宝真正押在富裕农民身上，因为我们起先押在贫农身上，后来押在中农身上的宝已经“输了”。这不是我们政策的新的向右转吗？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是意味着对无产阶级政策的不断的、系统的背离，不是意味着越来越把我们党的政策变为持续不断的、越走越远的让步——起先是对中农让步，而后来就对中等以上的资产者让步——的政策吗？换句话说，难道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蜕化的一条明明白白的路线吗？难道这不是放弃我们的阵地而向在我国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投降吗？

对这种思想和这种可能的非难必须非常仔细地加以研究。对它们决不可不予回答；这里必须非常开诚布公地把问题说透，因为如果不理解我们政策的实质（而如果不回答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如果对我们的政策没有这样的理解，当然无法比较正确地领导象我国这样一个面临着这么多的内部矛盾和这么复杂的任务的大国。

为了回答提出的问题和非难，首先一般地谈谈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合适的。当我们从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这种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敌人，“自己的”和国外的敌人，不倦地谈论和描述共产主义在俄国的破产；他们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作了一次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很快就对这个尝试失望了，因为它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既然布尔什维克求助于他们曾企图消灭的资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表明自己绝对无能为力了。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外国和俄国的阴谋分子、（白俄）流亡很刊喋喋不休地断言，俄国在恢复旧制度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在这一步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迈出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其他步子；工厂将被归还，过去的占有者将作为拯救俄国和在

那里建立秩序的瓦利亚基人而被请回，一切“国有化”和“垄断化”都将消失，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依靠“变得理智了的”布尔什维克本身而恢复，从而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会再一次证明它的巨大的生命力和它对一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有人也谈到，布尔什维克过去“把宝押在”工人阶级身上，现在把宝押在资产阶级身上，包括旧资产阶级和新资产阶级，后者是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庇护下产生的，它饱经世故，了解新的苏维埃制度中的一切门道，因此它必然更加适应于布尔什维克的制度。

但是，能不能说，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投降呢？能不能说，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劳动人民的事业就失败了呢？能不能说，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建设、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等等呢？最后，能不能说，这种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把宝押在资产阶级身上呢？

现在，当这种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好几年的时候，当它已经接受了经验的检验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可以对这一政策作出相当令人满意的总结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我们实行了这一政策，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力量、社会主义在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斗争中的力量，大大地增长了。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我国的生产力已经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即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形式以及接近社会主义的、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种经济形式，已经取得了而且正在取得愈来愈大的优势。在我国的总的经济中，绝对看不到与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相比私人资本日益增长的现象。相反地，在国内福利普遍增长的基础上，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阵地越来越巩固。既然情况是这样，——而且情况的确是如此，——那么怎么能说是投降呢？怎么能说是背离无产阶级的路线呢？或者说把宝押在资产阶级身上呢？这个“押在资产阶级身上的宝”可真

好，结果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正在获胜！共产主义的这种“破产”可真妙，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营经济经过多年的停滞和凝固之后，正在迅速高涨！

实际上，“共产主义的破产”乃是我们关于我国向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某些荒谬见解和错误观念的破产，而这些见解和观念都与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有联系。但是，某些荒谬见解的破产决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年青的阶级，不可能想象到它必须经历的道路上的全部复杂情况。在国内战争时期，在无情地镇压剥削者、实行没收、征用等等的时期，我们曾经设想，只要我们彻底地、迅速地在一切地方消灭贸易自由并代之以有组织的分配（发配给证等等），我们几乎就能一下子过渡到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任务是我们力不胜任的，而且，在存在着大量的、决不可能一下子纳入完整的统一计划中去的小经济的时候，实质上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长期禁止小生产者的，首先是农民的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破坏农民所习惯的全部关系，引起广大农民阶层反对我们，因而必然遭到失败。习惯于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如果愿意就可以出售）的农民和一般小生产者，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丧失了任何改良和扩大自己的生产的兴趣。因此，在这种体制下、农业生产不可能发展和前进。当时在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目的之间没有一种正确的结合。首先必须找出这种结合，这种联系。而新经济政策首先就意味着这种联系和结合。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只要抓住小生产者的私人经济利益，就可以通过合作社逐步地把他们引导到社会主义，而不致于一下子急剧地破坏那种习惯了的生活秩序，从而不致于激起广大劳动农民群众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和迷信来反对我们。只要想到我国大约有一亿农民，两千多万农户；只要想到农民经济是

我国国营工业的经济基础，——那么问题一下子就清楚了，由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我国该能获得多么大的前进动力。现在我们看清了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不在，或者确切地说，不完全在我们过去所探求过的地方。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可以说，这些市场关系将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而被消灭。通过什么途径呢？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占统治地位，各种私人企业在市场上互相斗争，互相竞争，大生产最后排挤小生产，中等资本让位于比较大的资本，而最终代替一大批互相竞争的企业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的是一小撮工业大王和银行大王，他们把全部工业和商业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市场斗争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是，竞争者的数目越来越少，生产集中在大型的资本主义组织的手里。类似的情况在我们这里表面上也会发生，而且现在已经发生了，不过有重大的差别：在我们这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代替了工业大王和银行大王。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各种经济“企业”；我们有国营企业，我们有合作社企业，最后，我们有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等等。最大的生产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掌握的是商业方面的比较小的企业，首先是零售商业，而批发商业（大商业）却掌握在国家手中；在工业中，大生产也掌握在国家手中，而属于私人企业主的大多是中小企业。这些不同形式的企业之间进行着经济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买主。因为哪里商品价廉物美买主就在那里购买。如果正确地组织企业——我们力求做到而且会愈来愈达到这一点——，则一切优越性都将在国营大生产方面，它将在竞争斗争中打败自己的私有者对手。小农经济就是吃了“小”的亏，但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它将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所支持的合作社

组织弥补这一缺陷,因此也将取得一切大联合的优越性,并且会在反对富农私人经济的斗争中利用由于合作社而得到的优越性和种种优惠。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将通过市场上的斗争,通过市场关系,通过竞争,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即私人资本。最后,市场关系的发展将消灭自身,因为既然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在具有买卖、货币、信贷、交易所等等的这些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将压倒其余的一切经济形式,并且通过市场把它们彻底排挤出去,那么市场本身就迟早会消失,因为一切都会由国家和合作社进行的产品分配所代替。

可见,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决不意味着背离无产阶级政策;相反地,它说明考虑了巨大的革命经验。我们在新经济政策中第一次找到了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事业之间的正确结合。新经济政策不是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叛,而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现在,这一点已经是清清楚楚的了。

如果看一看我们的政策的结果,总的说来,就能很好地断定,这一政策是不是背离了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如果这些结果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国内全部经济中的比重正在增加,那么仅此一点就完全足以解决全部问题了。贫农委员会的政策在农村中实际上解决了当时提到日程上的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同富农的反抗作斗争;第二项任务是按照余粮收集制征粮,否则就无法养活军队。但是,这一政策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农村经济高涨的任务。没有农民的经济上的基本群众即中农的经济高涨,就不可能有农村的经济高涨,即大量的小经济的高涨。如果有了这种经济高涨,那么这就为城市国营经济的高涨提供了基础。这是不是说忘记了贫农呢?决不是。因为全国经济的普遍高涨以及国营经济的高涨,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来帮助贫农——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实际生活中,不仅通过法令,而且提

供实实在在的物质帮助。如果说迄今为止这种帮助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那么其基本原因是我们国营经济中的资金积累的速度不够快。因此，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加速我们的物质资料的增长，加快我们国营工业中的积累“速度”，加速补充资金流入我们的国库。

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必须在我国进一步放宽商品流转，而为此又必须给农业资产阶级以更多的经济自由，就是说，必须把新经济政策推行到农村中去。现在这样做对我们没有丝毫危险，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样，我们已经掌握了命脉；另一方面，这样做既加速国内的商品流转，就使我们有可能更快地进行积累，使我们有可能更快地帮助贫农和中农合作社、集体农庄、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我们的真正的宝押在我们自己身上，押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身上，押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增长上，首先押在国营工业的增长上，其次押在农业合作社的增长上。这两种基本形式之间的结合是我们胜利的必要条件。

十一 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对 不同阶级的不同意义

我们现在的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保证是：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我们有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即独裁。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意义在于，首先，它是镇压剥削者的工具，镇压他们的一切重新执政的企图的工具；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意义在于，它是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的基本杠杆。工人阶级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机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经济关系，使之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在刚刚夺取政权和刚刚奠定新的国家制度的基础的时候，工人阶级利用了这一政权去“剥夺剥夺者”，即夺取工厂主

的工厂,使之成为国家的财产。工人阶级还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没收了地主的全部土地,并宣布这些土地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土地国有化)。随着自身的日益巩固,苏维埃政权执行不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既包括社会的,也包括经济的——形式的一切萌芽的政策,所以是社会改造的工具。根据前面几章中所讲的一切,可以作出结论说,随着苏维埃制度的稳固程度的增加,重心正在由直接地、机械地镇压剥削者和那些敌视工人阶级的社会集团残余,越来越转到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的事业,转到进行和平的组织工作,转到同私人企业进行经济斗争,转到建立各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国营企业,合作社等等)的事业。

无产阶级专政,即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的专政,对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各个不同的阶级集团不能不区别对待。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权对这些阶层不加区别,不看到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巨大差别,而实行一个完全相同的政策,就是说,对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一视同仁,那就是咄咄怪事了。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那些反抗它的制度的资产阶级阶层,其作用就是对它们实行镇压。例如,假使俄国反革命势力的一些代理人由国外跑回来,在我们这里建立秘密组织和团体,企图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并且推翻苏维埃政权,那么,对这种资产阶级地主阶层,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一把利剑,它对那些企图破坏按社会主义精神进行社会改造的任何可能性的阴谋分子实行无情的惩罚。对那些——按列宁同志的说法——“被容许”同工人阶级和农民进行“合作”的资产阶级阶层来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道,事实上,有整整一个资产阶级企业主阶层,首先是商人,在我们这里从事所谓在合法基础上的活动;我们的苏维埃法律容许这种活动。对待这些资产阶级阶层,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何在呢?在于:第一,

用一系列的条件(工人立法和关于劳动法律、工会的权利、各种形式的税收等等)来对这种活动加以限制;第二,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利用这些因素(商品流转的普遍活跃,使用从这些阶层那里得来的税收去支持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形式等等);第三,通过市场竞争同这些阶层进行经济斗争(开办国营企业和支持同私人资本竞争的合作社等等)。如果我们现在问一问自己,无产阶级专政对新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最简短的回答大致可以说是这样:这个任务就是利用和排挤。由此可见,这里是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归根结底会导致通过排挤的办法使私人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归于消灭。现在我们谈一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对劳动农民即贫农和中农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在这里有没有一点斗争的成分呢?在这里斗争的成分无疑是有的,但同新资产阶级比起来要少得不堪比拟。这种斗争的成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同某些农民阶层向资产阶级方面摇摆作斗争。我们已经看到,农民由于其经济的私人性质,由于愚昧无知和世代受压迫,由于不习惯集体的形式以及刚刚开始向集体的形式过渡,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艰苦的关键时刻,有摇摆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倾向。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同从农民本身的二重性——一方面是劳动,另一方面是经济的私人性质——中产生的这种摇摆,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每一次都只能采取适当的形式。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劳动农民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和改造,即对农民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造的任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帮助下,农民经济将变成——首先是通过合作化——一种新的、高级的形式,更加大型的、更加文明的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形式。这个过程的发展将不是通过“排挤”、“吞噬”、“消灭”农民经济,而恰恰是通过对它进行缓慢的改造。如果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敌不过国营企业

和合作社的竞争，将被排挤而归于灭亡，那么，农民经济是决不会灭亡的，它将过渡到另一种高级的形式。国营企业同私人企业竞争，并且最后把它打败。国营企业同农民经济竞争，而是帮助它提高到高级阶段，不是在竞争斗争中打败它，而是通过合作社把它组织起来。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同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联盟的联系。正如我们知道的，在这个联盟中领导权是属于已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的。

为了充分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必须把两件事严格区别开来：一件是在社会中的合作；另一件是在政权中的合作，即各阶级分掌政权。合作，甚至联盟，巩固的和牢不可破的联盟，还不是分掌政权。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在社会中的充分合作，存在着联盟关系。这就是说，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必须互相帮助；这就是说，当地主和资本家向苏维埃共和国进攻的时候，工人阶级和农民一道同他们作战；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和农民一道在经济战线上同私人资本作斗争。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这里是分掌政权，我们这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联盟本身是谁同谁的联盟呢？是已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农民没有参加国家政权本身，但是这个工人政权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为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在我国的情况下，即在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下，恰恰需要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呢？其所以需要，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它能够非常自觉地和坚定地把整个社会引向社会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这条道路上的领导权，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只有坚持这样的领导权才能胜利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国家政权，也就是组织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但是，工人阶级决不把建立

永恒的“无产阶级王国”作为自己的目的，决不把使无产阶级专政万古长存作为自己的任务，也决不把使自己作为统治阶级而永世长存作为自己的任务。

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的真正任务——它正在慢慢地却坚持不懈地向着、并且领导整个社会向着这个任务前进——，是要改造广大人民阶层，首先是改造农民本身，对他们进行重新教育，使之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不断地提高他们，使之达到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居民阶层所具备的物质、经济和文化政治水平。随着对广大农民阶层的改造，随着对他们的重新教育，他们将越来越同无产阶级并驾齐驱，同无产阶级混成一体，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同等成员，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将日益消失。而这样一来，最广大的农民阶层，“在改造自己的本性的同时”，将同城市的工作者溶合，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专政将日益消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资产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它，这个资产阶级是整个社会的领导者，是整个社会中最先进和最有教养的阶级；但是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具有最显著、最深刻、最根本的区别。因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导致这样的结果：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差别日益尖锐，日益扩大。绝对不能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和框框之内，工人阶级和农民按其物质状况、生活水平、教育程度、社会地位来说，会与资产阶级趋于平等。这是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基础相矛盾的。相反地，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就是它越来越尖锐地分成各个阶级，资产阶级政策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资产阶级借助于自己的政策保证自己，而且仅仅保证自己具有物质状况方面以及教育方面的一切优越条件；资产阶级在它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中，不仅拥有对生产资料、工厂、铁路等等的垄断（即绝对控制），不仅拥有对国家政权的

垄断(不容许别的任何人参与),而且拥有对高等教育、新闻(报刊)、科学等等的充分的实际垄断。新的科学家、新的行政人员、新的工程师、新的军官和将军,总之一句话,社会的新的领导干部,都不是从下层人民中,不是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而是从资产阶级本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培养,因为他们一贯利用——实际上是以世袭的方式——自己地位的一切优越条件。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要提高和经常地认真地提高许多新的人民阶层的水平,使之过文明的生活,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降低它自己的实力。

工人阶级实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截然相反的政策。它的任务不是要再生产那种阶级关系;它的任务是要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重新教育来克服阶级差别,消灭这些阶级差别;为此它使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和国家政权的全部威力。这种改造的基础是改造社会的经济关系,使这个社会沿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与此同时并举,工人阶级竭尽全力改造广大人民阶层,首先是改造在同地主和资本家作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同盟者——农民。顺便说说,这也表现在吸引农民参加苏维埃建设的政策中。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非党农民参加苏维埃工作,并且在这种工作中帮助他们重新接受教育、成长起来,改造自己的本性、养成为担当管理国家的事务所必需的习惯、学会不仅明了地方的任务而且明了整个国家的任务等等,——工人阶级就是用这种办法逐步开始消除自己同先进农民阶层之间的界限。农民的其他阶层和新的集团,通过这些先进阶层,将转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并且提高到过一种新的、积极的和自觉的生活,而全体农民就将慢慢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础上,在习惯、思想、目的和任务等方面越来越密切地同工人阶级结合在一起。农民经济将通过合作社同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最后,在自身得到改造之后,加入统一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同样地，由于生活的整个进程，农民将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自己的本性，最后同工人阶级一起进入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的社会。如果说，在这一过程的开头，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有一条宽阔的鸿沟把劳动和斗争的集体形式（社会性形式）的天然拥护者工人同小私有经济的拥护者农民隔离开来，那么，随着合作社的发展，随着农民的政治和一般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将日益发生变化，首先变为某种与工人阶级中广大的一般后进和落后阶层相似的东西，然后将越来越接近工人阶级，一直到横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被彻底填平，这两个阶级一劳永逸地溶合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同一类型的劳动成员。这就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由于“无用”而归于消灭（消亡）。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有一种长期的、坚定的政策，它盯住这个目的，权威地指导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必须完全保留正确政策的唯一有效的保证，这样的保证就是依靠农民并且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

十二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即不同于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苏维埃国家。这种国家政权形式的特征，有如下的几个突出之点。第一，它不容许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国家机关的选举。它从一个与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做法完全相反的方面限制选举权，因为资产国家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直接地或间接地、隐蔽地或公开地剥夺或限制劳动人民的代表的选举权。第二，苏维埃政权限制资产阶级代表的一系列“自由”，或者完全消灭他们的这些自由。例如，它禁止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它禁止资产阶级拥有自己的战斗的政治机关，其中包括出版机关等等。第三，但

同时它在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上真正实行工人的组织自由，以及他们的出版、他们的集会等等自由，从而造成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各种各样的团体的前所未有的繁荣，从而真正实行广泛的劳动者的民主，这种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的富人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同并且截然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和农民有时拥有各种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多半是形式上的（即只存在于纸上，而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例如，在纸上也可以承认工人的出版自由，但因为一切印刷所，一切纸张、一切屋房都掌握大资本主义私有者手中，所以革命的工人报纸实际上无立锥之地；即使在物质上有可能出版，人们也拒绝为之印刷。又如，在纸上可以存在集会的权利，但是，工人组织由于“没有场所”而不可能开会，如此等等。而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越来越在实际上保证这些自由，即把这些自由付诸实现，因为它为实现这些自由提供保障；它在物质上支持工人的报刊，它在城市中为工人组织提供最好的场所，它在农村中提供最好的场所，使先进农民有可能成立自己的俱乐部等等。它的邮局传送工人的报刊，它的民警保卫工人的集会。总之，国家政权的一切组织保证广大工人群众具有真正参加积极建设新社会的事业所需要的一切。

第四，苏维埃政权不脱离工人和农民的组织；相反地，它的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它直接联系和依靠庞大的劳动人民的各种各样的组织网，这些组织包括工会、农民合作社、农民委员会、贫苦农民委员会、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组织、各种各样的自愿参加的团体和协会，等等，等等。苏维埃政权把劳动居民中的一切阶层、甚至最落后的阶层都一个一个地发动起来；例如，它组织和全力支持女工、农妇即过去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妇女和最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各种团体，千方百计地使他们认识到走向新生活和亲自参加建设这种新生活的必要性。直接或间接地与苏维埃政权机关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的这许许多多和各种各样的团体，实际上同它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这个体系把劳动者的最广大的阶层都包括进来，组织起来，并且对它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权依靠少数大资本家阶层的一些狭隘的组织。如果它同劳动人民的组织发生联系，那么仅仅是为了腐化它们和欺骗它们；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联系的目的不是要吸引劳动者去建立新的秩序，而是要引诱工人阶级和农民不去实现自己的独立的目的是和阶级任务，使他们更好地替资产阶级工作，和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更加俯首贴耳。

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本身实际上就是劳动群众意志的体现，就是这些群众的最广泛的和无所不包的组织形式。如果说在我们这里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如果说在我们这里存在着的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个国家机构不仅与工人组织而且与农民组织的联系，乃是它的前提，乃是一座桥梁，农民正在沿着这座桥逐步走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

第五，苏维埃政权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参加政治生活，例如参加选举各级苏维埃的运动以及在各级苏维埃中工作，这与参加所谓的国会选举运动和参加国会的工作根本不同。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公民在每四年、三年或另外的某一期限内进行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他们的政治生活几乎仅此而已。另一方面，国会议员不能被自己的选民召回，他们完全是一批国会清谈家。在我们的条件下，选举各级苏维埃的运动以及在各级苏维埃中工作，意味着吸引选民尤其是代表参加实实在在的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选民甚至在最基层的选举单位如工厂中参加这种建设工作，而他们的在苏维埃机关中的代表也同样必须担负管理国家或管理一部分国营经济等等的某种领导工作。

还可以指出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深刻地区别于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许多特征。显而易见，正在改造整个旧制度、整个旧世界的基本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使命、目的和任务，是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目的和任务根本对立的。

但是，苏维埃政权的这种形式本身，由于劳动者为实现自己的事业而进行斗争的环境各不相同而经历一系列的变化。

在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当时全国已变成一个被围困的堡垒，政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对敌人的武装抵抗，首先必须迅速地、坚决地打败敌人，与其进行讨论不如以指示和命令的形式、按军事方法进行领导，因此，理所当然，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军事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广大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苏维埃的全会，实际上几乎等于没有了，领导权完全交给了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即少数委员，如“三人小组”、“五人小组”等等。特别是在那些接近敌占区的地方，或者在那些受到敌人威胁的地方，往往没有建立“正规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即真正是由全体劳动居民选举的机关，而建立了一些所谓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它们不是把问题提交群众讨论、提交广大劳动群众预先作出决定，而是完全独立行事。当然，这种苏维埃政权形式并不是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它在那个时期是必要的，对于那个时期来说是适当的，因为当时必须把一切清谈、一切争论精减到最小限度，因为当时甚至必须暂时放弃教育群众的任务，因为当时必须同劳动人民的敌人作武装斗争的战场上采取行动和再采取行动。由于当时实行这种军事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以缺乏明确规定的、必须严格执行的法律，主要是按照随战斗情况而变化的指示和命令办事。

没收和征用的办法是当时非常普遍的办法。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由于被强加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身上的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产生的。

随着向和平时期的过渡，特别是随着我国向全面的经济高涨的过渡，非常自然地，苏维埃政权的形式必须在逐渐消除和消灭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残余的意义上予以改变。

应当以革命法制取代行政（哪怕是革命的）专断的一切残余。在和平建设时期，当经济活动处于首位的时候，对经济生活过程的一切朝令夕改、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毫无预见的干涉，都可能给这种经济生活造成非常不幸的后果。首先说说农民经济。我们自己口头地和书面地对农民说：农民经济中必须更加正确地办事；我们建议由三区轮作制过渡到多区轮作制；我们建议实行一系列的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新的改良方法，我们说，必须好好估计经济的一切因素，必须更好、更适当、更正确地利用这一切因素；我们的农业宣传中充满了这一类的建议，而农民，特别是他们当中最有觉悟最有文化的阶层，即所谓的“先进农民”，都很乐意沿着这条路线走。但是，如果说，我们建议农民好好地估计他们的经济中现有的一切，好好地利用这些已经估计到的东西，那么，不言而喻，来自苏维埃政权方面的一切随心所欲、毫无预见的东西，都是同我们自己的宣传和正确地搞经济的要求尖锐对立和水火不相容的。事实上，譬如说，如果一个农民不确切地了解他必须怎样缴纳和在什么期限内缴纳农业税，那么他怎么能估计他应当做什么和应当付出哪些开支呢？

如果许多预见不到的命令象冰雹般地向他打去，如果没有一套稳定的、人们事先知道的、务必严格和无条件执行的法律，那么，他又怎样正确地搞自己的经济呢？这种与国内战争时期的军事环境根本不同的新环境，坚决要求正确地安排全部管理事务；它要求实行以立法方面的决定为根据的管理，那些决定是事先众所周知的，是可以事先考虑到和注意到的。因此，过渡到革命法制即严格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令，过渡到彻底地、无条件地消灭行政专

断的残余，乃是我国革命发展的新时期的基本特点之一。

现在，吸引群众也已成为比前一个时期更加必要得多的任务。一般文化的高涨以及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劳动者阶层的政治积极性的提高，比过去在艰苦的国内战争年代要多得多的空闲时间，物质状况之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注意一个极其重大而又最容易收到成效的任务：即要更加坚决地吸引广大劳动居民阶层参与国家的事务。必须注意，在现今的条件下，把农民的政治能量引上巩固工农联盟的轨道，这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正是为了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在“和平组织”时期，必须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按照必要的精神对农民进行改造。教育农民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首先就是吸引他们当中的非党的先进分子参加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正是在这里，农民在工作中进行学习，了解全国的任务，同时也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吸引城乡广大群众的这种办法，才能更有成效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这种迄今为止一直腐蚀着我们国家机体的溃疡的斗争。

最后，我们的苏维埃机关的最积极的核心人员，即我们的党员、这些苏维埃机关的领导者，必须根除命令和指示的方法，必须彻底地完全地和无条件地转向说服的方法。

这一整套措施都是为巩固和发展作为国家制度的特殊形式的苏维埃体制的事业服务的，都将保证劳动群众的最广大阶层（在物质、政治和一般文化方面）的日益提高。

一般地可以说，一种政治制度越好，它比历史上过去的制度越先进，那么它就会为越多的人提供发展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只限于给予一些特定的阶层，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主等等以这种可能性。广大劳动群众被置于这种发展的大门之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即人类的基本群众，没有提高和不

断地过渡到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去的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评价苏维埃政权，那就不难看出，它是迄今为止存在过的一切国家政权形式中的最好的国家政权形式。问题不在于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想要做到的一切（我们只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使人民的下层获得空前文化高涨的方向迈出了最初几步）；问题在于，社会发展的舵已经被拨到这个方向，而决定这种空前的文化高涨和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可能性的这个舵，就是苏维埃政权。

十三 经济上的不平等及其克服

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个社会的生产力、人征服自然的程度，将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制度在其繁荣时期所达到的那种技术发展程度；此外，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在那里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剥削人的现象，也没有任何由一些人的集团对另一些人的集团发号施令和使用暴力的现象。只要把人类社会的这种状况同资本主义制度遗留给我们的社会状况加以比较，就能明了，为了提高到人类发展的这个最高阶段，必须进行真正巨大的、历时几十年的工作。因此，十分明显，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总共还不过几年的时候，决不可能设想一下子就消灭一切不平等和一切贫困。但与此同时，必须千方百计地加速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步伐，而为此又必须首先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用什么办法来逐步克服我们这里迄今存在着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我们依次来考察一下现在在我们的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的不平等的几种主要表现。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城乡之间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造成农村的落后，阻碍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相比较而言），并且把城市

变成一切舒适的主要生活设备的唯一集中点。城乡之间这种相互关系是夺取了政权的工人阶级以及支持它的农民作为遗产接受下来的。

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技术的现代工厂。小农经济就其内部结构和劳动组织来说也同样落后于这样的工厂。结果,这种小农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十分低,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才能得到很微不足道的一点成果。怎样才能消除城乡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呢?企图用某种机械的办法、采取某种措施一举解决这个问题
的想法,是荒唐的。当然,可以荒谬地设想把拥有各种大企业、机器、电气装置等等的所有大城市中的东西,直到一砖一瓦都拆光拿光。但是,要知道,这丝毫无济于事。首先,因为这样做会破坏和毁灭大工业,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大工业是农业本身兴旺发达的基本源泉,因为它为农业提供机器、劳动工具以及为改善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许多东西,同时还提供正在日益成为农业生产方面的决定性力量的科学。这种想法是真正毫无理智的想法,凡属有健全理智和坚强记忆力的人都应当立即抛弃这种想法。相反地,非常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农民的忠实的帮助者——工人阶级领导的城市工业的帮助下,农村才可能得到提高;我们将逐步地填平以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深渊,其办法不是毁灭城市,而是使工业同农村接近以及给予农村以经济和技术援助。工人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要消除城乡之间的这种矛盾。我们应当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逐步地建设新的工厂、电站以及类似的大工业生产单位,使这些企业遍及全国,使它们成为在全国农民中传播文化、文明、经济改良、政治觉悟的苗圃和基地。

城市的技术援助,特别是农民经济的电气化以及与此同时的合作化(我们知道,合作化确定了我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

道)，是使农村繁荣昌盛的强有力的杠杆，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物质条件将逐渐趋于平衡，而且，实际上，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城市居民被闭锁在现代城市的监狱之内，看不到大自然，在这种条件下，尽管有相对的物质福利，也必然趋于退化，如今他们由于接近大自然而得到好处。反之亦然，农村居民也将得到极大的好处，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会提高，而且最后，他们会享受到过去只有我们的敌人才能享受的一切文化和文明的福利。不言而喻，为了达到这种社会制度需要许多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只有在很长很长的年代里才能实现。不过，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就已看到，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城市内部，现在我们也看到同样十分尖锐的和惹人注意的不平等。只要把耐普曼和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流浪街头饥肠辘辘的儿童的生活、或者哪怕同大批失业者加以比较，就能看出，我们离我们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提出的那种理想境地还多么遥远。如果我们把各种不同的生活水平从高往低依次排列的话，那么我们会得到由明显区别开来的各个等级组成的整整一个阶梯。如果只作大的分类，那么大致可以把这些等级描述如下：

(1) 新资产阶级 (耐普曼)，它靠剥削别人的劳动而获得利润，这种利润有的是来自工业企业的利润，有的是商业利润或供应者的赚头，或者是投机利润，或者某种其他形式的所谓“非劳动收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往往接近战前那些并不特别大的资本家所具有的生活水平。

(2) 高级苏维埃职员，主要是经济机构和经济机关的职员 (托拉斯经理、辛迪加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不可缺少的大专家等等)。

(3) 所谓的一般负责工作人员。

(4) 熟练工人。

(5)非熟练工人。

(6)失业者，流氓无产阶级(不务正业的人，长期失业者，乞丐等等)。

所有这一切情况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我们离哪怕是在城市里做到平等还多么遥远，尽管现在城市是我们的工作的中心，无产阶级的统治在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虽然如此，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只要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实行正确的政策，我国社会的发展必将导致这些矛盾的缓和、克服和消灭。首先，让我们来实际考察一下那种表现得最明显的的不平等——资产阶级(耐普曼)和整个工人阶级在物质状况方面的不平等。怎样消除这种不平等呢？根据我们已经作过的说明，这是不难设想的。

要知道，随同我们国营经济以及合作社的高涨的，是排挤私人企业主的经济形式。在这些经济形式在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胜利进军面前认输，而完全归于消灭以前，国营工业的高涨就将使工人阶级的工资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税收制度将对新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加以限制。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彻底战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定会把事情进行到底，城市中的这个基本矛盾、这种基本的不平等就将通过这种方式而被消灭。关于苏维埃职员和领导者当中的高级干部和中等工人之间的不平等的问题，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苏维埃政权的这些高级的和负责的职员当中，除了各行各业的专家之外，还有一些出身于最有才能和最有文化的“先进工人”的原先的工人(例如红色经理等等)。显而易见，这种不平等就其最深刻根源来说是由于工人群众的文化落后而产生的，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是被剥削、政治上被压迫和文化上被压抑的阶级。为了完成管理经济的复杂工作，为了进行在其他方面管理国家的一系列其他类似的工作，需要有大量的知识、经验、本领。工人阶级中的某些人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这样的任务，而有些人还在工人阶级获得胜利以前就在领导群众和进行政治斗争中取得了经验，但是这样的人为数很少。十分明显，决非全体工人群众都能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专家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是专家，他们积累了科学、管理、经济等方面的大量经验，在当前的条件下对于实际生活和管理人的事务是必需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或缺的力量；要在短时期内使全体工人群众，使它的一切组成部分也达到这样高的文化水平是不可能的。而进行这一类工作自然要求有相当高的报酬，以保证相应的生活方式。可是，限于目前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要给工人阶级的一切阶层以同样的报酬，是不可能的，无法实现的。假使全体工人都具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那么各种领导职务就可以轮流担任，或者仅仅担任一定的期限，这样一来，就经常是一批批的新的工作人员居于所谓的“负责岗位”，因为在任何活动中一个人随时可以由另一个人代替。但是在这里存在着文化水平不平等以及群众还非常落后的问题。这里还必须指出，这绝对不是这些群众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受资本主义统治的数十年时日使他们成了这个样子。工人阶级在革命年代里在斗争过程中非常迅速地学会了越来越广泛地参加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而且在各种专门机构（各种工人组织、俱乐部、党的和苏维埃的学校、工人速成中学、甚至高等学校）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它自身队伍中的这种落后。显然，不是全体工人群众、它的一切阶层都能完全同时并进的。正如在现今的条件下，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能居于领导岗位，在管理体系中占据完全相同的地位一样，由于一些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不是所有的工人人人都能进中学和高等学校。

工人阶级正在一小队一小队地分批提高到比较高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逐年地增加一批又一批、一小队又一小队的这样的新

人,直到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足够的经济基础,使得所有工人的子女都能完全正常地上中学和高等学校,经过相应的实习,然后进入生活,从而克服过去所形成的劳动者内部在文化上的一切不平等。

我们刚才所说的关于最有文化的先进工人以及原来的专家和一般工人群众之间的差别的问题,在较低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不同阶层是指其不同的劳动熟练程度(例如五金工人是一种,挖土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是另一种)。苏维埃政权、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机制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全部政策的方向,恰恰就在于提高广大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从而消灭工人阶级自身的最先进阶层的那种“离了他们就不行”的现象,消灭文化水平的差别,消灭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差别。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如下的意义上做到人们的完全平等,即人们在他们的智慧、才能、头发的颜色或鼻子的形式等方面都将完全一个样,这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平等没有丝毫意义。我们努力的目的不在于此。我们努力的目的在于达到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平等,保证一切人的正常的发展条件,从而使全体群众都可能前进,有可能不是从被一道道鸿沟同其他人隔绝开来的少数“有教养的人士”当中,而是从全体广大劳动人类当中涌现出最聪明能干的人物。

在这里也不难理解,从很深刻的原因中产生的这种不平等,不可能一举加以消灭。当然,有朝一日可以颁布一条法令,很据这条法令,所有一切高级苏维埃职员、工程师、教授、托拉斯经理等等,都领取和普通工人同样的报酬。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相信,如果这么干的话,整个工人阶级不会得益,反面会吃亏,它之所以会吃亏是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这些领导职务上的工作会进行得无比缓慢,在很大程度上事情会搞得乱七八糟,而普遍的成绩会被代之

以停滞或倒退。工人阶级好好地供养自己的上层以及一些出身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人即所谓专家，对自己更加有利，因为这样做它就能在比较短得多的期限内达到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并且能够依靠生产力的提高迅速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从一定的时候起，就能利用这种生产力的提高从本阶级和一般劳动者的越来越广大的群众当中开始加紧生产“有教养的人士”。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应当过分地搞高工资；相反地，党必须同这种“过分行为”进行顽强的斗争。

最后，在农村内部我们同样有各种各样的农民阶层，它们的生活水平的差别也相当之大。只要把富农同雇农，或者同贫农比较一下就行了。但是，现代农村所特有的这个基本矛盾，同样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随着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高涨而慢慢地归于消灭。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我们将越来越有可能给予中农和贫农——他们将不再是贫农——经济以援助，另一方面，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措施限制和在经济上排挤农民中的企业家阶层即农业资产阶级。由此可见，在经过一定的期限之后，即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开始更加迅速地增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农村中的发展的基本路线是消灭、克服现存的经济不平等的路线。

只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贫穷、愚昧、文化落后和不平等的全部深度，才能明了需要多少时间来改造全部人类原料和克服这种讨厌的遗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式正在高涨，这是使我们能实行真正的、切实的，以实现经济平等为目的的政策 的保证。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工人和农民的下一代正在越来越大批地提高到新的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党的工作、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活动和全部政策正在造成这样的局面。过去，工人和农民中只有个别人能进入高等学校；现在，劳动人民当中的成长的一代，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大批大

批地、系统地、“按照正常的次序”通过工人速成中学而进入我们的高等学校。过去，劳动者通常要到成年之后才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现在，仅共青团员——工人和农民的子女——我们就大约有150万，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或多或少同样参加积极的一般政治工作和一般文化工作；而更年青的一代——少先队员——开始包括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从小就在与以前的历代人不同的文化基础上受到教育、成长起来和学习进行工作。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可能创造历史奇迹；仅仅在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立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是，归根到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及在国内巩固工人的专政将创造条件，使我们朝着这种经济平等的方向前进，这是明确无疑的。

十四 政治上的不平等，它的克服以及一般政治的消灭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这里存在着的政治方面、政治权利方面的不平等。在这里，首先必须列举体现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的事实。

(1) 根据我们的立法，那些依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人（耐普曼、富农、为取得利润以这种或那样形式剥削劳动力的各种各样的人）没有选举权。可见，在这里，“受害者”是这样一些居民阶层，它们就其物质福利和生活水平来说处于最高的等级，在我们的制度中，它们是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原来的统治阶级的残余，他们现在落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掌之中。

(2) 劳动农民不拥有和无产阶级同样的权利，因为在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选举中，他们从比城市和工厂区的工人阶级要多得多

的选民中选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由此可见，在这里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的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显然就是工人阶级的权利大些。

(3)无产阶级享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特权)，在我们的立法中它占优先地位。

巩固我国社会各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的这种立法的原因，是非常明白和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这里存在着三个阶级：工人阶级，广大农民群众和被容许在社会中进行合作的资产阶级。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要保证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它同农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也知道，农民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由于当前的一些特殊困难，有时容易向资产阶级方面摇摆；最后，我们知道，如果新资产阶级增长起来，强大起来，展开自己的翅膀，并且在争取农民的斗争中战胜了工人阶级的话，那么整个革命事业就一定会遭到破坏的危险。在我们国家，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力量，但是，它的人数大约只等于农民居民的十分之一。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牢牢地把握住舵，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首先必须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为害，使它不可能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传播自己的政治影响。因此，必须剥夺私人企业主、商人、店铺老板、富农、一般耐普曼的政治权利。

由于农民容易发生重大的摇摆，由于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农民的愚昧无知和没有文化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促使他们有时违背自己的根本利益而跟着资产阶级走，所以我们的立法中就给工人阶级规定了某种优越的地位和政治特权。这种优越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补充的保险，它保证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至于限制或剥夺一切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么劳动人民当中未必有人会对此表示反对；只有这个资产阶级的公开或隐蔽的拥

护者，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流，才可能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相信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在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迄今为止，他们一直认为，在俄国发生了某种历史的偶然性，我国社会的发展必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苏维埃政权垮得愈快，这场恶梦（对资产阶级来说）结束得愈快，那就愈好。凡是真正相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的人，因而，凡是言行一致、相信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人，凡是绝对不愿意回到资本主义制度去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在我国限制和剥夺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权利，这是天经地义的。

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有些人往往以与政治毫无共同之处的道义上的论断来代替清醒的论断。例如，有人说：难道农民有时不比工人劳动得更多吗？你们给农民的政治权利比给城市工人的少，那么公平在哪里呢？难道农民不是我国居民的大多数吗？如果说劳动人民的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这个少数必须人为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多数劳动人民呢？农民并不好吃懒做，并不游手好闲，他们不是资产者，而是劳动者。这里又哪有一点点起码的（简单的）公平呢？难道这不是背离了要在劳动人民当中实现平等的约言吗？要知道，只有按照这些约言才能建立起通向社会主义的真正桥梁。

这些议论有时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却有一个根本的缺点，这就是：它们不是对各种力量进行冷静的估计，不是冷静地讨论问题，而是只说一些悲天悯人的话。如果要谈论公平^①的话，那就应当这样提出问题：

^① 这里以及上文和下文所使用的“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及其形容词，有“公平”和“正确”这两重含义。作者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为了行文的方便，下文译为“正确”。——编者注

假使我们稀里糊涂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搞糟了，这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假使我们使资产阶级有可能蒙混我们并且恢复事物的旧秩序，这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只要这样提问题，就能立刻得到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当然，假使我们真的稀里糊涂把社会主义事业搞糟了，那是极其“不正确的”，而且简直是愚蠢的。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不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矛盾，而且归根结底，实现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农民群众都有好处。因此，如果我们由于自己的过错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了失败的话，那么，无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还是从农民的基本利益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失败是我们在政治上的直接犯罪行为。

可是，我们知道而且确信，我们只有在和仅仅在工农联盟的条件下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在和仅仅在实现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的条件下才能走向胜利。我们知道，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即破坏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破坏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保证这种领导。如果说现在还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农民或某一部分农民发生某些摇摆，而且这些摇摆实际上是反对农民本身的根本利益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政治上的某种不平等，以便给予无产阶级某种补充的保障，来保证它的领导作用。

不难理解，归根结底，这种政策不仅不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相冲突，而且恰巧相反，体现他们的根本利益。农民由于自己的落后和愚昧，往往看不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被一些暂时的、表面的，或者次要的、从属的、非根本性的利益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应该善于牺牲这些利益而求得更加基本的和根本的利益。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完全公开地说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向所有的人承认存在着这种不平等；但是，我们同时还公开说明，工人阶级的这些特权只是暂时的，而且将随着

我国农民群众的觉悟的提高以及随着他们的得到改造而归于消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得越远，资产阶级的残余力量变得越微不足道，我们的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式越巩固而且巩固得越迅速，从而，工农之间的经济结合的基础越牢固，从而，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影响越大，——那么，工人阶级对这些特权的需要就会越小。这些特权将逐步减少，最后就会成为完全多余的东西。而无产阶级影响的普遍的进一步加强以及按照社会主义精神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的改造，将使得即使是来自残存的资产阶级分子方面的敌对影响也不能造成危害，这样一来，最后我们就将过渡到实行苏维埃机关的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权的制度。

如果我们进一步展望我们的未来，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那样一个前景：那时候，一切阶级壁垒都将消失，那时候，城乡劳动者之间的界限将归于消灭，那时候，将不再需要一般的国家强制机关（只是要到在全世界的其他国家中资本主义国家都被推翻了的时候），那时候，一切政治都将完全、彻底消亡。这种政治将被代之以仅仅是对社会的经济进行科学的管理和科学的领导。

十五 领导的正确政策的保证和共产党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正确的政策要靠正确的领导来保证，而正确的领导要靠各社会阶级及其组织的完全确定的互相结合来保证。为了切实保证这种领导，便必须使农民跟着工人阶级走，使工人阶级跟着自己的工会走，而使这些工会又跟着工人阶级的先头部队即它的党走，党应当是整个工农联盟中的基本的领导力量。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本身内部的矛盾，我们的庞大的国家的民族成分不同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矛盾。工

人阶级本身内部需要有这样一种力量：它最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矛盾，它高瞻远瞩，能及时觉察到一切危险，它善于在一切发展阶段上使次要的东西服从根本的和基本的东西，并且表现出空前的意志统一和领导才能。

工人阶级的这样的组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先进的部队，它吸收我国工人阶级中最坚决、最有觉悟、最先进和英勇的分子。

正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头部队和全国的基本领导力量，所以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都首先打击它：公开的白卫分子和主张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制度的人，如俄国的白色保皇分子、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其他公开拥护地主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人是这祥；社会主义的隐蔽的敌人和暗中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如孟什维克和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等等也是这样。所有这些人都认为自己的政治任务就是要齐根锯断党这根顶梁柱，使得工人专政、苏维埃政权的整个大厦随之而倾倒，使得工人阶级从十月胜利的最初时日起就已走上的那条道路被彻底堵死。

党的影响的加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对农民的领导作用，那么也就没有工人阶级专政；如果没有党同非党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系，那么就不可能有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工人阶级内部所形成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工人阶级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保证自己对工人阶级的一系列按其成分来说更加广泛的其他组织的影响，首先是对工会这个无产阶级的极其广泛的组织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保证自己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影响，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形式，它依靠广大农民阶层。党通过与非党工人有直接联系的这些组织，保证自己对全体无产阶

级群众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正确领导。

不过，人们可能要问：无产阶级有工会组织，那么在农民那里与此相应的组织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的是那些同在工业中一样、不过是在土地上工作的工人，那么这当然是指雇农即雇佣农业工人；当然，这些人正如其他某些行业的工人一样，有自己的工会是恰当的。在土地上工作的工人的这样的工会是存在的，这就是全俄农林工会。但是，如果我们再问：农民的特殊利益（“工会的利益”）是什么呢？那么，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首先，农民不象工人那样工作，而是在自己的经济中工作，他们的私人经济的利益，是由他们作为拥有自己的经济的独立的小生产者的地位而产生的，这种利益就在于：要更有利地出售自己经济的产品，要更有利地购买由国营工业提供的产品（他们既作为消费者又作为自己的小经济的领导者需要国营工业提供的产品）；最后，要更有利地获得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必需的利息比较低的贷款。农民的共同的根本利益在于，同工人阶级一道防止旧制度的恢复、防止产生新的地主，并且在各农户的合作社联合日益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自己的经济。而所有这些任务都要由农业合作社以及与之并存的象农民委员会等诸如此类的组织来解决。

但是，不应当无视这样的事实，即直到最近农民对合作社运动还不特别信任。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合作社有许多缺点，农民没有在其中找到他们应当找到的东西。

我们的这些缺点是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继承下来的。现在必须坚决予以消灭。首先必须谈一下关于合作社的完全自愿和合作社内部的民主制，即管理委员会和一切负责人员的选举制。农民不会把股金交给，不会把自己的钱委托给完全由上面委派的人。他们希望有他们所认识、所信赖的人。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坚决地

建立合作社，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对合作社感到休戚相关。

为了使合作社能起我们所赋予的那种作用，必须解决两个任务：

第一，在经济上巩固合作社的任务，即积累合作社的“资本”的任务，提高合作社周转额的任务等等；

第二，吸引群众参加合作社建设事业的任务，如果不把群众吸引过来，那么，合作社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但是，如果不实行合作社社籍的自愿和合作社组织领导人员的充分的选举制，就不可能解决这些任务。不言而喻，党在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同时，在选举中必须靠说服来竞选。但是，必须由农民自己选举。那时候，农民群众的主动性以及他们的积极性的提高，就必然导致我国农业合作社的迅速高涨。

其次，必须这样来安排事情，即要使合作社摆脱多余的、应当直接由国家机关去解决的任务。当然，合作社应当与苏维埃政权机关相联系，但是，除了共同的任务之外，合作社有它自己的特殊任务。例如，假使由合作社去收税，这就不对了，正如同假使在城市中由工人的工会去直接执行对工厂的国家管理的任务是不对的一样。假使要求农民作出巨大牺牲的一些任务都压在合作社的身上，那么，显而易见，人家就不大愿意参加了；因此，不应当这样办事。对农民来说，合作社应当成为他们的经济高涨的机关。那时候，在保证选举制和自愿的条件下，合作社就会成为农民十分喜爱的组织。而它在与工业和一般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联系中就会实际上起现在我们党赋予它的那种作用。

活跃苏维埃和使合作社运动高涨，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如果党以及——与党一道，并且通过党——工人阶级加强了自己对农民群众的影响，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我们这里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我们已经说过，即使劳动农民也有人们通常所说的“两个灵魂”：一方面，他们是劳动者，他们同地主和资本家作斗争；另一方面，他们是私有者，一旦发了财就不反对自己雇工，因此，他们对大私有者即资产阶级怀有某种敬意。这是第一。第二，农民中有各种不同阶层，从被剥削者起到剥削者止（贫农和富农；靠部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挣点钱的半雇农和雇佣他们的人即有钱的、富裕的所谓“富豪”）。当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且影响他们的时候（直接地或间接地，直接地把农民吸收到自己的行列中来或者通过自己对合作社、农民委员会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农民），那么，共产党就是在组织农民的劳动的灵魂，它通过合作社逐步地把农民引导到共同劳动的轨道上来；它通过苏维埃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的政府事务，通过党组织按照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和任务的精神直接改造农民，——以此使农民习惯于共同劳动。假使在农民中产生了反对共产党的另一个党（不管用什么名称），那么这个党就可能而且必然会只具有一个意义，只会起一种作用，它将千方百计地加强和组织农民的“非劳动的灵魂”；它要组织和加强的，恰恰是农民的那种接近资产阶级的倾向；它要精心爱护和培育的，恰恰是体现农民的这种摇摆性的特点，有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特点；由于事物的进程本身，它必然会“挑动”农民的暂时的和次要的利益去反对根本的和基本的利益，“挑动”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去反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挑动”富农的习气去反对无产阶级的团结性；它不仅不会缓和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摩擦，反而会加剧这些摩擦；它不仅不会实行工农联盟和自愿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的路线，反而会把所谓“摆脱”无产阶级的领导作为自己的任务，这实际上无非意味着由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劳动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妥协党）来影响农民和领导农民。

由此可见，工农事业的胜利要以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但是，这种领导又必须依靠苏维埃和合作社的大力巩固，必须依靠工业的高涨。将来，当这些任务正确地解决了的时候，——那时候，农民就会重新相信，从农民的根本利益来看，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如同空气一样是不可缺少的。

十六 国际革命和苏联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从我们的内部的观点研究了所有的问题。可是，要知道，我们决不是单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它们害怕我们的成长，它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迄今为止，除了在我国之外，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工人阶级都未能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取得政权。因此，很自然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问题：没有其他国家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直接支持，我们能不能在我们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呢？

我们已经在一个国家内夺取了政权，我们已经打退了从四面八方我们进逼的敌人，我们已经开始了我国的经济高涨，我们已经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但是，我们有没有使得外国的吸血鬼不会进攻我们、不会发动任何新的“干涉”的保障呢？只有无产阶级在其他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胜利才可能成为这样的保障。因此，我们的利益永远是同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殖民地的被压迫农民（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义愤填膺的斗争中削弱我们的凶恶敌人的力量）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我们党不再是国际革命的党，那么它就犯了背叛和出卖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罪行。时时刻刻都不应忘记，我国的和平建设可能被邻国的突然袭击所破坏。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用我们可以永远高枕无忧了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因此，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劳

动群众——他们是在敌人营垒中最可靠的盟友和有力的支柱——的兄弟般的联系，应当是分不开，打不散的。

根据国内战争的经验，根据支援一切叛乱的反革命将军的资本主义列强过去进行干涉的经验，我们知道，当时国际无产阶级给了我们多么巨大的帮助，因为它时时刻刻拉住本国资产阶级的后襟，不止一次地阻挠本国资产阶级在我国顺利地进行罪恶勾当。大家都知道，法国水兵在敖德萨举行过起义，大家都知道，一些英国部队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上撤走了，大家都知道，欧洲的工人群众曾屡次阻止我们的敌人运送军队和弹药来镇压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般劳动者的团结，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用来安慰自己、可以用来在节日开开心心的红色的字眼。不，这是一个最现实的东西，它对于我国的整个命运，我国的整个未来、我国整个发展道路的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防止外国军队用刺刀在我国恢复旧制度的最终的保障，只能是国际革命，我们党应当是国际革命的信仰者、拥护者、承担者。

不过，我们会不会命中注定不是亡于外来敌人的侵略，而是亡于我们自身的落后呢？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因为得不到其他国家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因为在很长的时期内得不到这种援助，而必然成为自身落后、自身在经济上的软弱的牺牲品呢？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其中农民居民占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人数不多，而且它在长期的帝国主义和国内战争中又被削弱了，——这一切会不会以“铁的必然性”导致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的失败呢？

这样一些表现出极其不相信我国革命力量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毫无根据的。诚然，没有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可惜它们还

没有取得政权)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我们的经济高涨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进度会大大延缓。如果能得到这种额外援助的话,当然,我们就会在经济高涨的道路上非常迅速地向前迈进,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就会比较迅速地开展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门科学以及所谓“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当然,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在自己的发展中将进展得比较缓慢,但是,我们毕竟会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摆脱国内战争和战场上的直接工作以后最初几年的经验,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提高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力的同时,我们看到,我们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形式以及正在越来越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经济形式,正在日益增长。决不能说,在以形形色色的私人企业资本为一方和以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为另一方的经济斗争中,私人资本正在成为胜利者。恰巧相反,我们知道,私人资本正在相对地退居次要地位,经济命脉正在变得日益强大,日益雄厚,因此,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向前迈进。如果说,在和平时期的最初几年内社会主义事业就前进了,那么,说今后我们会倒退,这又有什么根据呢?哪有一点一滴或者一丝一毫的证据,说明在今后几年内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条件会比在我国经济高涨的最初年代更加不利呢?恰巧相反,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证据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倒可以指出一系列的理由,说明今后必然会取得极其巨大的胜利。一般大生产的优越性会日益显示出来;国营经济由于它的计划性——即有计划地、最适当地利用这一经济中的一切物质资料和劳动力——的加强,将会更加节约和具有优越性;国家政权掌握的资金将越来越多,它将有可能通过建设合作社更加广泛地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以及如此等等。

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即使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

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我们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诚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近时期内，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必然是落后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不过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即使这些形式也会保证我们越来越朝着日益完善和日益完全的社会主义形式前进。

必须记住，即使在数百年当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在其发展的没落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尽管已达到如此的高龄，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各种不同的所谓“民族特点”。美国的资本主义现在就和法国的大为不同，德国的也和英国的大为不同，如此等等。美国的资本主义具有突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与本国工业的强大组织（托拉斯）结合在一起的银行在其中占统治地位。法国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国内工业不甚发达的、高利贷类型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把钱借给其他国家，剥削那些国家，这种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国内的生产活动非常之少，在它的怀抱中小农经济还有栖身之所，可是，例如在英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种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把自由农民的经济吞噬了，已经把世界掠夺者的特点同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活动结合起来了。俄国资本主义同样也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首先在于，如果拿全国总的国民经济来看，我国的一般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得较差。这表现在：在俄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小农经济、半农奴制类型的地主老爷（不是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地主）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大资本在其胜利进军中还远远没有来得及吃掉的小工业（作坊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也具有重大意义。但与此同时，如果仅仅拿大工业生产来看，那么在这种大工业生产领域中，所谓的“巨型企业”（工人人数超过1万，如莫罗佐夫工厂、南俄钢铁厂等工业巨人）占很大的比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资本的影响，外国资本在我国办了一些往往是用西欧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大企业。

可怕的、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后，同西欧

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的这种结合，就构成俄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的特点，构成它的所谓“民族面貌”。

但是，要知道，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从空地上开始的；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开始的，而工人阶级所得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给它留下的遗产。根据以上所述，十分明显，这种遗产在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说，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资本主义具有各自的特点，那么，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在世界各国溶合成为一个整体以前，也必将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以前的发展的特点产生的。过去在我们这里存在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同极其落后的经济形式的结合，这必然给我国正在建设着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打上自己的烙印。由于存在着小商人和小企业主，所以，即使在我国的制度下，他们仍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存在着在我国具有极其巨大的经济意义的非常广大的农民阶层，所以，第一、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相当长的，第二、作为农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的农业合作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由于存在着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无产者的大企业，所以，在我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完全可能的。

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如果不说殖民地的话），例如在英国，农民经济的作用非常微小，在那里，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必然会是另外一些形式，而且发展的进程会比我们的速度快得多。相反地，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西欧无产阶级将要面临的对于过去的殖民地（在那里有大批农民居民）的任务，那么，那里的许多任务和许多经济形式，将与我们正在解决的一些问题和任务相类似，将与我们的建设中采用的一些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相类似。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落后的形式，对此我们丝毫也不应当感到难以为情。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可以满怀信

心：我们现在具备种种可能性以便不断地向前迈进，以便使这些形式臻于完善，以便消灭我们的落后，以便更加迅速地过渡到真正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类型。

现在，我们的国家才刚刚开始摆脱真正可怕的贫困，任何安于现状或者要开始休息的想法都是极其荒谬的。我们还要消灭还很可怕的贫困、饥荒的残余、肮脏、愚昧、野蛮和因循守旧；但是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的面前摆着一条广阔的、正确的道路，我们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达到我们的最终胜利。

写于 1925 年。译自《俄国到社会主义之路》，
纽约 1967 年俄文版第 317—353 页。

革命面具下的凯撒主义

(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书)

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这本书已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推荐给了《真理报》读者，其实，从我们方面来说，这本书也同样值得予以注意。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宣传是着眼于具有高度修养的读者，着眼于这样一些人，对这些人可以拍拍他们的肩膀加以称赞说：

你一面慢慢啜饮，

一面静听着自然神教或无神论，

象一个倾听雅典诡辩家的好奇的野蛮人。^①

我们这位哈尔滨的，不，雅典的哲人是在用“上帝的语言”说话。的确，他是一位不太坏的文体家，他擅长于为“现实利益”描上一层既华丽而又恰到好处的语言花纹，有时甚至带有一种独特的路标转换派的激情。但是，这面以巧妙的手法把“不可思议的东西”，把“历史的理性”，把施本格勒连同索洛维约夫、列昂诺夫、德·梅斯特尔，把黑格尔，把许许多多其他东西都统统吸收入其内的文学花纹地毯要想把“现实利益”掩饰起来，那当然是非常勉强的。为了从乌斯特里亚洛夫那里摸索到真正的阶级真理，需要进行大量的练习，要善于了解敌人，把敌人从最遥远和最深邃的洞穴里揪出来。这里只是骂他一通是不够的。这里需要对他进行论证。因

^① 引自普希金的诗《致权贵》。——编者注

为我们是在同最危险的敌人打交道。这不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类的庸俗的空谈家。这是一些思想家，事实上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体系，尽管有时外表打扮得很不相称。这是这样一些思想家，他们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我们发展中的内部矛盾，并想在我们家里用慢性毒药把我们毒死。他们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要清醒和狡猾得多，尽管他们迷恋于神秘主义、上帝和其他愚蠢的东西。

你说得对，菲尔斯令人讨厌，
他妄自尊大，仿佛经纶满腹；
对于一切他都傲慢地予以批评，
他无所不晓，只是一知半解。
我爱你，我的邻居帕哈姆，
你简直是傻瓜，感谢上帝。^①

普希金所说的那些菲尔斯的确“令人讨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去啃嚼这种令人可疑的理论果冻。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打开了一面五颜六色的路标转换派意识形态的扇子。在提请读者注意的这篇文章里，我们自然不可能全面进行反击（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在以后来做）。因此，我们这里只涉及一些最“紧要的”问题，以便对那种想要把我们慢慢窒杀的可怕企图加以反击。

一 世界危机与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如果说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会绕过这个基本问题即我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问题，那当然是很奇怪的。要知道，任何人都明

^① 引自普希金的诗《善良的人》。——编者注

白，无论我国的一般命运，还是我国发展的具体阶段，无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一世界意义。要回避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尤其因为每时每刻都有以百万计的声音在大声谈论这一问题。

“当然，——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写道，——我们时代的巨大危机并不以政治、法律和整个外部社会结构的计划为限。它来源于精神深处，并落脚到精神深处。在这之外，它是没有力量的，它的冲力是它本身的保障。精神的即人类的组织正在蜕化。”^①

读者并没有为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这种拚命硬要往精神深处钻的癖好而感到难为情。这已经是那些“有学问的菲尔斯”所惯用的“说话方式”和“行动方式”。这里对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指出：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承认世界危机的无所不包性（“人类”，不仅是“外部结构”，而且还有“精神组织”）。

这很好。有意思的是应当问一问这位同“历史精神”关系密切的作者，他既然看到人类的物质组织和精神组织都在蜕化，那么这种组织究竟是在往哪一方面蜕化呢？全部问题也正是在这里。要知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切其他问题。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是位黑格尔爱好者。但是黑格尔也要求具体分析，不然空洞的抽象就一定会开始生病，然后全部死去，成为无论对“精神”，还是对人们和自己本身都是毫无用处的东西。

值得了解一下，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怎样想的呢？

噢，读者，您别以为答案很简单。因为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答案不是一个，而是整整三个。

答案之一：

^① 《革命宗教》第280页。

“当然，如不考虑俄国经验的世界意义，那就太近视了。有很多根据确认，俄国革命为整个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它是按‘89年伟大原则’生活的‘旧世界’的第一次激烈痉挛。但这还绝不是说它的最高要求如今已经全部实现。

世界历史正在向社会主义，即向自己的下一阶段前进，但是这条道路是漫长、曲折和渐进的。”^①

好，那我们就来大致谈谈这个答案。例如，世界历史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此外，它不只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是它的下一阶段。换句话说，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是在直接、准确和明白地说，紧接帝国主义之后，“下一”阶段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当前的世界历史危机在使“人类组织”向社会主义方面蜕化。所谓道路遥远、艰难、曲折等等，——这都是老生常谈。谁要来争论这些呢？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在于指出，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历史“精神”倒是需要我们作一番苦思。

例如，在上面援引的那段话稍前几页，我们看到这样的话：

“《路标转换》杂志不相信快速的共产主义。它的作者没有一个人是社会主义者。《路标转换》杂志遵循的首先是爱国主义思想。正统国际主义和阶级的(！)(惊叹号是我加的。——尼·布·)意识形态对它说来是异己的。”^②

谁(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也没有请求人们“相信”“快速的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只是请求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历史似乎就是这样引导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是怎样说的呢？剥开皮来看，他的思想就是：“由于历史在导向它的下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因此，无论是我，还是我的任何朋友，都不是社会主义者。”路标转换派先生们，你们多会开玩笑呵！

^① 《路标和革命》第48页。

^② 同上。

但是，这里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问题的实质在于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需要社会主义，就象他需要刺眼的烟草一样。下面就是令人信服的证明。

答案之二。即：

“现代欧洲气氛中感受到的那种凯撒主义气息，并不是什么最新发现。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认为。我仅仅是确认了它的存在。我清楚地看到（真有你的！——尼·布·），它比现在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要来得更深刻、更不偶然。它并不会带来人间天堂，因为人间天堂根本就没有，而且以后也不会有。但是，根据许多迹象来看，它本身将是‘世界历史的下一阶段’。”^①（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总之，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用同样的词句（“世界历史的下一阶段”）向我们预告的是凯撒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他果真在鼓吹凯撒主义，真是英雄！的确，他在有些文章里断言，社会主义恰恰是在凯撒主义的形式下才是可能的，这里可以划等号。但是，既然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本人“相信”这样的论断，那他为什么要放弃社会主义呢？不，“这里另有打算”，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需要社会主义仅仅是为了伪装。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答案之三。这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答案”。

“我们当代人了解不到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但是我不能不感觉到我们是生活在某种广大的历史边沿，即处在时代的交叉点上，摆在面前的是文化的重新估价，以及各族人民的交替。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表现了转折和危机现象。为了暴露正在发生的历史悲剧的深度，无论外部观察还是内部直觉都

^① 《争论的公理》第 264 页。

被溶合到一起。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一致确认整个人类生活广大领域的无穷性，并在预测新的、还不好具体确定的领域的诞生。”^①

这又是一个答案。总之，应有尽有。如果需要拒绝回答，那就说，是存在“当代人所了解不到的”“不好确定的领域”。如果需要给资产阶级以安慰，需要给它以支持，那就说，“我清楚地看到”凯撒主义。如果需要欺骗工人和农民，那就说，社会主义是“下一阶段”。就请大家从这些“历史精神”的奇怪舞蹈中自己去辨认吧！

“说话要诚实！”——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教训梅烈日柯夫斯基先生说。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自己也应记取这样的劝告。因为事实上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小丑般的轻浮！这是在回答重大问题时所玩弄的一套捉迷藏的游戏！这是一种用假面具掩盖着的可怜的胆小鬼思想，他把自己时而装扮成布里丹笔下的驴子，时而装扮成社会主义预言家，时而装扮成一个出面欢迎未来凯撒的宫廷代言人！

共产主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题。不是指“一般”危机，不是指柏拉图式的危机“思想”，不是指“概念”，而是指实际的、如今具体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整个巴比伦尖塔的实际危机。资产阶级的王国正在开始出现裂缝。请记住白朗瑞^②的话：

“我们把神灵和庙宇，
把终身、童年、香火
和布满祭坛的朵朵鲜花
统统献给了希腊神。

^① 《欧洲的命运》第 331 页。

^② 白朗瑞是十九世纪前半叶法国的人民歌手和王朝复辟时期的革命诗人。——编者注

在哈雷人们为了我们，
流过多少鲜血！
如今我们——在农村一无所有……
我们的王国已成为过去。”

但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只是在唯一的一页（第48页）上同意这一点。在其他页上，他宣扬的完全是另外一套。就象把什么都“捆到一起”一样，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巧妙地一下子就把一匹“公马”和一匹“胆怯的母鹿”套在“一辆车上”，从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

“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在于推翻了十九世纪形式一民主国家的基础（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尼·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真正胜利的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在真正的反议会主义的‘方括号’里，可以看到（说起来真奇怪！）同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的有墨索里尼、已故的斯塔姆波利斯基、仍健在的察恩科夫、基马尔、霍尔蒂、里韦拉，实际上还有彭加勒本人。”^①

由此说来，“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那个把霍尔蒂和彭加勒同列宁放在一起的“方括号”里。没有二话可说，这位教授先生的“精神”飞得真叫高！奇怪的只是为什么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不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旧好——陆军上将高尔察克也塞到这个名单里去，因为后者对“形式一民主国家”的基础也同样不怀好感。其实，这种羞羞答答是没有任何逻辑根据的。因为高尔察克比察恩科夫有什么“更坏”？他比霍尔蒂有什么“更坏”？不管是从阶级的角度看，还是从崇拜一定的“国家形式”的角度看，或者是从政治行动的方法的角度看，都是没有任何

^① 《第六个十月》第252—253页。

差别的。

这位尊敬的教授为什么要把那位西伯利亚将军隐匿起来呢？这是因为如果用大叫大嚷的形式把他拿来同列宁对比，就会暴露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荒唐行为的全部“用意”。对于乌斯特里亚洛夫说来，重要的在于从法西斯的凯撒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出发来否定民主。他的全部意图在于为苏维埃政权的专政形式塞进资产阶级内容，以便象在保温箱里孵化小鸡一样，在苏维埃国家的内部及其双翼下面培育出一些高尔察克来。为此，他就要拼命地把列宁和霍尔蒂放到一起。这一动机并不新鲜：我们从所有的敌人那里都能听得到，甚至不久前我在一篇针对考茨基的著作中也被迫具体分析过这一动机。

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所谓理论的“合理的内核”表现在哪里呢？在于在危机时代，特别是在内战时期，要求有专政的形式：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仅仅如此而已。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想做什么呢？乌斯特里亚洛夫想“离开”阶级内容，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之间划上等号。不用说，这是最妙的方法！

试看我们从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那里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果。例如，以列宁为首的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与以彭加勒为首的法国内阁等同起来。真有意思！真是绝妙的发明！只是为什么十月革命会在全世界那样轰动，为什么数百万的世界人民群众会在它的生气勃勃的光辉照耀下行动起来？为什么彭加勒内阁没有引起这样大的影响，为什么彭加勒的制度使人们竭力想要推翻它？难道乌斯特里亚洛夫，这位把形式与内容分割开来、根本不了解我国伟大革命真实意义的诡辩家真能自圆其说吗？

一个新的阶级执掌了政权。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它正在唤醒西方和东方的人民群众。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难道至今还不明

白这一点吗？

后来，当他试图深挖离奇而烦闷的现实时，同样不能自圆其说。有时他不无天才地描写了资产阶级的秩序，在他的调色板上颜色也调得不坏。例如，他对战争和最后一次危机是这样描写的：

“这场不幸的人民搏斗从始到终、从维也纳最后通牒到凡尔赛，是何等伪善。这场搏斗通过五年的考验、努力和死亡发现了真正的英雄行为，而似乎连这些行为也被溶合到伪善里去了。好象谎话从来也不曾对死亡、爱情和荣誉开过这样的玩笑。历史上有过用鲜血低偿、洗净、拯救和创造不朽珍品的事例。但是如今它却变成了‘超额利润’，它不再是‘完全特殊的汁液’。战争过后，和平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战争落得了一场空。仇恨在延长，谎话和伪善在延长。有人还企图用谎言来焊接和胶合业已解体的文明，拯救文明的人类。但是谎言也变得卑鄙下流……代替坚定信仰的是华而不实的自由主义的长篇‘说教’。代替神圣罗马帝国的是国际联盟。”……①

例如，导致“不幸”战争等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超额利润”，即帝国主义。不是这样吗？于是如今发现，摆脱危机的出路——不仅是列宁，而且有彭加勒都认为，——就是“彭加勒——战争”，这正是从乌斯特里亚洛夫对十月革命的“主要”意义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大家摆脱战争的出路：彭加勒——战争将从战争中拯救“人群”！大家真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三棵松树之间迷了路！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阵地的不牢固性，同样，这绝不意味着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这一点

① 《欧洲的命运》第 332 页。

上不想故意把烟灰往眼睛里撒，并装出一幅殷勤而吃惊的样子看着这场“痛苦”。他提出了一个“当代棘手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原则上建立政权？并且回答说：“需要一种思想。但是靠现在的欧洲人很难办到。”^①可见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这方面认为“有一点是对的：只有某种新的巨大动机、某种新的宗教高潮才能带来复兴”。^②

接着他便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它有可能吗？它会到来吗？它将是什么样子？谁知道呢？谁说得准呢？……我们经历过的这场世界大战会不会象旧时欧洲死前第一次可怕的痉挛那样留在后来数代人的记忆当中呢？那次痉挛就象在我们这一世纪的基础上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使中世纪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也横遭摧残……”^③

总之：

遍地黑暗，

遍地黑暗，

准有怪事，

准有怪事。

读者，你们明白吗？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清楚地看到”凯撒主义。如今他又打了个大问号，以自己的战斗精神一头潜入高深莫测的神秘主义，期待着某种巨大的宗教动机。从前他“主张”社会主义，而今他突然发现，欧洲人（所有的欧洲人）没有这样的思想。记住，以后再找我们这位预言家算账！毫无疑问，他的欲望的真正核心事实上是法西斯的凯撒主义。可是我们这位艺术家搞了多少假象和花招！就象一只急于逃脱猎手的兔子，为了把人弄糊

① 《欧洲的命运》第 339 页。

② 同上，第 340 页。

③ 同上。

涂，故意做了一个“绳套”，在那里跳来跳去，乱作一团。但是这种狡猾的手法往往是无济于事的……

除了上述关于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和世界危机问题以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宣布了形式民主的破产。

“世界上的傻子多的是，而你们却争取到了普遍投票！——卡莱尔^①大为伤心地说。

在民主原则高度繁荣的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它的触目惊心的堕落，它的发人深思的尾声，这究竟有什么奇怪？……群众脱离了同自己的直接政权的联系（着重号是作者加的）……他们……急急忙忙地把这一最高政权让给积极的先锋队，即他们本身中具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由此就产生了对俄国的列宁、对现在的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崇拜……并且出现了新的贵族政体，即就其自身是人民的而在实质上是先进的贵族政体——黑骨和茧手的贵族政体……”^②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真是个狡猾的人！事实上他在上述引文中耍了多少惊人的花招！“群众脱离了政权”，从而实现了由形式民主向凯撒主义的过渡。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就是这样描写的。但是，且慢！在形式民主的条件下群众掌握了政权，哪里有这等事？这是指普遍选举权吗？这就叫群众政权形式吗？那不是说在美国群众“掌握了政权”吗？那不是说在战前群众在法国也掌握过政权吗？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第六个十月》的山口上作了惊人的发现！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好心地和不少根据地把霍尔蒂和彭加勒也归到形式民主制度的破坏者的美好行列

^① 卡莱尔·托马斯(1875—1881)，英国历史学家，鼓吹崇拜“英雄”，轻视人民大众。——编者注

^② 《第六个十月》第253—254页。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里，那么我们这位路标转换派的理论就它的那种“伊洛瓦伊斯基^①式的”天真情况来说是十分动人的：在十九世纪，群众到处都掌握了政权，而到后来又把这一政权转交给了彭加勒、霍尔蒂、墨索里尼这样一批人的“茧手贵族”。墨索里尼同罗马教皇、国王、意大利银行和将官们结成联盟，实行“黑骨和茧手贵族政体”。真是一位至圣的罗马神父！永不犯错误的教皇！请用你那有灵的手来为这场表演祝福吧！

但是透过这些狡猾而虚伪的关于“黑骨”、“茧手”和来自“下层”（“自己阶层”）的领袖人物等等的谈论，流露了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真正热情：世界上的傻子多的是，即群众——这也就是“傻子”。他，即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所以不喜欢形式民主，不是因为这种民主实际上不让群众过问政事，相反地，他之所以憎恨形式民主，是因为它尽管是形式地，但毕竟是承认“傻子”的权利。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无怪乎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把他心爱的一段对话作为他的这篇文章的题词：

——将军，国会反对您！

——是的，然而国防军拥护我！……^②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既不了解（或者假装不了解）墨索里尼同列宁的区别，也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实质。他不了解苏维埃政权在克服形式民主的同时，它本身就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民主。如果说霍尔蒂、彭加勒、墨索里尼的专政是缩小下层发挥积极性的范围，那么苏维埃政权却是在空前地扩大这一范围。群众的热情对我们来说是主要的东西，而对于彭加勒先生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不起！）甚至对于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来说，则是“傻子”。所以说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就在于它唤醒了空前广泛的人类阶层。

^① 伊洛瓦伊斯基，俄国反动帝制派历史学家。——编者注

^② 《第六个十月》第252页。

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愿望相反，群众决不想交出除了在我国之外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那种政权。群众渴望夺取政权。忽略这一点，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和甚至它的形式，就等于根本不懂得我们眼前发生的、唯一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的这场具有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变迁。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却在抱着凯撒主义不放，唉声叹气，左眼斜视着社会主义，同时又在向上帝、向苏维埃暗送秋波。

老预言家伊赛亚说得好：“痛苦属于胆小和手软的人，痛苦属于徘徊于两种生活道路的破戒者！”

二 路标转换方针。苏联的经济“蜕化”

大家知道，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主要“思想”在于断言布尔什维主义、它的经济、它的阶级基础、它的政策、它的国际意义的蜕化。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非常希望列宁的精神能够说：“我撒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此外，在乌斯特里亚洛夫看来，这些“跳蚤”还会组成新俄罗斯将要使用的一个伟大的新词汇。结果发现，俄国资产阶级漂泊在江河里，虽说不是在巴比伦的江河里，但毕竟是离莫斯科河或涅瓦河相当远的地方的江河里，他们只能靠下面的回忆来生活：

我本来生活得多么开心！
火热的青春呵，你在哪里？
我那洁白的小手，
我那漂亮的小脚，
又在何方？

但是且慢！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资产阶级面前展现出一幅新的远景，如同山峰上的太阳焕发出灿烂的光辉。诚然，他的情人

已不是原先的资产阶级，而是新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来用刀子刮、用刷子刷和用水洗掉自己身上最初积累下来的那些又臭又脏的东西。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看来，只要几年的时间它就可以把自己洗刷一新，并为自己打上发腊，用路标转换派的各种思想药品把身体加以滋补，在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伟大宗教动机的庇护下，偷偷地潜入新俄罗斯的天国，潜入私有制、资产阶级专政、坚强的爱国主义和身强力壮的武装起来的富农的堡垒里去。大家知道，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并不主张用武装来突破布尔什维克的城墙。他主张“国家克服革命的第二条道路，——通过革命本身的道路”。这将是（据乌斯特里亚洛夫说，现在已经存在）一条

“革命组织本身的渐进的有机蜕化的道路。红色中心被物的力量和权的逻辑卷入国家工作，并自动地服从国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国家通过列宁的独特方式变得象一只四季萝卜，仅仅表皮是红的，而内部却象雪一样白。”^①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1921年），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指示说：

“为了拯救苏维埃，莫斯科以牺牲共产主义为代价。”^②

他在另一篇文章（《小萝卜》）里友好地拍着“伟大空想主义者和伟大机会主义者列宁”的肩膀说：

“祝你成功！”

现在，列宁的“新政策”的动机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策略本身。对它不能不表示欢迎。^③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对列宁的“新政策”表示欢迎的同时，

① 《脚下是无底深渊》第1—2页。

② 同上，第9页。

③ 《小萝卜》第12页。

在同一篇文章里又坚决地声明说：

“唯一可靠的道路就是中心的变换。”^①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看来，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起，便开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化”、它的全部路线的蜕化。乌斯特里亚洛夫接着应用自己的所有文章来证明，这种蜕化是如何发展的，这位哈尔滨的教授是位多么奇异的预言家，“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是一些什么样的怪人，“创造性的资产阶级”分子表明自己是一种多么出色的历史因素……

后面我们将把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全部言论加以比较，因为他“至今仍然相信”，“主要的直觉”是“骗不过”他的（四）。现在我们想谈谈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论据，并且首先谈谈他所喜欢说的经济“计划”。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著作在有一个地方以鄙视的口吻谈论那些“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但是恰恰是他在经济学方面是最自以为是的。因为正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这方面，即在“物质基础”方面大丢其丑。他预言的“直觉”象吃了败仗而萎靡不振。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并没有发现这一点。这种情况不是再一次地证明了“老调重弹和惯说谎话一个顶俩”这种“俄国精神”的本性吗？……

遗憾的是，有时甚至共产党人也会忘记在分析各大经济领域（例如农业领域）时所必需的基本方法要求。有些人以为似乎不研究农村同城市的联系，不研究农业同工业、运输和信用部门的联系，也能正确地确定总的发展道路。他们把农村看成某种孤立的和密闭的东西，就象著名的“斯芬克斯”^②那样，其本身的发展是由

^① 《小萝卜》第18页。

^② “斯芬克斯”指希腊神话中狮身或狗身女首女胸的有翼怪物。这里泛指不可理解的怪物。——编者注

与整个国民经济规律毫无关系的特殊规律支配的。这种贫乏的观点不止一次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毁灭性打击。它象一个粗糙的不倒翁再一次地站起来，以便尖声怪调地重复它“内在的”蠢话。如今他们认为有必要立即出来为它帮腔。要知道，恰恰是列宁早在对考茨基的批判文章中就提出了联系“总的演变”进行分析的要求。

诚然，上帝和读者要求我们做的决不是抒情式的退却。作为向敌人进攻的有力跳板，这样的“退却”对我们说来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听听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总的演变”是怎样说的。我们把谈到工业的所有地方也摘录下来。

在小册子的第 97 页上我们可以看到：

“共产主义国家”在同个人主动性、私人利益自由竞赛和自由竞争的舞台上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在“诚实的战斗”中，唉（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你何必“叹气”呢？——尼·布·），它证明了自己的无能。^①

在 101 页，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未来直截了当地预言：

“用余粮收集制的办法未能把农业组织好，用‘国家—社会主义’措施也不会把工业重建好。”^②

在 111 页：

“工厂的汽笛被非国有化和‘经济核算’唤醒。”^③

在 119 页，仍然认为：

“‘国营工业’（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看来，这个引号加得一定非常恶毒。——尼·布·）可怜无力经受同日益康复的个人主动性的竞争。人们普遍反映，‘重工业’——共产主

① 《革命的逻辑》第 97 页。

② 同上，第 101 页。

③ 《一周年》第 111 页。

义经济最后一架进料机——经历着不断发生的危机。它顽固地不顾‘自身补偿’，而国家也无力给它补贴。官僚主义、因循守旧、贪污盗窃——所有这一切都是经济怪物形影不离的伴侣。只有抛弃这种经济，才能战胜这些现象。”①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我国经济作了这样的描绘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下面这样的令他非常快慰的结论：

“革命的俄国就其社会实质来看，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私有者的国家。”②

其次：

“如果不怕说得过份，那就不能不强调指出，现今的‘共产主义的’俄国在客观上是现代‘资产阶级’欧洲中最缺少社会主义的国家。在英国或者说在捷克，由于它们有工人立法、财政政策 and 日益加强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等等，它们的‘国家社会主义’趋向比起破产的、手工业化的、幻想着‘原始积累’的俄国，情况要明显得不知多少倍。”③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就是这样批评革命的。根据他的想法，这种“诚实的批评”“将对国家有利，将是促进业已开始的革命蜕化的因素。”④ 亲爱的，不要追求任何共产主义。最好是慢慢地向熟悉的资本主义方式前进！如果愿意的话，不妨把小萝卜的粉红色外皮保留下来，只要你的内部是白的！

“相信我吧，”老太婆继续说道，

“柳德米拉难以找到，

她已经跑到了很远的地方，

① 《玷污》第 118 页。

② 《革命的逻辑》第 96 页。

③ 《关于我们的意识形态》第 151 页，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④ 《三种斗争》第 60 页。

我们俩别想把地找到。
在世界上乱跑真危险，
将来一定会弄得狼狈不堪。
还是听从我的奉劝，
掉转马头悄悄把家还。”^①

但是，不管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如何用自己的“天才动机”来施展自己的催眠本领，摆在我们面前的却不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路标转换派的梦话。

事实上在那些可敬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宗教眼光里情况是怎样的呢？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农村大模大样地分离出一批富有者和富农。健康的资本主义在被封建主义的腐败物喂肥了的俄国土地上象怒放的花朵一样，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城市，国营工业不断失败，“私人主动性”节节胜利，被奴役的资本挣脱了最后的枷锁，新资产阶级丰满红润的脸上挂着美制的大圆眼镜闪闪发光，如同新生活的太阳悬挂在俄国的地平线上。

当然，这种情况要想存在，除非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和使存在的东西不存在。

在1921—22年，还是允许有动摇，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路标转换派的人物。关于这类人，只能这样说：

“橡树林里最微小的声响，
流水欢快的歌唱，
黄雀飞过的声音，
都把他吓得浑身发烧出冷汗。”^②

“发烧出冷汗”一说当时尚可原谅，但是1925年再说这种胡话——就象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我国经济所胡扯的那一套，那

^① 摘自普希金的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编者注

^② 同上。

就是不可饶恕的了。对于最起码的无知、严重歪曲现实和粗暴抵毁明显真象的这种可耻行为，要想用一种华丽的蛊惑人心的文体来把它掩盖起来，那是不行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无论如何也不能拿他在前言中所讲的他那种经常出现的错误来为自己开脱。这里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基本路线：是前进还是后退，我国经济史的发展遵循资本主义规律还是社会主义规律。只能如此。你说什么共产主义国家“连连失败”。但是，尊敬的教授，这个计谋失败了！

“用国家社会主义措施不可能重建工业”？这个计谋也失败了。

“国营工业可悲地经不起同起死回生的个人主动性的竞争”？这同样是胡说！

“重工业……经受着接连不断的危机”？你的这张王牌完蛋了。这种意图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阁下，它是被无产阶级打败的，而无产阶级在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英明动机”的神秘眼光里几乎是不屑一顾的。的确，这些“直觉”是“不欺骗”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

与其读那些“直觉”，不如看一下平淡的统计数字。在研究考茨基先生的卑鄙的小册子时，我们曾不得不对事实真象作具体的数字分析；我们要使读者也来作这样的分析。这里不妨援引一些比较近的数字，也就是国家计委公布的数字。

到 1924—25 财政年度一开始时，全国资产总额分别为：

国营	117 亿切尔文卢布	} 122 亿
合作社	5 亿切尔文卢布	
私人(主要是农民的)	75 亿切尔文卢布	

由此可见，全国总“资产”中 62% 以上都已公有化。可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是怎样说的呢？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预言”，“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主义最少的欧洲国家”！当然，“各有各的古

怪念头”，但是，如果这种“念头”想为“人所共知”，那就不妨让这种念头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如果说在经济破坏年代我们避免同(非法的)“私人主动性”进行实际竞争，那么在现在，我国国营经济已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比重，并千方百计地影响着小农经济，越来越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结果。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核心的加强和这一核心的发展是不容任何怀疑的。但是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观念里，这个基本事实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但是这象什么话呢？如果不根据幻觉家的标准来看待问题的话，这让人怎么说呢？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非常轻易地”把“国家资本”的62%丢掉了。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更为“轻易地”把国营经济的比重的增大也丢掉了。这位教授先生竟有这样的“勇气”，竟连自己思考最起码事物的可能性都不要了；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在他关于我们破产的经济、富有的英国工业和关于英国(我们的对立面)的“社会主义”的言论里，不仅表现了对事实的歪曲，而且表现了对经济科学起码知识的无知。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从自己的哈尔滨瞭望台的高度以鄙视的眼光来注视着我国的工业。“这就是社会主义？！看人家英国”，如此等等。这是一种多么幼稚、天真和平庸的混淆概念的行为！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没有料想到的是，关于财富和满足的问题不总是同关于经济类型的高度问题相一致的。美国工业比我国工业无比富有。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美国，工业是资本主义的，而在我国，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其内部制度是不同的，因为阶级对比关系是不同的，因为生产资料是掌握在另外一些人的手中的。归根结底，我们的制度将能够保证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更多的福利。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情况会是这样的，尽管路标转换派在想象的国营工业的坟墓面前流着鳄鱼的眼泪……

列宁同志把我们的国营企业称之为“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难道这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吗？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在严格和准确的意义上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指的是整个经济，即全部经济成份都被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小农经济的海洋就是事实。市场就是事实。货币就是事实。资本主义的工作方式——甚至包括国营企业，——同样也是事实。此外，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困难，成千上万的矛盾，成千上万的“离奇古怪的现象”和“不合理的东西”，情况可说是五花八门。但是，事物的量有多大，应该心中有数。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于量、比例、各种关系，应心中有数！谁若事先把全部国营经济（全国“资产”的62%）丢掉，并叫喊它的失败，谁就是无知。这是在变魔术，而不是在分析。谁若是象牛犊似地跳跃狂喜，以为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谁就是无知。但是，一个职业哭丧婆如果看不到国营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主义的增长，那就更不好，也许要更坏。因为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在我国，社会主义不是“存在”，而是“正在形成”，它——在形成中，它已经有了坚固的基础，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我们工厂的汽笛歌颂的不是“非国有化”！它唱的是正在为自己开辟新的、空前的道路的英勇的劳动颂歌！……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并不反对随手给自己带上社会主义者的面具（在“奋不顾身”的时候，他显然把他写的信条也置诸脑后了）。

我们这位英雄写道：“如果国家不靠私人市场的帮助或者只靠它很少的一点帮助就能主持好国民经济，那当然太妙了（！！）。但是，真能这样吗？”^①

^①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57页。

为什么在你看来是“太妙了”呢？为什么要搞这套假社会主义的伪善呢？为什么要同共产主义大邻居来这套甜蜜的调情呢？如果说可以允许藐视魏宁盖尔笔下的“男”、“女”，那就可以提请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想想不久前在阿·康·托尔斯泰档案里发现的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的英明戒律：

“当你倾慕你的女邻时，
切不可把她的胸部抚摸。
绝不能用她的餐巾
擦你那满是汗水的前额。”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不应用共产主义的餐巾去擦那满是汗水的路标转换派的前额！你谁也别想欺骗，而且这有伤你的体面。

但是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下面的一些思想。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提出自己的问题（“真能这样”，靠私人资本很少一点帮助就能主持好国民经济）之后，他满有把握地回答道：

“……最近三年来，同私人商业资本进行的‘诚实’战争进行得很带劲。但是成效却可怜得很！！”

接着他又预言，

“看看苏联报纸有关苏联现时生活的报道，令人痛苦地相信，对合作社的打算显然可能是腐败的……私人资本的胜利将在俄国条件下深深扎下根子……”^①

我们没有什么能向我们的读者证明说在商业流转中也在——当然是整个说来——系统地排挤私人资本，即合作社事实上被放到首位，因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阴暗预言遭到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与其说是在分析资本的胜利条件，不

^①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 157 页。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这里作了一点保留，甚至请求专家们来帮助这一斗争！这样就提出了对私人资本的全部打算。

如说是他信仰资本。按照菲拉列特大主教的教义，信仰就是“把人想要的东西告诉给人，把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显示给人。”从心理学的观点上看，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的路标转换派指望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垮台的这种“企图”是很可以理解的。他们拼命抓住经济形势中各种曲折和苏维埃领袖人物的各种讲话来使自己相信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

“主啊，我相信！请帮助我不足的信心！”

生活在按照自己的次序前进，跨过各种坎坷和障碍，冲破各种痛苦的矛盾，经历了一系列不流血的与无声的阶级搏斗和各种经济形式的残酷竞赛，咬牙切齿的冷眼旁观的西欧资产阶级看到，不管经济“实体”、形式和关系如何混乱，社会主义胜利的清晰轮廓毕竟是越来越显现出来了。

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的仇恨难道不正是因此而加深了吗？

三 经济学的辩证法。“热月”。“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化”和阶级

总之，我们可以确认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经济学上的“英明的失算”。这位大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聘达^①——因为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意识形态是在向法西斯主义“发展”的，——犯了根本的根本性错误。因此，在实际上，他把路标转换派首领的一切其他“论据”也都消灭了。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想指出路标转换派意识形态之树的这些逻辑分枝是多么不堪一击。

“‘经济战线’正在向国家提出同军事战线完全不同的要求，同时不能不指出，革命用自己的手段是胜任不了经济战线

^① 聘达，古希腊诗人，庄重合唱抒情诗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的任务的，为了克服物质上的破坏，需要有革命的精神面貌的变换（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一年前开始的（这里援引的文章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1922年2月写的。——尼·布·）‘向后方阵地的进军’在不断地继续着，并且进行到真正有保证的和可靠的‘后方’，而从总体上看，已走得不近了。与此同时，经济演变已经进入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演变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法制和甚至政治有了某种变动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①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多半是用夸奖的方式向列宁进攻，他的那套所谓苏维埃政权蜕化变质的说法恰恰是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提出的，因此需要首先指出这种观点的实际不可靠性。请看，“革命的精神面貌”是从1921年开始变化的！在这种“面貌”变化的同时，按照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所希望的方向“变换”着的领导中心的面貌也在按照“伟大的机会主义者列宁”——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从“民族路线”上把列宁和德米特里·董斯科伊及其他“大公——高级僧侣”摆在同一地位，——的命令开始变换。我们现在暂把关于这些实际上的变态问题放一下。被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随意称之为“改变革命面貌”的纲领的那个纲领最初是在1921年形成的吗？

列宁即“新经济政策”的缔造者就这个问题写道：

“‘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②

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新经济政策”这一“新事物”作了这样的解释。列宁说道，这是个“新的”

^① 《会见的意义》第6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7页。——编者注

政策，

“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即对战时共产主义而言。——尼·布·），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有着更多的旧东西。”^①

他接着说：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初期，我们对于经济建设任务的谈论，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要小心谨慎得多……当时我们多少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在我们肩上，由于我国……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不幸这是一个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时期终于使我们相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同以前我们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言论相抵触的。”^②

这些引文不单纯是文字上的改正。它们回答了所谓“新经济政策”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意义。它们也给了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当头一棒。因为事实上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是怎样说的呢？他不是竭力愚弄自己的读者，鼓励资产者，瓦解和毒化共产党人的士气吗？这里有一连串的言论：1917年布尔什维克宣扬过人间天堂、“快速共产主义”和一切人的“快速幸福”。这就是革命的思想面貌。后来，还是同一些共产党人（“当然”，在形势的压力下；“当然”，从理想的动机出发；“当然”，基于他们将来能够补救一切的考虑）事实上完全背叛了当初投入革命时的纲领。他们宣布了一套原则上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就是向“不可避免的东西”的方面的“发展”、“蜕化”和“变换”。“但愿由你主宰”——乌斯特里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4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2、43页。——编者注

亚洛夫先生在向资产阶级制度祈祷着，并在它的形象面前燃起路标转换派的蜡烛，周围的空气被油烟所毒化。但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倒霉的是他的论点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列宁同志在上述引文里对它作了令人信服的驳斥。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恰恰就是我们投入革命时所持的那一政策和纲领。它是革命的思想面貌。它被国内战争的发展和外国武装干涉所破坏。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军事压制方法和对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否定。新经济政策就是回到最初的计划，但它是建立在扩大的国内战争的胜利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学的辩证法。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需要的是全面歪曲我国经济历史的主要事实，以便来迷惑和再迷惑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瓦解他们对我们正在实行的路线的正确性的信念，从而促使我国革命主要领导骨干的真正蜕化。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非常精彩地描绘了他想象中的我们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私人资本和国际资本等等面前所作的不断退却。但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看不见（或者又是假装看不见）我们的退却本身已经包含了用别的方法进攻的萌芽。“我们刚挨过一次打，就开始了缓慢的、有系统的和谨慎的进攻”（列宁语）。我们重整了队伍，开始在新的基础上“缓慢地、系统地和谨慎地”提高国营工业的比重，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实际上的进攻，尽管同时实行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路线上的退却。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两条交叉着的路线，需要作出平衡和总结，并考虑这两条路线，以便确定我们是在退却——只此而已——还是已经在开始前进。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把自己的任务过分地简单化了。他看不到情况的繁杂性及其全部矛盾性。他只抓住了一种倾向（而且绝不是决定性的），把自己反倾向的思想掩盖起来，象一只公鸡振起自己的双翅对着初升的资产阶级太阳啼鸣。但是，阁下，暂且让资产阶级的太阳升起吧，共产主义的甘露定将把事务主义的新资产阶级的“眼睛”腐蚀

瞎……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不断地运用自己的恐吓方法，千方百计地抓住“热月”的可怕的东西不放。在国内战争时期，就有人企图以推翻苏维埃政权来恐吓我们。这个可怜的苏维埃政权真是每一秒钟都在“跌落”（根据白党分子幸灾乐祸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当红军的胜利已成定局时，人们又在开始谈论革命的“顶点”，谈论“不可避免的热月”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主义分子——所有这些都突然变得历史地聪明起来，他们不仅用大量的历史类推法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摆出一幅“社会学家”的神气开始研究对“热月”的各种意义深刻的预言，以便振奋那些在俄国侨民贫瘠的牧场上象牲畜一样被饿得哞哞乱叫的穷途末路的白匪帮。

顺便说一句，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通知我们说，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哲学家研究“热月”的活动老早就开始了：

“记得——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写道，——莫斯科的韦·米·赫（赫沃斯托夫。——尼·布·）教授最近研究了社会学，并发现了一切革命都具有的“典型曲线”和每一种革命所独有的个体曲线，他在1918年春天满有把握地声明：

1) 布尔什维克政府从彼得堡搬到莫斯科就是俄国革命的热月九日，从这一天起，它的曲线不可避免地要开始下降”^①。

现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相信（要做到这点也不难），不管是“典型曲线”还是“个体”“曲线”都未能使韦·米·赫沃斯托夫教授得救；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信徒和实践家都驾驭不了这条曲线，连他本人也以自杀而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本人的破产只能同时说明他的“社会学”和他的实际政策的破产。

^① 《片断》第350页。

但是资产阶级的彼涅洛帕^①仍在继续织补着这块破布，不是别人，恰恰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拼命坚持“热月”，比赫沃斯托夫当年更谨慎地把它发生的时间安排在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并把列宁同志推上头号热月政变分子的高位。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曾和高尔察克联合起来同我们进行厮杀。如今当他忏悔时，他同样在反对我们，但是形式不同罢了：他想依靠“有公职的知识分子”按照资产阶级这一路标转换派的“美丽太太”的样子来改造我们。说实在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令人吃惊地提起了海涅的维斯瓦米特拉国王：

“从前有一个维斯瓦米特拉国王
怀着一个贪婪的欲望，
要用战争或忏悔
来取得瓦西斯达的母牛。

呵，维斯瓦米特拉国王，
你是一头真正的公牛，
仅仅为了一头母牛，
你又忏悔，又厮杀！”

但是我们且不提维斯瓦米特拉国王吧。何况俗语说众口难调，要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资产阶级“母牛”的癖好作斗争是很难的，因为他显然是着了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用逻辑批判的刀子来对付这位路标转换派哲人的理论。

“热月——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写道，——是法国革命的转折点……热月的道路是心灵演变的道路（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尼·布·），它伴随着所谓轻易的‘宫廷政变’，而这种政变在形式上又是在革命权的范围内实现的。这里必须强调

^① “彼涅洛帕”，古希腊荷马作品中奥德赛的妻子，丈夫出走二十年，杳无音信，虽有多人求婚，终不改嫁。——编者注

指出，热月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恰恰也就是革命法国整个风格的改变和由它而决定的雅各宾主义及其‘一帮’的演变（作者按：九日流血事件——罗伯斯比尔的倒台）——无非是细节或偶然性”……①

“‘热月’的道路就是如此。它的胜利受到了它的本性的制约。它不同于旺代和科布伦茨的道路，它依靠革命本身的存在，运用它的原理和受制于它的规律。热月进步是由革命法国的情绪所准备和由国民公会即革命最高合法机关所完成的”（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革命的细节、具体轮廓在我们这里完完全全是另一种样子。而且，从总的情况看，在如今的莫斯科不存在热月九日那样的意外事件的土壤。但是……它不是自动实现的……热月的道路在于革命组织的蜕化，在于其代表人物的心灵的变异”②。

对“革命的命运”无所忧虑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老是说一些多余的话：

“在当前的俄国似乎已经感觉到（所有这些话作者在1921年6月就已写过。——尼·布·）这一阶段的影响。革命已经不象从前了（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尼·布·），尽管它的领导还是原来那些熟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绝不打算把这些人送上断头台。但是他们本身被迫走上了喀琅施塔得山意外提示给他们的热月的道路，——他们逃避得了九日的悲剧吗？布尔什维克的骑士团的团结性、纪律性和官位等级制度是雅各宾分子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列宁比起罗伯斯比

① 《热月的道路》第20页。

② 同上，第21、21—22页。

尔要更为灵活和敏锐。”如此等等^①。

我们之所以援引了关于维斯瓦米特拉的那一大段话，是为了让读者看清楚，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所攻击的（打着自己“庇护”的幌子）恰恰是列宁这位所谓热月变节分子，他要用“热月的道路”把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经济政策即“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抹掉。好吧，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这些论点。

首先是关于法国问题。的确，我们不大清楚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历史知识的深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认为乌斯特里亚洛夫不了解自己的分析的全部贫乏性。在他看来，法国急风暴雨式的反革命历史是多么地平稳！“热月的道路”是多么平坦而文静！处死罗伯斯比尔——这只是小节、偶然性，甚至是历史的“错误”。看，问题就在于“心灵”的变化，仅此而已。多么单纯、可爱！什么“可爱”！应该说是“非常动人”！倒霉的是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历史完全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总之，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方法”远不能满足需要。本来存在各种各样的和相互矛盾的活生生的社会力量，而在他那里则只是千篇一律的“革命的法国”；本来是这些力量的相互交错、斗争、重新组合等等，而在他那里则仅仅是“心灵的演变”，仅此而已。如此等等。反正可以“证明”一切，应有尽有。只是这位教授所说的那些废话能有何用呢？……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避而不谈在热月九日之前发生了粉碎“疯狂的”和左倾的巴黎公社分子即粉碎了贫苦小市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组织的事实。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避而不谈以吉伦特派为首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即怙恶不悛的资产阶级集团——“泥潭派”（“新富人”的思想家集团）和极左派（接近于“疯人派”的左派雅各

^① 《热月的道路》第24页。

宾党人)是联合起来反对罗伯斯比尔分子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罗伯斯比尔分子的口号——“给保皇党分子和热月党分子以战争”(安宁闲逸的口号,不是这样吗?),只字不提。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闭口不谈随后处决左派雅各宾党人、处决大多数巴黎公社社员、粉碎巴黎公社、通过“金色青年”捣毁雅各宾党人俱乐部和通过新政府解散这一俱乐部的问题。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只字不提吉伦特党和保皇党人的复辟,1895年4月工人巴黎反对反革命的起义,四月起义失败后的特别戒严和大规模白色恐怖暴行,里昂和马赛集体屠杀等等;他闭口不谈图伦工人的起义和对这一起义的血腥镇压。显然,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小小的偶然性。是不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呢?关于热月“道路”后来的发展,我们就不必说了,这样会使我们扯得太远。这一切多么象乌斯特里亚洛夫安闲的田园生活,不是这样吗?这多么象那同一些人(“雅各宾派的基本群众”)的“心灵的演变”?

不,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你对法国的历史知道得实在太少!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看不到主要的东西:阶级的流动。他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热月是小资产阶级专政的并非“器官性的”,而是一种灾难性的(尽管是经整个先前的发展准备好的)垮台,它是政权往资产阶级反革命手中的过渡。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件小事。多么好的分析!从中得出了多么好的结论!

单单这一点就使关于俄国的热月的谈论变成一种地道的愚蠢行为。但有的爱好者就是喜欢咀嚼这些枯燥无味的东西。要知道,资产阶级就是希望我们这里的事情也能按“法国方式了结”……

这些爱好者想必或者是出于无知,或者是出于自我安慰,都不了解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主要的和最基本的区别。伟大的法国革命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制

度开辟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而推动这一革命的主观阶级力量则是小资产阶级。因此，小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被推翻是革命本身的逻辑，因为革命的客观任务和它主要的主观因素之间出现了不协调。我国革命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相反，在这里，革命的客观历史“目的”同它的主要阶级动机是严格协调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这绝不是说无产阶级是活动在社会真空中，这样认识问题等于是一种犯罪性的理论轻率行为。但是画面的复杂性并不排除它的基本轮廓及其决定性的布局。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只能有一条出路：他指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政府的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代替，在我们这里（通过某种根本不同于法国那样的极为独特的形式）发生了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实质的彻底“变异”。诚然，这不是什么“热月”，但是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是一种非同一般的危险的和致命的东西。事实上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正是在利用这一点，借机玩弄可以说是加强资产阶级在国内活动的花样，当然打的是“革命的旗号”。

我们在这里又要占用很多时间让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自己出来讲话：

“考虑一下苏维埃政策发生的演变过程，不能不发现它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在国内建立新的社会联系（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尼·布·）。很自然地可以设想，连俄国国家政权也将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革命过程中有机产生的这些新的联系……莫斯科必定要依靠的那个社会基础也在发生彻底的变化，而且是在往共产主义完全相反的方面变化……”

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基础在革命年代不断地演变着。起初它是由希望和平的士兵、要求面包的工人和追求(1)地主土地和财富的农民组成的。后来它变成了城市无产阶级同“贫

农”的联盟。再往后又不得不考虑(唉,多半是在口头上)臭名远扬的“中农”,而实际上是不得不求助于专门的特权集团,包括军队——警察和官吏”^①。

“列宁——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继续写道,——明白,忽视人民群众心理上的变化对政权是有害的……不可能对已经形成的形势的实质下一个更好的(比列宁所下的——尼·布·)定义。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它今后不可避免的结果:革命的俄国就其社会实质来说,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的国家”^②。再接下去:

“尽管现在‘新’资产阶级声称自己主要是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坐享其成者’和风度很坏的投机家……可是连经过革命培养和锻炼的创造性的资产阶级(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尼·布·),当然,首先是‘壮实的庄稼汉’,也一定会投靠他们的”……^③前面有一段话说得更明确:

“越来越清楚,莫斯科要想‘退回到共产主义’,那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各种新的社会联系正在形成,‘苏维埃资产阶级’日益成熟……新的经济因素——农民、‘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和城市新资产阶级同革命建立起来的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根本不希望恢复强制性的‘共产主义’……当新资产阶级的骨干完全成熟起来,看来相应的‘反映’也会接着在‘大政策’中表现出来”^④。

看来我们已经援引得够了。我们想,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这些言论(和教导)的主要毛病在哪里。就

① 《革命的逻辑》第94页。

② 同上,第96页。

③ 同上,第98页。

④ 《演变与策略》第53—54页。

象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经济领域里把国家总“资产”的62%（公有化部分）一笔勾销一样，他把全部无产阶级也不加思索地抹掉了。事实上他在非常具体地说明那些“新的联系”、“坐享其成的”资产阶级、有事业心的和“创造性的”资产阶级，等等。但是大家对工人能了解些什么呢？他们的数量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呢？工人阶级是在团结起来还是在不断分离和继续分离呢？无产阶级的社会比重是在提高还是在降低呢？一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被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抹掉了，而整个无产阶级自然也就不再存在了。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社会分析上的错误同他在纯经济分析方面的错误是完全相称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就是说，各种经济形式都有自己的阶级的承担者，而这些经济形式的交错、它们的联系、它们的斗争在社会阶级领域中得到了或多或少准确的和相等的反映。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既然在确定各种经济形式的比重时（国家工业的毫无根据的夭折）捣了鬼，那么他在确定各种阶级的比重时也就不得不捣鬼。实际上不仅新的资产阶级“联系”在形成，而且我国工业恢复过程集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也在更为迅速地增加。在社会阶级关系领域里，这是我国现实生活的决定性的事实，基本的事实。没有这个事实，我们的事业自然就要完蛋。可是结果相反，它不仅没有完蛋，而且它还前进了，这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增加了，并加强了自己的社会稳定性和威力。但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会对我们说，如果数一数居民的“人头”，小资产阶级的人数要多得多。这一点是对的。可是在这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却又在莫名其妙地起来保护他通常尽其所有热情反对的那个“数学观点”。在这里我们又要涉及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论据，而且不能不说：“呵，你们这些空泛的人，我们可敬的批评家！”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位哈尔滨教授在“深思发生的演变过程”时，把自己的任务完全简化了。现在我们就来一步一步地探讨他的论据。

“起初”，噢，对了，按照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说法，“起初”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由士兵、工人、农民组成的。妙极。仅仅如此吗？仅仅如此。

当然，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教授先生，请想一想，这是极其不够的。首先，不难看出，“士兵”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阶级范畴：这里每千人中有 999 人是农民。这是第一。其次，“起初”工农联盟的内部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看来，这似乎是小事情。而在事实上，它却是主要之点。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那就不可能对“社会基础”作任何“分析”。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我们认为，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取得政权以后，是它的专政，这是它对农民领导权的一种国家形式）保证了革命的胜利。数字和数学“观点”在这里也不管用了。需要把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时常喜欢援引的列宁的精彩言论拿来同它加以对照。

“动摇分子的人数多。我们的人数少。动摇分子是分离涣散的。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动摇分子在经济上是依赖别人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动摇分子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又想干，又怕疼，米留可夫又不允许他们干。而我们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所以我们一定会胜利。”^①

这不是庸俗的“数学”观点。这是真正的分析。

读者，请看，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是多么“彻底地”在重复同一些方法论上的错误。当他谈到法国时，人们从他那里见到的不是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38—539 页。——编者注

准确明白的阶级评定，而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革命的法国”，在这里，所有的猫儿都一律是灰色的或一律是红色的，因而在这里可以发现与众不同的“巧妙”论据。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这种场合怎么办呢？他故意用“士兵、工人、农民”来淹没无产阶级专政。在他那里，这种专政早已不在了。这样就更便于他在“后面的文章”里假心假意地对它表示哀悼。它“起初”越少，到“最后”也就越少。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唉”！——这是根本说服不了人的。

正象预料的那样，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陷入到最一般的、最普遍的错误当中：他把一些阶级在社会上的某种密切合作（有时是“联盟”、“同盟”等等）同这些阶级在政权上的合作（有时是“联盟”、“同盟”等等）问题，即同分权问题混为一谈。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专制。但是，它，即这个专政可以同农民或他们的一定阶层结成最密切的联盟或同盟。当然，在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客体、这一关系的积极成员，对待自己的阶级伙伴的态度可能要起变化，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消失。这种理论上的可能的消失要求具备完全特殊的条件。

现在大家可以看看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后来的阐述当中玩了些什么花样。最初形式的“基础”改变成为“城市无产阶级同贫农的联盟”。是这样吗？是，也不是。这里还需要加一点：第一，“联盟”应理解为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城市无产阶级同“贫农”的联盟；第二，不可以忽视对中农或至少对其很大一部分阶层的中立。

这时在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言论中出现了“跳跃点”。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直接声称，“不得不考虑（唉，多半在口头上）中农，而实际上是转而依靠……军事—警察（著名特殊人物，苏维埃政权“只能依靠”他们！——尼·布·）和官吏集团”。接着，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一下子就转向了新经济政策、新资产阶级、“生意人”等等。这就是政权的社会基础的“彻底改变”！

现在让我们来见识见识他要的这套鬼把戏。

是谁不得不“考虑中农”呢？（应该说的不是“考虑”——向来都是考虑的，——而是寻求同他们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如果它在这时已经消失了，那至少应当把这一奇迹公之于众。是谁不得不“在实际上”依靠军事—警察集团呢？显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从阶级意义上来说，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所谓“依靠”“军事—警察集团”无非是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无产阶级需要有特殊的镇压机关。不过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显然不想说出口而已。在他那里，无产阶级已不存在，“政权”的唯一支柱就是肃反委员会，如此等等。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一点一点地把无产阶级抛开了，尽管他不肯向读者公开这一点。既然他有了“新资产阶级”，所以他就想立刻用它来支持那个可怜的架在空中的“政权”。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给它穿上资产阶级裤子，或者更精确些说，在苏维埃政权的裤子里塞进资产阶级的东西（尽管这是一种“新鲜东西”），并且马上一口咬定说，政权蜕化的论点已被“证实”。何必那么匆忙呢？

如果无产阶级随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即国营工业的垮台而不断被粉碎，那么这类蜕化在实际中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由于这种过程早已不存在了，由于国营工业的衰落过程已被它的迅速高涨所代替，所以最后落空的绝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那些路标转换派分子。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那套所谓“没有主人”即没有无产阶级的说法在他更靠后的一篇涉及1923年底的情况的文章里讲得尤其清楚。他在文章里写道：

“在革命中保住了自己、消灭了地主和战胜了‘康姆尼①’

① 即共产主义。——编者注

的庄稼汉明显地在变成时局的实际主人。城市用国家机关手段建立不依靠任何经济基础（!!!）的这种企图在本质上是不能没有漏洞的。未来属于经济进步和经济创造因素，而不属于只会增加本来就已贫穷不堪的国库的负担的经济浪漫主义的温室成果。政权将一定会探索到、而且已经逐渐探索到自己健全的社会基础……组成新俄国的核心的‘人才’也正在显现出来。这首先是指农民—生产者，即‘壮实能干的庄稼汉’。他们一定会在城市里得到反映、继续和补充。克拉辛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严加讽刺的那些共产主义的‘党内作家’和‘高级政治总督’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人。他们的时代已经自发地流逝了。那剩下的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和合作社社员中的那些新一代的经济人员和实干家……但是除了他们以外，也不应该忘记那个最平凡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它不能不在这种和那种范围内重生……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就以他平时所特有的坦率精神承认了这种不可逆转性。”^①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我国社会力量的“混乱”中进行了发掘，觉得为自己找到了能够为他的阶级提供长远的有保证的生活的真正宝藏。我们不妨用浮士德的话来回答他：

“此人的脑中永远留着一切的希望，
他永远固执这世界的衣裳，
贪婪的两手向着宝藏深挖，
挖着一条蚯蚓也快活无量！”^②

顺便说一句，我们多少有点夸张。因为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毕竟还是“挖”出了点什么。但是这绝不能使他的整个论点得救。

^① 《左面的回答》142—148页。

^② 歌德：《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1—32页。——编者注

我们还是回到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论断上来。但是，首先我们发现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是寄希望于“最平凡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加上已经蜕化的那部分经济人员，加上那些能在上述“最平凡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领导下把“壮实能干的庄稼汉”带动起来的专家。

换句话说，这一意图旨在使私人资本相应增加并逐渐战胜国营工业。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理论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论据，这是不难再一次得到确认的。

但是，在乌斯特里亚洛夫看来，“城市”在徒劳无益地试图建立一种不依靠任何经济基础的“统治阶层”。这种梦话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什么是“城市”呢？要知道，乌斯特里亚洛夫的那个“最平凡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似乎也是属于城市的吧？何必隐瞒呢？显然，这里指的是“城市”的另一些因素。但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他觉得对无产阶级专政以不提为妙。其次，这种要建立不依靠“任何经济基础”的政权的“意图”是个什么怪物？这个似乎不仅没有基础、而且千方百计地拒绝基础的发了疯的政权是个啥家伙？这套胡说八道是什么意思？

如果抓住它的“合理的内核”，它的意思便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不相信国营工业的基础。另一方面，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确认，政权不愿意依靠非凡的和平凡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相信蜕化的不可避免性，并且说服政权不要悬在空中，而要依靠可爱的“工商界”。

正因为如此，国营工业在他那里便成了变相的“平凡的政治浪漫主义的产物”。请看，社会主义成了浪漫主义的空想，未来是属于以“平凡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首的“经济—创造性因素”。

我们简直想象不到，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怎么会在1925年出版自己的书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平凡的产物”几乎达到了战前的水平。“浪漫主义的幻想”周生长满了肌肉，而且急速地发展成为最真正的现实。整个私人经济的“创造性因素”都在退却，尽管它在个别阵地上暂时取得了这样或那样的胜利。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事前为自己绘制了一幅美丽的（根据资产阶级的观点）图案，顽强地重复自己的一套东西，他显然是在借欣赏自己风格的艺术热情来寻求自我安慰（如佛罗依特所说）。这位可怜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完全象一只已经丧失了视觉和听觉的正在发情的大雷鸟。乌斯特里亚洛夫讲话中所施展的那套“魔法”的迷惑性是很刺眼的。

“既然想说真话，
何必故弄玄虚？
岂知矫揉造作的言词，
如同在光秃的树枝间呼啸而过的秋风，
既潮湿，而又令人厌倦。”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正是“经济空想”的发展使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希望走向破灭。我们暂且假定我们的工业时时都真正在衰落，而私人资本时时都在增长。那时商业私人资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工业资本。那时“非国有化”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那时政权就会失掉无产阶级的基础。那时也就会非常自然地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部分经济骨干出现私人资本主义的蜕化，实际上同“最平凡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融合在一起。

啊，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该有多么高兴！不过这仅仅是这位在“新道路”上为自己寻找安慰的往日的高尔察克分子的“浪漫主义空想”。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不了解阶级的主要布局、它们的比重、它们的关系的变动，因为他不了解的恰恰是“经济基础”的变动。

所以说他见到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是那样地欣喜若狂。他看不到，我们之所以扩大商品流转的范围，取消农村私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行政障碍，是因为我们已经具有现在和将来日益有力地支配着整个全国经济的强大的经济命脉为后盾。事情正在向这方面发展。很遗憾，真是罪过，在对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评论里，“最正统和最纯正的布哈林（最后的这个形容词是指什么，我也莫明其妙。——尼·布·）、严厉的正统信仰的柱石、法律和预言家的论断”使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遭到误解。据说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断定，我向党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是指望让农村的掠夺者来收拾贫农。谁相信这是党的口号呢？实在说，很遗憾，我的表述方式引起了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多余的幻想。（这种表达方式无疑是对完全正确的论点即党应该采取提高农村福利的方针的错误的表达方式）。但是，要知道，在我和其他人的报告里以及在党代会的决议里提出的路线的实质并不在这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高兴得手舞足蹈，以为这一下可是“大功告成”了。于是他自然就弹起了自己动听的七弦琴，按照自己的风俗，呼唤着伟大列宁的灵魂：

“但是列宁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他将永远活在自己的党里和全部革命里。而这也就是说，可以对一切事情放心了。”

是的，列宁的灵魂是能够得到安息的。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安息，是因为党能够用坚强有力的手引导国家沿着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前进，以保证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

四 革命和进化。对列宁的诬蔑。“时代的哲学”。法西斯的凯撒主义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总是企图用轻柔绵软的云雾把他的读者

“遮蔽”起来。为了寻找日新月异的革命国家的综合“风格”，他双手紧紧地抓住耐普曼又脏又俗的破长衫，把耐普曼的尚未发挥的德行捧为至宝。但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找到这个“综合风格”以后，便登上意识形态的白雪皑皑的高峰，简直被耐普曼的富丽堂皇弄得神魂颠倒，从“应有的东西”（这种“应有的东西”是新资产者的必然的绝对命令）的观点去解释“存在的东西”。

“革命的天使悄悄地飞离了国家——

但是他已经保证自己流芳千古。”^①

“革命……是精神，它首先是活的精神。它是一个国家在自己生活的一定时期的风格。它是一个有始有终的生命迸发。国家已非四年前的国家了。无论是物质状况还是心理状况，无论是国际形势或国内形势，都大大不同了。“试验”已经作完，最高的革命炽热已经过去。黄昏开始了，也许要象北方国家的黄昏那样又久又长。”^②

“革命正在结束，俄国正在复兴。”^③

可见，“阿尔卡季朋友”还没有忘记“说漂亮话”。

但是，他决没有学会清醒地思考，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把全部时间都用去研究“精神”和“天使”，只是为的证实下述的“思想”：因为“革命炽热”的时代现在已成过去，那么，就是说革命结束了。既然革命已经结束，那么，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炽热”的其他仓卒产物也就“消声匿迹了”。这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实际上想说的话。

这一套思想可能使某些人上圈套。因为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一些同志：只要英勇的“搏斗”一结束，平淡的“商工业”时代一到

① 《革命的黄昏》第4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44页。

来,他们就开始意志消沉。

“战士们回忆过去的日子,
想起他们共同参加厮杀的战斗。”

但是,只把革命简单地理解为直接的武装斗争的这种“战士”,在我们当中毕竟是很少的。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乌斯特里亚洛夫这位先生、教授、“学者”、等等,可以说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不过立场有所不同。因为如果按照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想法推论,那么为了不出现“革命的黄昏”,人们就干脆不应当停止街垒战,而要继续进行国内战争,否则“革命的天使”就会飞走,以后再也不能把它捕捉回来。

这一套胡说八道,甚至对它加以反驳都是荒谬的。但这一套胡说八道却正是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观点的基础。

教授先生,还是请允许我正确地提一下问题吧。

社会主义革命一词的正确意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它首先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镇压剥夺者的反抗。以后,新社会便开始有机地进化增长,这个增长本身就是伟大革命改造的组成部分。如果在革命的这个阶段,经济的实际社会主义化过程以迅速的步伐前进,那么,只有什么也不懂的人才会谈什么“革命的黄昏”和就要飞走的革命“天使”。相反,事态的这种过程正是革命的胜利,而决不是革命的“黄昏”。同样地,如果我们能够活到电工技术获得全胜的时候,那么,这将意味着革命的最大胜利,而决不是表明革命的最终灭亡。只能从一定的角度上说,当革命已成为多余的时候,即当革命达到最终胜利的时候,革命就会死亡。但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说:不然,不然!因为他避而不谈在“革命的天使”飞走以后,立即会飞来黑色的“反革命天使”来“补缺”,毫不客气地把它的蹄子放到桌子上。

要使真正的“革命的黄昏”到来,必须有私人资本有机地排挤

国营经济的过程。但是偏偏没有这个过程，而有一种相反的过程。因此，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天使不得不改换路标，为自己另行规定路线……

但是，根本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毫不奇怪，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同伙来支持自己的反革命纲领……读者，你们猜他找的是谁？是列宁！对了，恰恰是列宁。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写道：“我们指出……社会主义在现代俄国是没有希望的，苏维埃的领袖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粗暴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①

这么说，列宁似乎在诊断时同意了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意见。这么说，列宁好象认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毫无希望了。当然，这是阶级敌人对列宁惯用的诬蔑，可是这种诬蔑已经长了一点根。其实，列宁是这样说的：

“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

敌人力图使这种危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②

这是绝对的真话。因此，列宁决没有断言我们已经蜕化或正在蜕化，等等。列宁只说过这是可能的，必须斗争、斗争、再斗争，以使这种可能不致于变成现实。但是，承认这一点决不是同乌斯特里亚洛夫唱一个调。恰恰相反。应当象撕下所有敌人的假面具那样，撕下这个敌人的假面具。对于我们的胜利一分钟也不能失去信心。但是，必须敏感地注意敌人所警告的危险，以使用相应的力量痛击敌人和加强薄弱的战线。

现在我们比以前强大得多了，无比地强大起来。几年以前，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产量还不足战前的百分之一。这是应当记住

^① 《革命的逻辑》第 10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253 页。——编者注

的。伊里奇逝世以后，我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我们的整个国营工业都站住了脚跟，运输业提高了，银行网建立并巩固起来，合作社（天才的导师为它规定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开办起来。这并不是说，一切危险和矛盾都已消失了。它们发展到“最高级”，上升到新的阶段。至于内部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但是，我们的力量还是越来越占优势，而且如果我们能执行正确的政策，今后还会更占优势。我们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由于无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强大的经济命脉，我们不断扩大一般商品流转范围，甚至取消妨碍农村中富裕农户发展的一些限制，因为扩大一般商品流转对我们比对敌人更有利；同时，我们正在整顿贫农战线，安排与中农的巩固联盟，并筹集了援助农村中贫苦阶层的基金。我们一再加强社会主义的基础——大工业。我们一再整顿合作社，合作社是城乡之间的主要桥梁，农村应当通过这条桥梁稳步走向社会主义。

道路日益明显，我们的方针日益明确。但是，看不见危险也是愚蠢的。粮食采购的例子，使我们看到私人商业资本仍在巧妙地活动着，我们的机关还在犯错误。这种私人资本为了影响农民而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以羽毛已丰的富农作为自己的基础。各种倾向、各种发展道路、各种经济形式、各种社会力量都在照常进行着斗争。但是，如果我们一面能看到所有的危险，另一面满怀胜利信心地坚决执行自己的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这就是列宁的主要美德，任何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不管他们怎么进行可笑的拚命挣扎，都不能使我们放弃这种美德。

这些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老爷硬要篡改历史，擦掉历史，用路标转换派的梳子来梳历史。无论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怎样卖劲地用巧妙的诡辩术来盗换辩证法，他也达不到这个目的。可是他很卖劲儿。只要欣赏一下下面的文章就行了：

“过去是‘快速的共产主义’，现在正恢复私有制。……过去是‘快速的世界革命’，现在把‘走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方针’提到日程上来，并放弃反对资本主义的极端主义斗争方法。过去是好战的无神论，现在盛行‘同教会妥协’。过去是不可遏止的国际主义，现在要‘考虑爱国情绪’，并适应这种情绪。过去是最正统的反军国主义，但是如今红军早已成为革命的骄傲。这样的对立还可以无穷无尽地继续数下去。”^①

在同一个花束里还有这样一朵花：

“列宁以鼓吹立刻燃起全欧烽火开始，以竭力鼓励亚洲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遗教和对‘土耳其斯坦社会主义’的离奇赞扬告终。于是，俄国在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出乎意外地（！！）和独出心裁地找到了它固有的‘欧亚’的历史使命。”^②

哎呀！怎么能不钦佩这一套诡计魔术呢！把列宁变成德米特利·顿斯基^③，把《国际歌》变成《天佑沙皇》^④，把红的变成白的，把共产党人变成路标转换派分子，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欧亚”的耐普曼国家，如此等等，“没完没了”，对这些离奇的变法仍然需要回答。

我们从末尾开始。

这指的是列宁以鼓吹西方革命“开始”，以嘱咐“亚洲人”的革命运动“告终”。结论是以“欧亚”精神使自己蜕变。

真不想用议会里的语言说：“你扯谎也要有个分寸！”还是叫乌斯特里亚洛夫多受一点基本教育吧。列宁（教授先生，可以告诉

① 《革命的黄昏》第44—45页。

② 《七年》第164页。

③ 德米特利·顿斯基（1350—1389），1359年起为莫斯科大公，1363年起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曾实行统一罗斯的政策。——编者注

④ 沙俄国歌。——编者注

您)——“开始”就在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中特别重视民族运动和殖民地运动。不稍稍知道一点儿这个……是可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有什么逻辑根据把欧洲革命同亚洲的运动对立起来呢？或许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不明白诸如中国和印度的运动，归根到底也必然会加剧英国的运动、即“欧洲革命”。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还有什么“论据”呢？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再往下谈。“最正统的反军国主义”是“开始”。蜕化的“结局”是“红军”。我们的批评家的恼人的无知和哈尔滨式的不学无术——教授先生，请原谅——只有令人再一次感到惊讶。如果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哪怕是看一眼战前和战时（1914年和以后几年）的布尔什维克文献，他就会看到布尔什维克同其他一切反军国主义者相反，一开始就主张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把我们同和平主义者混为一谈，这就暴露出他一窍不通，更谈不到有什么逻辑！仍然处在国际包围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革命的军队怎么可以想象呢？知道这一点似乎很重要。看来，连吃奶的孩子也明白这一点。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红军”论据有什么根据呢？同样是什么也没有。

起初是“不可遏止的国际主义”，而最后是“考虑爱国情绪”。这是第三号“对立”和蜕变的第三个证明。

这么说，按照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推论，我们以前“没有考虑”过“爱国情绪”。但是，在这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又暴露出“不可遏止的”无知和“不可遏止的”健忘。我们现在只举一个反例。二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曾建议无论如何要考虑“善良的迷途群众的护国主义”，即他们的爱国主义。当时是不是这样呢？“不可遏止的”开始在哪里呢？既然在爱国主义客观上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考虑爱国主义，那么在它转而拥护我们的时候（例如在“波兰战争”时期）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考虑它呢？从共产主义观点来

看，有什么理由反对把俄罗斯爱国主义或乌克兰爱国主义纳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爱国主义”轨道呢？在这方面，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也完全遭到了他应得的彻底破产。

“战斗的无神论”是开始，“同教会妥协是终结”。多么好听的词句！在我们开始革命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进行无神论的宣传。而现在，我们正在不声不响地极其广泛地进行这种宣传，而且利用着各种宣传和鼓动工具；我们正在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宣传，宣传的形式比几年前更加完善，宣传的内容比以前更充实。难道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无神论”论据也成泡影了。

我们再往下谈。

“过去是快速的世界革命”，现在是采取“走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方针”，“放弃反对资本主义的极端主义斗争方法”。这完全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在学张伯伦的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实际上想说什么呢？想说现在欧洲的革命情绪没有1921年高吗？这是事实，我们也应当考虑这个事实，但是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想法相反，这个事实一点儿也不能直接影响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实质。难道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发觉”我们从对资本家进行战争转向同他们和平，从而就“蜕化”和“改变”了吗？然而，这时我们要提醒显然患了健忘症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我们在1917年进行革命的时候就提出了和平的口号。我们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主张过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战争？你在胡说什么，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

但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却使自己完全……“变样”了。在他看来，好象我们把“走向世界革命的方针”改变为“走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方针”。“走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方针”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十分清楚。这也许只指贸易、外交关系和信贷业务等等而言。按照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意见，如果坚持革命方针，那就不能进行贸易，是不是这样呢？难道这里需要按照“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方法

解决问题吗？嘿，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据说你还欣赏过黑格尔呢！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可怜地重复考茨基等人的可怜论据……最后，谈谈最末一项“证明”：“快速的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对立。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前几章说得很清楚了。在这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又暴露了他的健忘（忘记了因战争和武装干涉而中断的我国的第一个“纲领”）和不理解我国经济的基本过程（发展的矛盾性，社会主义成分的加强）。

就是这些。这也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全部重炮。你的大炮都没有炮闩，不能射击。

我们认为，上述的一切已把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主要概括性思想、他的民族的——“欧亚的”“时代的哲学”驳得体无完肤了。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从现代的巨大危机中汲取的教训只是：伟大的俄罗斯国家发展起来，以新的形式和新的方法继承着克拉姆津所说的强大“俄罗斯国家”的“光荣”历史传统。在这里，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思想上以最动人的方式同苏维埃国家的一切敌人（从考茨基到张伯伦）聚合在一起了。简而言之，总而言之，在乌斯特里亚洛夫看来，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是瞎吹。但是，具有自己的规模空前广阔的政策和拥有正在加强俄罗斯在世界各地的影响的铁一般的人的新国家，并不是瞎吹。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从这种观点出发，准备欢迎我们：

“要知道，不论是阿列克谢也夫，还是高尔察克或邓尼金，他们都没有政权欲。他们都……是窝囊废们的窝囊领袖。”^①

共产党人则不同，他们是：

“具有铁心、机器灵魂和神经粗如巨索的钢铁怪物……万尼亚舅舅或三姊妹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呢？……”

^① 《片断》第 348 页。

我们的‘军事’战线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呢！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用聚集的能量烧得灼热的可怕的反射器呢？

他们在破坏没落的文化，以新的意志滋润大地，而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后，他们就会由于自己的毁灭性细菌而致死。”^①

然而在目前，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却希望供应这种“毁灭性细菌”。因为，如果说正经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时代的哲学”也是不正确的，具有深刻的悲观主义，虽然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

这个哲学所以不正确，是因为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无论如何没有了解这样一个主要事实：苏联的极其巨大的影响的基础，不仅在于我国已由“有志之士”接替了“窝囊废”，而且在于我国已经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我国的影响所以增长，是因为新的社会关系在增长。我们的声音所以响彻亚洲和非洲，是因为我们放弃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民族共居的新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联盟。简而言之，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理论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这个理论不理解这样一个决定性因素：现在的全世界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而且也只有这一条出路。

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理论具有深刻的悲观主义，虽然它的创造者也唱着精神焕发和欢乐愉快的调子。这个理论所以是悲观主义的，是因为它预言我国又要出现资本主义周期，即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还要继续再现。可以说，这个理论是在重复那老一套，而且是向“全世界”重复。如果这一套一旦成为现实，这就意味着整个文明人类的灭亡。

但是，仍然可以认为，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理论实质上是悲观主义的，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乐观的。那些一心想着昨

^① 《片断》第353页。

天而不是看未来的资产者，就认为是乐观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也特别害怕往远看，当主要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出来的时候，他就到处划一些没有用的问号。因此，他为自己创造一套比较简单的理论、战略和策略。

这就是俄国法西斯凯撒主义的理论、战略和策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这种凯撒主义规定的全部成分是：他的民族主义，他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某些德国法西斯分子正是这样自称），他与一些将军和德国国防军一同强烈表现出来的反议会主义，他对墨索里尼的崇拜，他对领导“壮实的庄稼汉”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霸权的指望，他的露骨的凯撒主义理想，他的“民族帝国主义的”野心，他对“政权欲”的崇拜，他同社会主义的斗争（目前是谨慎的）。他希望这一切成分不仅在他那里日益“成熟”，而且使可以真正制服“恶棍”的伟大救世主最后降临……

但是，用一句老俗话来说，这就是梦中见鬼，求神保佑。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已经不止一次地发出预言，但是一次比一次遭到更惨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总也未能自圆其说。但是“密纳发的猫头鹰”早已起飞了，而人们所要理解的东西也完全不是那么奥妙。请看下面这个例子。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写道：

“革命前在俄国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积存的无穷历史祸害，已经能够消除了，唉（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特别喜欢喊“唉”。——尼·布·），只是用一场大灾难来消除的。”

这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他的“大作”的第112页说的。我们在第137页里读到，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站在反对立场是“有害的和犯罪的”。可是，你得要理解什么对什么！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根本不理解世界战争，不理解专制制度的“历史祸害”。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根本不理解国内战争的意义，只是在事

后他才开始懂得白匪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不了解我们现在进行的经济“战”，而在这方面公开站在我们敌人的阵营。毫不奇怪，他实际上在维护经过改良的专制制度，即新式的专制制度。法西斯凯撒主义，也是专制制度的一种形式，不过它是用火和炮建立的，它没有旧式贵族的徽章，而有“掮客”、投机商和形迹可疑的“生意人”的镀金徽章，它依靠的是新的官吏阶层、富农和粮商、被它收买的丧失阶级性的荒淫无度的“群众”。

在我们的所有敌人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凯撒主义分子”这伙先生。他们嘴甜心苦。但是，我们丝毫不怀疑他们的“梦想”永远是“梦想”。乌斯特里亚洛夫这伙先生可能夸奖我们，可能采用我们的某些东西，可能竭尽全力企图从内部扼杀我们，可能用尽最后的气力来支持新资产阶级。但是，总的历史结论是：

“拾人牙慧，
徒劳无益；
硬吹冷风，
炉火不旺。”

有一个将来可以支配全世界的伟大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共产主义。

第一次发表于1925年。译自《真理报》
1925年11月13日、14日、15日。